

FLC

外国语言与文化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季刊

| 第5卷 第3期 | (总第17期) | 2021年9月 |

外国语言与文化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 第5卷 第3期 | (总第17期) | 2021年9月 |

主 编: 蒋洪新 Editor-in-Chief: Hongxin Jiang
副 主 编: 邓颖玲 Associate Editor-in-Chief: Yingling Deng
执行主编: 曾艳钰 Executive Editor-in-Chief: Yanyu Zeng
编辑部主任: 任海燕 Managing Editor: Haiyan Ren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宁 上海交通大学
王守仁 南京大学
王克非 北京外国语大学
王宏志 香港中文大学
马歇尔·布朗 美国华盛顿大学
申 丹 北京大学
许 钧 浙江大学
克劳德·劳森 美国耶鲁大学
张隆溪 香港城市大学
李德凤 澳门大学
束定芳 上海外国语大学
杨金才 南京大学
陆建德 中国社会科学院
陈众议 中国社会科学院
布鲁斯·罗宾斯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金 莉 北京外国语大学
安·海尔曼 英国卡迪夫大学
聂珍钊 浙江大学
黄友义 中国翻译协会
黄国文 华南农业大学
黄忠廉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劳瑞·沙耶尔 湖南师范大学

Editorial Board

Ning Wang,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ouren Wang, Nanjing University
Kefei Wang,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Hongzhi Wa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Marshall Brow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Dan Shen, Peking University
Jun Xu, Zhejiang University
Claude Rawson, Yale University
Zhang Longxi,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Defeng Li, University of Macau
Dingfang Shu,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Jincai Yang, Nanjing University
Jiande Lu,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Zhongyi Chen,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ruce Robbins, Columbia University
Li Jin,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Ann Heilmann, Cardiff University
Zhenzhao Nie, Zhejiang University
Youyi Huang, Translators Association of China
Guowen Huang,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Zhonglian Huang,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Lauri Scheyer,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主 管: 湖南省教育厅 出版发行: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海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主 办: 湖南师范大学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2096-4366 海外发行代号: QR9393
编 辑: 《外国语言与文化》编辑部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43-1536/H 国内发行: 湖南省邮政报刊发行局
邮 箱: jftc@hunnu.edu.cn 印 刷: 湖南雅嘉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国内发行代号: 42-380
地 址: 湖南长沙岳麓区麓山路36号 出版日期: 2021年9月28日 整体设计: 周基东
电 话: 0731-88873041 定 价: 28.00元 排版制作: 书亦有道

本刊已被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中国知网及其系列数据库(CNKI)、Scopus数据库、ERIH PLUS索引收录, 不以任何形式收取版面费

期刊基本参数: CN43-1536/H* 2021 *q* 16 * 160 *zh*P*¥ 28.00 * 2000 * 15 * 2021-9

目次

洪堡研究

- 001 引言 亚历山大·冯·洪堡——美洲、中国、中亚和世界 奥特玛·埃特 范妮/译
- 007 自然画卷的彼岸——亚历山大·冯·洪堡的双半球植物地理学方案 乌尔里希·湃斯勒 孙纯/译
- 018 曲径通幽——浅谈亚历山大·冯·洪堡《新西班牙王国政治随笔》中的统计图表 维拉·M·库津斯基 易佳/译
- 031 国家之间与国界之外——亚历山大·冯·洪堡与法国文学 马尔库斯·亚历山大·伦茨 张兰洋/译
- 041 第二次半球之旅——亚历山大·冯·洪堡作品中的亚洲之旅 托拜厄斯·克拉夫特 弗洛里安·斯诺 陈珏旭/译
- 051 洪堡、奴隶制与革命——全球性反殖民主义、废奴主义和反种族主义视角 米夏埃尔·措伊斯克 任海燕/译
- 062 莱布尼茨与亚历山大·冯·洪堡 埃伯哈德·克诺布洛赫 岳子涵/译

美国文学研究

- 075 解构“我们”的神话——《屈服》对后“9·11”美国国家特性的再思考 聂祝琳

翻译研究

- 085 华语地区《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中文译介对比研究 李雪伊
- 094 论成长小说翻译中的文学性再造 黄佳佳 徐德荣
- 106 兼容策略，辩证眼光——汪榕培的汉诗英译思想 张智中
- 116 学思并举、知行并重、本外共参——张柏然教授翻译人才培养观 郭薇

国防语言能力研究

- 123 美军军事行动命名的概念隐喻研究——以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为例 梁晓波 李雪莹
- 138 基于语料库的社会网络效度分析——以美国涉中军事科技报道为例 马晓雷 李平
- 148 国防语言能力视域下边防语言能力建设SWOT分析 庞超伟 杨咏运

Contents

- 001 **Ottmar Ette** Introduction to Alexander von Humboldt: The Americas, China, Central Asia and the World
- 007 **Ulrich Päßler** Beyond the Tableau: Alexander von Humboldt's Project of a Plant Geography of the Two Hemispheres
- 018 **Vera M. Kutzinski** Off-Road Adventures: Reading Statistical Tables in Alexander von Humboldt's *Political Essay on the Kingdom of New Spain*
- 031 **Markus A. Lenz** Between and Beyond the Nations: Alexander von Humboldt and French Literature
- 041 **Tobias Kraft, Florian Schnee** The Second Hemisphere: Alexander von Humboldt's Asian Journey as Reflected in His Writings
- 051 **Michael Zeuske** Humboldt, Slavery and Revolution: Global Anti-Colonial, Abolitionist and Anti-Racist Perspectives
- 062 **Eberhard Knobloch** Leibniz and Alexander von Humboldt
- 075 **Zhulin Nie** Deconstructing the Myth of "Us": *The Submission's* Reconsideration of Post-9/11 American National Identity
- 085 **Xueyi Li**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 in the Chinese-Speaking Regions
- 094 **Jiajia Huang, Derong Xu** The Re-creation of Literariness in the Translation of Bildungsroman
- 106 **Zhizhong Zhang** The C-E Poetry Translation Thought of Wang Rongpei
- 116 **Wei Guo** Equal Emphasis on Learning and Thinking, Knowing and Doing and Mutual Reference to Patterns from Home and Abroad: Zhang Boran's Concepts in Cultivating Translation Talents
- 123 **Xiaobo Liang, Xueying Li** A Conceptual Metaphor Study on the Naming of U.S. Military Operations: The Cases of Afghanistan War and Iraq War
- 138 **Xiaolei Ma, Ping Li** A Validity Analysis of Social Networks Extracted from Text Corpora: A Case Study on U.S. News Reports on China's Military Technology
- 148 **Chaowei Pang, Yongyun Yang** A SWOT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of Border Defense Language Capability

FLC

洪堡研究

引言

亚历山大·冯·洪堡——美洲、中国、中亚和世界^[1]

◎ 奥特玛·埃特 范妮/译^[2]

内容提要: 本文是此次洪堡研究专栏的引言,拟简要说明亚历山大·冯·洪堡漫长的一生及其鸿篇巨著。论文不仅梳理了这位普鲁士博物学家和文化学家的教育背景、心理状态和科研活动,还介绍了其著作的写作基础、涉及的多方面知识和这位学者将多门科学联系起来进行思考并将其融入自然绘画的能力。在洪堡那里,美学和伦理学是一个整体,美洲和亚洲基于洪堡自身的经验纳入其宇宙体系之中,所有这些,构成了一种博大的世界知识。

关键词: 亚历山大·冯·洪堡 自然绘画 洪堡式科学 洪堡式写作 跨学科性 自然与文化

中图分类号: I5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2021)03-0001-06

作者单位: 波茨坦大学,德国 波茨坦 D-14476; 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DOI: 10.19967/j.cnki.flc.2021.03.001

Title: Introduction to Alexander von Humboldt: The Americas, China, Central Asia and the World

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an introduction to this Humboldt research column. It is intended to briefly explain the long life and great works of Alexander von Humboldt. It not only lays out the educational background, mental state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activities of the Prussian naturalist and cultural scientist, but also introduces the writing resources of his work, the many disciplines involved, his connection to many branches of science, and his ability to think about and integrate it into a natural painting. In Humboldt's view, aesthetics and ethics are one, and the Americas and Asia are also incorporated into his "Universe" based on their own experiences, and all these are integrated into a broad global knowledge.

Keywords: Alexander von Humboldt, natural painting, Humboldt-style science, Humboldt-style writing, interdisciplinarity, nature and culture

Author: Ottmar Ette, Professor, Institute for Romance Studies, University of Potsdam, Potsdam, Brandenburg, Germany; Professor, Foreign Studies Colleg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China.

在中国，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研究是一个潜力无限的领域：既可研究这位欧洲伟大的全球旅行家；也可以研究他思想和作品中尚未被关注的部分。本文将简要介绍这位博物学家和文化学家所涉足的广泛领域，同时概述其对后世的影响。亚历山大·冯·洪堡研究也为中国学界开辟了巨大的空间：一方面，中国学者可以借中国视角发现他研究中的新问题；另一方面，尽管洪堡对中国抱有巨大的研究兴趣，截至目前其作品中的中国视角依然乏人关注。因此，本文既是引言，亦是呼吁：亚历山大·冯·洪堡关于中国的论述有着难以言喻的重要性。

亚历山大·冯·洪堡是谁？他的生活和工作经历以惊人巧合的方式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持续将近30年。1769年，他生在柏林，出生时恰有一颗彗星出现，这被视为某种预兆。尔后，他成为了一名他本人称为“游牧者”“多门科学的门外汉”的人。他在1806年1月回顾道：“我充满躁动和兴奋，从不因所取得的成就而高兴，做新事情的时候，只有当一次做成三件事，我才感到高兴。人们无疑会在因这一游牧生活带来的躁动不安，寻找我作品极度不完美的主要原因。[……]我的健康并未因此受到影响，在我发表了美洲科考之旅的研究成果之后，我开始准备前往亚洲的旅行。”（Humboldt, *Aus meinem Leben* 60）

由此，我们不仅能推断出洪堡开启亚洲之旅的急切，还能得到直至那时他一直过着“游牧”式生活的印象，且这种生活还将继续。这既将他带到各个国家，也使他跨越各种各样的学科。他在这里提及的“不完美”指的是作品的不完整，在出版了几十部专著之后，即使作品有几千页，他的整个出版体系也必然是不完整和未完成的。

在人生的第一阶段，母亲给予了他和哥哥威廉（Wilhelm von Humboldt）最好的教育。按照母亲的意愿，他在奥得河畔的法兰克福维亚德里纳大学学习，所学专业跨越化学、数学、植物学、地理学、历史学甚至财政金融学。年轻的洪堡有时是一个接一个，有时是同时学习多个学科的知识。在哥廷根大学，他进一步扩展了其学识的多样性，涉猎人类学、颅骨学、语言学和哲学。此外，他还曾在汉堡的一所商学院学习，对全球的交通和贸易状况有了初步的了解。在萨克森州著名的弗赖贝格大学，洪堡仅用常规时间的三分之一就完成了采矿地质学的学业，并在普鲁士矿务局开始了快速升迁的职业生涯，这段经历使他很快成为坚决推动普鲁士现代化的年轻一代中的一员。洪堡是各行各业的万事通，而且知识并不粗浅。他精通业务，在当时普鲁士的官僚机构中有着非常好的晋升机会。但洪堡厌倦了：他不愿仅仅将自己的前程限定在普鲁士的高级官员队伍之中。一条康庄大道摆在他面前，这条路使他后来成为19世纪最伟大的名人之一，且远远不止作为一名科学家。

洪堡抓住了过上这种生活的机会。母亲去世后，他不假思索地离开普鲁士，将遗产变成了现金，用于他最渴望的欧洲之外地区的旅行。所有的门似乎都向他敞开了。是环游世界还是和法国科学家一起跟随拿破仑的军队去埃及？是穿越海洋前往突尼斯探索非洲北部？亦或是去摩洛哥，登上高阿特拉斯山，再穿越非洲北部抵达麦加，然后经埃及、希腊和意大利回到西欧？但是，所有的计划，都因为当时的政治和军事冲突无法实施。在这些旅行计划失败之后，横穿

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的旅行最终使他成为了 1799 年至 1804 年间的国际科学之星。这是一次穿越今天委内瑞拉、古巴、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墨西哥，再回到古巴的旅行（埃特 2-11）。在本专栏中，库津斯基（Vera M. Kutzinski）的论文介绍了洪堡在新兴的墨西哥的科学研究，并揭示了文字与图像之间的相互作用。

洪堡生命的第二阶段由此开始。一种新的科学概念在转变中起了决定性作用：洪堡在旅途中创立、在后来的著作中确立的洪堡式科学。同时，他还加强了对法国文学的研究，并成为了一名兼用德语和法语写作的作家，专栏中伦茨（Markus Alexander Lenz）的论文对此进行了介绍。直到今天，洪堡在美洲的旅行日记仍然能让我们了解洪堡式科学和洪堡式写作这一重要的发展进程。德语和法语文学共同构成了这种写作方式的基础。一部规模浩大的旅行日记诞生了，作品如此庞大且费用高昂，以至于洪堡本人无法承担所有的工作。洪堡的美洲旅行日记开始于植物地理学研究——是洪堡创立了植物地理学，在本专栏中，湃斯勒（Ulrich Päßler）向我们展示了植物地理学在洪堡全部著作中的发展历程。洪堡不仅是植物地理学和古代美洲学等学科的奠基人，还是福柯意义上真正的话语奠基人。他为新的认识论和新的跨学科方法论奠定了基础，其发展空间直至今日仍没有穷尽。

随着新世界旅程的推进，洪堡开始思考以前深入学习过的所有学科。正如克诺布洛赫（Eberhard Knobloch）的分析所揭示的，如果说知识广博的莱布尼兹对他而言是一位重要的历史对话伙伴，那么洪堡关于不同学科写作方式的综合思考无疑开辟了全新的道路。他的科学观念始终是游牧的，绝不是一元的。他的哥哥威廉早就意识到，这个年轻人的伟大贡献是组合分析：将那些乍一看毫无关联的内容联系起来思考。这是一种跨学科式的科学的开端，此类科学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只有通过大规模集体性科学网络才能实现的巨大发展空间。在成千上万页的各种书籍、五万封信件和一种截至目前尚未得到全面研究的学术遗产中，绝不局限于美洲大陆的洪堡式科学诞生了。

洪堡人生的第三阶段再次开始于一次跨洲旅行。在他所有的亚洲旅行计划失败，访问英国殖民地的尝试也未果后——大英帝国的守护者特别小心地提防这位公认的殖民主义批评者前往印度和喜马拉雅地区旅行——来自沙皇的访俄邀请“拯救”了洪堡。洪堡抓住了这次机会，他的亚洲之行终获实现。

穿越俄国和西伯利亚地区的学术之旅让洪堡再次在运动中开拓了了解世界和地球的新视野。在克拉夫特（Tobias Kraft）和斯诺（Florian Schnee）的论文中，我们可以了解此次旅行及其相关著作和文字。在这次旅行中，洪堡不仅到达了中亚地区和中国边境，还像之前写作美洲旅行日记一样，以法语撰成多卷本的《中亚》（*Asie Centrale*）。同时，中亚之行也让他在长期研究中获得的关于亚洲尤其是中国的知识得到发挥。某种意义上，洪堡来到中国边境绝非偶然，一生至少到达中国一次并敲响中华帝国的大门是他的心愿。洪堡科考之旅的同伴提供的报告显示，那次与中国边境官员的会面对洪堡而言具有非常重要的象征意义，他必然极其享受那场小小的茶会。

正如克拉夫特和斯诺的文章所示，洪堡关于中亚和中国的著作和散见于其他作品中的文字既复杂又分散。他在其美洲旅行作品中也发表了众多或长或短的对中国的评论，因此我们从中寻找涉及亚洲的内容也是有价值的，就像人们在他关于亚洲的研究中也必须寻找涉及美洲的内容一样（Ette 37）。随着研究和旅行的范围拓展到亚洲，洪堡还实现了一个18世纪90年代便产生的梦想，写一部——如他本人所说——“关于天与地”，关于“一切造物”的作品：《宇宙》（*Kosmos. Entwurf einer physischen Weltbeschreibung*）。在人生的最后阶段，洪堡投入到该书的写作中。作为科学史上最受欢迎的书籍，融入了洪堡全部生命的《宇宙》一卷卷出版，直到他近九十岁逝世时，他仍在撰写《宇宙》的第五卷。尽管生命最后阶段的洪堡建造了这座当时科学研究的不朽丰碑，但自年轻时代起便活跃着的“躁动不安的心之灵性”却一直持续到了他生命的尽头。在这部伟大著作的第二卷，洪堡警告每个时代和每种文化，不要妄自尊大：

受到辉煌的新发现的激励和其欺骗性常常是之后才显现出来的新希望的滋养，每个时代都认为认识和理解自然的顶峰是接近自然。我认为，这种信念确实高估了当下的成果。更富有生命力也更符合我们物种的伟大使命的观点是，我们获得的成就只是自由的人类通过社会进步和公共教育不断获得的成就中非常无足轻重的部分。每项研究成果都只是事物不断发展升级这一灾难性过程中的一个阶段。（*Kosmos* 398）

洪堡认为，历史是循序渐进的，完全由其自身的发展决定，并始终为未来的发展创造前提。人们肯定不能将“灾难性”这一概念与洪堡的历史宿命论联系在一起，那是一种存在于历史所有阶段的逻辑造就并由此被预设的发展趋势。洪堡关于认识自然的说法当然也适用于文化领域。这位《对十五、十六世纪新大陆地理史和航海天文学进步的批判性考察》（*Examen critique de l'histoire de la géographie du Nouveau-Continent et des Progrès de l'Astronomie nautique aux quinzième et seizième siècles*）——这是一部关于十五、十六世纪欧洲发明史的著作，内容多达数千页——的著名作者警告说，不要将个人已经达到的知识视野视为最终的知识视野，也不要忘记人类历史上一次又一次有力推动知识边界扩展的总是异文化。

如果想对洪堡的思想形成一个“总体印象”并迅速地了解其全部作品，研究他第二个时期的杰作和美洲旅行日记是最好的捷径。《安第斯山脉及邻近地区自然图》（*Tableau physique des Andes et Pays voisins*）是洪堡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也无疑是19世纪最著名的科学成果之一。正如桦斯勒在其论文中所说，它可以追溯到洪堡1802年在厄瓜多尔的瓜亚基尔绘制的图片，并在1807年的《植物地理学》（*Géographie des Plantes*）中单独出版。《植物地理学》是他结束旅行后出版的第一本科学著作，也为此书中讨论的植物地理学奠定了基础。它不仅代表了洪堡在1807年左右的学术水平并与其之后近半个世纪的科学活动紧密相关，而且对整个美洲文学也至关重要。同时，它还使我们对洪堡式科学产生了良好的印象，堪称其中的代表作。该书对洪堡式写作也意义非凡。洪堡式写作始终建立在实证的基础上，以查明事实和数据为出发

点，以便形成“更高层次”的观点。

在《植物地理学的诸理念以及一幅热带地区的自然画卷》(*Ideen zu einer Geographie nebst einem Naturgemälde der Tropenländer*)中，正如“自然画卷”这一概念本身所表达的那样，洪堡将自然和艺术视为整体的观念显而易见。这是一种独一无二的科学与美学的融合，美学不再被认为是饰品或装饰，而被理解为将所有知识和科学领域本质性、艺术性联系起来的学问。这位普鲁士博物学家和文化学家由此建立了一种关于地球和洪堡式科学的近乎典范的图像。今天，洪堡式科学也因其跨学科特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现实意义。在这里，人们可以看到洪堡式科学是如何构成，能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因为通过知识的极度浓缩、不同视角在美学上被令人信服地可视化，洪堡式科学使人们注意到：如洪堡所言，科学成果对非专业观众而言具有怎样的开放性和可及性，科学知识的展示和典型代表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呈现科学成果真正的构成要素。

从旅行中获得、与不断变化的视角联系在一起的洪堡式科学总是创造出不断变化的知识画卷。在这幅描绘着穿过安第斯山的钦博拉索(Chimborazo)和卡尔瓦拉索(Canguairazo)两座火山的岛状剖面图上，所有的东西的确都在运动。一方面是洪堡早就确定了的大陆架，南美洲的轮廓可以非常精确地与非洲的轮廓拼接起来，由此推测，该次大陆很可能发生了向西的飘移；另一方面还有图片展示的整个地理状况，因为喷发的火山口表明，构成火山锥的岩石处于不断的由“地下热火”推动的运动中。

当然，最重要的还有正在变化的植物，洪堡建立的植物地理学并不是要对已经存在或新发现的植物进行统计或为之制图，而是要研究地球表面(对于孢子植物而言甚至是地表之下)植物的变化。此外还要研究各种参数，比如雪线和变化中的各种梯度，且正如《安第斯山脉及邻近地区自然图》精确记录的那样，将永久雪线和其它梯度向两极铺开，以便展示。它当然呈现了整个地球表面的一部分，但从基本分形的意义上讲，它使我们看到了整个星球。经过精确研究得出的关于全球化^[3]前两个加速阶段的知识及由此产生的文化动力深刻地融入了洪堡式科学，这些对我们地球的表面也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当然，在洪堡式科学的这种“总体印象”中，人也在迁徙，例如，在美洲热带种植园工作的非洲奴隶也被记录下来。措伊克斯(Michael Zeuske)的论文证明，亚历山大·冯·洪堡在何种本质意义上不仅是反殖民主义者，而且是反种族主义者。他的《古巴岛政治随笔》(*Essai politique sur l'île de Cuba*)是一部旗帜鲜明地反对任何形式奴隶制的著作。在美国，奴隶制的支持者思拉舍(Thrasher)将其翻译成英文是不无道理的，他伪造洪堡的作品，将这位普鲁士作家强烈抨击奴隶制的所有段落替换成明确支持奴隶制的英语“翻译”。即使洪堡竭尽全力反对这种伪造自己思想的行为，并在美国报纸上刊登了大幅广告，但这种翻译一直流传到20世纪末才被新的、忠实于原文的翻译取代^[4]。

不只是岩石、植物和动物，恰恰还有诸如欧洲征服者一样的人，在洪堡意义上不断地塑造着地球的面貌。洪堡在早期著作中就认识到人干预自然、改变自然、并由此改变自己生活条件

的程度之大。洪堡思想的根本原则“一切都是相互影响的”让我们今天仍然能够理解他对生态和事物之间相互联系的重视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对他而言，自然与文化不是彼此分离，而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洪堡式美学作为从根本上相互联系的知识并不指向自身，而是与一种基本伦理联系在一起，这种伦理渗透了所有知识和科学，即亚历山大·冯·洪堡关于世界的全部知识。欧洲殖民主义的伦理判断与洪堡的信念紧密相关：摆脱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罪恶——奴隶制——的枷锁后，人类将一步步发展，但当然应该时刻警惕，不要高估自己的地位和知识。

注释 [Notes]

- [1] 本专栏的翻译出版，有赖于北京外国语大学王炳钧教授的大力支持，在此特别鸣谢。
- [2] 本文译者系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德文专业教师。
- [3] 关于此概念的论述可参见 Ottmar Ette, *TransArea. A Literary History of Globalization*. Translated by Mark W. Person. Walter de Gruyter, 2016.
- [4] 详见 Alexander von Humboldt, *Political Essay on the Island of Cuba*. A Critical Edition.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Vera M. Kutzinski and Ottmar Ette, translated by J. Bradford Anderson, et al., annotated by Tobias Kraft, et al. The U of Chicago P, 2011.

引用文献 [Works Cited]

- Ette, Ottmar. "Amerika in Asien. Alexander von Humboldts 'Asie Centrale' und die russisch-sibirische Forschungsreise im transarealen Kontext." *HiN - Alexander von Humboldt im Netz. Internationale Zeitschrift für Humboldt-Studien (Potsdam - Berlin)* VIII, no. 14, 2007, pp. 16-40.
- . "About Islands, Archipelagos, and Archipelagic Writing: Alexander von Humboldt's Isle de Cube, Antilles en général." translated by Haiyan Ren,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 no. 3, 2019, pp. 2-11. [埃特:《岛屿、群岛和群岛写作——亚历山大·冯·洪堡的〈古巴岛,安的列斯群岛〉》,任海燕译,载《外国语言与文化》2019年第3期,第2-11页。]
- Humboldt, Alexander von. *Aus meinem Leben. Autobiographische Bekenntnisse*. Verlag C. H. Beck, 1987.
- . *Kosmos. Entwurf einer physischen Weltbeschreibung*. Bd. II. Stuttgart-Tübingen, Cotta 1845-1862.

◇责任编辑:吴晋先

自然画卷的彼岸

——亚历山大·冯·洪堡的双半球植物地理学方案

◎ 乌尔里希·湃斯勒 孙纯/译^[1]

内容提要:《安第斯山的自然画卷》从视觉上呈现了洪堡将自然界视为相互联系的整体理念。该图绘作品于1807年出版，是洪堡植物地理学散论的组成部分，也是该领域的奠基之作，它们聚焦洪堡美洲之行（1799—1804）的主要发现，对当时的植物研究产生了较大影响。在随后的二十年，洪堡继续在巴黎进行一系列今天不太为人所知的植物地理学研究。通过这些研究，洪堡努力探索构建全世界植物地理学的方法，大批的手稿也表明洪堡曾为此收集植物与地理数据，并进行关联分析。然而，洪堡于1825年前后与合作者孔特酝酿的《一种双半球的植物地理学方案》一书，试图整合其全球性研究计划，却未能付梓。

关键词: 亚历山大·冯·洪堡 植物地理学 自然历史 科学史 制图学

中图分类号: I5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 (2021) 03-0007-11

作者单位: 柏林-勃兰登堡科学与人文科学院，德国 柏林 10117

DOI: 10.19967/j.cnki.flc.2021.03.002

Title: Beyond the Tableau: Alexander von Humboldt's Project of a Plant Geography of the Two Hemispheres

Abstract: The “Naturgemälde der Anden” (Physical Tableau of the Andes) offers a visual representation of Alexander von Humboldt's view of nature as an interconnected whole. Humboldt published this graphic in 1807 as part of his “Essay on the Geography of Plants,” which focused on findings from his American journey (1799–1804) and had a major impact on the botanical research of the period. Much less known today are Humboldt's plant geographic investigations, undertaken in Paris in the two decades that followed this field-defining publication. With these studies, Humboldt sought methods to create a plant geography of the entire world. Countless manuscripts in his estate show how he collected and correlated botanical and geophysical data for this endeavor. Yet, the book project “Geography of the Plants of the Two Hemispheres,” which Humboldt conceived around 1825 together with his collaborator Carl Sigismund Kunth and with the intention of synthesizing his global research agenda, fail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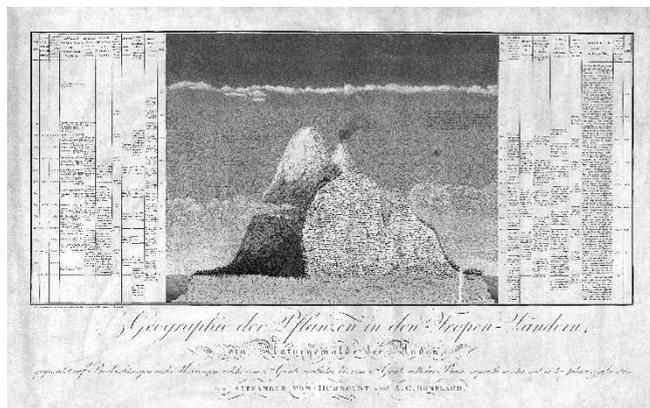
Keywords: Alexander von Humboldt, plant geography, natural history, history of science, cartography

Author: Ulrich Päßler, Head of the academy project “Alexander von Humboldt auf Reisen—Wissenschaft aus der Bewegung,” Berlin Brandenburg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Berlin, Germany.

导论：洪堡的自然画卷

《安第斯山的自然画卷》(*Naturgemälde der Anden*)无疑属于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最有名的作品。这部1803年初诞生于洪堡美洲科学考察途中的图绘,展现了太平洋和大西洋之间赤道地区附近安第斯山的理想化轮廓,位于图绘中心的是钦博拉索(Chimborazo)和科多帕西(Cotopaxi)这两座火山。洪堡在这个轮廓图上添加了一些植物的名字,在他看来,这些植物在南北纬10度线之间美洲热带地区的各个垂直带上具有典型性(见图1)。洪堡根据在某一地区面貌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植物的科属来为这些区域命名,比如“地衣石耳区”“树状蕨类区”“棕榈和蕉类区”等。1807年,这一图绘作为《植物地理学的诸理念以及一幅热带地区的自然画卷》(*Ideen zu einer Geographie nebst einem Naturgemälde der Tropenländer*,以下简称《植物地理学诸理念》)的组成部分被发表。图绘再现了洪堡投向自然的目光——自然的平衡源于“动态的、诸多力量之间的自由游戏”(Ideen zu einer Geographie 39)。画面的左右共16栏中,洪堡记录了一些力的存在——它们是由洪堡在科考途中借助许多仪器测量出来的。在这两个高度线轴构造的框架中,标记着一些数据,如平均气温、气压、天空的蓝度、大气的构成和电压等。作为绘图者,洪堡尽可能让观看者对自然拥有一种“目光把握”(Physiognomik der Gewächse 11)。由自然画卷引发的总体印象传达出两点信息:其一,洪堡以视觉化的方式呈现了一种研究实践,按照这一实践,对大量信息的收集和关联有助于人们发现经验法则;其二,即使自诞生起已有近220年,这幅画依然能够直接向我们呈现出一种以经验和美学之联系为内容的基础理念,就如同洪堡最初在他的植物地理学论著中所表达的那样。

如今,《安第斯山的自然画卷》常常被视为洪堡的植物地理学之概念乃至他全部作品的范例,并不是没有理由的。但与此同时,人们忽视了一个事实,即那两部基于洪堡在美洲热带地区旅行期间的思考记录而发表的重要作品——《关于一种植物面相学的诸理念》(*Ideen zu einer Physiognomik der Gewächse*,简称《植物面相学》)和《植物地理学的诸理念》——于洪堡自己而言,只是一个阶段性目标。在随后的二十年中,洪堡将美洲热带地区的植物地理学扩展为整个世界的植物地理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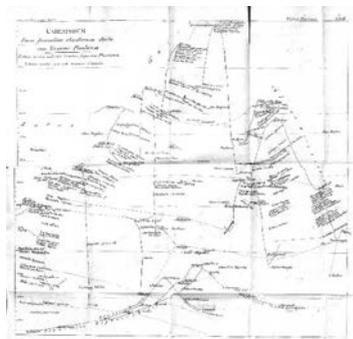


▲图1 洪堡《植物地理学的诸理念》中的图绘《安第斯山的自然画卷》(苏黎世中央图书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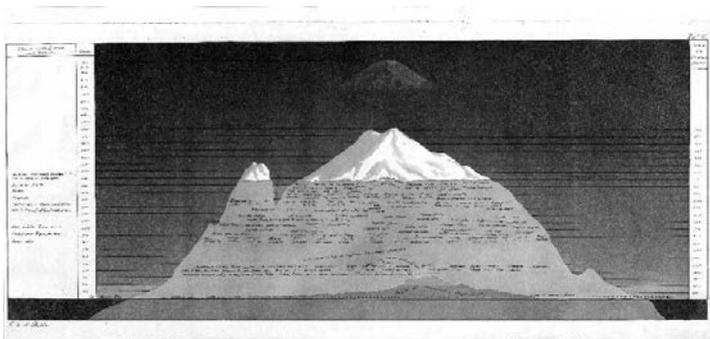
一、在巴黎的植物地理学研究

洪堡描绘的美洲热带自然画卷，和相伴而生的《植物地理学诸理念》一样，自身就已经包含一种世界性的比较维度。在图绘中，不仅记录有美洲山峰的高度，亦有如勃朗峰和维苏威火山等欧洲山峰的高度。有关图绘评注的具体章节中，洪堡同样将图绘的测量表格置入一个世界性的联系中。洪堡将它们与来自欧洲和南北美洲的自然研究者的测量数据进行比较，并由此为一种全球性的比较植物地理学奠定了基础。

洪堡全球性植物地理学方案的一个首要数据基础是他对自己科考成果的加工利用。1805年至1834年之间，一批描写植物收藏的旅行笔记式文献在巴黎出版，这一过程始于邦普兰(Aimé de Bonpland)，在1811年和1812年之交由洪堡曾经的植物学老师韦尔登诺(Carl Ludwig Willdenow)推进，自1813年以后则由孔特(Carl Sigismund Kunth)延续。然而，洪堡的全球性植物地理学方案只有借助一个相当庞大的观察者系统(Beobachternetz)才具有可行性。受到这一理念启发的田野调查，将植物学数据与测高学、气象学和气候学的成果结合到一起，提供了富有价值的信息。这其中有布赫(Leopold von Buch)于1815年发表的《挪威旅行笔记》(*Reise durch Norwegen*)和沃伦伯格(Göran Wahlenberg)关于拉普兰和瑞士的比较植物地理学研究。沃伦伯格以洪堡的热带自然画卷为榜样，在1814年发表了北喀尔巴阡山(Karpaten)植物地理学轮廓图。在这张图中，他给出了山地植物分布区域的上下界线(见图2)。恩格尔哈特(Moritz von Engelhardt)与帕罗特(Friedrich Parrot)合作绘制的高加索山轮廓图以一种更为显著的方式遵循了洪堡的模式。这张“植物学山地图绘”不仅记载着每种植被垂直带的典型植物，并且为了显示其以洪堡为榜样的做法，钦博拉索山的山顶也被描绘了出来，它仿佛浮荡在高加索山的上空(见图3)。在图中的左方边缘位置，恩格尔哈特与帕罗特完全以洪堡的自然画卷为圭臬，沿着图绘的高度刻度尺，记录了比利牛斯山(Pyrenäen)的植物类型。这种方式能够通过对比



▲图2 沃伦伯格在1814年发表的北喀尔巴阡山(Karpaten)植物地理学轮廓图(polona.p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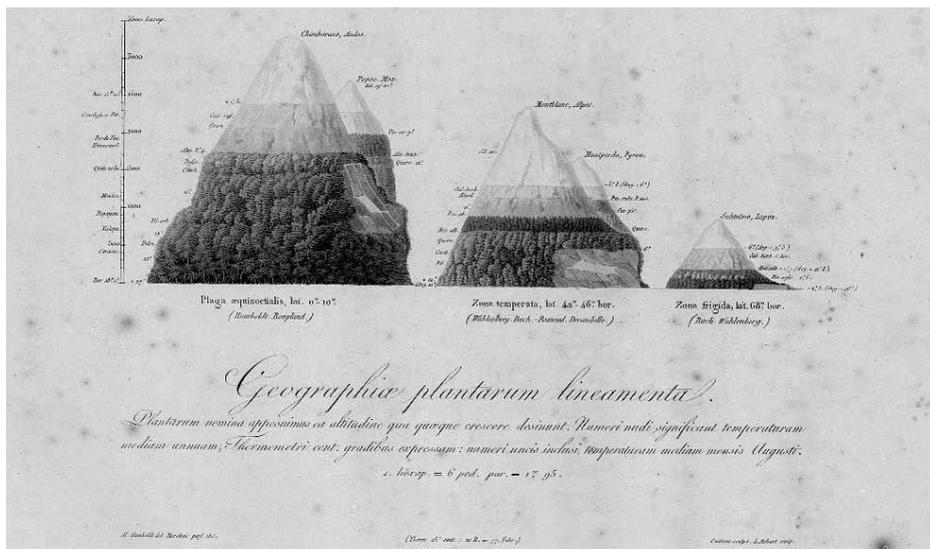
▲图3 恩格尔哈特(Moritz von Engelhardt)与帕罗特(Friedrich Parrot)合作绘制的高加索山轮廓图(哥廷根大学图书馆藏, GR 2 ITIN I, 1958: Kupfertaf)

呈现出两座山峰在植被垂直带方面的直接差异。

1814年,洪堡在法兰西学会发表名为《对加那利群岛上的植物的一般思考》(“*Considérations générales sur la végétation des îles Canaries*”)的演讲时,阐述了他如何践行作为一种“交联科学”(Vernetzungswissenschaft)的全球性植物地理学设想(Ette Sp. 31):洪堡认为,通过布赫、沃伦伯格、德堪多(Augustin-Pyrame de Candolle)、卡尔博尼埃(Louis Ramond de Carbonnières),以及邦普兰和他的研究工作,在过去的15年中,植物地理学在三个气候区(两极地带、欧洲温带地区、美洲热带地区)获得了某种“坚实的根基”(“*Considérations*” 30),而现在需要做的是去填补地理学的空白。以加那利群岛为例,洪堡探究了鲜有人研究的温带和热带之间的过渡地带。为此,他将自己在美洲热带地区北部(新西班牙和古巴)以及特内里费岛(Teneriffa)收集的信息与波达(Jean-Charles de Borda)、文森特(Jean-Baptiste Bory de Saint-Vincent)、蔻迪耶(Pierre-Louis-Antoine Cordier)等科研旅行家的结果进行比较。洪堡试图通过气温数值和气压高度测量值之间的关联以及植物学或者植物生理学的证据来揭示植物的分布规律。不同纬度中的平均气温、植被垂直带和雪线构成了分析的关联链条,通过它们,洪堡希望弄清楚有机自然界的秩序模式(29)。洪堡还同时钻研有关世界各地的积雪高度和等温线的研究方法,即数值方法,并将它也运用到植物地理学上。

《对加那利群岛上的植物的一般思考》中所展开的算术分析或者说理念,即通过数量关系表达不同地区植被垂直带和积雪高度的间距的方法,已经在一年后出版的主题性图表《植物的地理特征概览》(“*Geographiae plantarum lineamenta*”)中得到了呈现,这一图表涉及到热带、欧洲温带和北极圈这三个气候区(见图4)。

将地球物理学和植物学的数据以数学关系的形式建立关联的思想,指向了洪堡此时已经



▲图4 洪堡绘制的主题性图表《植物的地理特征概览》(苏黎世中央图书馆,通过e-rara网站获取)

在运用的植物学算术的概念，其目的在于通过统计数据去查明植被模式，并通过这个模式来确定不同纬度或地区特定科（Familie）的植物与所有属（Gattung）种（Art）植物总量的关系（Müller-Wille 125）。例如，根据洪堡的研究，豆科植物在赤道地区的比重为 1:10，在温带地区是 1:18，在极圈是 1:35。此外，数据统计式的方法是一种能够应对植物学中数据洪流的途径。之前那些鲜被研究的世界地区，比如北美洲、南非的好望角地区，以及澳大利亚，此时都有了相应的地区植物志、目录表和标本室。特别是洪堡将自己在旅途中收集到的 3000 种新的植物种类予以公布发表，清晰地展现了应当把简单的数据评估引向一种世界植物地理学的必要性。洪堡的第一篇植物学算数论著，也于 1815 年作为其美洲之旅中最重要的植物学著作《植物新属新种志》（*Nova Genera et Species Plantarum*）的“绪论”而发表，它如同一个导引，指导人们在探寻植物分布规律时如何处理庞大的数据量（Humboldt et al. iii-lviii）。

二、一种双半球的植物地理学方案（1825 年）

1807 年，洪堡已经将自己称为一门学科的学术奠基者——在他的理念之前，这门学科几乎仅有一个名称。差不多 20 年之后，情形变得完全不同。洪堡的理念启发了众多生物地理学的研究，这一学科的方法也随之得到了种种不同的发展和丰富。1825 年，当《植物新属新种志》趋于尾声之时，洪堡看到了一个合适的时间点，去出版一个全新修订过的《植物地理学诸理念》版本。1807 年的版本曾是旅行笔记的纲领性序幕，而新的版本应当成为洪堡肇始于美洲之旅的物理学和生命科学著作的终点和总结。洪堡选择了《植物新属新种志》的编辑人孔特作为自己的合作者。在 1825 年 2 月，他们一同与巴黎的出版商施密斯（James Smith）和纪德（Théophile-Étienne Gide）签署了一份合同，合同内容就是关于出版一本题为《一种双半球的植物地理学方案》（*Géographie des plantes dans les deux hémisphères, accompagnée d'un tableau physique des régions équinoxiales*）的法文著作。所谓的双半球，一半是指“古老世界”（欧亚大陆和非洲），另一半是指洪堡所踏足过的“新世界”，也就是美洲。这部作品应当涵盖整个地球的植物地理学。

洪堡遗留下来的关于这本著作之规划的丰富资料有很大一部分保留在柏林的国家图书馆，使我们得以重构洪堡和孔特的合著方式。大多数摘录、笔记和书信是根据手稿中一份八页的内容提要而进行分类的（Kunth 248-53）。孔特的出版计划给出了主题关键词，每一个关键词都标示了作为缩略符的大写字母，它们被写在每一个主题的旁边，指向那些标示着相同缩略符的材料；这些材料由洪堡交给孔特，或许是用于对一些思想档案的进一步加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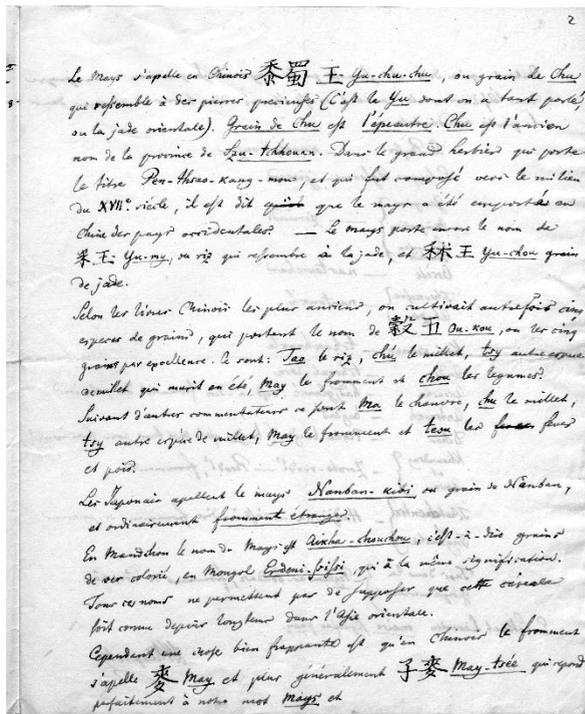
下面的段落将阐明洪堡在继续推行其植物地理学概念的三个方法要点：1）植物地理学作为一种关于植物空间传播的学说；2）植物学算术，即借助数据统计的方法揭示出全球的植物传播模式，并将它们用比例关系的方式表达出来；3）洪堡在美洲之旅中所发展出来的植物面相学（*Physiognomik der Gewächse*）这一美学方案。

三、植物的迁徙：关于玉米

青年洪堡在 1794 年写给席勒 (Friedrich Schiller) 的一封信中, 已经将植物在地球上的传播描述为“世界史”的研究对象。洪堡此时遵循的是一种“植物史”的定义 (*Jugendbriefe* 347)。韦尔登诺 (Carl Ludwig Willdenow) 在其 1792 年首次出版的著作《草本植物学概要》(*Grundriss der Kräuterkunde*) 的同名章节中表述了这个定义 (Kap. VI 345-80)。韦尔登诺曾经指导过洪堡最初的植物学研究, 按照他的理解, 植物史不仅涉及不同植被类型在生长时需要的气候条件, 同时也包括植物在地球历史中的变化与迁徙, 以及人类活动导致的植物传播。以此为出发点, 洪堡于 1799 年和 1801 年间在他的美洲日记中花费了更多篇幅论述了他关于气候、植被、人类文化进程以及植物在地球史和人类史中的迁徙过程这些因素间相互影响的思考 (Päßler)。然而, 洪堡那些出版于 1806 年和 1807 年且以植物地理学为内容的著作 (这里指的是《植物面相学》、《植物地理学诸理念》) 却主要着眼于简述两种由人类所引发的并有文字记载的植物迁徙过程。借助韦尔登诺的著述以及西克勒 (Friedrich Sickler) 的《果树栽培的普遍历史》(*Allgemeiner Geschichte der Obstkultur*), 洪堡刻画了人工栽培植物在古典时期从古希腊向欧洲的迁徙, 以及近代早期欧洲和美洲的植物交换 (*Ideen zu einer Geographie* viii 18-22)。

根据《植物地理学诸理念》新版本中的汇编资料, 洪堡和孔特试图去研究人工栽培植物在全球的传播路径问题。在“第 11 号人工作物玉米和芭蕉, 参见克拉普罗特 (Klaproth)” (缩写符号 A) 的条目下, 孔特提到的是当时巴黎汉学家、东方学家和科学旅行家克拉普罗特 (Heinrich Julius Klaproth) 的一份手稿 (Kunth 251)。这份手稿中包含了一些关于亚洲和欧洲语言中的玉米及其他经济作物命名方式的信息 (Klaproth web)。论述的起点是苏格兰旅行家和东方学家克劳福 (John Crawford) 提出的一个观点, 该观点认为, 早在美洲被发现之前, 亚洲人就已经很熟悉玉米了。克劳福这个论断的依据是, 在东南亚的一些岛屿上, 玉米仅有当地的方言名字 (Crawford 366)。在一封大约写作于 1825 年的信件中, 洪堡请求克拉普罗特去检验这个论点: “不知您是否愿意去对玉米在汉语、满语、日语或者其他某种东亚语言中的名称做一番考证调查?” (Walravens 122)。克拉普罗特试图表明, 东亚语言中对玉米的命名实际上仅仅是在不断地变换说法 (见图 5)。而事实上, 有证据表明在西亚存在着玉米的专名。洪堡将克拉普罗特关于玉米名称的中文词源学探究结果发表在出版于 1826 年年末的《关于新西班牙的散论》(*Essai politique sur le Royaume de la Nouvelle-Espagne*) 第二版的第二卷中 (Bd. II 409)。

洪堡所从事的关于地球植物传播的语言史考察实际上仅局限于经济作物, 在他看来, 可以通过研究历史性的文字文献来证明这些作物的迁徙。但是洪堡却拒绝就植物的地球史传播以及这些植物种类的起源和可变性做出一些假设, 因为他认为, 这些假设就像语言的发展史一样缺乏经验性的根据, 所以纯粹是推测性的。“语言等于植物”, 洪堡在一条 1825 年的笔记便签中——这条笔记只是他众多笔记中的一条——言简意赅地写道 (*Teneriffa* Bl. 4r.)。可见, 洪堡不愿意去构造一些自然史式的假设, 这也再次强调了植物学算术作为一种着眼于数据信息之汇集和相



▲图5克拉普罗特对汉语、日语、满语和蒙古语言中玉米名称的考察结果（普鲁士文化遗产基金会德国柏林国家图书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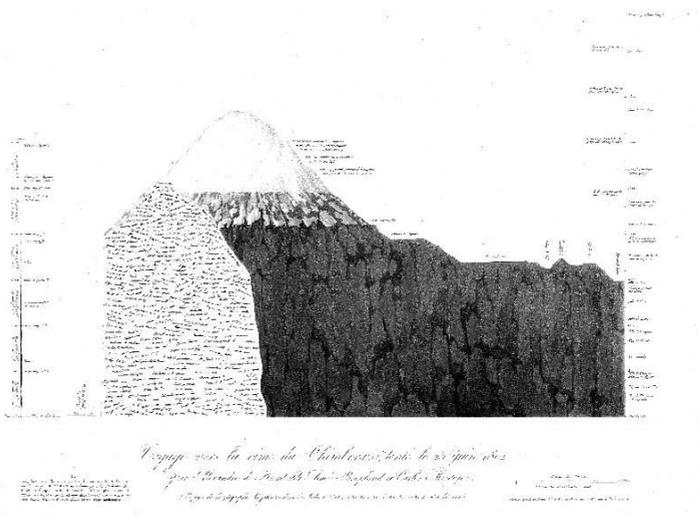
互关联的方法，对于洪堡来说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四、植物学算术：《基多省的植物清单》

在孔特为新版《植物地理学》开展的资料收集工作中，编号15的条目下有一个简单的关于“基多的植物志”的说明以及一个缩写字符F（Kunth 251）。在其背后则隐藏着一个具有非凡规格文献：在一个狭长的、计约3米半长的纸带上，洪堡罗列了超过650种植物（见图6）。

这个清单展示的是基多的植物世界，被分为三个梯度：热带地区，0～300图瓦兹（0～大约600米）；温带地区，1100～1600图瓦兹（大约2100～3100米）；寒冷地区，1600～2460图瓦兹（大约3100～4800米）。在基多附近收集并由孔特所描述的植物类型和高度信息，是洪堡从《植物新属新种志》的前四卷中提取出来的。

这个清单是洪堡为《新世界的赤道地区的植物地理分布》（*Distributio Geographica Plantarum Aequinoctialium Orbis Novi*）而汇集的，它出现在《植物新属新种志》第七卷中的最后一个段落，该段落以地区性植物群为主要内容。人们可以在四开本版本的第377到413页找到“基多植物志”。其所具有的非凡规格，严格遵守了安第斯山植物的垂直分区理念，可能被洪堡用来创作1824年的《基多的安第斯山的植物地理学概要》（*Esquisse de la Géographie des plantes dans les Andes de Quit*，见图7）。在图表中，他遵循自然画卷的模式，记录了安第斯山



▲图6 “基多的植物志”清单片段（普鲁士文化遗产基金会德国柏林国家图书馆）（左图）

▲图7 洪堡的《基多的安第斯山的植物地理学概要》（David Rumsey地图收藏，CC BY-NC-SA 3.0）（右图）

每一垂直带的典型植物，重新致力于将植物界的物种和地球物理学现象（美洲、欧洲和亚洲的海拔高度、平均气温、雪线、山高）建立起关联。

洪堡还对这些清单做了分析（*Enumeration Bl. Lr-Lv*），表明了他对植物学算术方法的问题意识。因为他和邦普兰在平原或者热带地区仅停留了很短的时间，所以他们在那里只发现了很少的植物品种，寒冷区域亦是如此。洪堡得出结论说，关于特定植物科在某一垂直带整个植物群所占比例的结论，最多仅适用于温带垂直带（Humboldt et al. VII: 379）。

五、植物面相学：约翰·莫里茨·鲁根达斯

在一封于1799年7月16号写给哥哥威廉的信中，洪堡描述了热带地区的植物群带给他和同伴的心灵刺激：“我们就像愚人一样四处奔跑。[……]邦普兰确信，如果这些奇迹不能马上停止，他将失去知觉。”（*Briefe aus Amerika* 42）。数周之后，洪堡在一份关于他沿海岸和深入腹地开展首次科学考察的报告中记录了他内在的感受：“人们刚一离开海滩，就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充满生命的世界。植物生长得何其茂盛，从茂密的像屋顶一样的树叶下看到的是怎样的夜晚！”（Humboldt, *Venezuela* 1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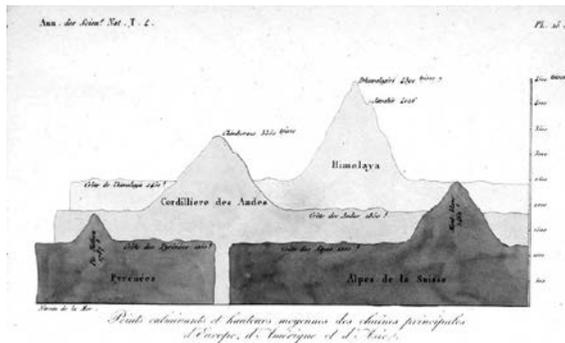
洪堡在旅行日记中不断承认欧洲研究者在热带地区所面临的双重挑战——感性层面和科学-分类学层面的挑战——之后，提出了通过美学手段来解决这一困境的设想：“在这条道路上，我有很多不同的动机，去思考植物的类型以及热带自然的本质。”对于洪堡来说，那个新的“热带世界”和那个“北方”及“非洲世界”自然风貌的差别在于，前者拥有远多于后者数量的“植

物类型”。“在热带世界一切都是统一的，在至为奇异的对比中，其繁密和数量都是壮观和独特的。”相比之下，在温带地区“差不多仅有两种植物类型，针叶树、落叶树、少叶树，没有棕榈、芦荟、仙人掌、蕉树这些植物类型”。在非洲占据主导地位的类型是仙人掌和芦荟，带给人们的印象是“严肃、呆板、死亡”（139）。由此，洪堡表述了一种植物地理学的概念，在数据收集和直观感受的双重作用下，它不仅应当把握植物类型，而且应当呈现一个植被的总体面貌。在对热带的观察中，洪堡通过植物面相学表达了一种新的植物分类系统，这个系统可以使一种关于地球植被类型的比较分析成为可能。洪堡定义了16种面相学意义上的基本形式，所有已知的植物种类都可以被归纳在这些形式之下，比如说：棕榈、芦苇、甘蔗、针叶树和落叶树（*Tagebücher III* 52v）。洪堡基于植物在面相学意义上的整体外观对其进行归类，而诸类型之间的相互关系决定着一个地区的总体植物面貌。通过植物面相学，洪堡将经验性的植物学成果和美学观感结合到一起。他由此在日记中想象着科学家和艺术家的某种结盟：“倘若一个充满品味的、通晓自然的旅行家与一个充满感受力的、致力于领会自然的画家联合到一起，漫步于世界并共同向我们呈现出棕榈、竹子、伞树的特征，这将产生一个何等伟大和重要的作品，这个描写自然的作品的重要性可以与艺术，即诗歌和绘画相媲美。”（*Tagebücher II und VI* Bl. 211r）。

在1806年首次出版的《植物面相学》及1807年的《植物地理学诸理念导论》（*Einführung zu den Ideen zu einer Geographie der Gewächse*）中，洪堡就对他的植物面相学概念进行了进一步的论述。但是只有当他1825年按照计划投入到刚刚提到的《植物地理学诸理念导论》的新版本工作时，作为植物学家的洪堡才首次与一位风景画画家展开合作：在这年的10月，23岁的鲁根达斯（Johann Moritz Rugendas）抵达巴黎。自1821年以来，这位画家就在巴西效力于朗斯道夫（Georg Heinrich von Langsdorff）组织的科学考察活动，在那里担任科考画家。洪堡立刻认识到，一位曾亲眼目睹过美洲热带地区的艺术家所绘制的植物图像，对于他的作品将具有什么样的价值。他委托朗斯道夫为自己作品中出现的每一种主要的植物类型提供画像。洪堡向鲁根达斯准确地说明了每一个绘制对象应有的尺寸，并规定下来，会有哪些植物类型出现在图中植物的周围。此外，每一张图画上应该展示一个或者多个人类形象，以便于向观察者传达出被描绘植物的大小比例关系。在这个语境下产生的四张图片被保存了下来，它们展示了香蕉和棕榈的面相学主要形式（图8）。和整部作品一样，这些图画在洪堡生前也没有被公开出版。

《植物地理学》的新版仅仅停留在资料收集和整理的早期方案阶段。人们无法从现存的构思清单和笔记中重构这本从未出版过的作品。人们能做的，仅仅是去看一看两位作者的书桌：由洪堡和孔特所汇集、评论和注解的内容包括摘录、观点和关键词，这些收集而来的资料能够让我们重构作者在1825年前后关于欧洲、美洲和亚洲的植物学研究，以及生物地理学研究的视角。如果说洪堡早期的植物地理学概念主要来源于田野，来源于他对旅行过的热带地区的亲自观察，那么他对（未能实现的）《一种双半球的植物地理学方案》的构想，却主要发生在书桌前。

在投身于写作计划的那年，洪堡在巴黎的科学院做了一个报告，它让人们看到，他是在怎



▲图8 鲁根达斯绘制的蕉类植物图像（普鲁士文化遗产基金会德国柏林国家图书馆）（左图）

▲图9 洪堡：《欧洲、美洲和亚洲主要山脉的峰顶高度和平均高度》（生物多样性遗产库）（右图）

样的全球语境中构思植物地理学的。在1825年的3月7日和14日，他谈到“基多附近安第斯山的科迪勒拉山系和喜马拉雅山西部的一些自然和地质学现象”，再一次探究起世界上的数值规律：通过比较安第斯山、比利牛斯山、阿尔卑斯山和喜马拉雅山的高度，洪堡得出结论，每一座山的山脊平均高度和其峰顶高度的比例总是保持在1:2左右。正如他对雪线和植被垂直带间关系以及植物学算术概念的研究，洪堡从数据中构建出模式，让人们看到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自然界中的可测秩序。在报告的阐述过程中，洪堡使用了两幅山脉轮廓图。第一张图——我们之前已经对它进行过描述——展示的是基多省的山脉轮廓，在它上面，植物地理学和地球物理学信息相互关联（图7）。这个图表采用一个较大的比例尺展现了《安第斯山的自然画卷》的细节片段，同时洪堡又将其与一张全景图进行了对比：第二张图将整个世界的山脉浓缩在一个图像中，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那里，洪堡曾涉足过的安第斯山和他从未抵达过的喜马拉雅山迎面而立（图9）。

注释 [Note]

[1] 本文译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师资博士后。

引用文献 [Works Cited]

- Crawford, John. *History of the Indian Archipelago: Containing an Account of the Manners, Art, Languages, Religions, Institutions, and Commerce of its Inhabitants*. 3 Bde. Constable, 1820.
- Ette, Ottmar. "Insel-Text und archipelisches Schreiben. Alexander von Humboldts 'Isle de Cube, Antilles en général'." Digital Humboldt edition. Edited by Ottmar Ette. 13 Oct. 2020. edition-humboldt.de/H0016213.
- Humboldt, Alexander von. *Tagebücher der Amerikanischen Reise II und VI*. Staatsbibliothek zu Berlin—Preußischer Kulturbesitz. Nachl. Alexander von Humboldt (Tagebücher), II und VI, resolver.staatsbibliothek-berlin.de/SBB0001527300000000.
- . *Tagebücher der Amerikanischen Reise III*. Staatsbibliothek zu Berlin—Preußischer Kulturbesitz, Handschriftenabteilung. Nachl. Alexander von Humboldt (Tagebücher), III, resolver.staatsbibliothek-berlin.de/SBB0001527400000000.
- . *Ideen zu einer Physiognomik der Gewächse*. Cotta, 1806.

- . Ideen zu einer Geographie der Pflanzen. Nebst einem Naturgemälde der Tropenländer, auf Beobachtungen und Messungen gegründet, welche vom 10ten Grade nördlicher bis zum 10ten Grade südlicher Breite, in den Jahren 1799, 1800, 1801, 1802 und 1803 angestellt worden sind. Von. Al. von Humboldt und A. Bonpland. Bearbeitet und herausgegeben von dem Erstern. Cotta, Schoell, 1807.
- . “Botanische Notizen und Pflanzengeographische Aufzeichnungen zu Teneriffa.” Staatsbibliothek zu Berlin—Preußischer Kulturbesitz, Handschriftenabteilung, Nachl. Alexander von Humboldt, gr. Kasten 6, Nr. 75a, Bl. 4r.
- . “Énumération des Plantes de la Province de Quito.” Edited by Ulrich Päßler. Digital Humboldt edition. Edited by Ottmar Ette. Berlin-Brandenburg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Berlin: edition-humboldt.de/H0016409.
- . *Essai politique sur le royaume de la Nouvelle-Espagne*, Deuxième édition. 4 Bde. Antoine-Augustin Renouard / Jules Renouard, 1825–1827.
- . *Die Jugendbriefe Alexander von Humboldts 1787-1799*. Edited by Ilse Jahn and Fritz G. Lange. Akademie-Verlag, 1973.
- . *Briefe aus Amerika 1799-1804*. Edited by Ulrike Moheit. Akademie Verlag, 1993.
- . *Reise durch Venezuela. Auswahl aus den amerikanischen Reisetagebüchern*. Edited and prefaced by Margot Faak. Akademie Verlag, 2000.
- . “Considérations générales sur la végétation des îles Canaries.” *Alexander von Humboldt: Geographie der Pflanzen. Unveröffentlichte Schriften aus dem Nachlass*. Print edition III, 1. Edited by Ulrich Päßler. J. B. Metzler / Springer Nature, 2020, pp. 27-40.
- Humboldt, Alexander von, et al. *Nova genera et species plantarum quas in peregrinatione ad plagam aequinoctialem orbis novi collegerunt, descripserunt, partim adumbraverunt Amat*. 7 Bde. Librairie Grecque-Latine-Allemande, 1815-1825[1826].
- Klaproth, Heinrich Julius. “Sur le mays.” Edited by Ulrich Päßler with the Collaboration of Abdurishid Yakup. Digital Humboldt edition. Edited by Ottmar Ette. Berlin-Brandenburg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Berlin. edition-humboldt.de/H0015189.
- Kunth, Carl Sigismund. “Ideensammlung für die Neuausgabe der Geographie der Pflanzen.” *Alexander von Humboldt: Geographie der Pflanzen. Unveröffentlichte Schriften aus dem Nachlass*. Print edition III, 1. Edited by Ulrich Päßler. J. B. Metzler / Springer Nature, 2020, pp. 248-53.
- Müller-Wille, Staffan. “Names and Numbers: ‘Data’ in Classical Natural History 1758–1859.” *Osiris*, vol. 32, no. 1, 2017, pp. 109-28.
- Päßler, Ulrich. “Reise als Werk. Alexander von Humboldts Beobachtungen, Aufzeichnungen und Entwürfe zur Geographie der Pflanzen (1799–1804).” *Alexander von Humboldt: Die ganze Welt, der ganze Mensch*. Edited by Ottmar Ette and Tobias Kraft. Olms, 2021.
- Walravens, Hartmut, editor. *Julius Klaproth (1783–1835). Briefwechsel mit Gelehrten, größtenteils aus dem Akademiearchiv in St. Petersburg*. Harrassowitz, 2002.
- Willdenow, Carl Ludwig. *Grundriss der Kräuterkunde. Zu Vorlesungen entworfen*. Haude und Spener, 1792.

◇责任编辑：陈忠平

曲径通幽

——浅谈亚历山大·冯·洪堡《新西班牙王国政治随笔》中的统计图表

◎ 维拉·M·库津斯基 易佳/译^[1]

内容提要: 文章着重讨论了亚历山大·冯·洪堡在《新西班牙王国政治随笔》中各种统计图表的观感和作用, 重点关注了这些图表与叙事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图表在洪堡的叙事中开辟了一个独特的空间, 图文分离的特点不但能激发出读者的新思路, 而且会催生出新思想, 这样的阅读体验颇像一次曲径通幽的冒险。

关键词: 亚历山大·冯·洪堡 图表 可视性 新西班牙

中图分类号: I5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 (2021) 03-0018-13

作者单位: 美国范德堡大学英语系, 美国 田纳西州 纳什维尔市 37240

DOI: 10.19967/j.cnki.flc.2021.03.003

Title: Off-Road Adventures: Reading Statistical Tables in Alexander von Humboldt's *Political Essay on the Kingdom of New Spain*

Abstract: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visual qualities of Alexander von Humboldt's statistical tables in his *Political Essay on the Kingdom of New Spain*, with special focus on how they relate to narrative writing. I argue that Humboldt's tables open up spaces inside his narration which fragment the reader's visual field in order to invite unexpected conversations, connections, and ideas—what I call off-road adventures.

Keywords: Alexander von Humboldt, tables, visuality, New Spain

Author: Vera M. Kutzinski,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nglish, Vanderbilt University, Nashville, Tennessee, USA.

亚历山大·冯·洪堡作品中的图片都精美绝伦。诸如美国旅行日记或其他类似作品，里面的素描、绘画、图表和地图都十分精美生动。相比而言，洪堡学者们却并未对其作品中的统计图表进行过深入讨论。例如《新西班牙王国政治随笔》(*Political Essay on the Kingdom of New Spain*，以下简称《新西班牙》)和《古巴岛政治随笔》(*Political Essay on the Island of Cuba*)^[2]这两本书中印有大量设计精良的统计表，特别是1827年经过大量修订的第二版《新西班牙》有177个图表，远多于其他作品。这些图表有的只有寥寥几行，与正文融为一体；有的则内容繁长、层次套叠、结构复杂，有时会占据几页篇幅。它们并非只是填满了数据的表格，也非冷冰冰地记录下的温度或人口等数据，而是数字、简短文本和符号的集合^[3]，是洪堡表达经验性、历史性和感官性数据的另辟蹊径，读者的阅读方式随之改变。

为了梳理出这些隐含信息，本文将重点介绍《新西班牙》中图表的视觉效果，并关注它们与叙事之间的联系。我认为，这些图表在他的叙事空间中独树一帜，激发了读者的深度思考。就像洪堡的物理画（即地理画）一样，《新西班牙》中的统计图表“同时挑战我们的想象力，并直击灵魂”；它们“不仅能引起自然科学领域学者的兴趣，还能让人们体会到学习未知的兴奋和乐趣”（Jackson 79-80）。之所以把这次探索称为曲径通幽之旅，就是希望捕捉到洪堡在文字和画作之外，给人们带来的无穷智慧、想象和乐趣。

埃特（Ottmar Ette）断言“洪堡科学是一门美学”（Ette and Maier 13）。他解释说，“洪堡科学艺术秉承的理念，即科学之美绝非锦上添花，而是将各种形式规范的知识汇聚、整合在一起，成为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13）。那些图表恰巧就是这样的整体，通过不同的表达方式而产生艺术性（19）。当我们静下心来认真阅读洪堡作品时，就会发现自己置身于埃特所说的“图文并茂”的环境之中。米切尔（William John Thomas Mitchell）将洪堡大部分文本称为“X图像文本”，它涉及了包括“图解、合成、建立关系”（39）等视觉和语言文字之间所有可能的关联。《新西班牙》中就出现了这些关联方式。在为数不多的探讨图表与叙事二者关系的学术文章中，坎佩（Rüdiger Campe）将笛福（Daniel Defoe）的《瘟疫年纪事》（*A Journal of the Plague Year*）解读为一部小说，其情节是通过图表的可视化力量展开的（228）。我认为《新西班牙》也以类似方式展开，洪堡将他的政治随笔整体描述为“画作”也是这个道理。图表一旦被插入到叙事文本中，就承担起提供数字信息和图形信息的双重角色。尽管这些图表并不全是数字类型的，但《新西班牙》仍是“建立在图表之上”的文本（232）^[4]。与笛福的作品不同，当时统计学作为一门科学已有了长足发展，在科学写作中图表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因此洪堡的这些图表一开始并不那么引人注目。所以，这里值得关注的并不是图表在《新西班牙》中的存在，而是洪堡用图表“打破简单的线性叙事，采用多元媒介表现形式的做法”（Ette and Maier 19）。他使用图表的方式与其他的视觉实践一样，影响了读者的阅读体验。

一、道路与路线

道路是《新西班牙》中明显的线性叙事对象，至少表面上看是如此。洪堡不厌其烦地向大家展示各种道路，不仅包括已有道路，还包括他在1804年访问新西班牙时仍在建设或规划中的道路，这本书里还有关于公路的专门章节。书中通过这些道路和路线的数据表现了一次次真实或想象的跋涉。在《新西班牙地图集的理性分析》（“Reasoned Analysis of the Atlas of New Spain”）中，洪堡除了介绍全新的知识，还通过空间投影，将他真实的旅行路线（如他的“新西班牙王国简明地图”所示）与未来可行走的旅行路线叠加在一起。“有经验的旅行者最好带着六分仪、计时器、消色差望远镜和便携式气压计……从三个方向横穿新西班牙王国的北部。”（Kutzinski and Ette, *New Spain* 1: 19, 斜体为作者所加）。这种想象中的行程同时向几个方向展开，最后到达洪堡在访问期间都没有抵达的地区。洪堡对这些想象路线的详细说明基本都可以在“新西班牙地图集”中找到，它被克拉夫特（Tobias Kraft）恰如其分地称之为“概率地理”（Wahrscheinlichkeitsgeographie）（209-21）。

洪堡笔下的实际道路与想象路线交织在一起，使他的旅行总是在道路与路线的虚实之间切换。当时可能只有一条道路直接连接阿卡普尔科和墨西哥城，但想象出来的路线却有很多条。可能有人会说，名词routes（英法语同源词）强调了洪堡赋予道路的想象空间。然而，要将虚实分开并不那么重要，只要承认两者的依附关系即可：道路一般都会衍生出路线。洪堡在《新西班牙》的索引中加入了道路（chemins）、路线（routes）和街道（chausées）等不同条目，也表明了这些术语的可互换属性。例如，词条“Chemins. Voyez Routes,”（*Nouvelle Espagne* 4: 337）同时指向了另外两个简短的条目：

贸易最频繁的路线，IV. 34 页。路线的纵向和横向划分，35 页。对墨西哥到阿卡普尔科间路线的描述；从墨西哥到拉维拉-克鲁斯的路线，39 页，还有正上方从费城到墨西哥城的路线，II. 225 页，注。从普韦布洛维亚哥到墨西哥，364 页。这条路线的详细情况及途径地，同上页。路线便利性，同上页。（363）

然而，这两个词条并没有完全反映出“chemin”和“route”在《新西班牙》中出现的极高频率，其中“chemin”一连出现了154次，“route”则足足出现了205次。尽管这些数字很可能不会引起索引者的兴趣，就连十分注重细节的洪堡也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但事实是，“chemins”的索引条目并不能将读者带回文本，而且索引条目非常有限。也就是说，这个索引基本上是自参照的循环，它只是总结了洪堡文本中所有道路或路线所代表的大致内容。它们形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网络，表现出不同的行进方式，以及不同方向或维度上的运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发现许多图表看似很随意地附着在这个网络上。这些大大小小的图表恰恰是（看似线性的）叙事中的暂停按钮，带领读者走出文本当下的时间和新西班牙的地理环境。它们就像一个个门

户，暂时截断叙事的流动，改变叙事的方向。这些图表带领读者曲径寻幽般走走停停，更加体现出作品的多维性和全面性。

道路显然是对贸易至关重要的基础设施，这也是洪堡在新西班牙的主要关切，但他如此频繁地提到道路和路线，并进行详细的讨论，还有其他原因。道路、路线、步道和小径都是线性的，但它们的曲折性却超越了线性。因此，道路测量必然试图描述“不规则和非连续模式”(Kutzinski and Ette xx)。从洪堡对“从普韦布洛·维埃霍到墨西哥城的道路”旅行的描述中，我们能很快明白，距离并不是绝对的，赶骡子的人才不会“像乌鸦飞行一样”走直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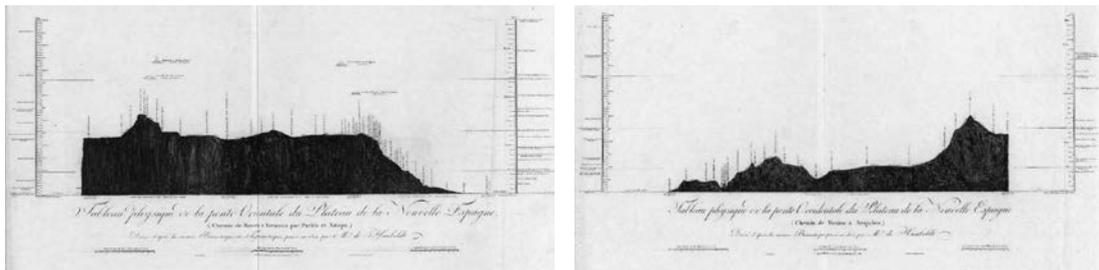
按照我之前的《新西班牙地图》(1804年)和鲍扎绘制的那张更精确的新版地图，从墨西哥城到坦皮科的普韦布洛-维埃霍 [Pueblo Viejo De Tampico] 的直线距离是60海里，2854突阿斯 [toises]。再加上四分之一弯弯曲曲的道路，人们会发现，骡夫所走的每111里格 [league] 都相当于1,928突阿斯。(Kutzinski and Ette 1:501-502, 斜体为作者所加)

洪堡甚至提供了一个尺寸较小的图表来比较几个城市之间的距离，说明骡夫绕行的路程比直线距离“多出四分之一”(“comptés à $\frac{1}{2}$ de la distance directe”) (Nouvelle Espagne 2: 366)^[5]。

<i>Il y a en ligne droite :</i>		<i>avec les détours :</i>
de Mexico à Acapulco	152,000 toises.	190,000 toises.
à Vera-Cruz	157,000	217,000
à Tampico	171,000	214,000

▲图1 城市间距离比较

图1在文本中的功能就像是一个“驿站”或观景台。驿站通常是休憩之处，但在这里也可以是一个短暂停留或闲适逗留的地方。这张图表夹在四页画作中，是个“带星号标记的驿站”(“Les Stations marquées d’un astérisque”) (366)。洪堡还标明了距离，如“维钦牧场*十五骡夫法里”和“里奥格兰德庄园*十二法里”，使每个驿站成为一个更大网络的一部分。如果说洪堡的每一张图表都有某种驿站的作用，也是在暗示这些“嵌入文本的数字图形和数字图像都在要求读者深度阅读”(Campe 220, 斜体为作者所加)。与洪堡的其他作品一样，深度阅读《新西班牙》的过程也总是让读者行走得更远^[6]。这些小小图表在视觉上提示读者停下来，虽不是像骡夫那样到了晚上停下来找个地方歇脚喂喂骡子，但从文本叙事的既定路线中间停下来，才能细细品味新西班牙南部的美丽风光，回想从墨西哥城到洪堡抵达的西海岸港口阿卡普尔科，然后回到墨西哥湾东南海岸线的坦皮科港和韦拉克鲁斯港，再翻翻地图集，看看洪堡的手绘地图，让脑海中的路线更加生动具体。此外，我们还可以用到大卫·拉姆西地图集 (David Rumsey Map Collection) 中的数字化图像，换一种视觉途径，找到那些道路。地图集中有两幅



▲图 2a 和 2b “新西班牙高原东坡地理表（墨西哥城至阿卡普尔科路线）”和“新西班牙高原西坡地理表（墨西哥城至阿卡普尔科路线）”，出自洪堡 *Atlas*，编号 XII and XIII。大卫·拉姆西地图集授权使用。在线地址：tinyurl.com/y39skdr4。

分别从墨西哥城到韦拉克鲁斯和阿卡普尔科的道路图，是洪堡使用自己的气压仪和三角测量仪绘制出的高程剖面（图 2a 和 2b）。这些新西班牙南部实际地形的横截面图为图 1 显示的测量距离提供了更精确的视觉信息。从剖面图中，我们无需依靠想象就可以看到真实的海拔。这两幅图都将洪堡测量出的数字转变为折线图的形式。大地色的纸张配上阴影晕线，清晰展示了地质构造，简直就像是张风景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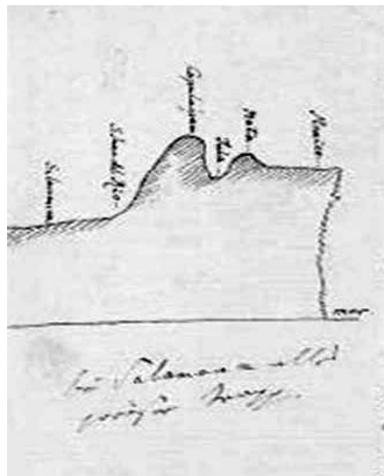
谁能想到，洪堡不过是测量了海拔高度、了解了地质构造，却能凭想象绘制出这些精美的图片。图 3 和图 4 的绘制也是如此。

历史上，从没有人把抽象概念绘制成这样的图表，把地表之下看不见摸不着的部分展现出来。这种洪堡惯用的制图效果与自然景观画非常相似，他通过着色和绘制地形图时用的晕线法，获得了这种三维视图效果。这些画面与肉眼可及的景色并不一致，因为它们不是对自然的模仿，而是数学的抽象，是洪堡对它们进行了艺术上的补充和修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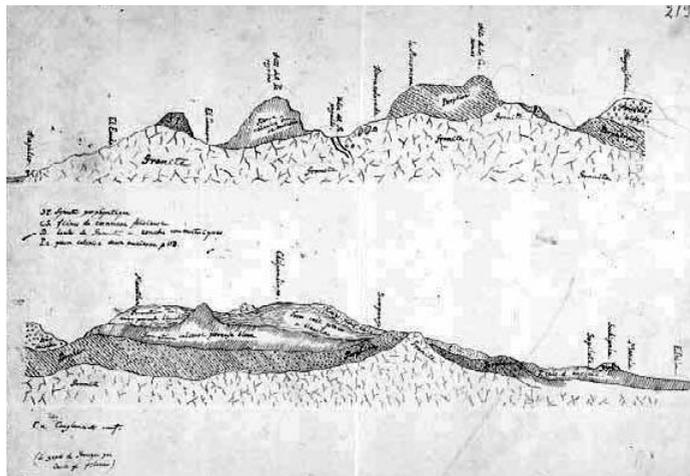
二、火山—驿站

从以上图表中，我们看到的并不仅仅是地下图景，图 2a 本来还包括了四幅火山示意图，尺寸都不大，在该图上方。它们是生动的视觉门户，承载着《新西班牙》文本中描述的“风景如画的墨西哥城中火山和普埃布拉火山”（Kutzinski and Ette 1: 110-12）。同样，在《科迪勒拉全景与美洲土著的遗迹》（*Views of the Cordilleras and the Monuments of the Indigenous Peoples of the New Continent*）中，洪堡提供了对波波卡特佩特火山、伊斯塔西瓦脱火山、奥里萨巴火山和佩罗特火山的缩影大版图。对比这两个版本，我们发现洪堡经常会放大和缩小比例来凸显视觉效果。如图 3 展现的那样，洪堡很可能是在他的旅途中一边写日记一边在左上角空白处画草图，之后再补充更多细节。图 4 以全景图的形式占据了整个页面（图片已旋转），随着旅程的展开，慢慢加深读者对阿卡普尔科到墨西哥城旅途中不同地质情况的认识。

如上所述，洪堡要用画作或者说“政治画作”展现整个新西班牙（*Nouvelle Espagne* 2: 160）。“政治画作”在英语中译成“政治全景图”（Kutzinski and Ette 2: 390），比古老的法语名词“画



▲图3 “从大西洋到墨西哥再到萨拉曼卡的新西班牙总督高地景观概况(1803年8月)”(部分),纸本,墨水,331×203毫米,IX,第57页,29r (Ette and Maier 421)。在线地址: tinyurl.com/yxdsktfv (10/08/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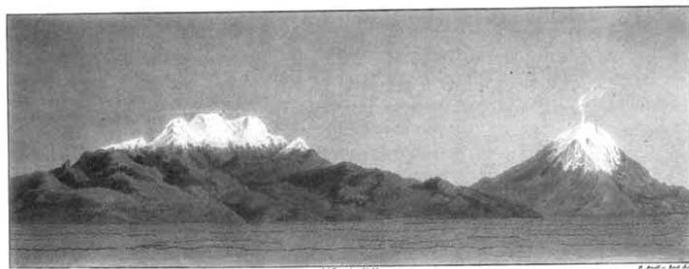


▲图4 “1803年从阿卡普尔科到墨西哥城的地理概况”,纸本,墨水和铅笔,196×256毫米,日记VIII,219 r. (Ette and Maier 447)。在线地址: tinyurl.com/yy89xjw3。

作”(tableau)更强调移动的概念。全景图(panorama)这个名词体现出洪堡非常希望用“行进中的文本”向读者呈现完整景象。

除了与风景画有关联外,洪堡的“政治全景图”还有财政学的渊源,洪堡对公共收入和财政管理非常熟悉,因为他在法兰克福、哥廷根和汉堡做过专门研究,后来还在普鲁士矿业管理检查局工作过。然而,这些跟数字打交道的学问与地理学和地质学这样的学科并不相容。克拉夫特认为财政学成为洪堡写这本书的一个起点,但很快就被证明仅财政学不足以对新西班牙的情况进行充分描绘(257)。但克拉夫特并没有探讨这种不充分其实是靠美学来弥补的。前文洪堡在海拔介绍中加入了绘画元素,这表明跟重视科学事实一样,他也同样重视审美,这一点在《新西班牙地图集的理性分析》一节里进行了强调。他写道:“虽然这部作品的目的是描述新西班牙的领土资源,不是地质考究,但我还是觉得应该在墨西哥地图集中加上一些风景如画的景观图(编号XVI和XVII),作为对山谷地图(板块III)的补充,以更好地展示墨西哥城的环境之美。”(Kutzinski and Ette 1:110,斜体为作者所加)能冲破财政学的框架去展现美景,洪堡对这个结果是相当自得的。他在海拔剖面图中添加了如画的火山剖面小图(图2a),就正好说明了这一点。这两张图片的大版本在他的地图集中出现了两次,成为紧接着海拔剖面之后的“风景如画的景色”(图5a和6a)。这些大大小小的图片似乎与洪堡的美洲旅行日记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当切实了解到图片之间的关系,我们就可以去追溯洪堡《新西班牙地图集》中图片材料的源头,比单纯解析海拔剖图还要准确(图5b、5c和6b)。

即使粗略浏览洪堡在《美洲旅行日记》(*The American Travel Diaries*)中插入的图片,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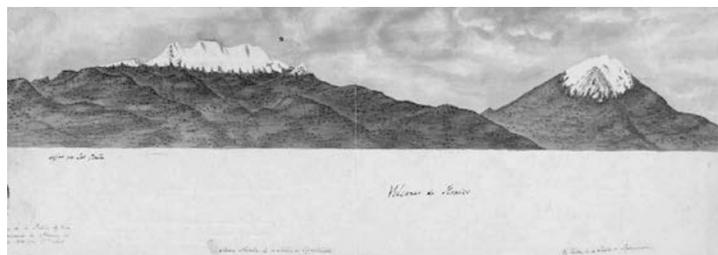


Vulcans de la Puebl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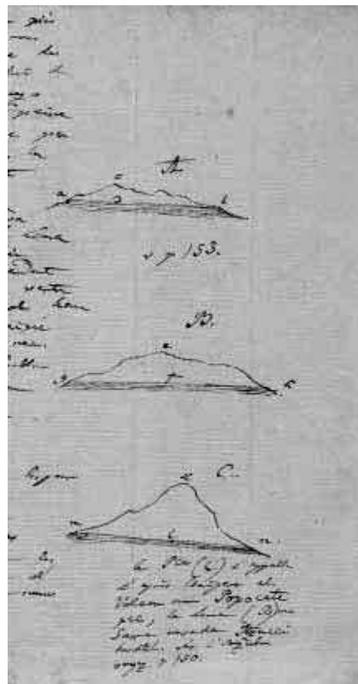
vue depuis la Ville de Mexico

de Chagnon & Lesclapart

▲图 5a “从墨西哥城看普埃布拉的火山(1803)”,出自洪堡《地图集》,编号:#XV。大卫·拉姆西地图集授权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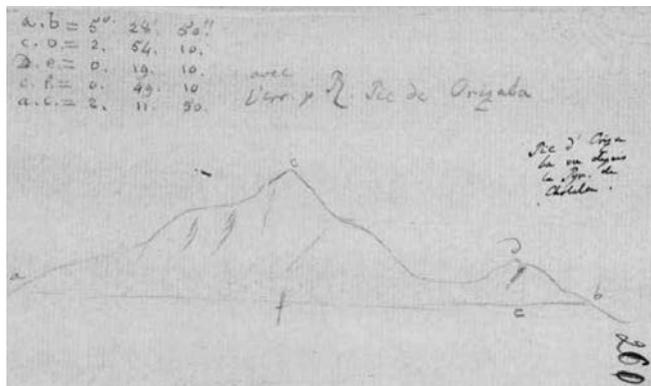
▲图 5b “路易斯·马林关于墨西哥火山的绘画(1803年11月)”。纸本,墨水和铅笔,179×486毫米,日记VII bb & VII c, 411 v. (Ette and Maier 344-45)。在线地址: tinyurl.com/yxckad4d。



▲图 5c “波波卡特佩特火山(C)和伊兹塔克华特尔火山(B),以及内华多·德·托卢卡的角度测量(1803年11月)。”纸本,墨水,335×203毫米,日记VIII,第118页,60v. (Ette and Maier 359)。在线地址: tinyurl.com/y4dblfqe。



▲图 6a “从哈拉帕森林看到的奥里萨巴峰”(1804),出自洪堡《地图集》,编号:#XVII。大卫·拉姆西地图集授权使用。



▲图 6b “从乔鲁拉金字塔看奥里萨巴峰(b.m.)”,1804年1月。纸本,铅笔,153×108毫米,日记VII a和VII b, 260 r. (Ette and Maier 3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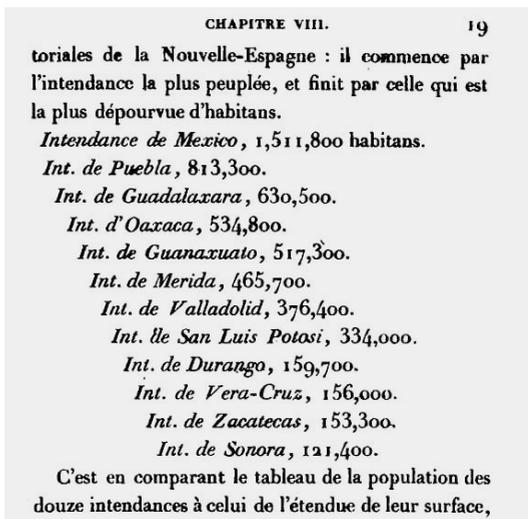
者也能很快发现，山脉图形反复出现。事实上，《美国旅行日记图片全集》（*The Complete Drawings from the American Travel Diaries*）中有一整节是关于“海岸线、山脉和火山景观”的，“景观和立面轮廓”一节则有很多抽象的斜坡草图。洪堡的作品中画满了山脉，尤其是他在厄瓜多尔、秘鲁，当然还有在墨西哥遇到的火山。洪堡对火山特别着迷，他用一种近乎痴迷的激情绘制了很多火山图。在加那利群岛停留期间，他的美洲之旅的开端就是攀登和测量火山坡度，后来他在《新西班牙》中特别提到的两张图片也是火山。这些绝非巧合，他曾表示自己要好好感受墨西哥城环境之美时说的就是火山。因此，我们阅读《新

西班牙》以及洪堡关于美洲的其他作品时，读懂洪堡绘画中或抽象或具象的火山坡成为了基本的视觉素养。具备这种视觉素养能使我们快速识别山形，领略知识与美学的融合之美。在《新西班牙》中，我们经常能看到这类图形，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却是洪堡在叙述看似无关紧要的信息时的图表（图7）。

在这个统计表中，新西班牙人口由多到少排列，呈现出坡度，拟现出山的特征。在其中“新西班牙王国数据分析”（“*Analysis Statique Du Royaume De La Nouvelle Espagne*”）一节中，洪堡根据领土面积大小和人口普查数据制作了三个图表，上面的图表只是其中之一。虽然他没在这里详述人口密度与物理地貌的关系，但统计表的形状已经暗示了这种联系。在比较从法国到俄罗斯的统计分析中，类似的图表直观地提示人们去关注结果的坡度，它们倾斜的形状总让人想起新西班牙风景中最美丽的部分：火山。

三、跨境写作

《新西班牙》中的许多图表是阅读之旅的驿站，叙事暂停下来，任由读者发挥想象，如同曲径通幽的冒险，衍生出阅读的各种可能性。当一幅关于道路的图表映入眼帘时，尽管它可能很不起眼，但我会觉得它是通往其他空间维度的载体。虽然并不是所有的图表都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发挥作用，但它们每一张都或多或少承载着一些历史的、地理的或（跨）学科的可能性。《新西班牙》中的图表之所以千差万别，是因为洪堡力图将知识与美学结合起来，只有在叙述中嵌入形式各异的图表，只有它们与前后文本关系不一，才能营造出一种独特的视觉效果。书中的图表阻隔了读者的视野，挑战他们去抵抗叙事，使他们转而关注文字以外的其他形式。比起统



▲图7 人口统计数据(*Nouvelle Espagne* 2: 19)

一形式，多样化的图表更能有效地实现这一目的。虽然读者仍然可以从各种图表中找到一些形式特征上的共性，但这些形式却不会让读者停留在单一的认知系统中。例如，图8出自重点介绍采矿和贵金属国际贸易的章节，该章有许多类似的图表，特别符合严格的统计数据采集程序。其实这套程序在图2a和2b中也有显示，但由于图表较小，就没有直接表现出来。统计数据不需要语言表达，并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文字的使用，因此图表中的数字行列在外观上与周围的叙述区分开来，表格双线框又加强了这种视觉分离的效果。下面的图表与作者行文没有明显的界限，所以我在截图时略去了周围的文本。

这张统计表将我们带出新西班牙，进入1802年洪堡旅行时期的秘鲁总督辖区的地理风貌，并将29年的历史数据压缩到一个小小空间里^[8]。该表将三个秘鲁银矿的总产量细分为钢锭的数量、重量及其货币价值（以比索为单位），按所支付的税额进行衡量。没有使用网格线，增加了产量急剧上升和下降的可见性（在C和E栏中）。然而，这个图表与文本的分离并不是完全可视的。除非我们仔细分析图表和文字中的数字，才会发现图表前面的文字叙述与图表信息并不一致，非常容易被读者忽略掉。令人奇怪的是，洪堡在正文中给出的这29年的总体数字比表中要低得多。“从1774年4月到1802年10月，乔塔地区的古尔加约克矿总共为特鲁希略省的金库生产了1,912,327马克的白银，平均每年为67,193马克”（Kutzinski and Ette 2:203）。231,852马克的差额足以引起我们的疑问，可这并不是一个错误，只是洪堡把计量单位从比索换成了马克。这种计量单位变换带来的差异提醒我们，《新西班牙》中各种不同的测量单位有时会同同时出现。洪堡很少对这种做法发表评论，这也反映出他的思维跳转非常灵活，丝毫不在乎标准化的统一。如图2a和2b底部的三个刻度，在这里他并没有把比索转换成马克，也没有把法语中以万米为单位的海上距离翻译成“法国距离”，他认为视觉上得到这些数量信息就足够了。说起洪堡抗拒系统化标准化的做法，这只是九牛一毛，类似情况比比皆是。

克拉夫特在读完洪堡于1803年为西班牙新总督何

PRODUIT DES MINES D'ARGENT DE HUACAYOC, DE GUAMACHUCO ET DE CONCHUCO.

ÉPOQUES.	NOMBRE des ANDES D'ARGENT.	LEUR POIDS.		DROITS.	
		marcs.	onces.	en piastres.	en quetzales.
1774	183	34,603	4	33,852	
1775	300	57,894	5	56,241	
1776	423	84,350	1	82,905	
1777	302	60,016	3	59,051	
1778	327	65,062	7	64,084	
1779	328	64,203	7	63,214	
1780	306	60,981	0	60,021	
1781	368	81,433	4	80,337	
1782	429	73,858	6	72,652	
1783	328	58,713	6	57,808	
1784	355	61,584	0	60,440	
1785	287	73,814	2	72,372	
1786	368	73,305	8	72,024	
1787	450	83,833	0	82,209	
1788	404	73,813	5	74,371	
1789	489	87,484	0	85,469	
1790	654	113,152	3	112,241	
1791	575	105,383	2	103,948	
1792	721	134,084	4	131,830	
1793	468	75,904	6	71,243	
1794	480	86,876	1	85,605	
1795	424	78,309	4	78,047	
1796	428	75,297	5	74,246	
1797	378	67,789	3	66,721	
1798	501	86,015	4	84,660	
1799	607	108,281	0	106,889	
1800	393	70,585	4	69,474	
1801	235	45,378	3	44,826	
1802	287	48,708	0	47,613	
TOTAL en 29 ANS.	11,791	2,180,457	3	2,184,170	

III. 33

▲图8 华加约克、瓜马丘科和康丘科银矿生产情况 (*Nouvelle Espagne* 3: 353)

Nous venons de trouver **, en puisant aux sources que l'on doit regarder comme les meilleures, que des 43,500,000 piastres que l'Europe reçoit aujourd'hui annuellement de l'Amérique, il en reflux à peu près

4,000,000 en Asie, par le commerce du Levant;
25,800,000 { 17,500,000 en Asie, par le commerce du cap de Bonne-Espérance;
4,000,000 en Asie, par la voie de Kiscit et de Tobolsk.
18,000,000 or et argent de l'Amérique, qui restent en Europe. ***

Il faut décompter de ces dix-huit millions de piastres, ou 94,500,000 livres tournois, ce qui est dissipé par les refontes et par une extrême division en bijoux, de même que ce qui est employé en vaisselle, en galons et en dorures. Il a été constaté à la mon-

* Tableau de commerce de l'empire de Russie, traduit par M. Pfeiffer, 1808, n^o 9 et 10. *Océanie, le Nord-Néerlandais*, t. 2, p. 203.

** Voyez l'esquisse d'une carte qui offre le flux et le reflux des métaux d'un continent à l'autre, pl. xix de l'*Atlas de Manille*.

*** Ces résultats ne sont pas applicables à l'époque à laquelle parait cette nouvelle édition de l'*Encyclopédie*. Les Grandes Indes n'ont beaucoup plus les métaux précieux de l'Amérique. Voyez les considérations exposées à la fin de livre IV.

▲图9 欧洲、亚洲和美国贵金属贸易统计表 (*Nouvelle Espagne* 3: 443)

塞·德·伊图加雷雷 (José de Iturrigaray) 而作的《新西班牙王国政治地理记录表》(Tablas geográficas políticas del Reino de Nueva España) 后, 对洪堡用“文字和图画 [书写] 统计数据” (256) 大为赞赏。下面这张来自《新西班牙》的图 9 很好地说明了洪堡的图文交融写法是如何抹去了图表和叙事之间界限的。

从语法上讲, 这张图表接续了前一句话, 很好展现了洪堡在叙述中图文不分家的做法。他自由地在文本和图形之间转换, 因为没有表格框线, 这个图表很不容易被读者看出。如果不是因为字体较小, 我们几乎不会将该表识别为一个独立空间。这张图表的特殊点不仅在于视觉上的不同, 而且还因为它将欧洲、亚洲和美国贵金属贸易的情况全部进行了比较。这张图表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 不仅让我们更了解新西班牙, 还带着我们跨越美洲, 进入跨大西洋和跨太平洋地区, 了解更多政治和经济地理知识。在《新西班牙》众多图文交融的图表中, 这张最为紧凑, 其他类似图表显得有些杂乱无章, 甚至有些图表与图 9 的情况相反。例如, 洪堡在分析韦拉克鲁斯大宗商品贸易时, 为了排版紧凑, 他将 1804 年的数据做了一张与之前一模一样但却很小的图表 (*Nouvelle Espagne* 4: 79)。我们本以为会有另一个更大的图表来告知进出口的细节, 却发现后面紧接着的是长达好几页的对随后几年贸易数字洋洋洒洒的叙述。对于 1805 年和 1806 年的贸易数字 (81), 只有斜体标题“维拉-克鲁斯的贸易”与之前的图表格式相呼应。洪堡在这一章节中还用了几个更小的图表来说明那几年纸张进口情况, 并比较了韦拉克鲁斯和阿尔瓦拉多的进出口贸易。他保留了一张关于进出口贸易的更全面的图表, 将其放进一张大折叠图表中, 这张图表的出现完全打断了叙事进程。这就像是文字在数字上滚滚而过, 叙述节奏逐渐加快, 一直到那张大图表将视觉快感推向顶峰 (*Nouvelle Espagne* 4: 85), 不过这张表实在太不方便在这里引用。

四、图表翻译对叙事的影响

之前我为亚历山大·冯·洪堡英译项目 (HiE) 2011 至 2019 年出版的一系列新版英译本进行校对时, 很少考虑图表与洪堡叙事的相关性。当时我只是注意到, 芝加哥大学出版社的书籍设计师把所有的图表都当作插图对待, 不太关注它们出现的位置。他们之所以会忽略图表确切位置的标注, 是因为他们与文案编辑不同, 不会先阅读文本再决定将图片放在哪里。设计师更关心的只是页面的视觉“契合度”, 而不是图文关系。因此, 特别是在两部政治随笔的译本中, 图文有很多不连贯的地方^[9]。当然, 关于图表在这些译本中的呈现方式, 还有继续深入讨论的空间: 即使现在绝大多数图表在译本中都在正确的位置, 它们看起来仍然与原作非常不同。我现在举一个《新西班牙》中的例子来说明视觉上的巨大差别。在法文译本 (*Humboldt, Nouvelle Espagne* 4: 85) 中有一张大的折叠图表, 我没有按原样复制, 结果译本中的图表不是折叠的, 尽管它仍然是纵向排版的, 但跨了好几个页面 (*Kutzinski and Ette* 2: 342-47)。这样就割裂了洪堡本想要在一张大图上表达的内容, 原本连续的图表栏分散在不同页面上, 读者很难

连贯阅读。并且，那张表最后几列原本是横向布局的，像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图表，这又进一步增加了排版难度。换句话说，洪堡原想通过这张大表对韦拉克鲁斯 25 年（1796—1820）间的贸易收支变化进行全面描写，结果译本却无法反映出来，读者除了查阅法语第二版的《新西班牙》，别无选择。图 8 中的图表也有类似问题，只不过它横跨了两页，同是横向布局，失真效果没有像折叠图那么明显。

Output of the Silver Mines of Hualgayoc, Guanachuco, and Conchucos				
PERIODS	NUMBER OF INGOTS OF SILVER	THEIR WEIGHT		DUTY IN QUINTALS
		Marks	Ounces	Piasters
1774	182	34,403	4	33,852
1775	300	57,894	5	56,941
1776	432	84,326	1	82,985
1777	302	60,015	3	59,051
1778	327	65,062	3	64,034
1779	324	64,203	7	63,214
1780	306	60,981	0	60,021
1781	308	61,435	4	60,387
1782	429	73,698	6	72,462
1783	329	58,713	6	57,808
1784	335	61,564	0	60,440
1785	397	73,604	2	72,373
1786	398	73,305	6	72,024
1787	450	83,633	0	82,209
1799	759	144,407	9	143,309
1790	645	110,183	3	117,241
1791	375	105,383	2	103,618
1792	731	134,084	4	131,939
1793	406	72,904	6	71,713
1794	480	86,876	1	85,305
1795	434	79,309	4	78,755
1797	378	67,780	3	66,721
1798	301	90,015	4	88,600
1799	607	108,591	6	106,880
1800	392	70,595	6	69,471
1801	253	45,378	3	44,626
1802	267	48,198	6	47,413
TOTAL for 29 [28?] years:	11,701 [11,363?]	2,180,437 [2,102,460?]	3 [102?]	2,144,179 [2,068,132?]

▲图 10 华加约克、瓜马丘科和康丘科的银矿产量（Kutzinski and Ette 2:204-205）

STATE OF THE MINING OF NEW SPAIN 261	
43,500,000	piasters that Europe today receives annually from the Americas, roughly the following amounts flow to:
	4,000,000 to Asia, because of the Levant trade;
25,500,000	17,500,000 to Asia, by the route around the Cape of Good Hope;
	4,000,000 to Asia, by way of Kyatkha [Mongolia] and Tobolsk.
18,000,000	gold and silver from America remain in Europe. ¹

¹ These results are not applicable to the period in which this new edition of the *Political Essay* is appearing. The East Indies no longer take in precious metals from the Americas. See the considerations presented at the end of book IV.

▲图 11 新西班牙地区的采矿情况（Humboldt 2:261）

同样，译本也没有将法语原版中图表的一些视觉变化表现出来。我们将原版的图 9 与英文版的图 11 进行比较时，可以看到这一点。

在译本中，这个图表遵循了统计表的格式惯例：洪堡使用的大括号被去掉了，两列对齐。顶部和底部的框线使图文完全分离，无法与叙述相融合。类似的图文分离出现在《新西班牙》的每个图表中，图 10 也是其中一例。而且这种图文分离都被框进了同一个标准样式，因为读者无法看见洪堡的原始手迹，图表和上下文的关系就被简化了。从视觉上看，英译本对图表的处理并没有很好表现出洪堡绘制图表时希望与标准化和正规化的不一样的用意。洪堡的图表经常跨越图文边界这一特点并没有表现出来。

原版《新西班牙》中图表的视觉复杂程度和丰富程度远远高于译本，这让读者的阅读体验不尽相同。不规则的图表形状总能抓住读者的注意力，但反复出现的形状只会让读者倦怠，所以在读译本时大家很容易忽略图表，只把它们当作一幅幅装饰性的插图。人们一方面认同这个视觉刺激假说，可另一方面总认为图表对理解起不到帮助。也难怪，逐渐同质化的图表形式恰恰反映出人们不重视图表信息的心理。不管作品是否出版，洪堡持续不断地逆视觉标准化和线性叙事而行，切中的利害之处并不仅是打破线性叙事，而更重要的是它打破了单一概念框架的主导地位。这里要强调一点，尽管洪堡极力回避已有认知系统及其中的层级划分^[10]，但无法推翻他是一个有条不紊的思想家和作家的事情，更让我们认识到他是新体系新方法的创造者，在传统和创新中游刃有余。我希望通过本文向大家展示，在洪堡法语版的《新西班牙》等作品中，图表的视觉效果是如何表现出作者对图像和文字之间纷乱复杂的关系的思考。如果将洪堡笔下的图表和图像从文本中挪走，不仅会打断叙事，而且会遮蔽他巧妙的写作构思和挑战标准化的初衷。如果我们（那些用欧洲语言阅读洪堡作品的人）认真地追踪洪堡文本中的视觉线索，一定会觉察出他的作品挑战了意识形态预设，而正是这些预设削弱了人们理解和想象的深度和广度。当阅读过程变成一次曲径通幽的冒险时，我们的想象，我们的思维，将能够在图文并茂的形式变换中，超越日常，收获别样的乐趣。

注释 [Notes]

[1] 译者系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师。

[2] 虽然我自始至终都使用洪堡英文版本的标题，但我始终以法文版本为参照，这些版本均在参考文献中列出。

[3] 洪堡的图表几乎都是文字、数字、线条和图画之精美融合。因为是用法语写作，所以他没有区分画作 (tableau) 和 (统计) 图表 (table)，图表往往是更大画作的一部分。本文未按照洪堡的做法，对画作和图表进行了区分。

[4] “图表的外观本就与图形只有一线之隔，而且图表中表意的数字，竟也会构建出自己的图形外观模式。写作已经注入了一种非文字 [和非文学] 的图形主义，通过字母和数字的关系呈现，文字与图形成为写作固有的特征。文字和图形的组合可以被称为写作图式 (diagrammatics of writing)。可以说，小说中的图表重现了它作为书面文本基本条件的写作图式” (Campe 220-21)。

[5] 表中首先出现 296.25 公里与 370.3 公里的计量比较 (1 突阿斯等于 1.94 米)。洪堡的绕行数据略高 1/4。

[6] 虽然这两个词之间没有词源上的区别，但我发现以下的区分很有必要：“数学家可能会说，再进一步 (further) 是指矢量的增加，而更远 (farther) 指的是距离的增加。用英语来说就是：更远指的是离共同的测量点有更长的

距离，无论是字面的还是隐喻的距离。再进一步指的是在共同的方向上有更大的前行空间”（Crain web）。

- [7] 洪堡提供了关于该表的出处信息——它是“应我的要求在监督局的办公室里起草的”（“a été formé, a ma prière, dans les bureau de l'intentionance”）——他在解释该图表不完整的原因时提示大家注意 1802 年他在秘鲁的档案工作：他“无法获得从 1771 年发现矿藏起到 1774 年塞罗·德·瓜尔加约克的产量……因为当时银子都被送去了利马，[而] 特鲁希略的档案无法提供这方面的任何信息”（Kutzinski and Ette, *New Spain* 2:203）。我们完全可以问，为什么当时的收入被送到利马而不是特鲁希略。
- [8] 虽然我们能够发现并纠正以这种方式产生的大部分错误，其中一些错误比较明显，但在出版的文本中仍然有一页存在这个问题。见 Kutzinski and Ette, *New Spain*, vol. 1, pp. 283-84; Humboldt, *Nouvelle Espagne*, vol. 3, pp. 472 的比较。
- [9] 有些人把洪堡的《宇宙》（*Kosmos*）作为他重视系统思维的证据。邓肯（Ian Duncan）还奇怪地暗示洪堡在这方面受到了达尔文的影响（57）。

引用文献 [Works Cited]

- Campe, Rüdiger. *The Game of Probability: Literature and Calculation from Pascal to Kleist*. Translated by Ellwood H. Wiggins. Stanford UP, 2012.
- Crain, Caleb. “Further and Farther: A Theory.” *New Yorker*, 23 Oct. 2015, www.newyorker.com/books/page-turner/further-and-farther-a-theory.
- Duncan, Ian. “Natural Histories of Form: Charles Darwin’s Aesthetic Science.” *Representations*, vol. 151, no. 1, 2020, pp. 51-73.
- Ette, Ottmar, and Julia Maier, editors. *Alexander von Humboldt: The Complete Drawings from the American Travel Diaries*. Translated by Vera M. Kutzinski. Prestel/Random, 2018.
- Humboldt, Alexandre de. *Vues des Cordillères et monumens des peuples indigènes de l’Amérique*. F. Schoell, 1810.
- . *Essai politique sur l’Isle de Cuba*. Gide Fils, 1826.
- . *Essai Politique sur le royaume de la Nouvelle Espagne*. Deuxième Ed. Antoine Augustin Renouard, 1827. Vol. 2-4.
- Humboldt, Alexander von. *The American Travel Diaries*. Staatsbibliothek Berlin.
- Jackson, Stephen T., editor. *Essay on the Geography of Plants*. Translated by Sylvia Romanowski. U of Chicago P, 2009.
- Kraft, Tobias. *Figuren des Wissens bei Alexander von Humboldt. Essai, Tableau und Atlas im Amerikanischen Reisewerk*. De Gruyter, 2014.
- Kutzinski, Vera M., and Ottmar Ette, editors. *Alexander von Humboldt’s Political Essay on the Kingdom of New Spain (A Critical Edition)*. Translated by John Ryan Poynter, et al. U of Chicago P, 2019. 2 vols.
- Mitchell, William John Thomas. *Image Science: Iconology, Visual Culture, and Media Aesthetics*. U of Chicago P, 2015.

◇责任编辑：罗辉

国家之间与国界之外 ——亚历山大·冯·洪堡与法国文学

◎ 马尔库斯·亚历山大·伦茨 张兰洋/译^[1]

内容提要: 作为科学家和普鲁士国王的外交调解员, 亚历山大·冯·洪堡在法国和普鲁士之间发挥了桥梁作用, 超越了单个民族文学“传统”。然而他与当时的欧洲中心法国尤其是巴黎的密切交流, 让人看到这位普鲁士学者与法国及法国文学之间的联系是多么的重要。广泛了解洪堡与夏多布里昂、巴尔扎克和雨果等作家的关系, 以及作为法国文学灵感之源的洪堡, 可以更深入地了解洪堡的作品以及他本人在 19 世纪法国文学领域中的地位。洪堡以众多不同且令人惊讶的方式与法国文学相联结, 但直到现在还没有人系统地考察过他的写作与法国作家之间的联系。本文将为此主题提供初步的研究路径。

关键词: 勒内·德·夏多布里昂 奥诺雷·德·巴尔扎克 儒勒·凡尔纳 让-雅克·卢梭 贝尔纳丹·德·圣皮埃尔 法国文学 亚历山大·冯·洪堡

中图分类号: I5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 (2021) 03-0031-10

作者单位: 波兹坦大学罗曼语文学研究所, 德国 勃兰登堡 波兹坦 D-14476

DOI: 10.19967/j.cnki.flc.2021.03.004

Title: Between and Beyond the Nations: Alexander von Humboldt and French Literature

Abstract: Alexander von Humboldt, as a scientist and diplomatically mediating chamberlain to the Prussian king, played a bridging role between France and Prussia. He can hardly be claimed by one single national literary “tradition”, yet his close ties to France, especially to Paris, his place of residence and work for many years, as a central, if not the literary capital of European modernity, give an idea of how important the Prussian scholar’s connections to France and its literature were. A broader understanding of Humboldt’s relationship to writers such as Chateaubriand, Balzac and Hugo, and of Humboldt as a source of inspiration for French literature, provides a deeper insight into Humboldt’s own writing and his place within the literary field of 19th-century France. Alexander von Humboldt is connected to French literature in many different and surprising ways, but until now there has been no systematic examination of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French writers and the writing of the Prussian cosmopolitan. This article provides a new approach to this subject.

Keywords: René de Chateaubriand, Honoré de Balzac, Jules Verne, Jean-Jacques Rousseau, Bernardin de St. Pierre, French Literature, Alexander von Humboldt

Author: Markus A. Lenz, Research Assistant, Institute of Romance Literature, University of Potsdam, Potsdam, Brandenburg, Germany.

在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整个研究旅行结束的75年之后，一位享誉世界的法国作家凡尔纳（Jules Verne）发展了游记类文学的叙述形式——凡尔纳叙事方式。凡尔纳对科学技术十分着迷，科学进步带来的种种可能鼓舞了他，其叙事中也充满新颖、充满虚构和奇妙的元素。他将幻想与科学事实融合在一起，扩大了当时已知世界的边界，包括虚构的从地球到月球的未知区域。他的作品集科幻小说风格与科研文风于一体，其文学美学成就、超越地理学和物理学边界的主题，以及叙事张力在21世纪初依然具有生命力。

尽管在这位畅销书作家的有生之年，人类对地球表面的第一次探索已基本完成，但人们仍着迷于对未知区域和自然万物之间关联的科学研究。在被奥斯特哈默尔（Jürgen Osterhammel）形容为“世界之演变”^[2]的19世纪初，凡尔纳所推崇的洪堡就已经认识到了自然界中的相互作用，他可能是最早在严格的测量系统中呈现这种相互作用的研究人员之一。因此，尽管1871年的德（普）法战争让两国间的敌意急剧上升，凡尔纳仍视洪堡为榜样。既是世界公民又超越民族的洪堡是最高科学成就和成功文学写作的保证人，也是这位拥有爱国主义情怀的法国作家的灵感来源。对凡尔纳而言，洪堡既是一位探险家，也是一位作家。作家洪堡影响了凡尔纳的写作事业和创作主题，凡尔纳小说中的一些著名人物形象便是受他启发而创作。《地心游记》（*Voyage au Centre de la Terre*）的创作基于洪堡对瓜查拉洞穴（Höhle von Guachara）的勘探。洪堡的描述颇具文学色彩，渲染了洞穴的深不可测，令人印象深刻。而时至今日，凡尔纳小说中的相关描绘也让人为之着迷。《哈特拉斯船长历险记》（*Voyages et Aventures du Capitaine Hatteras*）、《格兰特船长的儿女》（*Les Enfants du Capitaine Grant*）、《海底两万里》（*Vingt Mille Lieues sous les Mers*），以及《大木筏》（*La Jangada*）等作品都体现了凡尔纳对洪堡研究成果的接受和引用（Verne 159-215）。小说《壮丽的奥里诺科河》（*Le Superbe Orénoque*）中有大量“行动”（Action）情节，以人类深陷重重险境中的阴谋为主题，具有典型的凡尔纳叙事风格。虽然它来源于凡尔纳的美国游记，与洪堡本人的作品很少有互文关系（Schifko 68），但作品还是参考了洪堡的美洲考察报告。就地理信息、科学知识和叙述而言，小说描写的旅程与洪堡在美洲的科学考察有大量的对应之处。帕泰尔和艾洛赫两位主人公对植物学充满兴趣，他们旅行的目的地是奥里诺科河的源头。小说中的探险者并不知晓河源的具体位置，让人误以为凡尔纳的探险小说并没有处处借鉴洪堡的探索成果。但实际上，这部小说充满暗示地重构了这场在19世纪末已成为传奇的探险。不单单是这部凡尔纳晚年的文学作品，前面提到的所有小说都与洪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超越了对19世纪末的怀旧热情，在某些方面已经走在杰出科学家的前面。

19世纪末，法国文学史上许多声名卓著的人物不仅善于向作为自然研究者的洪堡学习，也善于向作为作家的洪堡学习，为自己的文学创作增色。凡尔纳这位拥有众多拥趸的科幻文学之父只是他们中的一员。洪堡的作品被大量翻译成不同语言的版本，并且他本人也能使用多种语言写作，常在法语和德语之间切换。长期以来，人们对洪堡是法国作家还是普鲁士作家意见不一。如今看来，洪堡不能被简单纳入任何一部国别文学史。作为科学家和文学家的洪堡在

创作和接受度两个层面上都可被视为一位超越国家界限的世界公民 (Ette, *Mobile Preußen* 87-106)。

伟大的英语作家、心理小说大师詹姆斯 (Henry James) 将自然研究者洪堡视为 19 世纪最重要的作家之一, 并将其与法国文学, 或者更准确地说, 与一位伟大的法国现实主义文学作家代表相联系。这位美裔英籍作家、戏剧家、游记作家和小说家细致地比较了洪堡与法国小说家巴尔扎克 (Honoré de Balzac)。在洪堡的自然概念中, 每个自然现象与自然整体的各部分互相关联, 而巴尔扎克则分析了人类社会中的种种联系和互动。巴尔扎克穷毕生之力所创作的《人间喜剧》(*Comédie Humaine*) 正对应于洪堡的未尽之作《宇宙》(*Kosmos. Entwurf einer physischen Weltbeschreibung*)。詹姆斯将巴尔扎克同洪堡进行比较是基于他们研究方法的相似性。事实上, 他们的关系也不无历史根据, 因为他们在生前便有接触。巴尔扎克创作了一系列 19 世纪最伟大的小说, 而洪堡的《美洲游记》(*Amerikanischen Reiseswerkes*)、《论自然》(*Ansichten der Natur*)、《宇宙》也均可谓鸿篇巨制。他们彼此认识且互相欣赏。这一点不足为奇, 因为洪堡在一生中都保持着与法国社会的互动, 他与 19 世纪法国作家们建立友谊, 保持联络。詹姆斯将二者相提并论也合情合理。法国文学史上许多知名人物跟洪堡几乎身处同一历史时期, 还有过私下交往, 巴尔扎克只是其中之一。

斯戴尔-奥斯丹 (Germaine de Staël-Holstein), 康斯坦 (Benjamin Constant), 司汤达 (Stendhal, 本名 Marie-Henri Beyle), 以及夏多布里昂 (René de Chateaubriand) 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前是法国文学的核心人物, 也是维系德法之间文学关系的中坚力量。后来, 雨果和巴尔扎克深刻影响了法国文学史。洪堡与浪漫主义者夏多布里昂和现实主义者巴尔扎克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与法国的紧密关系影响了洪堡的整个人生。除去在柏林生活的岁月, 洪堡主要的工作和生活地点是巴黎。哲学家本雅明 (Walter Benjamin) 称巴黎为“19 世纪的首都”, 而在艺术和科学进入变动不居的现代化阶段时, 巴黎也是文学的首都。巴黎和柏林隶属欧洲两个不同文化圈, 它们在洪堡的生命中紧密地联系起来。由此可见, 在洪堡生前, 法国作家对他的欢迎意义重大。下文将概述这位普鲁士学者与部分法国作家的关系, 深入理解洪堡在两国之间进行的创作、其享誉欧洲的作家身份及在法国文学界中的地位。

一、柏林与巴黎之间的 (文学) 生活

如上所述, 詹姆斯对洪堡和巴尔扎克的比较虽然间接表明洪堡与法国文学界的密切关系, 但这不能说明洪堡在巴黎学者圈和文学领域的核心地位。洪堡与巴尔扎克的私人关系才能为这一点提供明证。跟洪堡一样, 巴尔扎克在青年时期就对自然科学和 19 世纪逐渐建立起来的自然史学科有兴趣浓厚, 并在巴黎聆听了圣伊莱尔 (Geoffroy Saint-Hillaire) 的动物学课程。大约在 1830 年, 巴尔扎克在他的友人——肖像画家西蒙, 即热拉尔男爵 (François-Pascal Simon / Baron Gérard) 那里结识了洪堡。而此前, 他对洪堡仰慕已久, 洪堡也扶持过这位前途无量

的年轻作家。1843年，洪堡在柏林与巴尔扎克见面，并在波茨坦将其引荐给作家、莎士比亚翻译家蒂克（Ludwig Tieck）——这位伟大的小说家是德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核心人物（Dedeyan 277-88）。

洪堡和巴尔扎克之间有时会呈现出一种有趣的关系，这种关系不仅存在于文学的虚构世界中，也存在于文学之外。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中以其作家同行和沙龙朋友为原型塑造人物，洪堡通过巴尔扎克成功地进入现实主义的文学世界。在巴尔扎克的《猫打球商店》（*La Maison du Chat-qui-pelote*）和《不自知的喜剧演员》（*Les Comédiens sans le savoir*）中，为了进行文学对比，学者洪堡被塑造成一个举足轻重且幽默风趣的人物形象，还要冷静地忍耐理发和画肖像画这类枯燥的活动（Clark and Lubrich 119-20）。这位“普鲁士男爵”同样不失讽刺意味地出现在巴尔扎克《一个好主意在行政管理部的冒险》（*Aventures administratives d'une idée heureuse*）一书的一次沙龙聚会里，巴尔扎克的内隐自我或子人格（Alter Ego）路易·兰贝尔也在场，二人就“系统”这一概念进行了复杂深入的学术探讨。以洪堡为原型的小说人物毫不掩饰地抨击了斯威登堡（Emanuel Swedenborg）和波墨（Jakob Boehme）的神智学思想。这位以洪堡为原型虚构的人物兼具普鲁士民族的个性和法国人的优雅。作为作者的传声筒，小说人物并不传播洪堡本人的思想，而是将巴尔扎克自己的科学观念带入沙龙的讨论中去（Dedeyan 88-92）。巴尔扎克在文学创作中使洪堡不朽。这位普鲁士人在法国社会的知名度和活跃度由此可见一斑。

要理解洪堡在巴黎社交圈的知名度及其与法国文学界的关系，需要考察洪堡在外交和科学政策方面的“联络人”（Netzwerker）身份。身为科学家和普鲁士国王善于外交斡旋的侍从官，洪堡始终在普法之间扮演着调停者的角色。从拿破仑战争开始，经历路易十八的复辟、查理十世的统治和路易·菲利普一世的七月王朝时期，洪堡往返于柏林和巴黎之间，促进了两个民族间的相互理解。不仅洪堡自己的创作受到法国作家的影响，而且正如他与法国作家的频繁联络所表明的那样，他还促进了莱茵河两岸文学的发展和交流。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在巴黎度过的二十年时光（1807—1827）对洪堡具有决定性意义。这位享誉世界的科学家在巴黎活跃于一个由自然科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家和作家构成的社交网络中。在柏林的岁月里，他依旧维系和拓展着这些关系，直到生命的终结。

这个社交网络的开端可以追溯至洪堡早年对兄长威廉（Wilhelm von Humboldt）的一次拜访。1801年以前，威廉一直定居巴黎。在前往美洲之前，洪堡在拜访威廉时第一次接触到法国社会的核心人物。之所以有这样的机会，是因为洪堡早年除了参加过莱文（Rahel Levin）和赫尔兹（Henriette Herz）主持的柏林学者沙龙，还出席了雷卡米尔（Julie Récamier）、杜拉斯（Claire de Duras）和蒙卡尔姆侯爵夫人（Marquise de Montcalm）在巴黎举办的沙龙。美洲之旅结束后，洪堡成在巴黎沙龙颇受欢迎的人物。洪堡兄弟二人都与自然科学家、文学家、高产的艺术家和音乐家，还有政治家及外交人士有着密切的交流和通信（Fumaroli 8; Espagne 73）。前面提到的肖像画家热拉尔男爵和他举办的沙龙活动对洪堡与法国作家的交往尤为重要。洪堡早在拿破

仑统治时期就已结识热拉尔，并通过他与当时几位最著名的作家建立联系，结交为友。

洪堡同热拉尔的友人司汤达的关系较为复杂。司汤达这一笔名来源于歌德的朋友温克尔曼(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出生地的地名。在服役于拿破仑军队期间，司汤达在普鲁士度过了较长一段时间。洪堡是否见过司汤达，见面情况如何，我们对此并不清楚。不过，根据施劳歇尔(Kurt Schleucher)的说法，这位著有《红与黑》(*Le Rouge et le Noir*)的作家曾带着对洪堡最崇高的敬意将自己的所有作品寄给他(280)。但是施劳歇尔的说法缺乏根据，而且在洪堡图书馆的书单中并没有关于司汤达作品的记录。能够确定的是，与这种崇敬的态度相反，司汤达对洪堡自1818年后的写作风格抱有批判态度，称这种文风太过“浮华”。在《伦敦杂志》(*London Magazine*)和《新月刊》(*New Monthly Magazine*)等英文杂志发表的文章和信件中，司汤达表达了对洪堡的批评，甚至指责他的人格。他认为洪堡阴险狡猾，贬斥其为一个“根深蒂固的阴谋家”(tiefsitzendes Jesuitentum)。在批评家昂里奥(Émile Henriot)和外交官兼作家多洛(René Dollot)看来，司汤达对洪堡的评价可能也受到他们之间观点和立场分歧的影响(Théodoridés 42-44)。

洪堡作为欧洲科学家和学者所起到的桥梁作用在他与雨果的关系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在1848年动荡的革命前三年，雨果在将《巴黎圣母院》寄给洪堡时称其为“杰出的同仁”(illustre confrère)，并请求他将自己引荐给普鲁士国王(Humboldt et al. 112)。备受称颂的小说家、戏剧家和诗人的情人、后来成为寡妇的作家多奈(Léonie d'Aunet)在斯堪的纳维亚进行过科学考查，她十分敬佩作为科学家和作家的洪堡，一直与他保持着内容涉及广泛的通信。洪堡曾亲自带她观光游览柏林。她曾请求洪堡为她的好友、第二位登上勃朗峰的女性德安格维尔(Henriette d'Angeville)的作品撰写推荐语及导言。而洪堡却并未满足她的请求(Ferron 68)。在多奈的作品《一个女人的施彼茨堡之旅》(*Voyage d'une Femme au Spitzberg*)中，她对这位科学家和作家的赞美和赏识溢于言表。洪堡在自由市民眼中是自由研究的象征。多奈称其为“我们的导师”和探险的向导(351)。

洪堡与夏多布里昂保持着最为紧密的关系。在洪堡定居柏林时期，他只是以客人的身份前往巴黎。当时，除了巴尔扎克，只有夏多布里昂和雨果有幸提前知晓洪堡尚未付梓的作品部分章节。同时，洪堡十分珍视夏多布里昂提出的建设性意见(“Alexander von Humboldt und Cotta” 281)。夏多布里昂在1808年耶路撒冷之行后与洪堡相识，此前他就与洪堡的兄长相熟。夏多布里昂与洪堡几乎同岁，他们的友谊不仅限于文学领域——这位法国浪漫派文学的代表作家与洪堡一样也是政府官员，他在洪堡热爱科学和文学的生命中占有一席之地。夏多布里昂著有《勒内》(*Autor von René*)、《阿达拉》(*Atala*)和《墓畔回忆录》(*Mémoires d'outre tombe*)。洪堡于1808年写成《论自然》一书。他们一同出游美洲的经历、对旅游的热情，以及对圣皮埃尔(Bernardin de St. Pierre)作品的喜爱加深了彼此的友情。夏多布里昂还在自己的作品中戏仿了圣皮埃尔《保尔与薇吉妮》(*Paul et Virginie*)中的爱情主题。除了上述文学方面的影响，夏多布里昂还曾帮助洪堡扩大其在法国学术机构中的影响力。二人都是巴黎地理学

会成员，并分别在1824年和1845年担任该机构主席。在著作出版方面，夏多布里昂同样给洪堡提供了诸多帮助。比如，1819年他在具有保皇倾向的杂志《保守派》（*Le Conservateur*）中就《热带地区之旅》（*Voyage dans les Régions équinoxiales*）的前两卷（第1卷1814—1817，第2卷1819—1821）发表了一篇热情洋溢的书评。他称赞洪堡继承了蒙田和卢梭的“高贵人类学”（*edle Anthropologie*）。在这一点上，游历过美洲和东方地区的夏多布里昂有可能将他本人对卢梭的崇敬带入到了对洪堡作品的认可中。夏多布里昂对洪堡的赞赏并非不求回报，洪堡也是他与德语文学之间的一座桥梁。夏多布里昂与洪堡的友人歌德之间的复杂关系为洪堡的“联络人”身份提供了一个有趣的例证。这位法国浪漫派作家十分欣赏《少年维特之烦恼》（*Die Leiden des jungen Werthers*）一书，但对于歌德从情感充沛的“狂飙突进人物”到理性、和谐的古典主义者的转变表示不满。

洪堡在人生的暮年已经完全融入法国学者群和文学界。在他离世之际，《年刊》（*Nouvelles Annales*）刊登了长达二十页的悼词，并详细报道了在柏林举行的葬礼盛况（*Espagne* 80）。洪堡精通法语，早年接受法国启蒙思想的熏陶，与法国在文学、科学、机构、社会层面都建立了种种联系。据此，我们有理由称之为法国作家。为了证明这一点，还需在洪堡的早年作品中寻找依据。

二、作为作家洪堡之榜样的法国文学家

洪堡兄弟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法语教育。信仰胡格诺教的母亲玛丽-伊丽莎白（Marie-Elisabeth Colomb）让他们在童年时期就有很扎实的法语基础；父亲亚历山大·格奥尔格（Alexander-Georg von Humboldt）聘用的家庭教师为洪堡兄弟二人带来了法国启蒙思想。其中一位叫坎普（Joachim Heinrich Campe），是教育家、作家、出版家，也是卢梭的信徒。在他不再担任家庭教师一职之后，洪堡仍与他保持联系。在他的引导下，洪堡接触了“日内瓦公民”，哲学家、作家、戏剧家和作曲家卢梭的思想（Heyl: 37, 67-69; Schleucher 11）。

卢梭的自然概念在18世纪末成为哲学术语，洪堡在青年时期就对这一概念有所了解。1795年9—10月，在弗莱堡逗留期间，洪堡与多年好友弗莱尔斯里本（Johann Carl Freiesleben）一同前往瑞士，游历了萨尔纳湖和四森林州湖（*Sarner-und den Vierwaldstättersee*）。在洪堡关于这次旅行的记录中，卢梭的自然观对他的影响可见一斑。洪堡这颗敏感的心中饱含着对自然风景的热爱。他在日内瓦湖畔给瓦尔登费尔斯（Christiane von Waldenfels）写信说：“远离那些所谓的文明之士，过一段静穆而幸福的人生。”（*Aus meinem Leben* 153）之后，面对内心对科学研究的热情，洪堡将以往对文明的批判态度归因于青年时代经历的维特式的狂热。在1791年写给苏默林（Samuel Thomas von Soemmerring）的一封信中，他从自然哲学家普拉特纳（Ernst Platner）的视角出发批判了卢梭对自然的服从态度，认为他一成不变、毫无批判意识（Heyl 66, fn. 51）。

洪堡的科学成就、美洲之旅的规划，以及《美洲游记》、《论自然》和《宇宙》这些作品的成功都离不开他对自然现象的热情和他在科学研究中的想象力，其作品中蕴含着卢梭式的对自然的生动感受。洪堡游记中对自然现象的描绘有着较高的文学价值，主要体现在其文风清丽、细节详实，关于科学知识的表述生动且浅显易懂。洪堡认为，对事物的描写“体现着观察者的观察能力”（Ette, “Anmerkungen” 1575）。

洪堡对其他两位法国作家的接受比对卢梭的接受更为明显。他反复阅读过夏多布里昂和圣皮埃尔的作品并深受鼓舞，如《阿达拉》和《保尔与薇吉妮》。后者的情节来源于作家在当时隶属法国的毛里求斯岛旅行的经历、印象和考察的结果。这些作品生动而诗意地描绘自然，描写人与大地共生共存的状况，是洪堡取之不尽的灵感之源。在美洲之行中，洪堡和他的同伴邦普兰（Aimé de Bonpland）除了携带各种测量工具、地图集和植物学、天文学及地理学著作以外，还随身带着《保尔与薇吉妮》。这部小说自出版以来在欧洲广受欢迎，德语区的艾克曼（J. P. Eckermann）和歌德也是它的读者。保尔与薇吉妮这对恋人的故事中充满人类的迷惘与混乱，具有悲剧色彩的情感纠葛。小说中的大自然既是故事情节的推动者，也是人类与其周遭环境、天气现象及感官印象和谐共存的空间。在阅读这部小说时，邦普兰和洪堡会朗诵其中的段落。洪堡表示，他“要在德国人面前成为一个像圣皮埃尔一样独一无二的典范式人物”（“Alexander von Humboldt und Cotta” 79）。洪堡使用了十分新颖的认识论和美学手法刻画自然，将感官印象同丰富的事实相结合，生动再现了旅途场景。这些特点都证明洪堡对圣皮埃尔的写作手法和夏多布里昂的科学散文的借鉴。洪堡将自然叙事看作是感官印象的一个有机总体，并“模拟”它的运行过程（Ette, “Anmerkungen” 1571; König 292-95; Kraft 61）。尽管如此，洪堡还保留着独特的个人风格，恰好是对于自然在文学中的角色而言，洪堡和他的前辈存在根本的差异，正如他在给恩塞（Varnhagen von Ense）的信中所说：“一本自然之书必须要唤起读者亲临自然的感受。关于自然的观点，我与福斯特 [Georg Forster] 和夏多布里昂的根本区别是：我尝试过，总是真实地去描绘，忠实于科学本身，却不局限于枯燥的知识。”（Humboldt et al. 15）

不仅其外交工作和人生经历，洪堡的作品以及他对自然和文化的描述都同法国哲学和文学交织在一起，融入法国人创造的自然概念和写作风格。和枯燥的知识性著作完全不同的是，洪堡的著作可以被人们当作成功的文学叙事作品来阅读，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作品是虚构的叙事散文或杜撰的叙事小说，其中的人物也不具有道德教化功能。被洪堡视为榜样的法国文学家在小说中对自然的叙述和描写方式共同塑造了这些写作特点。

三、成功的秘密：根植法国及法文作品的出版和接受

洪堡的生平经历、社交和文学写作与法国及法国文学的关系十分紧密。此外，洪堡之所以能载入法国文学史，还有一个最“实际”的原因，即他的写作和出版均根植于法国。拿破仑下令出版的巨著《埃及记述》（*Description de l'Égypte*）为《美洲游记》的写作提供了科学的模

型 (Humboldt et al. 73)。此外,在美洲考查结束之后,洪堡多用法语发表作品,法语是十八、十九世纪之交的学术语言和“世界语”。同时,法语国家出版界提供的支持也促进了洪堡写作事业的成功。洪堡在巴黎期间用法语写成《美洲游记》,并耗巨资以多种语言出版发行。这部作品是一部国际“合作作品”。除了斯图加特的书商科塔 (Johann Friedrich von Cotta),还有法国出版商勒夫罗 (Levreault)、雷诺阿 (Renouard)、吉德 (Gide),以及在巴黎的外国出版商舍尔 (Schoell)、史密斯 (Smith)、斯通 (Stone) 等共同促成了此书的出版。这部具有标志性意义作品的成书过程十分复杂,分工细致,印有彩色插图、地图和图表的纸张造价不菲,整个欧洲的绘画师、雕刻家和印刷人员都为之出力,最终《美洲游记》在巴黎成书 (Leitner 83-112)。与此同时,洪堡还在法国最为知名的一些杂志上发表文章。这些杂志在学科内地位重要,读者众多。洪堡发表的这些作品也为《美洲游记》一书的写作风格做了宣传。洪堡刊登于《年刊》及由布戎 (Conrad Malte-Brun) 和艾里埃 (Jean Baptiste Benoît Eyriès) 于 1807 年创刊的《新游记年刊》(*Nouvelles annales des voyages*) 上的文章受众是专业人士,而发表在期刊《两个世界》(*Revue des deux mondes*) 上的文章则面向广大对不同学科领域新知识感兴趣的受过一定教育的读者。后者赞赏《美洲游记》中洪堡描写和叙述自然的文学力量。仅从洪堡的出版事业来看,我们很难将被欧洲广为称颂的回归者洪堡称为在法国“流亡”的“德国”作家,尤其需要考虑的是,他之后定居柏林期间用德语发表的作品,在译者和作家群体的支持和帮助下很快出版了法语译本。《论自然》一书于 1828 年被翻译成法语,雷纳迪埃 (Philippe de la Renaudière) 为其撰写了书评。与洪堡相识的阿拉戈 (François Arago) 的学生法耶 (Hervé de Faye) 将《宇宙》译成法文。

洪堡作品的创作和出版都与法国密不可分,他在美洲之行后也常年活跃于巴黎科学界和社交界。因此,洪堡及其作品经常成为法国学者圈内的讨论对象,而且讨论不仅局限于他作为自然科学家的身份。研究洪堡的热度持续了整个 19 世纪,并且在文学家、批评家、出版商和译者的支持下,在他离世后热度仍不减。在 1865 年一篇关于伏尔泰的文章中,文学史学家塔扬迪耶 (Saint-René Taillandier) 将洪堡对其时代的意义与数学家和哲学家莫佩尔蒂 (Pierre-Louis Moreau de Maupertuis) 对 18 世纪的意义进行了对比,以便法国的读者能够形象直观的比较两者 (Espagne 82)。同样,尽管 1871 年德国统一之后德法关系日趋紧张,德国方面仍将洪堡视为德国和法国之间的欧洲作家。在 1883 年 8 月 3 日柏林大学洪堡纪念像奠基之际,德国医学家和心理学家杜布瓦雷蒙 (Emil Heinrich Du Bois-Reymond) 满怀激情地将洪堡和伏尔泰相比较,称他们是各自时代欧洲学术界的核心和典范式人物 (Humboldt and Bois-Reymond 199-200)。

四、亚历山大·冯·洪堡与法国文学:有待探索的关系

尽管洪堡与法国文学紧密相连,但至今学界尚未系统整理法国作家对洪堡作品的接受情况,洪堡在法国文学界的定位也缺乏专业的文学分析。由富马罗利 (Marc Fumaroli)、费伦 (Isabella

Ferron)、埃斯帕涅 (Michel Espagne)、莱特纳 (Ulrike Leitner)、埃特 (Ottmar Ette) 和希夫科 (Georg Schifko) 等人开启的初步研究为进一步研究这个复杂的主题带来了希望, 这将为探究法国文学在科学和历史方面对洪堡式写作的影响带来新的成果。同时, 19 世纪的文学是什么? 什么对今天的文学概念产生了重大影响? 通过研究洪堡与它们的关系可以揭示尚不为人所知的影 响、洪堡通过旅行和观察获得的方法论、风格、自然科学知识, 或者更长远地说, 深入地理解 19 世纪欧洲的核心文学景观。鉴于洪堡的作品在文学领域和虚构文本之间的复杂关系, 洪堡本人成为文学概念批判性现实化过程中的关键人物, 这一文学概念在语文学意义上也绝不是自成一体的。以往文学与严肃的自然科学写作泾渭分明, 后者或被过分重视或被直接忽视。尤其是 19 世纪的法国拥有比“文学性的”和“纪录式的”二元对立更为开阔的视野, 洪堡对文学的理解也受益于此, 他与凡尔纳一起用自己的写作实践了这种文学观。

注释 [Notes]

[1] 译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硕士研究生。

[2] 参见 Jürgen Osterhamm, *Die Verwandlung der Welt. Eine Geschichte des 19. Jahrhunderts*. C. H. Beck, 2009.

引用文献 [Works Cited]

- Clark, Rex, and Oliver Lubrich, editors. *Transatlantic Echoes. Alexander von Humboldt in World Literature*. Berghahn, 2012.
- D'Aunet, Léonie. *Voyage d'une femme au Spitzberg*. Hachette, 1873.
- Dedeyan, Charles. "Balzac et Alexandre de Humboldt." *L'Année balzacienne. Nouvelle Serie 18*, edited by Groupe d'études balzacienne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97, pp. 88-92, 277-88.
- Espagne, Michel. "Momente der deutsch-französischen Weltvermessung um Alexander von Humboldt." *"Mein zweites Vaterland": Alexander von Humboldt und Frankreich*, edited by David Blankenstein, et al., De Gruyter Akademie Forschung, 2015, pp. 71-82.
- Ette, Ottmar. "Anmerkungen." *Alexander von Humboldt: Reise in die Äquinoktial-Gegenden des Neuen Kontinents*, Band 2, edited by Ottmar Ette, Mit Anmerkungen zum Text, einem Nachwort und zahlreichen zeitgenössischen Abbildungen sowie einem farbigen Bildteil, Insel, 1991, pp. 1515-62.
- . *Mobile Preußen: Ansichten jenseits des Nationalen*. J. B. Metzler, 2019.
- Ferron, Isabella. "Alexander von Humboldts Briefwechsel mit französischen hommes des lettres." *"Mein zweites Vaterland": Alexander von Humboldt und Frankreich*, edited by David Blankenstein, et al., De Gruyter Akademie Forschung, 2015, pp. 59-70.
- Fumarioli, Marc. "Chateaubriand, Goethe und die Brüder Humboldt." *"Mein zweites Vaterland": Alexander von Humboldt und Frankreich*, edited by David Blankenstein, et al., De Gruyter Akademie Forschung, 2015, pp. 1-14.
- Heyl, Bettina. *Das Ganze der Natur und die Differenzierung des Wissens: Alexander von Humboldt als Schriftsteller*. De Gruyter, 2007.
- Humboldt, Alexander von. *Aus meinem Leben: Autobiographische Bekenntnisse*. Compiled and explained by Kurt-R. Biermann, Urania, 1987.
- . "Alexander von Humboldt und Cotta." *Briefwechsel*, edited by Ulrike Leitner, Akademie Verlag, 2009.
- Humboldt, Alexander von, and Emil du Bois-Reymond. *Briefwechsel*, edited by Ingo Schwarz and Klaus Wenig, De Gruyter Akademie Forschung, 1997.

- Humboldt, Alexander von, et al. *Briefe von Alexander von Humboldt an Varnhagen von Ense, aus den Jahren 1827 bis 1858: Nebst Auszügen aus Varnhagens Tagebüchern, und Briefen von Varnhagen und Andern an Humboldt*, edited by Ludmilla Assing, Brockhaus, 1860.
- König, Torsten. *Naturwissen, Ästhetik und Religion in Bernardin de Saint-Pierres "Études de la nature."* Peter Lang, 2010.
- Kraft, Tobias. *Figuren des Wissens bei Alexander von Humboldt: Essai, Tableau und Atlas im Amerikanischen Reisewerk*. De Gruyter, 2014.
- Leitner, Ulrike. "Das amerikanische Reisewerk—Eine internationale Koproduktion in Paris." *"Mein zweites Vaterland": Alexander von Humboldt und Frankreich*, edited by David Blankenstein, et al., De Gruyter Akademie Forschung, 2015, pp. 83-112.
- Schifko, Georg. "Jules Vernes literarische Thematisierung der Kanarischen Inseln als Hommage an Alexander von Humboldt." *HiN XI*, vol. 21, 2010, pp. 66-71.
- Schleucher, Kurt. *Alexander von Humboldt. Der Mensch. Der Forscher. Der Schriftsteller*. Eduard Roether, 1984.
- Théodorides, Jean. "A propos d'un centenaire. Humboldt vu par Jacquemont, Stendhal et Delécluze." *Stendhal Club*, no. 5, 15 Oct. 1959, pp. 39-46.
- Verne, Jules. *Die großen Seefahrer und Entdecker. Eine Geschichte der Entdeckung der Erde im 18. Und 19. Jahrhundert*. Selected and edited by Claudia Schmöders. Diogenes, 1974.

◇责任编辑：罗辉

第二次半球之旅 ——亚历山大·冯·洪堡作品中的亚洲之旅

◎ 托拜厄斯·克拉夫特 弗洛里安·斯诺 陈珏旭/译^[1]

内容提要: 1829年横穿中亚的远征是普鲁士探险家亚历山大·冯·洪堡的一个人生转折点。在巴蒂边哨所,他首次直接接触了中国文化,并将《三国志》的抄写本带回柏林。在随后的几年中,出现了一种别样的、但在中亚探索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旅行书写:今天我们可以在各种付梓的作品和手稿中读到这些文字。本文介绍了洪堡记述第二次半球之旅的旅行书写的特点,并特别强调了这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中亚》(1843)之于洪堡科学模型的关键性意义。

关键词: 亚历山大·冯·洪堡 旅行文学 旅行杂志 中亚 《三国志》 探索史

中图分类号: I5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 (2021) 03-0041-10

作者单位: 柏林-勃兰登堡科学与人文科学院, 德国 柏林 10117

DOI: 10.19967/j.cnki.flc.2021.03.005

Title: The Second Hemisphere: Alexander von Humboldt's Asian Journey as Reflected in His Writings

Abstract: The expedition through Central Asia in 1829 marked a turning point in the life of the Prussian explorer Alexander von Humboldt. At the border post Baty, he came into contact with Chinese culture for the first time. From there he brought a copy of *The Records of the Three Kingdoms* to Berlin. In the following years, a heterogeneous, but extremely important travel work in the history of the exploration of Central Asia emerged: it is available to us today in various printed materials and manuscripts. This article presents the special features of this travel work based on Humboldt's second hemisphere journey, emphasizing in particular the importance of the representative work *Asie Centrale* (1843) as a key to Humboldt's scientific model.

Keywords: Alexander von Humboldt, travel literature, travel journals, Central Asia, *The Records of the Three Kingdoms*, history of exploration

Author: Dr. Tobias Kraft, Head of the Academy Project "Alexander von Humboldt auf Reisen – Wissenschaft aus der Bewegung," Berlin Brandenburg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Berlin, Germany; Florian Schnee, Research Assistant of the Academy Project "Alexander von Humboldt auf Reisen – Wissenschaft aus der Bewegung," Berlin Brandenburg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Berlin, Germany.

一、从西伯利亚到中国边境

西伯利亚小镇,卡因斯克(Kainsk)^[2]。这是1829年7月29日的清晨。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在这个他本不该来的小镇,面临着艰难的抉择。三个半月前,他从柏林启程前往俄罗斯和更远的西伯利亚地区,开启了盼望已久的第二次半球之旅。此次科考可与使他享誉全球的美洲热带地区考察(1799—1804)相提并论。自1829年4月12日深夜出发以来,他与另外两名科学家埃伦伯格(Christian Gottfried Ehrenberg)和罗斯(Gustav Rose)已经在马车上前行了数千俄里。

他们先沿波罗的海沿岸到达圣彼得堡,而后辗转南下莫斯科、下诺夫哥罗德,又经喀山和彼尔姆到达叶卡捷琳堡,继而越过北乌拉尔山脉的矿山群,途经秋明州、托博尔斯克和塔拉,最后抵达西西伯利亚低地草原上的卡因斯克。按照与沙俄政府商定的计划,他们不应来此,而是要从托博尔斯克到鄂木斯克,然后结束旅程。但洪堡心中另有计划。

只要可能,洪堡就会在夜间赶路。一路上,他不得不忍受无休无止的款待和“持剑者的不停造访”,却不想因此而迁延时日。同年6月21日,他在叶卡捷琳堡写信告诉哥哥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按照预定的计划筹得了几天的旅费。”并暗示他想继续向“更东处”前进(Humboldt, *Russland* 138)。实际上,他正计划绕行几千俄里,前往西伯利亚,直至中俄交界地区。7月14日,他再次写信给威廉:“我们将直接前往阿尔泰的托博尔斯克、鄂木斯克(又或许是巴尔瑙尔)。”几天后,他实施了这个计划:“一切都如预想的那样,我们已经预留了10~12天的时间,可以考察阿尔泰或鄂木斯克以外的地区,也许我们会看到位于中国边境旁的塞米巴拉金斯克。”(151)

离开托博尔斯克后仅一天,他便突破了沙俄政府对考察路线的严格限制,前往阿尔泰地区,正是此举创造了历史。直到7月23日写给财政部长的信中,洪堡才披露了自己所在的位置。这次探险活动原本由沙俄政府资助,时任沙俄财政部长的坎林(Georg von Cancrin)负责发起和组织。坎林与洪堡商定了各项资助事宜,并禁止其出版涉及沙俄政治和社会状况的作品。为了向坎林解释此举,洪堡声称考察路线的变动不仅可以节省时间,还能勘探施朗恩矿山,并承诺此行可以发现未知的动植物。然而在信的字里行间,还是暴露出这都只是他违反资助协议的托辞:“但是您也让我自行制定考察计划,希望它能够朝着有助于科学发现的方向去实施。”(153f.)

不到一周后,在7月29日上午,身处卡因斯克的洪堡获悉西伯利亚瘟疫正在巴拉宾斯克草原上的村庄里肆虐,而这恰恰是通往中国边境的必经之路。绕道而行不是不可能,但复杂的地形和紧凑的日程计划并不允许他们这样做。就此放弃更非良策,因为前往中亚高山地带和中国边境对测量山地、植被和各项数值比对来说非常必要。旅行结束后,洪堡专门在圣彼得堡学院发表演说,叙述此行。随后的几年,他撰写了一部名为《前往乌拉尔和阿尔泰的矿山、中国的准噶尔盆地周边和里海的旅程》(*voyage [...] aux mines de l'Oural et de l'Altai, aux frontières de la Dzongarie chinoise, et à la mer Caspienne*)的著作,并在书中清楚表明了考察阿尔泰和中俄

边境地区的重要性 (Humboldt, *Sämtliche Schriften* V: 12)。除了受沙皇委托勘探乌拉尔山脉的沉积物外,针对那些并不包含在原计划中的地点——里海、阿尔泰和准噶尔盆地周边地区——的考察也意义非凡。显然,如果当时选择在卡因斯克终止旅程,这些成就都无法取得。

最终,在收集了所有相关信息、征求当地医生的建议之后,洪堡采取了一些规避传染风险的措施——带足口粮、自我隔离、杜绝社交——继续前行。他的策略是有效的:8月1日,他毫发无损地穿过草原抵达鄂毕河,鼠疫肆虐的景象在此消失得无影无踪;几天之后,阿尔泰山脉前麓遥遥在望。1829年8月17日下午,在穿越纳雷姆^[3]后,中国边境已经近在咫尺。最终他抵达了巴蒂边哨所。

二、“我们将到达天朝”:洪堡在巴蒂的短暂停留

若将洪堡在中国边境停留的三小时视为一个标志性事件,便能领会此行的深远意义。洪堡一行在中国边境上的所见所闻远不及到达此处这一行为本身的意义重大。巴蒂^[4]并不在中国境内,而是一个位于额尔齐斯河畔的小型定居点,距北京仅四个月车程 (Ehrenberg 45r)。更重要的是,在巴蒂边哨所的经历对于洪堡来说非比寻常,这是他与中国文化的首次接触,这一刻他期待已久。到达中国边境是此次旅行的重中之重,即使它现在还未实现其真正意义。洪堡在离开乌斯季卡缅诺戈尔斯克之前,写信给他的哥哥:“我们将到达天朝 [……] 并且将一生铭记这件事情。” (*Russland* 172) 年近花甲的洪堡此时应当意识到,这是他人生中最后一次环游世界的伟大旅程。在此之后,他再也没有金钱、时间和精力领导一场类似的探险。在没有取得进展的情况下,洪堡便不应从巴蒂回来。但可以肯定的是,洪堡在巴蒂的收获远超过他在那里所能找到的。

在简陋的特雷加马车 (teléga)——这是一种适合山区地形的特殊载具——中待了六小时后,考察队在中午时分抵达边哨所。由于洪堡此前已向中方告知了行程,所以双方都有所准备。正如埃伦伯格在其日记中所描述的,会面非常隆重,也注重礼节 (44v-45r)。在友好的氛围中,双方互赠礼物。洪堡向中国当地指挥官幸福 (Cingfu) 献上一件蓝色斗篷,而他收到的回礼也极为宝贵:幸福以个人名义抄写的二十册 17 世纪金圣叹评点版《三国志》。在所有相关资料中,罗斯对于旅行的记录最为详尽;涉及在巴蒂边哨所经历的章节值得细读 (I: 600-607)。

三、洪堡的亚洲系列著作

对巴蒂的访问让此行的科考范围得到极大拓展。随后几个月,洪堡越过鄂木斯克,行经米斯克和奥伦堡,沿伏尔加河直抵里海,再北返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于 1829 年 12 月 28 日回到柏林。记录此行的作品(直到 1838 年才完稿)与此前记录美洲之行的作品有着完全不同的结构、布局和顺序。如果要有效把握洪堡著述中与中亚相关的作品,就必须进行有序的梳理。以下内

容分别梳理了带有个人色彩的专著（洪堡和罗斯）、相关著作的不同译本和独立成篇的文章（洪堡和埃伦伯格）三类作品，并在最后简要介绍洪堡此行所获得的文献资料。

（一）专著

1. 《亚洲地质学与气候学的部分见解》（*Fragmens de géologie et de climatologie asiatiques*, 两卷本，1831年巴黎出版）

旅行结束约两年后，洪堡向巴黎科学院的同仁赠送了此书。之前的几个月，他已在巴黎科学院就其亚洲研究做过多场演讲，这部著作即演讲内容的汇总。某种程度上，说这些书卷是“草草地汇编成的演讲稿和文章”（Werner and Suckow 107）也并不算夸张。由于克拉普罗普斯（Julius Klaproth）和其他学者署名的文章占了全书约600页篇幅中的四分之一，而且洪堡的其他鸿篇巨制也很少是独著，其作者身份甚至遭到里特（Carl Ritter）的质疑（Fiedler and Leitner 349）。1831年12月19日写给埃伦伯格的信中，他本人对自己的工作量也不满意。洪堡深知，俄罗斯人正在等待其研究成果，并且担心这次昂贵的旅行会是一笔失败的投资。这位长期享誉世界的科学家认为其声誉受到威胁，便借此书的出版委婉地暗示和请求他的朋友罗斯尽快发表他所写的地质学旅行报告。

2. 《前往乌拉尔、阿尔泰和里海的矿物学和地质学旅程》（*Mineralogisch-geognostische Reise nach dem Ural, dem Altai und dem Kaspischen Meere*, 1837/1842年柏林出版）

罗斯代替洪堡撰写了这份俄罗斯-西伯利亚之行的科学评估报告。他在序言中说，此次旅行与美洲之行不同，他们并未对“旅行后要展开的工作有明确的计划”。因此，1831年夏天，当这位地质学和矿物学家出乎意料地被委托编写一份“以日记形式记录整个探险过程”（Rose I: X-XII）的报告时，他正准备出版其他专业书籍。包括未能出版的《地质志》（*Geognostic Diary*）在内，旅途中的著作和文件，以及洪堡的旅行日记，都成了他的写作来源。这份据称“仅为矿物学家和地质学家撰写”的两卷本报告文风混杂，既有对考察行程和旅途见闻的客观叙述和部分文学性描绘，又有各种测量结果和科学观察记录，还有大篇幅的地质学和矿物学分析，甚至包括回国后在他哥哥海因里希（Heinrich Rose）的实验室里针对考察样本的矿物成分和水质的分析结果。鉴于可参考的材料十分有限，该报告对考察旅行过程的还原非常重要。报告随附的乌拉尔、阿尔泰和米阿斯冶金区^[5]的地图也意义非凡。该报告全文可在德国文本档案馆（DTA）或e-rara^[6]中找到；《中亚》（*Asie Centrale*）一书亦有摘录。

3. 《中亚》（*Asie Centrale*, 三卷本，1843年巴黎出版）

起初，洪堡计划扩充《亚洲地质学与气候学的部分见解》的内容，因为该书篇幅太小且出版量太少，无法达到俄国政府的要求。在该书付梓后的忙碌岁月里，洪堡手中的资料迅速增加，研究领域发生变化，专业水平也不断提高，所以他决定大干一场：“当我浏览过去十二年来收集的资料时，我发现其中最重要的资料尚未出版，[……]对我来说，写一本全新的书似乎更可取。”（*Asie Centrale* I: XXVI-XXVII）即使从标题来看，其概念的定位也是开创性的。“中

亚”一词在学术上并没有明确定义。与之前笼统使用这一概念的做法不同，洪堡在这本书的开篇便批评道：“就像它们是同义词一样，我们混淆了中部地区、未知地区、大陆内部地区的表达。”(XXVII)他认为，应该把三卷本中的前两卷视为消除这几个词的模糊性的一种尝试。洪堡确实取得了成功，他将“中亚”或“中亚地区”定义为俄罗斯、印度和中国之间的高地地区，因此“中亚”也首次成为得到明确界定的地理调查对象。“在北纬 44.5 度泛亚线以北 5 度、以南 5 度的宽度上，洪堡进一步界定了泛亚中部地带的范围，此后这被视为中亚地区的唯一定义。”(Gorshenina Abs. 3)

《中亚》也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专著。就像《亚洲地质学与气候学的部分见解》那样，它由洪堡和许多之前单独从事研究的同事合作完成(Fiedler and Leitner 356ff.)，这两部书在内容上也相互呼应，“像是一幅图与它的素描”(Beck 167)。洪堡认为这是《宇宙》(*Kosmos. Entwurf einer physischen Weltbeschreibung*)问世前他最用心的作品，并且比美洲旅行见闻更有文学性(Fiedler and Leitner 355)。

全书分为三卷。前两卷涉及亚洲的地质状况：包括山脉、火山链和平原，在乌拉尔山脉的考察，以及对山脉最高点的测量。洪堡认为实地考察中积累的知识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完全“颠覆了整个亚洲古代山地地理”(Humboldt et al. 360)知识。《中亚》不仅是对实地考察活动的数据收集——各项数据、测量值和调查概况——更是在全球范围内对相关知识进行的参照和比较，具有比较性地质学意义(*Géologie comparée*) (Humboldt, *Asie Centrale* I: XIV)。

第三卷主要致力于气候学和地磁学研究(Suckow, “Rußland” 257)，展现出洪堡式的双重策略：一方面侧重于研究具体问题，另一方面致力于制定前瞻性的研究目标。旅行结束后，他进一步完善了地磁测量方法(Reich et al. 8f.)，并推动全球范围内地磁观测站的建设和特殊探险活动的开展(Honigmann 57-86; Reich et al. 69ff.)。他意识到基础研究对改善诸如航海学等其他学科研究状况的重要意义。在气候学方面，他将途中收集到的温度测量数据加以利用，并且为了收集等温线模型的数据，他按要求将所使用的温度计和测量计划转交给俄罗斯矿务局的官员和科学家。依靠一支像三十年前那样的科考队进行科学考察已经无法满足洪堡对科学的设想了。洪堡在亚洲之行时的理想是通过全球范围内的测量站和标准化程序进行联合研究，他筹划着一项“针对整个俄罗斯帝国的长期研究计划”(Ette 26-27)。他向圣彼得堡学院提交了一份新型数据行动计划(Humboldt, *Russland* 502)。洪堡的倡议促进了欧亚科学站点网络的建立，使在整个俄罗斯领土范围内对当地气候和地磁状况的测量研究成为可能。在该计划指导下，欧亚大陆上建造了 70 多个固定观测站。其中一处站点设在位于北京的俄罗斯大使馆内。天文学家富斯(Georg Albrecht Fuß)将会在此进行第一次现代意义上的、针对中国的地磁观测。正如洪堡在《宇宙》第四卷中所指出的，彼得堡学会将观测站的建造和运营委托给他，但近年的地磁研究史却没有明确指出上述观测站的作用与历史意义。

3. 《中亚》(*Central-Asien*) (两卷本，三部分，1844 年柏林出版)

1844 年，马勒曼(Wilhelm Mahlmann)将《中亚》译为德文，并重新扩充了约 130 页。

在洪堡的帮助下，该书的地图资料也有所更新。为了该版的编辑，洪堡甚至将自己的旅行日记也提供给这位译者和合著者一段时间，供其参考（Mahlmann VI）。由于马勒曼对该版本做了全面的编注、补充和缩略，所以本书理应视为一本独立的著作，而不是译本。

（二）翻译和其他版本

1. 《亚洲地质学与气候学的部分见解》（*Fragmente einer Geologie und Klimatologie Asiens*, 1832年柏林出版）

《亚洲地质学与气候学的部分见解》的德语版由洛文贝格（Julius Löwenberg）依据法语版翻译而成。除译者的评注外，它还包含了两幅特有的折叠地图：一幅“亚洲内陆山脉和火山”（*Berg-Ketten und Vulkane von Inner-Asien*）^[7]图和一幅等温线极坐标投影地图（Fiedler and Leitner 352），前者比法语版更为清晰，后者则仅见于此德语版中。但不同于《中亚》，本书并非由洪堡独立撰写，但是它们在洪堡作品的接受史上依然占有重要地位。因为从1837年起，俄语版翻译的篇幅大大缩短，所以它们至今仍是《亚洲地质学与气候学的部分见解》唯一的完整译本（354）。

2. 《中亚》（*Central'naja Azija*, 阿努钦译，1915年莫斯科出版）

首版于1915年的俄语版《中亚》是俄罗斯学界了解洪堡亚洲之旅的里程碑式的著作。不幸的是，编辑阿努钦（Dmitrij Nikolaevič Anušin）的项目未能完结，它在第一卷出版后便戛然而止。然而，学界认为该译本是“根据现有资料，对旅程进程的首次全面描述”，并且对俄语读者而言，该版直到今天仍具有“很高的可读性”（Suckow, “Verlauf und Ergebnisse” 23）。

3. 《中亚》（*Zentral-Asien*, 卢布里希译，2009年法兰克福出版）

《中亚》由来自伯尔尼的文学研究者卢布里希（Oliver Lubrich）于2009年翻译出版，它可以被视为当代唯一符合学科规范的德语译本。该版本语言精炼，补充了许多仪器相关的材料，并且标记了马勒曼的翻译和他所作出的大量更正及增补的内容，甚至在个别地方还参考了马勒曼的版本。因此，有理由将其视为《中亚》首个完整的德语译本。由于它（如2004年发行的《宇宙》新版本或洪堡在英语版^[8]的写作中一样）的引文始终以法语原文的页码为准，故而在阅读中可以将两个版本并行使用。

（三）相关著作

一般而言，大部分读者无法直接获取洪堡的著作。因此，在报纸、专业期刊和大众杂志上刊登的稿件对洪堡研究的接受和传播起了关键作用。约三分之一的稿件与洪堡的著作直接相关——作为已出版作品的一部分，或虽是初次面世，但也为以后的出版做准备。伯尔尼版的洪堡系列著作于2019年问世，该系列收录了约800篇文章，包括学术论文、摘录的信件、演讲稿、政治类稿件和其他类型的短文，约有3,600部印刷品（包括几本未经授权的）在全球范围内分别于约440个城市的1,200多种期刊中出版（Lubrich and Nehrlich 8）。其中大多数是用

德语或法语编写而成——英语版则要到洪堡晚年才面世——并且已在欧洲和美国出版。与此相比，洪堡在亚洲期刊上发表的文章甚少，仅在1853年5月和1856年9月的《孟买时报》、1846年3月的《孟加拉先驱报》和1853年4月的《华北先驱报》上各有一篇文章刊出。另一方面，亚洲作为研究对象贯穿在洪堡的研究中。在前往俄罗斯-西伯利亚前，他就曾想过穿越雪线，研究中美洲与亚洲之间的贸易关系或对安第斯山脉和喜马拉雅山脉进行比较。在考察结束后，篇幅不一的著作自1830年起接连面世，有的作为专著，有的作为《亚洲地质学与气候学的部分见解》和《中亚》的预印本或节选段落出版，例如《关于亚洲内陆山脉和火山》（*Ueber die Bergketten und Vulkane von Inner-Asien*）。

洪堡在其著作中曾反复提及中国，尤其是中国古代的科技成就。在美洲之行的影响下，他从斯汤顿（George Leonard Staunton）所写关于乔治·麦卡特尼的中国公使团之旅（1792—1794）的报告和巴罗（John Barrow）的著作中了解与中国相关的信息。后来又在朱利安（Janislus Julien）、勒穆萨（Jean-Pierre Abel-Rémusat）和克拉普罗斯（Julius Klaproth）的帮助下，获得众多重要的原始材料。中国文明是洪堡心中非西方文明中具有强大影响力的代表，并为其提供了诸多灵感。在后来的著作中，他强调中国对指南针的使用和地磁的发现在导航中的实际意义，并指出了中国古代在制糖、贵金属开采上所具备的知识，以及天文学领域所取得成就，例如出现在《中国年鉴》中的彗星记录（Humboldt, *Sämtliche Schriften* VI: 268）。洪堡认为，自己对中亚地理环境和中国资源状况的考察和评估所带来的见闻，大大超过当时欧洲人的已有认知：

相比较而言，欧洲旅行者提供的材料对我们几乎没有什么意义。近年来，对汉族、满族和蒙古族文字材料的细致研究，为我们提供了最重要、最全面的信息。（V: 32）

洪堡认为，以往的中亚山脉的测绘记录未曾参考“丰富的中文材料，他们主观臆想的数据被当作客观测量结果使用在广泛阅读的著作和地图中”（VI: 542f.）。除此以外他还认为，对于火山的研究也应当参考中国地质学中的相关内容（VII: 437）。为了更好的学习和吸收这些知识，欧洲人需要提升汉语水平。

（四）旅行日记

1. 洪堡：1829年西伯利亚旅行日记的片段

洪堡在俄罗斯-西伯利亚之行期间所写的笔记（主要是用德语和法语）并未按照时间顺序排列，而是分节再现旅途的过程。笔记内容包括与地理位置相关的测量数据（如温度、气压、高度、距离、倾斜度等）和相关计算结果，有时还会摘录其他探险家的计算数据作为参考。除此以外，还有许多非常具有参考价值的信息，比如矿床、天气和距离信息、各种经济数据、人口统计数据、对于景观和地质情况的描述、词源问题和语言特点等。旅途中获取的联系方式按人名的顺序记录在两本小册子上，有时还附有简短的注释。类似于美洲考察游记那样详细描述

和分析旅行遭遇、书写旅行的感悟和思索的文字较为少见。洪堡在旅途中修改了部分游记的内容，并重新调整了顺序。在正式版中，最原始的笔记穿插在不同的段落里。据考察，洪堡使用这些片段编写了后来的出版物，特别是《中亚》。这本日记是私人收藏品，直到2020年，在柏林的洪堡作品数字化项目（Humboldt digital）上首次发行（Humboldt, *Fragments web*）。

2. 埃伦伯格：1829年俄罗斯—西伯利亚之行日记

动物学家、植物学家埃伦伯格负责记录旅途中的动植物。他的笔记多由铅笔写成，内容简短，主要是植物学方面的观察心得。整个行程在他笔下有所缺失，前往圣彼得堡的旅途及从多尔帕特到柏林的部分并未被提及。为此，他留下了一些空白页，方便日后补写，但却并未付诸实施。埃伦伯格在圣彼得堡、莫斯科、阿斯特拉罕，以及巴蒂边哨所停留了较长时间。尽管其日记主要作为植物学著作，注重注释的简洁性，但它偶尔还是会记录探险生活，这在其他旅行读物中很少见。例如，埃伦伯格详细记录了早餐的时间和地点及途中是否提供午餐等细节。有时，他只用几句话便勾勒出对风景或遭遇的印象。该日记原本存于柏林勃兰登堡科学研究院的档案馆，自2019年起可浏览其数字版本（Ehrenberg web）。

（五）洪堡的硕果：带到柏林的亚洲文献

亚洲之行的研究成果不仅体现在内容详实、文风多样、叙述客观的旅行著作中（Lubrich 827）。以巴蒂停留时期为例，洪堡将全新的对象纳入研究视野^[9]。在中国指挥官的蒙古包内获赠的珍贵礼物并非是亚洲书写文化传入柏林的唯一范例。1830年3月，他将24件藏品移交给柏林皇家图书馆，其中包括波斯语诗歌集、亚美尼亚语手稿、中国地图、中国日历和木版印刷品，发行于道光二年（1822）的几份邸报的副本，以及蒙古文和藏文手稿。时至今日，除了不慎遗失的7份材料外，这些罕见的、具有相当研究价值、记录于旅途中的宝贵文献资料仍然可以在柏林国家图书馆中查阅，是属于普鲁士的文化遗产（Humboldt, *Zentral-Asien* B13-20; Walravens 101-102, 114-42）^[10]。洪堡的亚洲著作在柏林的出版发行已广为人知，并在专业领域迅速引起人们的注意，这引发了汉学家^[11]之间关于著作的性质和内容，特别是关于三国的历史及随身携带的日报中刊登的政治和文化信息的讨论。

（六）概念圈的扩大

洪堡带回欧洲的收藏品和他的亚洲研究鼓舞人心（Ette, “Briefe aus Russland” 16-17），彻底颠覆了西方对世界的认知。在筹备美洲勘探系列著作（1805—1838）的数十年中，洪堡发展了一种新的科学研究模式。就像他苦心创作的《美洲山系一览》（*Vues des Cordillères*）一样，对欧洲读者而言，阅读《中亚》需要他们搁置以往的知识体系^[12]。洪堡不仅在自己的研究中践行研究视野的扩大化，还强烈主张细致研究亚洲文献，指出“西方人民忽略了大量事实”（Humboldt, *Asie Centrale* I: XXXIII）。

洪堡以往对文献的研究都在全球视野的前提下进行，他将世界视为不同文化影响下的结果，

正是这样的观点催生了《宇宙》中的全球观(Lubrich 865)。洪堡告别了西方中心主义的研究方法,在全球范围内推动“思想边界的扩展”(Kosmos, II: 153-54, 186, 283; III: 61),他认为亚洲、阿拉伯和美洲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与欧洲的一样重要。洪堡的研究是“跨学科的世界科学”(Ette 30)。洪堡的中亚探险之旅和研究成果构成了他研究事业的“第二个半球”。没有这一部分,洪堡整体性的研究范式便无法实现。

注释 [Notes]

- [1] 本文译者系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
- [2] 卡因斯克, 1782 年设立为城市, 1935 年为纪念被判在当地流放两年的苏联领袖瓦勒良·古比雪夫而更名为古比雪夫(Куйбышев), 今天为萨拉马市。
- [3] 纳雷姆(Narym), 俄语名 Нарым, 是俄罗斯托木斯克州帕拉贝尔斯基区的一个村庄, 位于鄂毕河与凯特河交汇处附近。
- [4] 在有关巴蒂的文学作品中也发现了它的满州地名 Choni Mailachu 或 Qoni Mayilaqu, Xoni Mayilaxu 或 Xon' Mailax (Humboldt, *Russland* 171, fn. 12)。这个地方已经不存在了, 如今布赫敏斯克水库就坐落于此 (170, fn. 11)。
- [5] 数字版分别见: www.digi-hub.de/viewer/fullscreen/BV045429724/1/;
www.digi-hub.de/viewer/fullscreen/BV036786937/699/; www.digi-hub.de/viewer/image/BV036787228/637/。
- [6] 数字版分别见: www.deutschestextarchiv.de/rose_ural01_1837/; doi.org/10.3931/e-rara-71843
- [7] 数字版见: www.e-rara.ch/zut/content/zoom/7098769。
- [8] press.uchicago.edu/ucp/books/series/HUMBENG.html。
- [9] 参见洪堡《中亚》一书中“收藏”一章, 主要是第二卷 2-20 页。
- [10] 洪堡带回的《三国志》抄写本的个别章节可在网上浏览:
stabikat.de/DB=1/XMLPRS=N/PPN?PPN=3343782149 (目录);
resolver.staatsbibliothek-berlin.de/SBB0000EA7700000000 (数字版)。
- [11] 库尔兹(Heinrich Kurz)、诺伊曼(Karl Friedrich Neumann)和卡拉普洛斯(Julius Klaproth)也间接参与了刊载于普鲁士公报(Allgemeinen Preußischen Staats-Zeitung)上的争论。洪堡感到有必要参与此次争论, 曾要求诺伊曼等人对他带回的文献作初步评估(Walravens 100-12; *Sämtliche Schriften* V: 63-64)。
- [12] 关于洪堡作品中大量的“亚洲式的美洲”内容及其旅行著作中亚洲与美洲的比较, 请参见 Ottmar Ette, “Amerika in Asien. Alexander von Humboldts Asie Centrale und die russisch-sibirische Forschungsreise im transarealen Kontext.” *HiN-Alexander von Humboldt im Netz*, vol. 8, no. 14, 2007, pp. 17-40.

引用文献 [Works Cited]

- Beck, Hanno. *Vom Reisewerk zum “Kosmos” 1804–1859*. Franz Steiner Verlag, 1961. 2 vols.
- Ehrenberg, Christian Gottfried. *Tagebuch der russisch-sibirischen Reise 1829*. Edited by Kerstin Aranda, et al. BBAW, 2019.
- Ette, Ottmar. “Alexander von Humboldts Briefe aus Russland – Wissenschaft im Zeichen ihres Erlebens.” *Briefe aus Russland 1829*, edited by Eberhard Knobloch, et al., Akademie Verlag, 2009, pp. 13-36.
- Fiedler, Horst, and Ulrike Leitner. *Alexander von Humboldts Schriften: Bibliographie der selbständig erschienenen Werke*. Akademie Verlag, 2000.
- Grshenina, Svetlana. “Comment penser l’Asie du Milieu et l’Asie du Centre?” *Espace populations sociétés*, no. 1, 2007, pp. 15-31.
- Honigmann, Peter. “Entstehung und Schicksal von Humboldts Magnetischen ‘Verein’ (1829–1834) im Zusammenhang mit seiner Rußlandreise.” *Annals of Science*, vol. 41, no. 1, 1984, pp. 57-86.
- Humboldt, Alexander von. *Asie Centrale: Recherches sur les chaines de montagnes et la climatologie comparée*. Gide, 1843. 3 vols.

- . *Kosmos: Entwurf einer physischen Weltbeschreibung*. Cotta, 1845–1862. 5 vols.
- . *Briefe aus Russland 1829*. Edited by Eberhard Knobloch, et al. Akademie Verlag, 2009.
- . *Zentral-Asien: Untersuchungen zu den Gebirgsketten und zur vergleichenden Klimatologie*. Edited by Oliver Lubrich. S. Fischer Verlag, 2009.
- . *Sämtliche Schriften*. Edited by Oliver Lubrich and Thomas Nehrlich. Deutsche Taschenbuch Verlag, 2019. 10 vols.
- . *Fragmente des Sibirischen Reise-Journals 1829*. Edited by Tobias Kraft, et al. BBAW, 2020. Edition Humboldt Digital, edited by Ottmar Ette. Version 6, edition-humboldt.de/H0005449.
- Humboldt, Alexander von, et al. *Briefwechsel*. Edited by Ulrike Leitner and Eberhard Knobloch. Akademie Verlag, 2009.
- Lubrich, Oliver. “Editorischer Bericht.” *Zentral-Asien: Untersuchungen zu den Gebirgsketten und zur vergleichenden Klimatologie*, edited by Lubrich, S. Fischer Verlag, 2009, pp. 823-43.
- . “Nachwort.” *Zentral-Asien: Untersuchungen zu den Gebirgsketten und zur vergleichenden Klimatologie*, edited by Lubrich, S. Fischer Verlag, 2009, pp. 845-85.
- Lubrich, Oliver, and Thomas Nehrlich. “Die ganze Welt in tausend Schriften. Der andere Kosmos des Alexander von Humboldt. Einführung.” *Sämtliche Schriften VIII*, by Alexander von Humboldt, edited by Lubrich and Nehrlich, Deutsche Taschenbuch Verlag, 2019, pp. 7-21.
- Mahlmann, Wilhelm. “Vorrede des Übersetzers.” *Central-Asien: Untersuchungen über die Gebirgsketten und die vergleichende Klimatologie*, vol. I, edited by Mahlmann, Klemann, 1844, pp. I-XII.
- Reich, Karin, et al. *Alexander von Humboldts Geniestreich: Hintergründe und Folgen seines Briefes an den Herzog von Sussex für die Erforschung des Erdmagnetismus*. Springer Spektrum, 2016.
- Rose, Gustav. *Mineralogisch-geognostische Reise nach dem Ural, dem Altai und dem Kaspischen Meere*. Sandersche Buchhandlung, 1837/1842. 2 vols.
- Suckow, Christian. “Alexander von Humboldt und Rußland.” *Alexander von Humboldt: Aufbruch in die Moderne*, edited by Ottmar Ette, et al., Akademie Verlag, 2001, pp. 247-64.
- . “Eine ‘große Masse von Ideen’ – Verlauf und Ergebnisse der russisch-sibirischen Reise Alexander von Humboldts, Gustav Roses und Christian Gottfried Ehrenbergs 1829.” *Alexander von Humboldt und Russland: Eine Spurensuche*, edited by Kerstin Aranda, et al., De Gruyter, 2014, pp. 3-27.
- Walravens, Hartmut. “Zu den von Alexander von Humboldt aus Russland mitgebrachten Büchern.” *HiN – Alexander von Humboldt im Netz*, vol. 18, no. 34, 2017, pp. 97-147.
- Werner, Petra, and Christian Suckow. “Die geheime Biographie der Dinge: Eine Vase als Prachtgeschenk des russischen Zaren an Alexander von Humboldt.” *Jahrbuch der Berliner Museen*, no. 51, 2009, pp. 101-109.

◇责任编辑：吴晋先

洪堡、奴隶制与革命 ——全球性反殖民主义、废奴主义和反种族主义视角

◎ 米夏埃尔·措伊斯克 任海燕/译^[1]

内容提要: 本文以洪堡日记中有关委内瑞拉和古巴的奴隶主和奴隶贩子的记录为研究对象。这两个群体同殖民地官员和科学家们一道,均是在洪堡美洲之行(1799—1804)中起到关键作用的联络人,有的还是重要的东道主。在1810—1830年殖民地反对西班牙的伟大独立革命之前10年左右,洪堡就已经游历了西属美洲。与当地人的来往,使洪堡获得了关于奴隶贸易和奴隶种植园的经验性知识,由此形成了对玻利瓦尔领导下的军事革命思想及其开端的判断,同时也促使他成为一位废奴主义者、反殖民主义者和非种族主义者。

关键词: 洪堡日记 西蒙·玻利瓦尔 “奴隶制帝国” 独立革命 第二奴隶制 奴隶贸易

中图分类号: I5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 (2021) 03-0051-12

作者单位: 波恩大学波恩依赖性和奴隶制研究中心,德国 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 波恩 53115

DOI: 10.19967/j.cnki.flc.2021.03.006

Title: Humboldt, Slavery and Revolution: Global Anti-Colonial, Abolitionist and Anti-Racist Perspectives

Abstract: This essay deals with Humboldt's notes in his diaries about Venezuela and Cuba regarding slave owners and slave traders. Both groups, along with colonial officials and scientists, were among the most important contacts and hosts for Humboldt on his trip to the Americas (1799-1804). Humboldt traveled through Spanish America around 10 years before the great independence revolution of the colonies against Spain from 1810 to 1830. The empirical knowledge that Humboldt gained through the contacts with his hosts on their slave trade and slavery plantations shaped his judgment of the thinking and the beginnings of the military revolution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Simón Bolívar as well as his own development as an abolitionist, anti-colonialist and non-racis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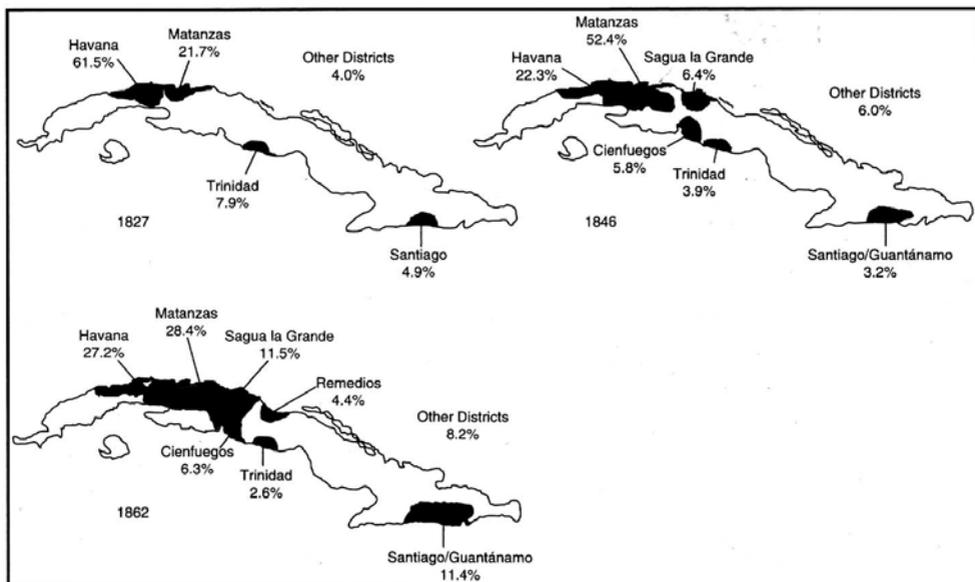
Keywords: Humboldt's diaries, Simón Bolívar, "Empire of Slavery," revolution of independence, second slavery, slave trade

Author: Michael Zeuske, Bonn Center for Dependency and Slavery Studies, University of Bonn, Bonn, North Rhine-Westphalia, Germany.

一、第二奴隶制和美洲之旅

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和邦普兰（Aimé de Bonpland）美洲之行的第一站，到达了位于热带的两个西班牙殖民地：委内瑞拉和古巴。1800年前后，这里是西班牙属美洲中种植园奴隶制最发达的地区。从1799年7月16日至1800年11月24日，他们在委内瑞拉停留了1年零4个月；在古巴（特别是哈瓦那）则两度停留，第一次从1800年12月19日至1801年3月16日，第二次从1804年3月20日至1804年4月29日。这意味着，他们美洲之旅（1799—1804）最初的近两年时间，都是在委内瑞拉和古巴度过的。也就是说，二人美洲之旅的绝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奴隶制帝国”中急速发展的加勒比海边缘地带和西班牙属印度群岛的海域边疆。在那里，他们见证了最现代的奴隶制——第二奴隶制的形成，并对其展开研究。

那一时期，委内瑞拉的第二奴隶制比古巴更为激进，而洪堡关于这些地区第二奴隶制发端的描述记载，不仅对古巴和委内瑞拉的历史研究十分重要，对西属美洲及其他殖民地的比较史学而言也是如此。1810—1826年间，委内瑞拉的资本主义第二奴隶制进程受到诸如西蒙·玻利瓦尔（Simón Bolívar）等克里奥尔精英领导的大陆独立战争（也称“独立革命”）影响而中断，同时期的古巴则仍旧是西班牙殖民帝国的一部分。所谓的古巴大区（古巴种植园奴隶制最发达的地区，在1800—1886年间，覆盖了从哈瓦那经马坦萨斯到萨瓜拉大区和西恩富戈斯的区域）（见图1）。从世界范围看，在整个19世纪，古巴西部是最先进的现代奴隶制高地。于奴隶主和奴隶贩子而言，在技术和操作层面，在经济和社会层面，这里都有利可图，这种情形一直持



Karte 41: „Cuba grande“.

▲图1 古巴大区 1827,1846,1862

续到 1886 年。除了这里，只有巴西的奴隶制持续了更长时间，直到 1888 年。

从世界史和全球史的框架体系来看，19 世纪的洪堡和邦普兰在委内瑞拉和古巴所遇到的是人类历史中的两个基本问题：工作的性质和改变社会的政治手段。前者是指“劳动自由”问题；后者指的则是革命和改革，以及科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统一体）在其中的作用。直到今天，这些问题依然存在。

当两位旅行者到达委内瑞拉的库马纳时，除了古代奴隶制和一些相当零散的知识，他们对奴隶制一无所知。委内瑞拉是一个奴隶制帝国（Reséndez 131-34），在那里，他们从与当地人的交往和观察中，获得了大量有关现代奴隶经济和奴隶文化的知识。这段旅途就如同一部关于奴隶制的公路电影。到达古巴后，他们住在哈瓦那的胡安·路易斯·德·拉·奎斯塔（Juan Luis de la Cuesta）家中，此人是 1795—1804 年间最重要的奴隶贩子，这为他们观察和分析奴隶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洪堡和邦普兰当时在委内瑞拉沿海的大陆和哈瓦那周边及南部的吉内斯（Güines）和圣·安东尼奥·德·拉斯·维加斯（San Antonio de las Vegas）的所见，在当今被概念化为第二奴隶制。洪堡观察和研究了现代奴隶制和大西洋奴隶贸易的新形式（很可能是跨帝国式走私），还有殖民边缘地带其他类型的奴隶制。

在介绍洪堡日记之前，有必要了解委内瑞拉和古巴学界的奴隶制历史研究状况：由于 20 世纪古巴奴隶制的研究深受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正面影响，委内瑞拉独立前出现的第二奴隶制萌芽被忽略了。连我都犯了这个错误，至少是部分错了。直到系统研究了洪堡在委内瑞拉和古巴对当时的奴隶制所做的思考后，我才意识到委内瑞拉是研究第二奴隶制的核心。

基于以上考虑，我提出这样的假设：美洲大陆的第二奴隶制肇始于委内瑞拉；由于 1810 年委内瑞拉独立革命造成的破坏，从 19 世纪初直到 1868 年，第二奴隶制经由没有发生政治革命的古巴进一步发展，并扩展至全球，且变得更为现代，成为基于种族奴隶制的奴隶资本主义。这是在洪堡撰写《美洲游记》（*Amerikanische Reise*）之后的事情。由于资本主义奴隶制的爆炸式发展，洪堡又于 1826 年发表了《古巴岛政治随笔》（*Essai Politique sur l' Ile de Cuba*）。

二、创造性混沌中的秩序：洪堡的各类作品

由洪堡执笔的作品和关于洪堡的文本、出版物、再版书籍、选本（书名不同）和译本确实混乱不堪。如果稍加整理，可以粗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洪堡写于旅行期间的作品和关于洪堡旅行的作品，最典型的是洪堡的旅行日记、他的信件和其他人关于他的信件及自传式作品。在这类作品中，若是说到古巴，就必须提及委内瑞拉，因为这两位旅行者是在委内瑞拉，才接触到美洲不同类型的奴隶制。

第二类主要是洪堡的美洲类作品，如《新西班牙王国政治随笔》（*The Essai politique sur le Royaume de La Nouvelle -Espagne*）、《新大陆热带地区旅行的历史记述》（*Relation historique du Voyage aux régions équinoxiales du Nouveau Continent*）和《古巴岛政治随笔》（*Essai Politique*）。

sur l'Ile de Cuba)。这类作品还包括《科迪勒拉山脉的景致》(Vues des Cordillères)和《论自然》(Ansichten der Natur),以及美洲之行结束之后写下的诸如地理历史学著作《对十五、十六世纪新大陆地理史和航海天文学进步的批判性考察》(Éxamen critique de l'histoire de la géographie du Nouveau-Continent et des Progrès de l'Astronomie nautique aux quinzième et seizième siècles)、关于俄罗斯之旅的著述,以及《宇宙》(Kosmos. Entwurf einer physischen Weltbeschreibung)等。

第三类是无数研究洪堡的文本和作品,包括评论和报刊,甚至还有“创造洪堡”的文学作品。按时间可以划分,这类作品分为洪堡在世时(—1859年)和去世后(1859—2021年)两个阶段。鲁普克(Nicolaas A. Rupke)2005年出版的《亚历山大·冯·洪堡——一本元传记》(Alexander von Humboldt: A Metabiography)是迄今为止最好的一本关于洪堡的书,它囊括了洪堡的各个侧面,既包括其生平,作为1848年德意志人的英雄、德意志帝国的洪堡,魏玛的沙文主义洪堡,纳粹的雅利安洪堡,马克思主义的洪堡,世界主义的洪堡,犹太人和两德(至1990年)的朋友,也包括当下全球化的洪堡。洪堡一直是,而且依然是一面时代之镜。

在委内瑞拉和古巴,洪堡研究受到“民族的洪堡”影响,更多集中在第三类作品(于专家而言,还包括翻译第二类作品)。鉴于此,我认为历史学家非常有必要研究第一手、真实的洪堡日记(第一类作品),并将其与当前关于这一主题的历史研究结果进行比照。

三、洪堡与革命：委内瑞拉和“白人共和国”

与洪堡和邦普兰有过密切接触的人都出现在委内瑞拉的一份名单上。洪堡在他的加拉加斯日记里,写下了一串“加拉加斯的人”:

德·托罗侯爵(特立尼达的房子,圣胡安街);多娜·索科罗,他的妻子,德·瓦莱侯爵的妹妹,她的母亲是盲人;托罗兄弟:寡妇塞巴斯蒂安娜,后面的格特鲁迪斯^[1],维森特·伊巴拉先生之妻安娜·特蕾莎,马丁·埃雷拉先生之妻特蕾莎,其子马里亚诺,托马斯·费尔南多、贝尔纳多娶了他的表妹,水手迭戈和唐璜,以及何塞·伊格纳西奥·乌斯塔里兹,老侯爵的侄子,最年长、最有学问的路易斯,聋子哈维尔,何塞·玛丽亚。老伯爵托瓦尔,最年长的多明戈,马丁(托瓦尔)。胡安·加布里埃尔·连德罗。唐·尼古拉斯·托罗和玛格丽塔夫人,贾孔·德·特立尼达的妹妹,有三女三儿。圣泽维尔伯爵,德拉·格兰克斯伯爵。唐·蒙蒂拉与女儿多洛雷斯和两个孩子,索肖斯,玛丽亚·安东尼亚·阿里斯蒂格塔,贝林·阿[里斯蒂格塔],曼努埃拉·阿[里斯蒂格塔],胖子阿斯卡尼亚-贝尼特。何塞·维森特·德·兰达。华金·朱埃和唐·洛伦索……唐·费尔南德·基。德雷富奥·奥里亚先生。阿拉贾的姐夫。约瑟夫·安东尼奥·黑山(修道院院长)。胡安·伊曼纽尔·德·卡西加尔,雷伊的中尉。安东尼奥·桑萨。-贝林·阿里斯蒂格塔。-安东尼奥·索克索。-

莫里诺医生-玛利亚·叶塞·弗里斯女士……市长埃斯特万·费尔南多·德莱昂。安东尼奥·莱昂兄长-奥伊多尔·胡安·朱拉多-埃瓦里斯托·布鲁兹-洛伦佐·庞特。唐·费尔南多·基和穆尼奥斯。德雷富奥·奥里亚^[2]-拉·格拉尼亚伯爵(阿斯卡尼奥)-阿斯卡尼奥神父-布兰丁-兰达-埃坎蒂亚-西蒙·德·马约拉-华金·霍维-佩德罗·加略戈-巴尔塔萨尔·帕德龙-唐·马特奥·佩雷斯-卡本内尔-伊曼纽尔·厄本塞萨(也在地牢)。(Humboldt, *Reise durch Venezuela* 183-84)

这些人全都是奴隶主兼/或批发商,其重要的利润来源便是奴隶贸易和走私。

除了这份名单,我们还可以从洪堡关于委内瑞拉的日记中得知,他在加拉加斯寡头政体中最密切的联系人(甚至可以称为朋友)是多明戈·德·托瓦尔·庞特(Domingo de Tovar Ponte)。他是托瓦尔伯爵(Count of Tovar)的长子,也是马丁·托瓦尔·庞特(Martín Tovar Ponte)的弟弟(Guillén and Elena 121-60)。这意味着洪堡同大约生于1750—1765年间的克里奥尔贵族中的保守集团往来密切。可以说,同洪堡走得最近,同时也是他最看重的人有维森特·伊巴拉(Vicente Ibarra)、马丁·托瓦尔,以及德·托罗侯爵(Marqués de Toro)。他们后来成为了伊内斯·金特罗(Ines Quintero)所说的“最高委员会”(La Junta de los Principales)中最为活跃的成员(97-116)。

洪堡同奴隶制的这些关联和经验令我们意识到,需要重读他在《新大陆热带地区旅行的历史记述》中关于委内瑞拉的记叙(前文提到的第二类作品),以及第一类作品中关于委内瑞拉部分的日记(在将其翻译成西班牙语或英语的基础上)。这些系统性的解读显示,库马纳周边,委内瑞拉的加勒比海岸(主要是河口)和加拉加斯南部(图伊河谷、巴洛文托、阿拉瓜、巴伦西亚湖)的市集,除了供应如牛、马、骡子、肉、皮革和烟草等之外,还是当时西班牙美洲第二奴隶制最重要的贸易平台(可可、糖、靛蓝、咖啡)。

从1799年11月22日到1800年2月7日,洪堡和邦普兰驻留在加拉加斯。这期间,洪堡观察到,奴隶制的现代化、资本主义积累和大西洋贸易的新动向之间关系错综复杂,其中最重要的是加勒比地区跨帝国的黑人走私贸易。而在大规模奴隶贸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物流的安全性。据说仓库是当时奴隶贸易物流的基本节点,一般称为兵营(barracones);洪堡称其为“黑奴之家”(casas de negros)。关于拉瓜伊拉/加拉加斯的兵营,洪堡写道:“临近战争^[3]爆发时,奴隶人数激增,以至于来自格林纳达和牙买加的商人想要在加拉加斯建造新的黑奴之家。”(Humboldt, “Von Caracas” 201)

在加拉加斯西南部,洪堡观察到了种植园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因素(187)。这些现代种植园里的庞大营房以正方形或是长方形方式排列,夜间会从外面上锁,奴隶们在其中过着半自主的生活。这也是“非洲”文化元素,特别是食物和音乐/舞蹈及奴隶们信仰的不同形式的宗教,能够在此地实现文化互化的原因之一(Guédez 175-81)^[4]。

从经济结构这一现代奴隶制要素出发,洪堡这位了不起的叙述者,很快进入政治和意识形

态层面的论述，还提及了他在一场由奴隶主精英发动，以民众为基础的军事革命中所受到的创伤。

总的说来，洪堡在旅行途中（第一类作品）几乎总是住在委内瑞拉和古巴当地最亲近的人家中。他们是克里奥尔贵族上层，拥有众多奴隶。在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诚如我们所知，蓄奴精英如托瓦尔伯爵等同时还是保守的改革者；而在古巴，哈瓦那最有权势的奴隶贩子胡安·路易斯·德拉·奎斯塔则支付了两位旅行者的住宿和膳食费用。

洪堡憎恶两件事：暴力的政治革命——特别是雅各宾主义和街头的大规模暴力，以及他在委内瑞拉接触到的各种现代形式的奴隶制。对洪堡来说，在法国和欧洲之外，雅各宾主义指的是在海地的圣多明各革命中，尤其是1802—1803年拿破仑干预下那场真正意义上的灭绝性战争中，法国革命军官（雅各宾们）造成的恐怖，这在时间上恰与洪堡1799—1804的美洲之行重合。他将这记录在了哈瓦那的《1804年日记》（“Diary 1804”）中。洪堡在日记中一般对于海地革命三缄其口，但是因为雅各宾派军官制造的恐怖，他在1804年哈瓦那日记中写道：

我看到这个将奴隶战士致残的主意，这个残害5万到6万人的想法，是圣多明各的一名牧师在1803年正式提出的。用狗来将奴隶分尸！1802年！我听到有人说：先生，您真是没用，是位慈善家！枪毙黑奴之前，我们会先鞭打他们200到300下，我们枪毙了所有的囚犯，一次50到80个。1803年的殖民地笼罩在恐怖主义之中[……]黑人在开普敦的大街上被绑架，然后被卖掉，带上船。”（“Diario Habana 1804” 82）

洪堡反对暴力，是一名人道主义者。在其担忧的奴隶主和革命问题上，洪堡想知道，谁是委内瑞拉的雅各宾派（Zeuske, “The French Revolution” 99-145）。令他感到惊讶的不是那些保守的改革者，那些与他密切接触的人，而是更年轻的现代蓄奴精英，即1780年后出生的玻利瓦尔这代人。这些人是第二奴隶制这种最为现代的种植园经济的领导者兼经营者。费尔南多·佩纳尔韦·佩隆（Fernando Peñalver Pellón）是这批现代奴隶主中较为年长的一位，洪堡在日记（第一类作品）中提到此人，称其为这群人的典型：他想进行一场“保留奴隶的雅各宾式革命”（Zeuske, “Una revolución” 5-47）。众所周知，无论是伟大的“大西洋革命”或者是1794年前的法国人，都没有废除奴隶制——法国大革命废除奴隶制乃是迫于圣多明各自由奴和有色人种的革命压力^[5]。洪堡1799年见到费尔南多·佩纳尔韦时，他的种植园区（瓜卡拉和巴伦西亚）是当时最先进的，后来，佩纳尔韦于1819年成为玻利瓦尔在安戈斯图拉大会的顾问。洪堡在1800年2月22日上午的日记中记载了参观佩纳尔韦位于巴伦西亚的家的情形（他们在那里庆祝了狂欢节）：

巴伦西亚的圈子似乎比加拉加斯的更有教养^[6]，交谈更随性。费尔南多·佩纳尔韦先生与他兄弟接受了一样的教育，也瘦得像条狗，但个子更高，自诩为阿多尼斯，

可怜的虚荣心，最初几天总是讲雷纳尔、百科全书、人类自由……后来，就屈从于共通的人性了。葡萄牙人^[7]认为应该建立一个白人共和国[……]；在白人共和国里，连自由的混血儿都不应享有权利，奴隶要跪着侍奉主人，他们[主人]则卖掉奴隶的儿子……这就是美洲启蒙运动的成果！扔掉你们的《百科全书》和雷纳尔吧，你们这些混蛋。（Humboldt, “Von Caracas” 208; Zeuske, “Una revolución” 5-47）

这个“白人共和国”是委内瑞拉年轻的“雅各宾”奴隶精英群体的座右铭和最重要的政治目标，洪堡数次提及，他的日记里也有记载。他们的目标是将自己的国家变为一个白人共和国。洪堡记录下了这些富有的种植园主和奴隶主的思想 and 革命狂热。这首先表现在口头上，出现在委内瑞拉东部，但最为突出地表现在阿拉瓜谷第二次奴隶制的交易场所。

洪堡所写的注释，既概括了他在委内瑞拉蓄奴区的见闻，也表达了他对这个种族主义的、蓄奴的“白人共和国”的反对态度：“在北美，白人自己建立了一个白人共和国，延续最可耻的奴隶制法律。因此，[南美]贵族们也希望捐建一个共和国。当谈到有色人种的苦难时，他们就顾左右而言他。安德烈斯·伊巴拉 [Andrés Ibarra]^[8]想禁止自由的黑白混血儿从事哪怕只是一门手艺；[白人]想迫使政府把他们分散到该省腹地（以减少危险），耕种白人的田地，政府将强迫贫穷的白人做鞋和靴子……。这就是当地慈善家的计划。”（Humboldt, *Lateinamerika am Vorabend* 245）

对于这个希望通过武装暴力革命，即军事革命的方式建立“白人共和国”的群体，洪堡极为反感，这一点表露在后来的《美洲游记》中（正是在1803年厄瓜多尔的瓜亚基尔），题为《殖民地》（“Colonies”）：“欧洲政府成功地在殖民地传播仇恨和分裂，那里的社会生活毫无乐趣可言；至少不存在持久的社会性^[9]，许多家庭深陷其中。这造成了思想和意见上无迹可寻的混乱，这是一股具有普遍性的革命势头。但是革命的意愿仍只限于驱逐欧洲人，然后内战。”（65f.）

四、洪堡与奴隶贸易：哈瓦那/古巴的奴隶贩子之家， 奴隶贸易和第二奴隶制的资本积累

众所周知，洪堡已发表的作品中多次提到古巴。《古巴岛政治随笔》发表于洪堡和邦普兰结束西属美洲之旅二十多年之后。洪堡的两次古巴之行，第一次为1800年12月19日至1801年3月16日，第2次从1804年3月20日至1804年4月29日，在现实的时空中是否有痕迹可循？

洪堡于1800年底从委内瑞拉的巴塞罗那（Barcelona de Venezuela）到古巴哈瓦那之前，在写于加拉加斯的旅行日记中，在前文提及的那个名单里，留下了第一条关于古巴的具体记录。在列举了加拉加斯保守的上层精英之后，他在“哈瓦那”这个标题下提到了以下几位：“佩德罗·保罗·奥雷利伯爵。玛丽亚·弗朗西斯卡·孔察·德·布埃纳维斯塔，他的妻子。弗朗西斯科·勒·莫尔。何塞·德·埃林切塔^[10]。胡安·何塞·德·埃利扎尔迪。胡安·德·奎

斯塔^[11]。普拉多·阿梅诺侯爵”(Humboldt, *Reise durch Venezuela* 183-84)。对洪堡的古巴之行起到关键性作用的是佩德罗·保罗·奥雷利、他的妻子、纳瓦拉人何塞·德·伊林切塔、萨默罗斯将军的顾问兼秘书(他后来将洪堡介绍给了其在古巴的社交圈)等人,当然,最重要的是胡安·路易斯·德·拉·奎斯塔,哈瓦那一家大商行“圣玛利亚和奎斯塔”商业公司的正式合伙人。洪堡去古巴乃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他在日记中提到,来哈瓦那是为了做“可怜的钱财生意”(Reise durch Venezuela 166)。洪堡试图获得足够多的现金,以继续他们的旅程(他还考虑前往波多黎各)。在委内瑞拉,他一直未能兑现从柏林带来的支付委托书(libranza),而在哈瓦那,胡安·路易斯·德·拉·奎斯塔和他的岳父加布里埃尔·雷蒙多·德·阿兹卡拉特(哈瓦那保守的克里奥尔精英阶层的大人物)接受了洪堡的支付委托书。胡安·路易斯·德·拉·奎斯塔精通法语,他可能是和让-路易斯·德拉·科斯特一样出生在法国贝阿恩,之后取道新奥尔良和圣多明各来到哈瓦那。

胡安·路易斯·德·拉·奎斯塔邀请洪堡住在他在哈瓦那的家中。洪堡本人在《古巴岛政治随笔》中曾提及这一节:“我们在奎斯塔先生家和奥雷利伯爵家受到了最高规格的款待。奎斯塔先生和圣玛丽亚先生一道,经营着美洲最重要的商行之一。我们住在奎斯塔先生的家里,将一路收集的物件和仪器放在奥莱利伯爵的大宅子里,那里的露台特别有利于天文观测。”(Political Essay 35)

换言之,正如洪堡在给威尔登诺(Karl Willdenow)的信中提到的那样,胡安·路易斯·德·拉·奎斯塔的家对他而言是“我在哈瓦那的家”,可以把给他的书“寄到我在哈瓦那的家(路易斯·德·拉·奎斯塔之家)”(“An Karl Ludwig Willdenow” 128)。不过,虽然洪堡是胡安·路易斯·德·拉·奎斯塔在哈瓦那家中的客人,但是由于两个原因,古巴、西班牙或一般关于洪堡的文献中从未提及此人:首先,他是新崛起的奴隶商人(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贵族商人”);其次,他出身低微。1804年的大破产扫荡了其他商人和奴隶主精英阶层,而他却暴富。

古巴和哈瓦那都有关于洪堡的重要著作,也有良好的洪堡传统。维达尔·莫拉莱斯(Vidal Morales)、埃米利奥·罗伊格·德·劳克辛林(Emilio Roig de Leuchsenring)和费尔南多·奥尔蒂斯(Fernando Ortiz)对于增强洪堡在古巴的影响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费尔南多·奥尔蒂斯的著作,古巴人得知洪堡与古巴的上流社会、殖民、蓄奴者和科学精英均有来往,他们给这位普鲁士的旅行家贴上了一个标签:“发现古巴的第二人。”但是,关于洪堡,依然有很多未知的事件和信息,有不少未解之谜。他于何时何地进入奴隶制和奴隶贸易的圈子,获取相关信息?他真的这么做过吗?我想可以肯定,他在委内瑞拉这样做过,但在古巴呢?他于何处结识了阿兰戈(Arango)、莫波克斯伯爵(Count Mopox)、安东尼奥·德尔·瓦莱·埃尔南德斯(Antonio del Valle Hernández)等古巴的奴隶主精英?是谁促成了这一切?也许是身为副总督、萨默罗斯将军的顾问兼秘书,何塞·德·伊林切塔(他在前文提到的加拉加斯名单中),亦或是方济各会修士胡安·冈萨雷斯的斡旋,还是胡安·路易斯·德·拉·奎斯塔本人的建议和引介?洪堡在哪里写下了著名的日记《哈瓦那 1804》(“Havana 1804”;原标题为《古巴岛,

安的列斯群岛》[*Isle de Cube. Antilles en général*])?

我几乎可以肯定，洪堡是在胡安·路易斯·德·拉·奎斯塔家中开始撰写这本日记的。作为商人和贩奴者（洪堡在古巴逗留期间，他是当地最活跃和最富有的人），胡安·路易斯·德·拉·奎斯塔向洪堡提供了关于贩奴活动和贩奴船只的一手资料，洪堡后来在《古巴岛政治随笔》中用到了这些资料。也正是从此人这里，洪堡得到了关于领事馆营房或称阿拉米达营房（奴隶贩子将从非洲或其他加勒比殖民地新虏获的奴隶关在兵营，以便在古巴出售）的信息。1802年，胡安·路易斯·德·拉·奎斯塔在1号军营（共16号）（图2），组织了一次奴隶拍卖会——不仅拍卖成年男女（印度群岛奴隶贩子的行话称为“印度群岛的零部件”[*piezas de Indias*]；人体资本的肉体价值），还拍卖14岁以下的女孩（西班牙语称为 *muleque*）和7岁以下的女孩（西班牙语称为 *mulequitos* 和 *mulequitas*）。洪堡对此是知情的。他没有直接提及此事（他是多么擅于外交辞令），但在《古巴岛政治随笔》里，有关于军营的信息：“在坎波-德-马尔特 [Campo de Marte] 附近有一个植物园，一个值得政府关注的地方，还有全然不同的东西，它的存在既让人愤怒，又让人震惊，那就是军营，奴隶凄惨地陈列于营房前，等待出售。”（*Political Essay* 27）此处提到的军营，是现在的领事馆街，与著名的普拉多大道（Paseo del Prado）平行。这里还能发现一条有关洪堡足迹及其观察的记录。洪堡提到了德拉蓬塔要塞（检疫后奴隶船在此登陆）：“我经常一个人在德拉蓬塔的这些岩石上坐上几个小时。”（“Isle de Cube” web）由是，洪堡1804年的日记告诉我们，他观察到了奴隶贸易中的微观经济学现象，见证了一群群奴隶



▲图2 1798年哈瓦那的军营



▲图3 1823年的普拉多大道

从德拉蓬塔要塞被驱赶至领事馆兵营，胡安·路易斯·德·拉·奎斯塔的奴隶出售前也囚禁在那里。

洪堡在委内瑞拉的行踪被划归为“德国人在委内瑞拉”或地方性（民族性）知识和全球性知识一类（Freites 35-52）。在古巴，洪堡的足迹或多或少地与“第二发现者”的神话相关，他

的名字被用于纪念碑，或是机构、公园和项目的名称中。但事实上，洪堡真实的历史痕迹，他在委内瑞拉和古巴旅行和停留期间的的生活痕迹，如生活、饮食、工作之所，与古巴的社会和科学精英交往、对之进行采访之所，还有日记撰写之所等，却是缺失的。此外，还缺少关于洪堡行踪的具体信息（需要附上一张好的地图），以及对认识论而言最重要的诸如经济结构等真实空间的信息，如他那个时代的糖厂、大庄园、道路，或是地理结构和景观等，这些都可以成为进一步研究和出版的话题，洪堡正是在这些空间里获取了关于古巴和西属美洲其他地区的知识，从历史、经济、政治和文化等维度，构建起洪堡的全球/世界主义概念框架。

对于“奴隶制帝国”西属美洲奴隶制的真实情形，如家内奴隶、种植园奴隶制、国家奴隶制、制度化奴隶制（使团）、土著奴隶制等，洪堡知之甚广。他同时也亲眼目睹了贩卖自非洲的奴隶的真实情况。他对发展起第二奴隶制的奴隶主，那些现代化精英们的革命军事努力保持警惕，对以“白人共和国”为目标的革命持全然批判态度。

从更普遍的意义上说，我们可以从洪堡的态度发现，对一个剥削社会——在本文的语境中，也就是对现代化的第二奴隶制和奴隶制资本主义社会——最严厉的批评，往往来自具有世界视野的知识精英。

从全球历史的角度看，洪堡的深度经验性知识（往往来自口述资料）、观察和判断，使其成为了废奴主义者（这一点在1804年的日记、在《古巴岛政治随笔》中显露无遗），反殖民主义者（表现在关于委内瑞拉的记述中，特别是在《新大陆热带地区旅行的历史记述》讨论政治革命理论的章节提到委内瑞拉时）和反种族主义者。从他的著作，尤其是《宇宙》中，我们可以看到，洪堡毕生致力于科学研究，是坚定的、科学的反种族主义者（与康德等人不同，尽管那个时代的语言是新兴的种族主义语言，深受新兴德国哲学的影响）。

从全球历史的角度和人类的角度看，洪堡均是将上述意义的科学运用于生活实践，从而推动社会进步的典范。

注释 [Notes]

[1] 本文译者系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师。

[1] 洪堡如此称呼她的原因未知。

[2] 洪堡会重复这些名字。

[3] 法国大革命/拿破仑的战争，特别是1799—1802年第二次联军战争。

[4] 参见 José Marcial Ramos Guédez, *Contribución a la historia de las culturas negras en Venezuela colonial*, Caracas, Instituto Municipal de Publicaciones, Alcaldía de Caracas, 2001; Angelina Pollak-Eltz, *La esclavitud en Venezuela: un estudio histórico-cultural*, Caracas, Universidad Católica Andrés Bello, 2002.

[5] 参见 Rainer Roth, *Sklaverei als Menschenrecht. Über die bürgerlichen Revolutionen in England, den USA und Frankreich* [Slavery as a Human Right. On the Bourgeois Revolutions in England, the USA and France], DVS, 2017.

[6] 巴伦西亚是富裕奴隶主的避暑胜地。

[7] 佩纳尔弗家出身于葡萄牙商人家庭，可能是奴隶贩子。

[8] 洪堡和邦普兰曾在他位于加拉加斯山谷的咖啡农场的房子里过夜（Humboldt, *Lateinamerika am Vorabend* 177, 181）。

[9] 伊曼纽尔·康德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

[10] 原文如此，应为伊林切塔。

[11] 原文如此，应为胡安·路易斯·德·拉·奎斯塔。

引用文献 [Works Cited]

- Reséndez, Andrés. "An Empire of Slaves." *The Other Slavery: The Uncovered Story of Indian Enslavement in America*, by Reséndez,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16, pp. 131-34.
- Humboldt, Alexander von. "Colonies." Guayaquil, 4 de enero – 17 de febrero 1803. *Lateinamerika am Vorabend der Unabhängigkeitsrevolution*, edited by Margot Faak, Akademie-Verlag, 1982, pp. 63-67.
- . "Sklaven." *Lateinamerika am Vorabend der Unabhängigkeitsrevolution*. Edited by Margot Faak. Akademie-Verlag, 1982, pp. 244-47.
- . "An Karl Ludwig Willdenow." *Alexander von Humboldt. Briefe aus Amerika 1799-1804*, edited by Ulrike Moheit, Akademie Verlag, 1995, pp. 122-31.
- . *Reise durch Venezuela. Auswahl aus den amerikanischen Reisetagebüchern*, edited by Margot Faak, Akademie Verlag, 2000.
- . "Von Caracas an den See von Valencia und nach Puerto Cabello (8.2.-5.3. 1800)." *Auswahl aus den amerikanischen Reisetagebüchern*, edited and introduced by Margot Faak, Akademie Verlag, 2000, pp. 185-222.
- . *Political Essay on the Island of Cuba: A Critical Edition*. Edited by Vera M. Kutzinski and Ottmar Ette. U of Chicago P, 2011.
- . "Isle de Cube. Antilles en general." edition humboldt, fol. 140v, 9 Nov. 2019, edition-humboldt.de/v5/H0002922/140v.
- . "Diario Habana 1804." *El diario original de Humboldt, escrito en La Habana*, edited by Michael Zeuske, Biblioteca Nacional de Cuba, 2021.
- Freites, Yajaira. "La visita de Humboldt (1799-1800) a las Provincias de Nueva Andalucía, Caracas y Guayana en Venezuela y sus informants." *Quiju*, vol. 13, no. 1, 2000, pp. 35-52.
- Guillén, Rojas, and Aura Elena. "Los Miedos de un Mantuano Revolucionario: Martín Tovar Ponte en 1814 (Provincia de Caracas)." *Cuadernos de Historia. Serie economía y sociedad*, no. 15, Universidad Nacional de Córdoba, 2015, pp. 121-60.
- Quintero, Inés. "La Junta de los principales." *La Conjura de los Mantuanos*, Caracas, Universidad Católica Andrés Bello, 2002, pp. 97-116.
- Ramos Guédez, José Marcial. "Bibliografía afrovenezolana 1976-2001." *Boletín de la Academia Nacional de la Historia*, vol. 86, no. 342, 2003, pp. 175-81.
- Roth, Rainer. *Sklaverei als Menschenrecht. Über die bürgerlichen Revolutionen in England, den USA und Frankreich*. DVS, 2017.
- Zeuske, Michael. "Una revolución con esclavos y con Bolívar. Un ensayo de interpretación." *Memorias. Revista Digital de Historia y Arqueología desde el Caribe*, vol. 8, no. 14, 2011, pp. 5-47.
- . "The French Revolution in Spanish America. With Some Reflections on Manfred Kossok as Marxist Historian of 'Bourgeois Revolutions.'" Review. *Journal of the Fernand Braudel Center*, vol. 38, no. 1/2, 2015, pp. 99-145.

◇责任编辑：马妮娅

莱布尼茨与亚历山大·冯·洪堡

◎ 埃伯哈德·克诺布洛赫^[1] 岳子涵/译

内容提要: 亚历山大·冯·洪堡曾多次对莱布尼茨的科学成就和研究项目进行评价。特别令洪堡感兴趣的是莱布尼茨的地磁学贡献、地质史著作以及微分学发明。本论文围绕这三个主题展开论述,在对其进行历史背景介绍的基础上,阐明洪堡对这些主题做过的评述。本文将首次披露迄今未曾公开过的历史文献或书信,特别是维特施泰因 1851 年写给洪堡的信件。

关键词: 地磁学 地质史 类比推理 微分学 特奥多尔·维特施泰因

中图分类号: I5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 (2021) 03-0062-13

作者单位: 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 德国 柏林 10117

DOI: 10.19967/j.cnki.flc.2021.03.007

Title: Leibniz and Alexander von Humboldt

Abstract: Alexander von Humboldt often evaluated Leibniz's scientific achievements and projects. He was especially interested in Leibniz's contributions to the investigation of earth magnetism, his writings on earth history and his invention of the differential calculus. Hence this paper deals with these three subjects. It explains their historical background before it explains Humboldt's comments and evaluations. And it reveals for the first time some unpublished historical documents and letters, in particular Wittstein's 1851 letter to Humboldt.

Keywords: earth magnetism, earth history, analogical thinking, differential calculus, Theodor Wittstein

Author: Eberhard Knobloch, Professor, Berlin Brandenburg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Berlin, Germany.

这是科学史上命运攸关的一刻：1829年11月3—9日，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在其俄国之旅的返程途中又一次驻留莫斯科（Humboldt, *Briefe aus Russland* 51），其间他访问了当地的档案馆，查阅了莱布尼茨呈递给彼得大帝及其周遭名流的书信和备忘录。莱布尼茨对发展科学，特别是推动地磁学考察的热忱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然而洪堡对这位与他在科学贡献上不相伯仲的前辈的关注却并不仅限于此。1859年7月7日，伯克（August Böckh）在柏林科学院举办的“莱布尼茨纪念日”上的演讲中，就已着重强调过这两位学者之间的共性（Humboldt, *August Böckh* 263）。1975年，法克（Margot Faak）首次编纂洪堡关于莱布尼茨的评论。本文将披露迄今未曾公布的原始资料，阐明莱布尼茨最重要的三个主题（地质学、地质史、微分）产生的历史背景——洪堡对这些主题都曾予以评述——并在此基础之上，对这些论述加以分析。

一、地球物理学：地磁学

（一）历史背景

自从里希特（Liselotte Richter）针对莱布尼茨对地磁学的兴趣发表详尽论述以来（91-102），近期已有多篇论文探讨过该问题（Reich and Roussanova, “Meilensteine” 132-60; “Gottfried Wilhelm” 135-80; Reich 305-35），因此笔者谨在此作一概述。

这股兴趣贯穿了莱布尼茨的一生。在1670年与基歇尔（Athanasius Kircher）的通信中，他谈及这一点，并在1671年的《新物理学假说》（*Hypothesis physica nova*）中深入分析了后者的观点（Leibniz, *Hypothesis physica* § 34; *Nova hypothesis* 64-69）。此外莱布尼茨与舍费尔（Sebastian Scheffer）在1680—1681年间及与惠更斯（Christiaan Huygens）在1691年的书信往来也都佐证了这一点。

勃兰登堡科学社团——该社团于1700年7月11日在弗雷德里希三世选帝侯的赞助下成立，选帝侯于当日签署该纲领——的指导纲领曾提出要与俄国沙皇合作，尤其旨在进行地磁观察，从而为探索地磁学打下基础（Leibniz, *Sämtliche* IV: 478f.）。这个庞大帝国不存在边界争端，因而具有卓越的观测条件。

正因如此，无论是在同沙皇的三次会面（1711年10月在托尔高、1712年11月在卡尔斯巴德，以及1716年6月在皮尔蒙特）中，还是在呈递给沙皇的备忘录里，这一主题都占据重要位置。同样的情形也见于莱布尼茨与效力于彼得一世的权贵们的信函往来中。1712年11月21日——并非里希特在书中所写的23号（Richter 97），莱布尼茨从德累斯顿给俄国炮兵上将布鲁斯（Jacob Daniel Bruce）寄了一个由他亲自设计的磁铁地球仪，地球仪上绘有地磁偏角线，此外还附寄一封带有使用说明的书信。这封信的开头如下：“谨将磁铁地球仪的试验成果献给阁下，奇妙的地磁力线运转可于其上得以一窥。”（LH XXXVII 7: 37r）

在1714年6月18日给彼得一世的信中，莱布尼茨曾提到想命人为沙皇制作一个格外精美

的样品 (Reich and Roussanova, “Gottfried” 174)。而这一地球仪是否真正存在, 如今已不可考。

(二) 洪堡对该问题的态度

洪堡在 1843 年的三卷本《中亚》(*Asie Centrale*) 中首次详细涉及了莱布尼茨的地磁学研究计划 (Humboldt, *Asie Centrale* III: 469-76), 认为后者为了探究自然规律而系统搜集观察数据的做法完全符合自己的科学方法论。在涉及俄国的问题上, 莱布尼茨的计划和倡议则更具前瞻性, 而这些动议已被洪堡一一实现 (Biermann 107-16; Knobloch, *Naturwissenschaften* 122-24)。

洪堡在书中写道, 汉诺威当地历史学家、莱布尼茨作品出版人佩尔茨 (Georg Heinrich Pertz) 为他提供了相关文件的复本, 包括莱布尼茨分别于 1712 年 1 月 16 日、11 月 21 日写给彼得一世和布鲁斯的信函, 以及一篇长达十四页的有关磁铁地球仪上地磁偏角线走向的论文 (*Asie Centrale* III: 470, 473)。德文版将后一日期错误地印刷为了 11 月 2 号 (Humboldt, *Central-Asien* II: 288)。除写给彼得一世的信外, 后两份手稿之前均未出版。后者正由赖希 (Karin Reich) 和笔者酝酿出版。难以辨认的手稿原件藏于莱布尼茨图书馆, 索引编号为 LBr 120 Bl. 12 即 10-11 页 (见 igitale-sammlungen.gwlb.de/resolve?id=DE-611-HS-957543, [19]-[24])。手稿副本藏于同一图书馆, 索引编号为 LH XXXVII, 附录 7 中的 29-37 页 (见 ritter.bbaw.de) (Bodemann 331; Richter 152)。

1712 年 1 月 16 日, 莱布尼茨致信“最最尊贵、强大、不可战胜的伟大沙皇”——洪堡在译文中仅将其称为“战无不胜的沙皇”。这封信由洪堡部分翻译为法语 (未包含后记) 并首次出版 (Humboldt, *Asie Centrale* III: 473-75)。格里尔 (Woldemar Guerrier) 首次出版了这封信函的德语手稿原文 (205-208)。现将其展示如下。文本比对显示, 洪堡将文稿略加改动之后译为法语, 马尔曼 (Matthias Mahlmann) 又将其译回德语, 洪堡生前, 这一德语版本都可供研究使用 (Humboldt, *Central-Asien* II: 290f.):

最最仁慈的君主, 自从沙皇陛下在托尔高仁慈地示意, 我所提出的几条微小建议并未引起陛下的不快, 回来之后我便丝毫不敢怠慢, 命人制作了一个磁铁地球仪。类似的地球仪还从未有过, 它将会给航海旅行带来显著改变。如果每隔十年使用磁针进行新的观测, 并为此制作新的地球仪——后者还能为航海者所使用; 那么姑且十年之内, 能够将其用于对经线——即荷兰人所说的东西向延伸的线——的探测, 如此循环往复直到研制出牢固耐用的仪器。

由于磁铁不仅在水平方向上有磁偏角, 在垂直方向上也有磁倾角, 因而也应坚持对后者进行观测。为此我特意研制了一项测量磁倾角的仪器, 希望无论是磁偏角还是磁倾角, 都能够在陛下的广袤国土上于不同的地点和时间进行观测, 因为这一点将会对航海旅行大有裨益。

我满心期待陛下委任我做此事, 另外在此重申我在托尔高向陛下呈递过的书面

建议，恳请陛下考虑我的提议，一旦目标达成，即便是在艰难战时，陛下依旧可以凭借充沛的资源争取到时间（这是上帝赐予我们的最珍贵的东西），并且在短时间内成就伟业，而无须为资助传播科学艺术耗费巨款。

随信附上我与中国皇帝之间书信往来的节选，陛下可以从中看出那里的人们对发展科学也十分关心，这一点将中国与欧洲紧密联系在一起。

倘若陛下对我在这项伟大事业中表现出的热忱能够报以宽容的理解，那么我便斗胆（在获悉御医多奈利的死讯之后）向陛下提出如下建议：如果陛下想要为这一职务寻觅新的人选，我可以举荐一位，此人不仅是物理学上的卓越人才，还能对支持科学事业有所助益。我衷心希望，无论是为陛下自身，还是为整个皇室家族，无论是在医药领域，还是在科学方面，此人都能为陛下效力多年。

尊贵的沙皇陛下最忠实的仆人

G. W. v. 莱布尼茨

在《中亚》中洪堡这样写道：“我在第二次途径莫斯科时趁机参观了当地的档案馆，在那里读到了莱布尼茨写给彼得大帝的一封信。他在信中敦促沙皇同意在他的国土上观测地磁现象，这份热忱让我着实感到惊异。”（*Asie Centrale* III: 49f.; *Central-Asien* II: 288）洪堡在谈及这位颇负盛名的大数学家时，口吻中满是赞赏。

洪堡还在书中颇为详细地介绍了莱布尼茨呈交给布鲁斯的论文，特别提到了莱布尼茨对于存在一条没有磁偏角的特殊经线的错误设想，即所谓的“主线”。洪堡对此持保留态度：“从这段节选中可以看出，莱布尼茨地球仪上曲线的走势是建立在一种十分模糊不清的观点之上的。认为存在一个没有磁偏角的经线圈，这种设想太过不准确，连一个奇特大胆的想法都称不上。”（*Central-Asien* II: 289f.）

从洪堡在这段话末尾处所做的历史评价可以看出，他只知晓莱布尼茨同沙皇在托尔高的会面，对之后的两次则一无所知（Humboldt, *Asie Centrale* III: 478）。但他猜想到后续应该还有过会面，或许在德累斯顿，事实则并非如此。

当洪堡在《宇宙》（*Kosmos*）的第四卷中谈及莱布尼茨关于没有磁偏角的地球曲线的论述时，他又一次提到《中亚》中的这段话，还特别谈到了莱布尼茨在1712年1月16日写给彼得一世的信。洪堡态度审慎地总结道：“在莱布尼茨留下的这些迄今尚未引人注目的文献里，并没有独特的理论之光闪现其中。”（*Kosmos* IV: 139, 203）

二、地质学：地质史与进化史

（一）历史背景

1685年8月10日，恩斯特·奥古斯特公爵（Herzog Ernst August）委托莱布尼茨进行韦

尔夫家族史的编写，直到生命尽头莱布尼茨都在致力于这项工作，最终也未能完结。莱布尼茨雄心勃勃地计划完成一部立足于文献、对史实进行精确阐述的著作，这种做法在当时并不多见。

自1691年起，莱布尼茨开始着手写作一部有关下萨克森地区地质史和进化史的作品，在1692年9月6日写给贾斯泰尔（Henri Justel）的信中，他提到希望将其命名为《原态》（Leibniz, *Sämtliche I*: 413）。据推测，莱布尼茨本意是计划将其作为韦尔夫家族编年史的绪言。他致力于在一种真实科学的意义上对地球及其表面生物的起源进行研究，而非对其进行超自然归因。这部作品完成于1694年，但直到莱布尼茨去世之后才出版面世：《原态即论地球的最初形态及自然遗迹中的古老历史痕迹》（*Protogaea sive de prima facie telluris et antiquissimae historiae vestigiis in ipsis naturae monumentis dissertatio*）。

这本书由沙伊德（Christian Ludwig Scheid）出版于1749年，同年被一位名为M. W. L. G.的人译为德语出版，德文版标题被缩略为《原态即论地球的最初形态及自然遗迹中的历史痕迹》（*Protogaea oder Abhandlung von der ersten Gestalt der Erde und den Spuren der Historie in den Denkmalen der Natur*）。原拉丁文标题中的antiquissimae（古老）一词被删掉了。大约一个世纪之后的1847年，汉诺威数学教师特尔坎普夫（Adolf Tellkamp）发表了一篇短论文《莱布尼茨论地表形态演变》（“Leibniz über die Bildung der Erdoberfläche”），这篇文章于1854年被收录到论文集中再次出版（*Physikalische Studien I*: 1-32）。论文长度并非62页（Ravier 382），而是32页。它并不是《原态》的德语译本（Faak 17, 21），而是一篇用德语起草的、针对莱布尼茨原文的阐释性文章——并且仅仅针对莱布尼茨在《原态》中前半部分所表达的主要思想（Tellkamp, *Leibniz über* 9-25）。科恩（Claudine Cohen）和韦克菲尔德（Andre Wakefield）的拉丁语-英语版本中提到过近代德语和法语译本（Leibniz, *Protogaea* 156）。

这篇文章尤其值得关注，因为特尔坎普夫在注释中引用了洪堡出版于1845年的《宇宙》第一卷（*Leibniz über* 31; Humboldt, *Kosmos I*: 311），其中涉及国家形成的原因；而洪堡则反过来在1847年面世的《宇宙》第二卷中援引了于同一年发表的特尔坎普夫的文章（*Kosmos II*: 520）。

莱布尼茨在开篇就将他的论述置于一种宗教语境之中。开头处的三个大写字母B. C. D.是拉丁语Bono cum Deo的缩写，意为“与上帝同在”；然而这些却被译者不恰当地省略了，尽管文中反复出现的对上帝的指涉不断指向这一点。全文共由48个章节组成，在第二章中就出现了这样的语句：地球是脱胎于自然之手的规整球体，因为上帝不会创造任何不规则的事物（incondita non molitur）。在驳斥一种解释《圣经》“大洪水”来源的理论时，莱布尼茨这样写道：“这种观点有着无穷的麻烦，因为它没有考虑到自身与《圣经》相抵触，而后者是人们不得违背的。”（*Protogaea oder Abhandlung web*）

对于自己的操作方式，莱布尼茨在开头处做了如下阐述：

对于伟大的事物来说，再微不足道的认识也是弥足珍贵的。如果我要谈论我们

所在地区最原初的状态，那么就必须提及土壤的形态、土地的自然状况及保存于其中的事物。由于我们居住在低地德语区，它是纬度最高的地区，土壤中富含金属。因此我们能够从自身出发进行重要的推测，犹如从普照之光中散发出的光束，借助它们可以对其他地区进行评估。即便我们的目标未能实现，我们的范例依然能够起到振奋人心的效果。如果每个人都能够对所处的地区充满好奇之心，那么人们就能够更加轻而易举地找寻到我们共同的起源。（*Protogaea oder Abhandlung web*）

由此可见，莱布尼茨最核心的方法是类比推理（Sticker, “Leibniz’ Beitrag” 244-59; “Naturam cognosci” 176-96），尤其是自然过程与人为过程之间的类比（§ 18）。水与火是两股最为根本的力量。莱布尼茨曾提及一门新兴学科的产生，即自然地理（§ 5），对此他曾深入研究过斯坦诺（Nicolaus Steno）、阿格里科拉（Georg Agricola）及拉赫蒙德（Friedrich Lachmund）等人的著作。

（二）洪堡对该问题的态度

洪堡曾在《宇宙》中对《原态》进行过三次细致探讨。在第二卷中他曾以略带讽刺的口吻对莱布尼茨提出的火山岩理论作出如下批判：“如果不是因为莱布尼茨富有想象力的作品《原态》，后者本可以被升格为更具普遍性的观点。”紧随其后的是如下文字：

《原态》中的某些地方甚至比那些出自同一位哲学家之手、如今正广为人知的诗学作品还要富于诗意。这本书讲述了“海绵状的、炽热的、一度兀自发光的地壳如何渣化；笼罩在热气之中、向外散发热量的地表如何逐渐冷却；热气层如何在缓慢冷却过程中被压缩为雨水降落；海平面如何由于海水灌入地穴而下降；以及这些洞穴如何最终坍塌，并如何进一步引发岩层下陷（其倾斜角与地平线相对）”。这幅原始幻想图景中的自然部分中呈现出某些特质，而这些特质在那门新兴的、已经发展为各个流派的地质学的追随者们看来，并非难登大雅之堂之事。（Humboldt, *Kosmos II*: 391f.）

对于《原态》中的自然特征以及不同山型中的矿物学差异，《宇宙》中并未涉及。

洪堡引文中误写的年份（1680）在与这段话对应的、针对特尔坎普夫所做的注释 99 中被纠正为 1691 年（520）。莱布尼茨的神学语境并未使得洪堡对他持有的批判态度有所缓和。无论如何，莱布尼茨从类比中得出的观点只不过是通向更为精确知识的过渡阶段。如果他本人对于事实的的确确感兴趣的话（Knobloch, “Naturgenuss” 40）。

洪堡对于《原态》的认知显然不仅仅基于特尔坎普夫的文章，因为他对《原态》的全篇内容都曾发表过观点。并且在《宇宙》的第四卷，他还明白无误地引用过莱布尼茨的拉丁文原文，而这一部分并未出现在特尔坎普夫的文章中（*Kosmos IV*: 370, 580）。

洪堡在《宇宙》第四卷中的态度明显要积极得多：“《原态》不朽的作者认为这些洞穴在中

心温度降低理论中扮演了重要角色。”(Leibniz, *Protogaea sive* § 4) 这段拉丁文意为:“最终可以相信,由于寒冷而收缩的表面根据其大小不同,会在穹形之下留下大气泡或孔洞。”(Leibniz, *Protogaea oder* 45)

在未完成的《宇宙》第五卷的断篇中,洪堡又一次提到上文中出现过的、他在第二卷中所做的注释,这也是他最后一次提及《原态》(*Kosmos V: 63*)。与斯坦诺不同,莱布尼茨在火山岩原态中将地层向与水平线相反的方向下陷的趋势归结为地下洞穴的存在及洞穴中的沉渣。

三、数学:创立微分

(一) 历史背景

爆发于牛顿和莱布尼茨之间的激烈的微积分(calculus)发明权之争——即牛顿的流数法(Fluenten-Fluxionen-Methode)和莱布尼茨的微分-积分(Differential- und Integralrechnung)究竟何者在先——是同类争端中最声名狼藉的一例。这一发明的科学史意义不容小觑。如今毋庸置疑的一点是,二人是各自独立地创建了微积分^[2]。接下来将对相关细节进行进一步阐述,这些细节对于理解洪堡与汉诺威数学家维特施泰因(Theodor Wittstein)之间的争论是不可或缺的。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当今的认识水平并不适用于二人之间的通信。

1665年,牛顿在林肯郡写下了流数法的初稿,但直到1704年才将其发表。流数(Fluxionen)指的是流量(Fluenten),即实数随时间发生改变时的速度:牛顿采用的是物理学研究方法。他对于纯粹学理上的问题并不感兴趣。用现代的话来说,他并没有创立积分这一符号。

莱布尼茨对微积分的关键想法则起草于1675年10月至11月在巴黎期间。微分指的是无穷小的实数——按照莱布尼茨的定义,小于任何已知的量。从1684年起莱布尼茨开始发表自己的成果。他创立了一种计算方法,并且极为重视概念命名的问题:莱布尼茨采取的是代数学的方法。

由此可见,流数法和微分学截然不同。牛顿与莱布尼茨二人之间的关系起初也是相互赞赏有加。而来自第三方——丢利埃(Fatio de Duillier)和基尔(John Keill)的恶意诋毁却招致了这场不幸的争端。基尔于1710年直接指责莱布尼茨剽窃了牛顿的成果,对此莱布尼茨期望能从他所在的皇家学会获得恢复名誉的声明。事实却恰恰相反:牛顿亲自起草撰写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几乎未加改动地发表在了《通报》(*Commercium epistolicum*)上(Hall 178):在这项关涉到自身的事件中,牛顿集原告与法官于一体。根据这份《通报》,莱布尼茨最为重要的观点都来自于牛顿。

(二) 洪堡对该问题的态度

雅可比(Carl Gustav Jacob Jacobi)是洪堡在数学史方面最为重要的顾问。在1846年11月8日和12月12日同他的书信中,洪堡说道,16世纪的数学分析最终导向了费马(Pierre de

Fermat)、巴罗 (Isaac Barrow)、莱布尼茨和牛顿 (Humboldt, *Briefwechsel zwischen* 84), 高等数学分析至少会引向一个特定的光明时期, 费马、牛顿和莱布尼茨的微积分则是其中带有火药味的一个。

与此相应, 在 1847 年面世的《宇宙》第二卷《物质宇宙观的历史》一文中, 洪堡反复提及两位堪称 17 世纪终结者的数学家, 以及他们在纯粹数学知识上所取得的进步 (Humboldt, *Kosmos II*: 341, 342, 355, 369, 533, 543)。在提到牛顿时他写道: “可以笃定的一点是, 早在 1666 和 1667 年之前, 这位伟人就已经掌握了他的光学思想、万有引力理论以及微分 (流数法) 中最根本的部分。” (S. 371)

洪堡错误地将流数法与微分混为一谈, 并且在针对这句话的第 68 条注释中给明了出处:

布鲁斯特 (David Brewster), 《艾萨克·牛顿爵士的生平》(*The life of Sir Isaac Newton*) 第 17 页。通行的观点认为流数法的发明时间为 1665 年。按照英国皇家协会于 1712 年 4 月 24 日发布的官方声明中的说法, 流数法 ‘除了名称和使用符号的方法之外, 其他方面与微分法毫无二致’。有关牛顿与莱布尼茨之间耸人听闻的发明权之争——其中甚至 (匪夷所思地) 夹杂着对牛顿合法地位的控诉——的部分见布鲁斯特第 189-218 页。(514)

布鲁斯特的牛顿传记出版于 1831 年, 洪堡有这本传记, 并自其出版以来, 一直与作者保持通信, 其中六封由他收发的信件已经公开。除此之外, 布鲁斯特还曾参与贝格豪斯 (Heinrich Berghaus) 作品《物理图集》(*Physikalischer Atlas*) 的英文版编纂工作。而布鲁斯特对英国皇家学会《通报》的援引, 则是这段引文中又一处存疑的地方。

异议果然接踵而至。1851 年, 来自汉诺威一所综合性技术学校的数学教师维特施泰因将他所做的三篇有关微积分背景介绍的讲稿出版成书, 并将一本样书寄给了洪堡。在第三篇讲义中, 有如下内容:

大家或许已经察觉到, 时至今日, 我们著名的同胞亚历山大·冯·洪堡对于微分发明权的真实情况仍然一知半解, 以致于当他在《宇宙》第二卷中提及该事件时, 又一次将英国皇家学会对于发明权的判决展现在了读者面前。(Wittstein web)

洪堡在一封未被保存下来、写于 1851 年 10 月 8 日的回信中驳斥了这一指责。而这又促使维特施泰因于 11 月 18 日写了一封更长的信进行辩解。这封信首次公布如下^[1]:

谨蒙阁下于 10 月 8 日赐函, 不胜荣幸。因俗务缠身, 未能即刻回复, 还望阁下容谅。自收信以来, 我便趁此机会, 翻阅了与这桩悬案——莱布尼茨与牛顿的微分发明权一

事——相关的诸多权威典籍。在查明来龙去脉之后,如今斗胆怀着敬意奉上如下信函,敬请阁下批评指正。

首先我必须承认的一点是,在不揣冒昧呈递给阁下的拙作“三篇讲稿”^[2]之中,即文章中的第38页上,我对于您作品《宇宙》的引述有不够确切之处。此处涉及的是您在《宇宙》第二卷第514页的第68个注释,阁下在这段话中参照布鲁斯特的作品,逐字转引了英国皇家协会的说法,即认为流数法除了名称和使用符号的方法之外,其他方面与微分法毫无二致;除此之外,您还在涉及莱布尼茨-牛顿的争议问题上全盘接收布鲁斯特^[3]的观点,而后者在呈现这一事件时所展现出的民族偏见并非无可指摘。有鉴于此,我将在接下来的行文中引入古劳尔的报告。而在第二卷第371页的附文中,您同样将微分与流数法等而视之。针对您的这一观点,我在拙作“三篇讲稿”的第38页摘引了莱布尼茨的几句话,这段话出自他的作品《微积分的历史和起源》(*Historia et origo calculi differentialis*)^[4],出现在原文的第2页上:

Et quo jure adversarii nunc Newtono talia vindicant, posset aliquis Cartesii analysin etiam Apollonio vindicare, qui rem calculi habebat, calculum ipsum non habebat.^[5]

而这篇文章中第25页上的这段话则更具代表性:

Et licet nostris temporibus insignes viri Keplerus, Cavalerius, Fermatius, Hugenius, Wallisius, Wrennus, Jac. Gregorius, Barrovius ac novissime Newtonus sub indivisibilium vel denique sub fluxionum nomine rem considerassent multaque scitu digna inde eruisent, modum tamen non habuere, per quem ad calculum revocari posset.^[6]

看到这里,阁下有理由指出,在面临这样一个争议已久的问题时,我应当给出除莱布尼茨自述之外的其他例证来支撑我的观点——尽管这些例证与我的观点并不相悖。诸如此类的证据大量存在于莱布尼茨的传记之中,这本传记由古劳尔在1842年出版于布雷斯劳。在传记的第一卷174-180页中,古劳尔列举了一系列权威人士的名字:欧拉、拉格朗日、拉普拉斯、泊松以及毕奥,其中毕奥发表在1832年的《学者杂志》(*Journal des savans*)上的论文更是充当了古劳尔的理论支撑。在这一类型的问题上,像毕奥这样完全严谨可靠的人足以赢得任何一位公允之士的信任。古劳尔在第179页上写道:“在微分的发展史问题上,上文提到的大数学家们就如下一点达成一致:在时代更迭之中,费马是这项伟大发明的奠基人,而牛顿与莱布尼茨所取得的功绩之间的关系就好比是将一项特殊事物擢升为普遍原理。”

此外他还写道:“拉普拉斯曾明确指出,英国皇家协会的论断……恰恰在这一点上大错特错,因为他们认为:‘微分法与流数法所使用的的方法是如出一辙的,只是名称与符号使用上有所不同……’如此机敏的一群审判者却没有领会出莱布尼茨论述

中的不同之处，这当然不能怪到莱布尼茨头上。拉普拉斯至少从符号看出了一种新的计算原则。”此外泊松还断言：“微分始终未能脱离莱布尼茨所创作的算法和符号。”

在第 180 页上，毕奥补充道：“如果历史上只有流数法存在过——如同在牛顿作品中那样，那么它（指微分）依然是当今人们必须学习攻克的一项令人钦佩的创造。”

一位出自本国的、德高望重的数学家曾在 1813 年在英格兰待过很长一段时间，我在此特将他亲口说过的一番话做一总结：彼时的英国人对于微分法以及诸如此类的伟大进步浑然不知，他们囿于牛顿流数法的表象，固步自封，不思进取，直到许久之后（这一点要归功于艾佛里的努力）才借由法国人编写的数学教科书对微分法有所了解，这番景象是多么的可悲。

以上是我所做的粗略综述，恳请阁下予以接纳。随信附上我对阁下的诚挚感谢，感谢您对于拙作“三篇讲稿”的直言不讳以及对其作出的友好而宽容的评定。

向阁下致以致以崇高的敬意

您忠诚的 Th. 维特施泰因

汉诺威，1851 年 11 月 18 日

洪堡在这封信中做了四处批注。

在开头的称呼后面他写道：“《宇宙》中没有任何一行字能够支持维特施泰因先生的话，即他在第 38 页上所說的‘我对于真实情况仍然一知半解，以致于又一次将英国皇家学会对于发明权的判决展现在了读者面前！’。”

在信函的第二段之前：

我曾对维特施泰因先生提出过抗议，他认为我对莱布尼茨怀有敌意，而这一点是有失公允的。我仅仅在书中偶然引述过别人的观点，例如在第 512 和 364 页上引用拉普拉斯的话，他将费马称作是微分法的发明者，参见布鲁斯特第 514 页。在第 371 页上我本来想表达的是“他的万有引力理论以及微分法。”我曾将牛顿和莱布尼茨同样称作是有真知灼见的数学家，见《宇宙》第二卷第 369 页。

在第一句拉丁语引言之后洪堡注明：来自佩尔吉的阿波罗尼奥斯（Apollonios von Perge）。

在倒数第二段旁他写下：莱布尼茨-牛顿。

对于维特施泰因合乎理据的指控，即认为布鲁斯特在这场争端中并非公正无私，洪堡并未予以回复。而布鲁斯特将英国皇家学会的判决作为依据是极其不恰当的，因为牛顿本身即担任学会的院长——这一点洪堡并不知情。他如此信任他的通信对象，将后者把流数法和微积分等同的不恰当观点照单全收。洪堡的第二段批注再次表明了这一点：正如他承认的那样，他原

本是想说牛顿的微分法。坦率地讲，这里所涉及的高等数学分析对于洪堡来说是相当陌生的。

在此后的1858年7月8日，洪堡在写给伯克的信中又一次谈及了这个主题。他在信中写道：“布鲁斯特在他所写的牛顿传记中曾提到，莱布尼茨在书信中暴露出，为了报微积分发明权的一箭之仇，他曾在夏洛特王后（Königin Sophie Charlotte）面前进谗言，将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的牛顿污蔑为是不祥的、反基督的泛神论者。”（August Böckh 231）

然而布鲁斯特在书中提到的并非夏洛特王后——莱布尼茨也从未与她谈论过牛顿——而是来自勃兰登堡-安斯巴赫的卡洛琳（Wilhelmine Caroline von Brandenburg-Ansbach），她自1714年成为威尔士王妃，1727年加冕成为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王后：“然而，如果他竟敢在与敬爱他的威尔士王妃的通信中污蔑那位伟大的人，如果他胆敢把牛顿的思想描述为理论上错误的、于宗教有害的，如果他将自己的指控建立在《原理》和《光学》中那些充盈着虔诚热情的段落之上；那么他就是在自己的名誉上留下污点，一个他作为哲学家的毕生才华和作为一个人的全部美德都永远无法抹除的污点。”（Brewster web）

然而这并不妨碍洪堡对莱布尼茨作出的溢美之词，正如上述引文中的“具有敏锐洞察力”“不朽的”“莱布尼茨的天才”等词语所展现的那样。对于洪堡这样一位对数学无比赞赏的人来说，这不足为奇。

莱布尼茨对中国的浓厚兴趣也体现在他与彼得大帝的通信中。在莱布尼茨眼中，这个庞大的帝国在欧洲与中国之间构筑起了一座科学文化的桥梁。洪堡一定对这一想法欣赏有加。他依据自身的科学方法论标准，对莱布尼茨的地球物理学动议和地质史假说做出判断。在洪堡看来，可靠的数学和狂野的梦境（*Kosmos* III: 39）、幻想的浓雾（374）之间存在一道鸿沟，而仅凭归纳法并不能够使其完全弥合。《宇宙》的第二卷和第三卷都以一曲对数学的赞歌作为结尾——尽管存在批判性的异议，尽管对布鲁斯特的引用依然存疑，这种倾向依然深刻影响着洪堡对莱布尼茨的评判。

注释 [Notes]

- [1] 本文译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 [2] 更多细节，参见Eberhard Knobloch, “Originalität, Priorität und Reputation: Leibniz und Newton.” *Vision als Aufgabe – Das Leibniz-Universum im 21. Jahrhundert*, edited by Martin Grötschel, et al., Berlin: Berlin-Brandenburg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S., 2016, pp. 85-95.
- [1] Staatsbibliothek zu Berlin – Preußischer Kulturbesitz, Signatur: Nachlass Alexander von Humboldt, gr. Kasten 8, Nr. 107. Elektronisch zugänglich unter: digital.staatsbibliothek-berlin.de/werkansicht?PPN=PPN792353544&view=overview-toc&PHYSID=PHYS_0001&DMDID=DMDLOG_0001
- [2] Theodor Wittstein, *Drei Vorlesungen zur Einleitung in die Differential- und Integralrechnung*.
- [3] David Brewster, *Life of Sir Isaac Newton*.
- [4] 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Historia et origo calculi differentialis (1714).” *Als Anhang sind zwei noch ungedruckte mathematische Abhandlungen Leibnizens hinzugefügt*, edited by von Carl Immanuel Gerhardt, Hannover: Hahn'sche Hofbuchhandlung, 1846, pp. 392-410.

- [5] “如果反对者们将微分归于牛顿名下是合乎正当的，那么人们就同样有理由把笛卡尔的解析几何归于阿波罗尼奥斯名下了，后者只是提出了这个计算问题，却并未解决这一问题”（Leibniz, *Mathematische Schriften* V: 394）。
- [6] 第二段引文并非出自莱布尼茨《微积分的历史》的正文，而是出现在出版者格哈特（Gerhardt）的注释部分中，因此并未被收录进莱布尼茨全集第五卷（LMG V）进行再版：“尽管我们时代中的这些伟人——开普勒、卡瓦利里、费马、惠更斯、沃利斯、雷恩、詹姆斯·格雷果里、巴罗以及近来的牛顿——都将这一主题归入‘不可分量’抑或……并最终纳入流数这一问题下进行思考，尽管他们从中获得了许多颇有价值之物，但他们始终未曾得出一种可以最终化为计算的方法。”

引用文献 [Works Cited]

- Biermann, Kurt-Reinhard. “Alexander von Humboldt als Initiator und Organisator internationaler Zusammenarbeit auf geophysikalischem Gebiet.” *Human Implications of Scientific Advance, Proceedings of the XV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History of Science*. Edinburgh, S. 1978, pp. 126-38.
- Bodemann, Eduard. *Die Leibniz-Handschriften der Königlichen öffentlichen Bibliothek zu Hannover*. Hannover: Hahn, 1889.
- Brewster, David. *Life of Sir Isaac Newton*. London: Murray, 1832. books.google.de/books?id=A0RWAAAAMAAJ&pg=PA168&hl=de&source=gbv_toc_r&cad=3#v=onepage&q&f=false.
- Faak, Margot. “G. W. Leibniz im Urteil Alexander von Humboldts.” *NTM-Schriftenreihe zur Geschichte der Naturwissenschaften, Technik und Medizin*, vol. 12, no. 1, 1975, pp. 10-24.
- Guerrier, Woldemar. *Leibniz in seinen Beziehungen zu Russland und Peter dem Grossen, Eine geschichtliche Darstellung dieses Verhältnisses nebst den darauf bezüglichen Briefen und Denkschriften*. St. Petersburg – Leipzig: Eggers, 1873. mdz-nbn-resolving.de/urn:nbn:de:bvb:12-bsb11157684-2.
- Hall, A. Rupert. *Philosophers at War – The Quarrel between Newton and Leibniz*. Cambridge: Cambridge UP, 1980.
- Humboldt, Alexander von. *Asie Centrale, Recherches sur les chaînes de montagnes et la climatologie comparée*. Bd. 3. Paris: Gide, 1843.
- . *Central-Asien, Untersuchungen über die Gebirgsketten und die vergleichende Klimatologie*. Bd. 2. Berlin: Carl J. Klemann, 1844.
- . *Kosmos, Entwurf einer physischen Weltbeschreibung*. 5 Bände. Stuttgart-Tübingen: J. G. Cotta'scher Verlag, 1845-1862.
- . *Briefwechsel zwischen Alexander von Humboldt und C. G. Jacob Jacobi*. Edited by von Herbert Pieper. Berlin: Akademie Verlag, 1987.
- . *Briefe aus Russland 1829*. Edited by von Eberhard Knobloch, et al. Berlin: Akademie Verlag, 2009.
- . *August Böckh, Briefwechsel, hrsg. von Romy Werther unter Mitarbeit von Eberhard Knobloch*. Berlin: Akademie Verlag, 2011.
- Knobloch, Eberhard. “Naturgenuss und Weltgemälde-Gedanken zu Humboldts *Kosmos*.” *Dahlemer Archivgespräche*, no. 12, 2016, pp. 24-43.
- . “Naturwissenschaften.” *Alexander von Humboldt Handbuch, Leben – Werk – Wirkung*, edited by Ottmar Ette, Stuttgart: J. G. Metzler, S., 2018, pp. 113-26.
- Leibniz, Gottfried Wilhelm. *Hypothesis physica nova*. Mainz: Christophorus Kuechler, 1671.
- . *Protogaea oder Abhandlung von der ersten Gestalt der Erde und den Spuren der Historie in den Denkmalen der Natur*. Leipzig-Hof: J. G. Bierling, 1749. mdz-nbn-resolving.de/urn:nbn:de:bvb:12-bsb10134151-5.
- . *Protogaea sive de prima facie telluris et antiquissimae historiae vestigiis in ipsis naturae monumentis dissertatio ex schedis manuscriptis viri illustris in lucem edita a Christiano Ludovico Scheidio*. Göttingen: J. W. Schmid, 1749. mdz-nbn-resolving.de/urn:nbn:de:bvb:12-bsb11220480-8.
- . *Mathematische Schriften*. Edited by von Carl Immanuel Gerhardt. 7 Bände. Berlin-Halle, 1849-1861.
- . *Sämtliche Schriften und Briefe*. Edited by von der Berlin-Brandenburg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und der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zu Göttingen. Berlin-Boston: de Gruyter, 1923.
- . *Protogaea*.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Claudine Cohen and Andre Wakefield. Chicago: The U of Chicago P, 2008.

- . *Nova hypothesis physica / Neue physikalische Hypothese. Einleitung, lateinischer Text, deutsche Übersetzung und Anmerkungen von Otto und Eva Schönberger*. Würzburg: Königshausen & Neumann, 2017.
- Ravier, Émile. *Bibliographie des œuvres de Leibniz*. Paris: Alcan, 1937.
- Reich, Karin. “Leibnizens Interesse an der Geophysik und die Folgen.” *Theatrum naturae et artium – Leibniz und die Schauplätze der Aufklärung*, edited by Daniel Fulda and Pirmin Stekeler-Weithofer, Stuttgart-Leipzig: S. Hirzel, S., 2019, pp. 305-35.
- Reich, Karin, and Elena Roussanova. “Meilensteine in der Darstellung von erdmagnetischen Beobachtungen in der Zeit von 1701 bis 1849 unter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s Beitrages von Russland.” *Beschreibung, Vermessung und Visualisierung der Welt*, edited by Ingrid Kästner and Jürgen Kiefer, Aachen: Shaker Verlag, S., 2012, pp. 132-60.
- . “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und die Anfänge der wissenschaftlichen Erforschung des Erdmagnetismus in Russland.” *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1646-1716) und die gelehrte Welt Europas um 1700*, edited by Berthold Heinecke and Ingrid Kästner, Aachen: Shaker Verlag, S., 2013, pp. 135-80.
- Richter, Liselotte. *Leibniz und sein Russlandbild*. Berlin: Akademie Verlag, 1946.
- Sticker, Bernhard. “Leibniz’ Beitrag zur Theorie der Erde.” *Sudhoffs Archiv*, no. 51, 1967, pp. 244-59.
- . “Naturam cognosci per analogiam – Das Prinzip der Analogie in der Naturforschung bei Leibniz.” *Akten des Internationalen Leibniz-Kongresses Hannover 1966, Bd. II*. Wiesbaden: Steiner, S., pp. 176-96.
- Tellkampf, Adolf. *Physikalische Studien: Eine Reihe naturwissenschaftlicher Abhandlungen*. Hannover: Rümpler, 1854.
- Wittstein, Theodor. *Drei Vorlesungen zur Einleitung in die Differential- und Integralrechnung*. Hannover: Hahn’sche Hofbuchhandlung, 1851. resolver.sub.uni-goettingen.de/purl?PPN587937378.

◇责任编辑：吴晋先

FLC

美国文学研究

解构“我们”的神话 ——《屈服》对后“9·11”美国国家特性的再思考

◎ 聂祝琳

内容提要: 艾米·沃德曼的处女作《屈服》是美国后“9·11”文学的代表作之一。小说虚构“9·11”“归零地”纪念馆匿名竞稿风波,通过聚焦创伤阴影下纪念馆评审团的内部争议,背离美国信念的遇难者家属等级划分,以及美国穆斯林主人公在“恐伊症”症候下的身份认同困境,解构了后“9·11”时代“我们”的神话,对主流话语阐释的美国国家特性的霸权性、虚伪性与排外性展开了批判性思考。

关键词: 《屈服》 美国国家特性 创伤 美国信念 恐伊症

中图分类号: I7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 (2021) 03-0075-10

基金项目: 2019年湖南省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后9·11美国小说中的国家认同研究”(CX20190371)

作者单位: 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DOI: 10.19967/j.cnki.flc.2021.03.008

Title: Deconstructing the Myth of “Us”: *The Submission*'s Reconsideration of Post-9 / 11 American National Identity

Abstract: Amy Waldman's debut novel *The Submission* is the representative of American post-9 / 11 literature. The novel fictionalizes an anonymous “Ground Zero” memorial design competition, and, by focusing on the furious debates within the memorial jury in the shadow of trauma, the hierarchy of the victims' families betraying the American Creed, as well as the identity crisis of the American Muslim protagonist under the pressure of Islamophobia, deconstructs the post-9 / 11 myth of “us.” It is a criticism of the hegemony, hypocrisy and exclusiveness of post-9 / 11 American national identity elucidated by the mainstream discourse.

Keywords: *The Submission*, American national identity, trauma, American Creed, Islamophobia

Author: Zhulin Nie, Ph.D. Candidate, Foreign Studies Colleg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China.

美国作家艾米·沃德曼 (Amy Waldman) 是近年来备受关注的文坛新星。她毕业于耶鲁大学, 涉足记者行业多年, 曾任《纽约时报》南亚分社联席主编, 迄今为止已有《屈服》(*The Submission*) 和《地狱之门》(*A Door in the Earth*) 两部小说问世。《屈服》是沃德曼的处女作, 自出版起便广受好评, 摘得珍妮特·海丁格尔·卡夫卡奖, 入选笔会/海明威奖决选名单, 并被众多知名报刊评为年度最佳书目。小说以一场虚构的“9·11”纪念馆匿名竞稿风波为中心线索, 讲述了印度裔美国穆斯林建筑师穆罕默德·可汗 (以下简称穆) 在其作品《花园》获胜后的剧变人生。遇难者家属克莱尔一开始力挺穆, 却在外界的压力下逐渐怀疑穆的动机; 而穆更是在支持与反对的风暴中心不知所措, 经历严重的身份认同危机, 并最终在其支持者——孟加拉裔寡妇阿斯玛的遇袭和克莱尔的倒戈后撤稿远离美国。目前国内对该作品尚以引介为主, 国外则侧重探讨小说中的他者文化身份、文化创伤、文化记忆与叙事策略等。戈蒂埃 (Tim Gauthier) 从美国穆斯林的他者性着手解读后“9·11”时代共情的必要与艰难 (191-216)。基布尔 (Arin Keeble) 则认为书中灵活的新闻写作技巧及其对美国社会的全景化描绘实现了创伤和政治主题的巧妙交融 (165-87)。莫利 (Catherine Morley) 聚焦记忆主题, 指出作品参与“9·11”文化记忆建构的文学价值 (185-200)。事实上, 正如《华盛顿邮报》所说, 《屈服》是对处于悲痛中的美国的一次连贯、及时、绝妙的自我审视。不论是他者身份还是文化创伤都与作家对“9·11”后“我们是谁”这个问题的思考密切相关。基于此, 本文由作为“我们”的美国人在纪念馆风波中的喧哗与骚动入手, 尝试解读《屈服》对后“9·11”美国国家特性 (national identity) 的理解。

国家特性与国家认同密切相关。国家认同指一个人确认自己属于哪个国家, 以及这个国家究竟是怎样一个国家的心理活动 (江宜桦 12)。其中, “这个国家究竟是怎样一个国家”即一国的独特性。当该独特性被多数国民认同并进而成为其国家认同的基础时, 国家特性应运而生 (王立新 124)。换言之, 国家特性指国民公认的本国区别于他国的独特性, 是国家认同的前提。在亨廷顿 (Samuel Huntington) 看来, 美国国家特性关乎一套在基督教信仰, 新教价值观, 英式法制体系和欧洲文化传统基础上生成的, 以自由、平等、个人主义、代议制政府和私有财产制为主要原则的美国信念 (36)。而历史的不断推进和国家的“诠释之共同体” (萨义德 59) 特质则决定了国家特性集稳定性与发展性于一身的建构性。其中, 风云变幻的国内外环境, 尤其是战争冲突等重大危机事件对国家政治领导力和文化权威性的冲击, 更是不断唤起人们重新定义并捍卫国家特性的需求 (Coles 588; Hall et al. 217)。这使得由政府 and 媒体共同编织的主流话语成为国家特性的重要阐释途径。“9·11”后, 小布什政府抓住危机后的话语空白, 通过重申自由、民主、美国梦等美国理想与价值观, 肯定美国的道德领袖大国地位, 妖魔化特定“敌人” (Hutcheson et al. 30), 为美国打造出一个在邪恶攻击下坚守美国信念、万众一心的山巅之城形象, 在为国家意识形态奠基的同时确立了自身的话语霸权。

对于这种非此即彼思维模式的产物, 沃德曼显然存疑。她曾在陈述创作动机时指出, 作为“我们”的美国并非铁板一块, 甚至连遇难者家属在阶级、政治立场等各方面都有巨大差异 (Brown

web)。《屈服》便通过打破美国主流话语中所谓统一战线的“我们”的神话，揭露了主流话语构建的后“9·11”美国国家特性的霸权性、虚伪性与排外性。

一、创伤阴影下的国家特性之思

戈蒂埃指出，尽管“9·11”后的美国一度成为爱国热情高涨的星条旗海，但是“我们”之间的“团结感”似乎既不持久也不普遍（192）。换言之，后“9·11”美国主流话语构建的步调一致的“我们”或许从一开始就是幻象。《屈服》以竞稿决选夜评审团内部关于纪念馆应“如何建”的剑拔弩张开篇，对创伤与国家特性间的关系展开探索，反思主流话语以创伤“绑架”美国国家特性的企图。

在两部设计风格大相径庭的决赛作品中，雕塑家阿里安娜极力推崇以肃穆的黑色为主基调的《虚空》，认为其花岗岩与池水的创意组合如同天地间难以弥和的巨大裂口，象征着“9·11”当天的丧失与残酷。遇难者家属代表克莱尔支持的《花园》则是一座由凉亭、水道、树木、白墙构成的静谧之所。置身其中，观者既可在镌刻了死者名单的围墙的环抱中寄托哀思，也能于园内四季美景的变与不变中反思过去，感恩当下，借美学之力疗心灵之伤。

一方面，阿里安娜和克莱尔的争论源于艺术家和遇难者家属对纪念馆设计理念和功用相异的理解与期待。这呼应着詹姆斯·杨（James E. Young）的相关论述，即渴望结束悲伤的遇难者家庭和要求明确传达“9·11”事件之丧失特质的当代艺术家之间存在一种根本的张力（转引自Morley 187），也揭示了“9·11”事件超越个体创伤的文化创伤维度。如果说克莱尔在沉思中回忆过往，于美好中调和哀思的选择反映着多数遇难者家属个体创伤的难以言说及其自我疗伤、重建生活的期许，那么阿里安娜对纪念馆应揭露历史残酷、具有凝聚记忆密度的集体哀悼功能的主张则体现着后“9·11”美国建构文化创伤的努力。亚历山大（Jeffrey C. Alexander）这样定义“文化创伤”：“当个人和群体觉得他们经历了可怕的事件，在群体意识上留下难以抹灭的痕迹，成为永久的记忆，根本且无可逆转地改变了他们的未来，文化创伤就发生了。”（1）这个概念同时包含了文化创伤的群体维度、苦难维度和建构维度。换言之，文化创伤并非自在的伤痛经验，而是“在一个特定的文化系统中发生的对经验事实的特定书写和表征”（陶东风10）。在诺拉（Pierre Nora）看来，纪念馆是意图性纪念物（intentional monument）的代表，以其独到的公共空间设计承担回溯与前瞻的双重功能，作为“记忆的介质”（milieu de mémoire）发挥着书写社会记忆、更新自我认知的媒介价值（转引自陈蕴茜135）。正如阿里安娜所说，“纪念馆不是墓地，而是一种国家象征、历史符号，无论参观者与袭击事件的时空关联多么微弱，都能让他们体会当时的感受与意义”（Waldman 5）。作为文化创伤的形塑媒介，纪念馆为观者在追忆、反思“9·11”事件的同时提供理解自我与外界关系的可能。与书中人物倾力打造的纪念馆一样，“9·11”后，无论是纽约市民在“归零地”和消防队附近自发组织的哀悼活动，还是《纽约时报》开辟的遇难者群像专栏，均可视为美国社会召唤民众编织“9·11”事件相

关文化意义的努力。“9·11”事件因此并未止步于由无数个体创伤汇聚而成的社会危机事件，而是逐渐沉淀为整个国家的文化创伤，植根于民族文化记忆之中，成为后“9·11”时代美国国家特性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同时，沃德曼对《虚空》的描绘亦蕴含着她对后“9·11”美国应如何构建文化创伤与国家特性的深刻思考。亚历山大指出，“借由建构文化创伤，各种社会群体、国族社会，有时候甚至是整个文明，不仅在认知上辨认出人类苦难的存在和根源，还会就此担负起一些重责大任。一旦辨认出创伤的缘由，并因此担负了这种道德责任，集体的成员便界定了他们的团结关系，而这种方式原则上让他们得以分担他人的苦难”（1）。这表明文化创伤不应止于伤痛的宣泄，更应承担继往开来的历史担当。结合“虚空”（void）一词强烈的反讽意蕴，沃德曼对该作品参与建构文化创伤的立场显然是不赞同的。《虚空》的忧郁特质及其于毁灭之上创造毁灭的美学原理致力于从共时维度打造充斥伤痛与复仇情绪的精神空间，却未能从历时维度揭示出基于人类共有苦难，反思灾难根源、承担社会责任的必要性与紧迫性。杜恩（Katharina Donn）对“9·11”后“创伤”概念的政治化高度警惕，指出“创伤在从单纯的症状转变为文化记忆的过程中，有被利用、甚至滥用的危险”（转引自梅丽 166）。沃德曼同样没有忽视后“9·11”文化创伤与政治之间的联动关系。结合阿里安娜“伤痛”“愤怒”“毁灭”等词汇的选择，《虚空》可被视为沃德曼对兼具哀悼叙事和反恐叙事的后“9·11”美国主流话语的隐喻，于其中现形的正是一个集受害者和复仇者于一身的正义无畏的山巅之城形象。这与美国在“9·11”后将创伤意识形态化，大肆宣扬以单边主义、先发制人的反恐战争为特征的布什主义，以及民主改造大中东的霸权主义行为呈显著映射关系。沃德曼借《虚空》揭示并批判的正是现实中美国主流话语在道德化文化创伤的大旗下阐释的美国国家特性的霸权性。

而《花园》的最终胜出同样体现着创伤与国家特性建构之间的深层纠缠。尽管不比阿里安娜的高调强势，克莱尔柔美的外表下却也蛰伏着相似的控制欲，“别人如果不按照她的意思行事，她似乎并不能接受”（Waldman 7）。同阿里安娜的“武器”品味不同，克莱尔善用在沃德曼看来亦不啻于霸凌的悲伤。拉票环节的克莱尔极为擅长运用遇难者家属身份，将个体创伤转化为道德压迫感施于他人。除了借助一袭黑衣“抢尽优势”（7），克莱尔数次以“我们”自居，强调其作为痛失至亲的遇难者家属群体的一员与其他失去“美国无懈可击的安全感”和“纽约最引人注目的地标建筑”的美国人的区别（3）。因此，评审团主席保罗对克莱尔的胜利“合乎美国风格”的评价包含着更深的内涵（12）。阿里安娜将艺术家与遇难者家属的关系比作医生与病人，营造出一张权力关系网，赋予自身审视国民现状、引导国民心态的权威性。这不由使人想到福柯对临床医学中基于凝视的不平等医患关系的论述：在科学、冷静、客观的目光中，医生成为知识的权威，而病人则沦为被审视的对象，“凝视的王权逐渐确立了自己——眼睛认识和决定一切，眼睛统治一切”（转引自陈榕 356）。但事实上，克莱尔非但不是阿里安娜口中被凝视的对象，反而深谙凝视的权力运作机制：小说首页就描写到其他评审团成员如何在克莱尔强调自己痛失所爱时放低视线，愧疚不已，而克莱尔又是何等“略感欣慰”（Waldman 3）。当

人们在创伤的压力下调转目光时，创伤便登上了权力的宝座，主宰、掌控着一切。通过描述克莱尔其人其行，沃德曼实现了对主流话语以创伤引导国民情绪与判断力，继而主导后“9·11”美国国家特性重塑的更加隐晦的批判。

二、遇难者家属内部的他者化

在“9·11”后的相关媒体报道中，斯特肯（Marita Sturken）注意到“遇难者等级”（hierarchy of the dead）的存在，其中公职人员和拥有大量资产的成功人士受到的关注远高于普通上班族、门卫和保洁等（272）。在《屈服》中，该遇难者等级被遇难者家属等级取代：通过塑造克莱尔、肖恩、阿斯玛等阶级、族裔背景各异的遇难者家属形象，《屈服》凸显出部分家属遭受他者化的残酷现实，从美国信念中人们最引以为傲的民主理念与现实的背离拷问主流话语中美国国家特性的虚伪。

当纪念馆竞稿结果成为公开的秘密后，克莱尔的劲敌不再是阿里安娜，而成为在袭击事件中失去消防员哥哥的肖恩。不同于充满责任感的兄长，肖恩暴躁易怒，坚决反对穆斯林插手纪念馆的设计与建设，甚至为此专门成立捍卫纪念馆委员会。多数学者倾向于将其视为典型的白人蓝领阶级反面形象，“在愤怒和家属特权中煎熬，为达到自己的目的一意孤行，不惜践踏他人尊严”（Bell 109）。亦有论者将其视为后“9·11”极端爱国主义鼓动下的寓言式人物，与布什主义政治辞令影响下的美国有密切关联（Keeble 184）。肖恩诚然具备前述极端化性格特征，但他的愤怒与过激行为不止是后“9·11”政治话术的产物，亦与草根阶层在国家权力关系网络中的边缘性位置不无关系，从多方面反映着美式民主面临的危机。

尽管福山（Francis Fukuyama）曾在冷战结束后骄傲地宣称美国所代表的西方自由民主将是“人类意识形态演进的终点”（4），现实却并不尽如人意。作为一个被赋予“个人自由、政府问责、法制、社会公平”等诸多内涵的概念（谢韬 34），美式民主在后冷战时代非但未能继续发扬光大，反而愈发呈现出衰败的迹象。书中肖恩和保罗在昂贵的麦迪逊大道咖啡厅的见面颇具象征意义。仅仅是置身上流社会的领地便使肖恩坐如针毡，“感到身处敌营”（Waldman 127-28）。这种敌对感首先源自阶级间显著的贫富差距：“肖恩觉得这家咖啡厅看起来普通，价格却不便宜：半颗西柚 5 美元，奶油芝士百吉饼 12 美元。”（127）沃尔夫（Edward Wolff）的研究数据显示，2010 年，全美 1% 的家庭拥有 35.4% 的资产，而 80% 的家庭却仅有 11.1% 的财产（转引自谢韬 35）。肖恩显然属于后者。不论是生疏的点餐、邋遢的衣着，还是临走时扔下的 20 美元都使肖恩在面对身价高出自己 40 万倍的保罗时感到泄气而愤怒。同时，二者的对峙也隐射着评审资格裁定中民主的缺席。当评审委员会拒绝肖恩，转而选择克莱尔时，他们青睐的不止是她的艺术品收藏和鉴赏能力，更是其亡夫雄厚的家族背景。或许州长的揶揄道尽了其中奥秘：“我们可不想让一群消防员做决定，他们会在曼哈顿建一个巨型头盔。”（Waldman 104）面对保罗的气定神闲，肖恩的暴怒和谩骂只能使他越发受挫，形象地表现出位于政府公

共决策天平两端的富人和普通百姓悬殊的影响力，映射着美式民主在政治信任度、政治效能、政府回应性等多方面面临的危机。这便解释了肖恩在演讲时对评审团有悖事实的夸张演绎：

各位知道吗，评审团表决的当晚，他们在瑰西园喝着香槟王。当发现赢家是穆斯林时，他们说：“哇，太棒了，这正好可以告诉穆斯林，我们是他们的朋友，我们与穆斯林没有不和，伊斯兰教没对我们做过任何坏事。”（86）

通过丑化评审团形象，肖恩对高高在上的精英阶层极尽挖苦之能事。沙利文（Robert Sullivan）指出，肖恩的反应是他对精英政治脱离群众这一严重社会问题的抨击（48）。而肖恩可观的支持者也说明，当精英的决策悖逆于草根阶层的普遍利益时，肖恩只是不满美国民主现状的“沉默的大多数”的一员（谢韬 37）。但值得注意的是，肖恩并未能如愿摆脱精英政治设置的话语框架：毕特曼州长对他的公开支持说明肖恩对穆斯林建筑师的抗拒也无法使其摆脱成为精英们拉取政治选票的工具的命运。换言之，肖恩渴求的民主同时意味着对少数群体民主权利的漠视，其结果是对美式民主理念的另一种背离，体现了他对民主的单薄理解。

作为当代美国梦幻灭的生动写照，孟加拉裔非法移民阿斯玛以其悲剧人生进一步诠释着美式民主的幻象。亚当斯（James Truslow Adams）曾将美国梦定义为“每个人都有机会依据自己的能力或成就过上更好、更富足、更充实的生活”的国家梦想（214-15）。不同于东方主义话语中沉默、顺从的穆斯林女性，执着追梦的阿斯玛乐观、坚强。正是她鼓励丈夫伊南到世贸双塔工作，因为她坚信在那里工作“也意味着她和伊南的生活在往高处走”（Waldman 71）。随着双塔的倒塌，伊南就此化为尘埃。丈夫的非法移民身份，使阿斯玛领取抚恤金的过程遭遇重重困难，而伊南的遇难者身份一开始甚至无法得到美国官方承认。当涉及“9·11”纪念馆相关话题时，克莱尔和阿斯玛均关注着丈夫的名字。但不同于克莱尔为丈夫的名字该如何与纪念馆的整体风格更好地融合而焦灼，阿斯玛却因伊南的名字能否进入纪念馆而煎熬。在阿斯玛看来，“丈夫的名字进不了纪念馆 [……] 等于对他的存在进行了最后否定，似乎他只存活于她的想象中”（77）。这无疑是对她长期以来所信奉的美国梦的巨大打击。因此，当诸多与穆斯林相关的负面评价奔涌而来，当重重争议之声不断质疑穆的纪念馆设计资格时，对丈夫的爱和对美国的期待赋予了阿斯玛巨大的能量，促使她勇敢地站在聚光灯下声援《花园》。在她充满激情的话语中，阿斯玛将美国比作一座大花园，“所有人，不论是不是穆斯林皆可进入，共同成长”（231）。这使她超越穆斯林身份，成为全书一个更大范围内的隐喻，暗示美国社会长久存在的阶级与种族间的不公。而阿斯玛每况愈下的生存境遇也使自己逐渐明白了自己当初的天真：“她以为她在美国的自由无可限量，事实却并非如此。在美国，她的圈子比在家乡大，但仍有界限。她的发言冲撞界限，跨越界限，冒犯到了一些人。情形虽然和家乡完全不同，却也没有区别。”（252）被刺身亡的结局正是对她越界行为的惩罚。身着鸚鵡绿沙丽的阿斯玛如同向往自由的飞鸟，她的飘然而逝不止意味着个体生命的消逝，亦代表了试图通过拼搏赢取自我实现的边缘群体的美国

梦的夭折，是沃德曼从阶级、族裔等多个层面对美式民主现状的严厉质询。

三、美国穆斯林的后“9·11”身份认同困境

《屈服》的初稿完成不久，有消息称，有关单位将在距离世贸原址2个街区的地方建立一座伊斯兰文化中心，引起轩然大波。反对者将该文化中心讽喻为“归零地清真寺”（Ground Zero Mosque），认为它是对“9·11”遇难者及其家属的冒犯，是对“圣地”的侮辱。一时间，伊斯兰、穆斯林相关话题再次进入舆论中心，而沃德曼惊讶地发现公众的论战和她在《屈服》中所思所写何其相似，使她更加确信自己“行进在正确的轨道上”（Brown web）。文化中心事件后“9·11”美国对伊斯兰的敌意在《屈服》的纪念馆风波中也全然可见。伊斯兰是否等于恐怖主义？美国穆斯林是否是“我们”的一员？这类问题对后“9·11”美国国家特性的阐释尤为关键。通过描绘穆的身份认同困境，《屈服》展示了美国后“9·11”恐伊症的严峻形势，批判了主流话语中美国国家特性针对伊斯兰的排外性。

恐伊症（Islamophobia）首次以书面形式出现于1918年，但直至20世纪90年代，该词才因为巴以冲突、伊朗伊斯兰革命等一系列事件逐渐步入西方公众视野。格林（Todd H. Green）结合1997年“兰尼米德报告”（The Runnymede Report）中的相关定义，将恐伊症解释为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恐惧、厌恶、仇恨；同时他也强调该词蕴含的文化种族主义维度，即对他者基于宗教信仰、文化传统和种族的憎恶与敌意（9-33）。由于美国内在的欧陆传统和冷战以来与中东伊斯兰世界之间的长期纠葛，恐伊症在美国酝酿已久。“9·11”事件后，美国恐伊症急剧升级，不同程度的种族形象定性（racial profiling）和仇恨犯罪频发。据美国阿拉伯反歧视协会的调查数据显示，仅在“9·11”事件后9周内，美国各地便爆发了包含谋杀在内的逾700起针对穆斯林的仇恨犯罪（Love 90）。美国穆斯林更是首当其冲地沦为替罪羊。小说通过穆在恐怖袭击一周后接受机场问询的场景形象地刻画了后“9·11”美国的高压恐伊氛围：

“你爱美国吗，穆罕默德？”

[……]

“你对圣战作何感想？”

[……]

“认不认识想危害美国的穆斯林？”

[……]

“你相信炸死自己能上天堂吗？”（Waldman 25-26）

调查人员对穆发起的刻意刁难充分体现恐伊症症候下伊斯兰教被“落后、好战”的偏见均质化的艰难处境（Morey 2）。灰色的问询室和狭小的窗户更是将压迫感放大到极致，使穆斯林沦

为被怀疑、监视的“囚徒”。

洛夫(Erik Love)指出,美国的恐伊症呈现结构化、系统化、制度化等特征,并通过文化、政治与政策等各种方式表达(83)。换言之,美国后“9·11”恐伊症的爆发与主流话语的引导有脱不开的关系。一方面,尽管小布什政府大力倡导民众区分“好穆斯林”和“坏穆斯林”,但其对“敌人”的塑造依然基于流行文化和大众传媒过去20多年间将穆斯林、阿拉伯人、恐怖分子混为一谈的刻板印象(Merskin 171)。另一方面,为吸引眼球、制造公共戏剧(public drama; Monahan xii),报纸、电视、互联网充分利用其舆论引导力操纵公众对伊斯兰教的理解,为妖魔化穆斯林推波助澜。沃德曼多年的记者从业经历使她对恐伊症的话语建构性了然于胸。小说中,不论是提醒民众激进派伊斯兰主义者可能利用美国的民主与开放达到其意图的毕特曼州长、靠抨击伊斯兰教声名大噪的电视主持人路·沙吉,还是声称“伊斯兰教的问题在于伊斯兰教”的新闻记者阿丽莎,均以不同方式营造出一种无孔不入的恐伊氛围(Waldman 106),使本就在夹缝中求生存的美国穆斯林更加举步维艰。

与伊斯兰的关联注定了美国穆斯林身份的混杂性。在霍米·巴巴(Homi Bhabha)的后殖民批判话语中,混杂性与第三空间(Third Space)密切关联,二者均代表一种超越非此即彼的文化居间状态(in-between),是对文化本质主义的挑战。如果说穆在“9·11”之前曾试图掩盖自身的混杂性,机场问询室突然闯入脑海的《清真言》则开启了他探寻自我的脚步,而《花园》正是其试图构建的第三空间的物化表征。一方面,穆一再表示自己是出于对攻击事件的深刻感触和对消失双塔的“怀旧之情”设计《花园》的(Waldman 29);另一方面,其灵感也部分源自于他“9·11”后的喀布尔之行,尤其是他与巴布尔花园的偶遇。这座由果树、凉亭、水道装点而成的伊斯兰花园不止以其对称、秩序、几何之美为置身战乱与失序空间的穆提供了宁静与祥和之感,更是穆感受到伊斯兰文化的召唤之所。正如穆在宣礼声中不自觉地加入礼拜的举动所暗示的,于花园的暮色柔光中见证阿富汗人向真主虔诚俯身成为穆发掘自身穆斯林身份的重要节点。兼容伊斯兰美学与西方现代主义美学风格的《花园》因此成为穆勇敢面对身份杂糅性的理想投射空间。诚如他在听证会上所说,“《花园》的设计风格受多方影响,糅合了多种风格,因此更具美国特色”(218),它表达了穆对美国文化多元主义的理解。在穆看来,崇尚个人才能,不歧视姓名、宗教与出身正是美国精神的要义。但媒体报道非但没能理解穆的良苦用心,反而先以蒙面恐怖分子的配图将穆妖魔化,继而诤称《花园》是为伊斯兰极端分子而建的“烈士天堂”“凯旋花园”。这使穆成为“吊在半空任人闭眼打的皮纳塔”(81),陷入“我是谁”的身份认同困境。

与此同时,穆并未放弃争取承认的努力。雅钦(Amina Yaqin)和莫雷(Peter Morey)认为,当穆斯林认识到自己总是被某种难以名状的野蛮倾向定义时,他们很容易采取防御性的群体身份认同应对策略(转引自Keeble 173)。从喀布尔返美后穆开始蓄须,而在因《花园》站在舆论风口浪尖时穆开始尝试斋戒,这一切举动都是他的“权利宣言”,是他致力于改变公众对伊斯兰刻板印象、争取美国穆斯林公民权利的抗争行为。这也解释了穆为何一直拒绝声明自己的

宗教立场与竞稿动机：不论是逊尼派、什叶派、哈瓦比教派，还是“好穆斯林”“坏穆斯林”，都是社会试图加诸穆斯林群体的不同标签，而自称“温和派”并无益于消解公众对穆斯林的偏见，反而是向通过妖魔化伊斯兰重塑美国国家身份的主流话语的屈服。然而当外界的压力过于强大时，甚至连穆也不得不做出让步。听证会上，几经纠结剃去胡须的穆最终决定对《花园》的设计理念作出解释。结果，穆非但没能消除保守派和自由派美国人对其爱国心的疑虑，反而因对伊斯兰教的“亵渎”之言招致某些伊斯兰极端分子的通缉。当穆流着泪说，“或许我只应刮半边脸”，因为不管转向哪边，一定会冒犯到人时（Waldman 240），他曾满怀希望建构的充满理解、信任、和谐的第三空间理想彻底破灭，而他的痛苦与崩溃也预示着他四海为家却无以为家的尴尬结局。

穆的身份认同悲剧只是众多美国穆斯林生存现状的缩影。在后“9·11”美国的政治与文化高压下，调节美国穆斯林群体的身份认同内部生态已成为刻不容缓的社会命题。以穆为圆心，沃德曼对在恐伊症心理的驱动下刻板理解伊斯兰教，并将美国穆斯林排除在“我们”之外的美国国家特性的担忧可见一斑。

《屈服》以作为物质性文化符号的“归零地”纪念馆设计为中心，将隐藏于美国主流话语所致力于构建的“我们”的神话之下的遇难者家属与艺术家、精英与草根、白人与少数族裔、非穆斯林与穆斯林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一一呈现，以局外人般的清醒从多方面审视主流话语对美国国家特性的阐释。小说融合虚构文学与非虚构文学叙事技巧，凭借文学想象的深度与广度进一步开拓后“9·11”文学“集想象与反思于一体”的文学伦理价值（杨金才 4），展现了文学强大的反叙事功能。

引用文献 [Works Cited]

- Adams, James Truslow. *The Epic of America*.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31.
- Alexander, Jeffrey C. "Toward a Theory of Cultural Trauma." *Cultural Trauma and Collective Identity*, edited by Alexander, et al., U of California P, 2004, pp. 1-30.
- Bell, Lenore. *The "Other" in 9/11 Literature: If You See Something, Say Something*. Palgrave Macmillan, 2017.
- Brown, Jeffrey. "Conversation: Amy Waldman, Author of 'The Submission.'" *PBS News Hour*, 7 Sept. 2011, www.pbs.org/newshour/arts/conversation-amy-waldman-author-of-the-submission.
- Chen, Rong. "Gaze." *Keywords of Western Literary Criticism*, edited by Yifan Zhao, et al.,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2006, pp. 349-61. [陈榕：《凝视》，载赵一凡等编《西方文论关键词》（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第349-61页。]
- Chen, Yunqian. "Memorial Space and Social Memory." *Academic Monthly*, no. 7, 2012, pp. 134-37. [陈蕴茜：《纪念空间与社会记忆》，载《学术月刊》2012年第7期，第134-37页。]
- Coles, Roberta L. "War and the Contest over National Identity." *The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50, no. 4, 2002, pp. 587-609.
- Fukuyama, Francis. "The End of History?" *The National Interest*, no. 16, 1989, pp. 3-18.
- Gauthier, Tim. *9/11 Fiction, Empathy, and Otherness*. Lexington Books, 2015.
- Green, Todd H. *The Fear of Islam: An Introduction to Islamophobia in the West*. Fortress, 2015.
- Hall, Stuart, et al. *Policing the Crisis: Mugging, the State, and Law and Order*. Macmillan, 1978.

- Huntington, Samuel P. *Who are We?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 Translated by Kexiong Cheng. Xinhua, 2005. [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
- Hutcheson, John, et al. "U.S. National Identity, Political Elites, and a Patriotic Press Following September 11."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vol. 21, 2004, pp. 27-50.
- Jiang, Yihua. *Liberalism, Nationalism and National Identity*. Yang-Chih, 1998. [江宜桦:《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与国家认同》。台北: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
- Keeble, Arin. *The 9/11 Novel: Trauma, Politics and Identity*. McFarland, 2014.
- Love, Erik. *Islamophobia and Racism in America*. New York UP, 2017.
- Mei, Li. "A Review of *A Poetics of Trauma after 9/11: Representing Trauma in a Digital Present*." *Foreign Literature*, no. 3, 2019, pp. 161-68. [梅丽:《数字化时代的创伤叙事——评〈“9·11”之后的创伤诗学:数字化当下的创伤再现〉》,载《外国文学》2019年第3期,第161-68页。]
- Merskin, Debra. "The Construction of Arabs as Enemies: Post-September 11 Discourse of George W. Bush." *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vol. 7, no. 2, 2004, pp. 157-75.
- Monahan, Brian A. *The Shock of the News: Media Coverage and the Making of 9/11*. New York UP, 2010.
- Morey, Peter. *Islamophobia and the Novel*. Columbia UP, 2018.
- Morley, Catherine. "The Architecture of Memory and Memorialization in Amy Waldman's *The Submission*." *9/11: Topics in Contemporary North American Literature*, edited by Morley, Bloomsbury, 2016, pp. 185-200.
- Said, Edward. *Covering Islam: How the Media and the Experts Determine How We See the Rest of the World*. Translated by Jiyu Yan. Shanghai Translation, 2009. [萨义德:《报道伊斯兰:媒体与专家如何决定我们观看世界其他地方的方式》,阎纪宇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
- Sturken, Marita. *Tourists of History: Memory, Kitsch, and Consumerism from Oklahoma City to Ground Zero*. Duke UP, 2007.
- Sullivan, Robert. *Terrorizing Islam: Building American Identity in the 9/11 Novel*. Thesis. Salem State University, 2014.
- Tao, Dongfeng. "Cultural Trauma and Witnessing Literature." *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ism*, no. 5, 2011, pp. 10-15. [陶东风:《文化创伤与见证文学》,载《当代文坛》2011年第5期,第10-15页。]
- Waldman, Amy. *The Submission*.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1.
- Wang, Lixin. "The Formation of American National Identity and Its Effects on Foreign Affairs." *Historical Research*, no. 4, 2003, pp. 124-36, 191. [王立新:《美国国家认同的形成及其对美国外交的影响》,载《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第124-36,191页。]
- Xie, Tao. "From the End of History to the Decay of American Democracy." *Contemporary World*, no. 1, 2017, pp. 33-37. [谢韬:《从历史的终结到美国民主的衰败》,载《当代世界》2017年第1期,第33-37页。]
- Yang, Jincai. "Reflections on Post-9/11 Literary Studies." *New Perspectives on World Literature*, no. 3, 2013, pp. 4-5. [杨金才:《关于后“9·11”文学研究的几点思考》,载《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13年第3期,第4-5页。]

◇责任编辑:马妮娅

FLC

翻 译 研 究

华语地区《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中文译介对比研究

◎ 李雪伊

内容提要: 本文梳理和讨论英文儿童文学经典《爱丽丝漫游奇境记》在中国（包括中国大陆及港澳台）、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中文译介特征。对比发现，各华语国家和地区不同的政治历史形态及文学环境决定了《爱丽丝漫游奇境记》早期的文本流通和首个中译本的产生，《爱丽丝漫游奇境记》的译介数量、译介形态、译者特征也呈现出明显的地域性差异。文章认为，将经典大众化是各地《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中译的普遍趋势，但具体策略各有特色，值得互相借鉴，取长补短，以促进童书译制更好发展。

关键词: 华语地区 《爱丽丝漫游奇境记》 中文译介 儿童文学翻译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 (2021) 03-0085-09

基金项目: 深圳大学高水平大学二期建设项目 (860-0000020721)

作者单位: 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 广东 深圳 518060

DOI: 10.19967/j.cnki.flc.2021.03.009

Titl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 in the Chinese-Speaking Regions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 an English classic for children, published in the Chinese-speaking regions, i.e. mainland China, Taiwan, Hong Kong, Macau, Malaysia and Singapore. It finds that different political and historical situations and literary contexts have shaped the early circulated Chinese texts and the very first translation of *Alice* produced in each place. Translations of *Alice* have also shown regional features regarding the number of translations, the form of translated texts and the features of translators. Moreover, it is a shared trend in different places to translate *Alice* in a popular style aiming at a child audience. Drawing on each other's strengths may further improve the translation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Keywords: Chinese-speaking regions, *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 Chinese translations, translation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Author: Xueyi Li, Associate Researcher, English Department,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henzhen University, Shenzhen, Guangdong, China.

儿童文学作品《爱丽丝漫游奇境记》(*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 以下简称《爱丽丝》)由卡罗尔(Lewis Carroll)创作于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生动有趣的故事配以田尼尔爵士(Sir John Tenniel)为其量身绘制的插图,在1865年出版后畅销全英。作品既无生硬说教,也不空谈道理,被誉为“儿童文学革新之作”(O'Sullivan 61),是“儿童文学黄金时代的重要里程碑”(Watson 20)。华语地区对《爱丽丝》的关注始于晚清时期,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庄士敦(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曾口述爱丽丝的故事给他听,国学大师孙毓修在编译《欧美小说丛谈》时介绍了“大小说家”卡罗尔的童话故事(44),但直到1922年赵元任译本《阿丽思漫游奇境记》的出版,华语地区才拥有完整的《爱丽丝》译本。赵元任的白话文技巧高超,译本幽默风趣,周作人和郑振铎专门撰文推荐,商务出版社更是连年重印发行,以满足读者需求。此后20多年间,华语地区虽先后出现几个或全译或改写的译本,但都反响平平,远不及赵译本受欢迎程度,《阿丽思漫游奇境记》成为当时华语地区读者共同的《爱丽丝》记忆。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受交流所限,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的意识形态及文化心理逐渐出现差异;当时,分属英国和葡萄牙殖民管辖的香港、澳门社会,以及南洋的华语社群(本研究主要涉及1963年建国的马来西亚和1965年成立共和国的新加坡),亦都面临不同的社会境况。长久以来,这六个华语地区^[1]浸润于不同的人文环境,各自生发出独特的文学创作体系,儿童文学翻译亦展现出不同面貌。本文梳理和讨论1949年后《爱丽丝》在各华语地区的中文译介特征,借此探讨各地区童书译制的历史、现状及其成因。对《爱丽丝》的中文译介进行地域性对比,可了解各方所长,以互相借鉴,彼此参照,推动华语地区儿童文学翻译更好地发展。

一、《爱丽丝》翻译情况简述和译本界定

为详尽了解《爱丽丝》的翻译情况,笔者利用六个华语地区不同类型的图书数据库、网络图书平台、相关史料研究,搜集1950至2015年间《爱丽丝》的中文翻译信息。初步整合发现华语地区的《爱丽丝》中译呈现以下几个主要特点:第一,英中文本间的语际翻译是最主要的翻译类型,有少量由英文文本到中文视频、图片等其他媒体模态的符际翻译;第二,以卡罗尔所著《爱丽丝》为源文本创作的翻译为主体,亦有以《爱丽丝》的英文改写、改编、缩写等版本为源文本进行的中译;第三,根据其他语言版本转译而来的中文翻译和地方民族语言译文也见于市面;第四,《爱丽丝》新译本的制作发行和旧译本的重印再版一直不断,相同译本可能在多家出版社或多个华语地区发行。如此繁复而庞杂的翻译现象印证了《爱丽丝》在华语地区“独一无二的受欢迎程度”(Feng 187)。

为使对比更具针对性,笔者在整合上述信息的基础上,设定了以下两条译本筛选标准,对研究范围做出进一步界定:第一,译本是以卡罗尔所作《爱丽丝》为源文本进行的语际翻译;第二,译本和源文本具有一定对等性^[2];将符合标准的《爱丽丝》中译纳入主要研究范畴,以下均称为译本;标准以外的翻译作为辅助参考,如转译本,报刊连载的译文,非卡罗尔版《爱

丽丝》的中译本，有标题和出版记录但因馆藏丢失、信息缺乏、年代久远等原因无法判断来历的中文本等，以下统称为文本。为梳理译本信息，笔者先根据译者、出版责任人、页码、书籍规格等信息划分关联译本，按照出版时间、版次信息将译本进行排序，相同译本的重印、再版、异地发行不计入新译本数量，同时以译本首次出版所在地作为译本归属区域。经统计，1950至2015年间，华语地区共有334个《爱丽丝》中文译本，中国333本（其中大陆地区246本、台湾75本、香港12本、澳门0本），马来西亚1本，新加坡无当地制作的译本，数量为零^[3]。笔者将从各华语地区《爱丽丝》的中文首译本着手，考查首译本生成前后的文化社会语境，探讨各地《爱丽丝》中译体系建立的渊源。

二、《爱丽丝》早期文本流通和首译本生成

1950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对赵元任译本进行再版，此后至1980年，中国大陆地区既无新的《爱丽丝》译本面世，也不见已有译本的重印发行。这30年间，大陆地区的社会文化氛围剧烈变革，儿童文学翻译随之不断转向。五六十年代，在革命理想主义的国家叙事中，前苏联的“红色”文学作品成为童书中译的主要来源（王泉根，《现代中国儿童文学主潮》129-31）；而文革期间，童书翻译则一度停滞（134）。受意识形态和翻译现状的双重限制，英文儿童小说中译被迫暂停，《爱丽丝》在大陆文学语境中消失了30年。1981年3月，新疆人民出版社发行管绍淳和赵明菲合译的《爱丽丝漫游奇境记》，这是1950年后首个大陆地区的中文译本，结束了《爱丽丝》的缺席状态。此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译本的到来点燃了童书界的热情。在童话研究领域颇有建树的复旦大学教授赵景深为译本作序，同年，《读书》杂志第7期撰文向全国读者推介译本。此后，该译本获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儿童文学教研室认可，作为英国儿童文学经典翻译代表作入选《世界童话名著文库》丛书，由大陆第一个儿童类专业性出版社——新蕾出版社结集发行。《世界童话名著文库》丛书从策划到出版均由儿童文学专业人士完成，揽括众多国家的儿童文学译作，作品开放多元，出版系统有序，一改之前儿童文学翻译匮乏单一的局面，是80年代大陆地区最重要的儿童文学译介活动，对日后大陆的世界儿童文学交流活动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王泉根，《中外儿童文学交流综论》30）。由此可见，《爱丽丝》回归大陆的第一个中文译本意义重大，见证了新中国儿童文学翻译事业的变革。

台湾地区和大陆地区不同，最早的《爱丽丝》中文本见于50年代，包括1957年启明书局出版、标注为“启明书局编译”的《爱丽丝漫游奇境记》和1959年东方出版社发行、标注为“游弥彦编”的《阿丽思漫游奇境》。但这两本都不是英文直译而来，前者实为1936年何君莲译本的重印，后者经由日文本转译而来。刻意掩盖译者及翻译源头是当时特殊历史环境下的无奈之举。历经半个世纪日本殖民（1895—1945）的台湾社会通用日文，国民党接管后将推广国语作为当务之急（周有光164）。当时岛内读物短缺，为求平价快速地印制书籍，出版社便开始翻印来自大陆的旧书（蔡盛琦246），但国民政府以“反共”为由严查大陆书籍，出版社为求自保，

只好纷纷将作者以“本书编译局”进行署名，或不署名、署假名（赖慈芸，《埋名异乡五十载》52-53）。从上海迁至台湾的启明书局重印何君莲译本时，便刻意隐去真实译者，署名为“启明书局编译”。在推广国语的同时，国民党也大力提倡“去日本化”，以去除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影响。创社于台湾的东方出版社自始秉持让儿童认识中国文字的初衷，发行各类儿童书籍也旨在“为护卫历史文化而战，为复兴中华民族而战”（赖慈芸，《被遗忘的功臣》43），但迫于刊物短缺，社员不得不“四处从地摊收购大量日本人撤退时拍卖的日文书籍”，以“作编辑参考书”（邱各容、林文宝 26）。所以东方早期的儿童翻译作品多为刻意隐藏日文源头的日文转译本（赖慈芸，《被遗忘的功臣》19-21），包括 1959 年的《阿丽思漫游奇境》，将出版社长游弥坚作为书籍编辑而非写明日语来源旨在消除政治隐患。台湾首个《爱丽丝》中文译本是 1962 年由大众书局出版、汪祖培编著的《爱丽斯梦游仙境》，但读者接受度一般，未引起译界和学界关注。

香港地区最早印制的《爱丽丝》中文本也见于 50 年代，是 1948 年刘之根译注的《阿丽思漫游记》的重印本，由三民出版社发行。当时的香港汇集大批因战乱南下的文人，各大报章的儿童副刊蓬勃发展，不少外国儿童文学故事的中译连载见刊。半月刊《儿童乐园》曾刊登《爱丽丝》的中文故事，但该刊长期参考日语的《小学馆》杂志进行故事改写（霍玉英 142），笔者推断其《爱丽丝》大概也由日语转译而成。《爱丽丝》的香港首译诞生于 60 年代，分别是碧辉出版社译述的《爱丽斯梦游仙境》和小学生从业出版社出版、由梅绮丽翻译的《阿丽思梦游仙境》。由于译本均未明确标注出版年份，两个出版社也早已歇业，难以断定两本的先后顺序。当时的香港经济腾飞，两岸民间交流也频繁在此进行，无形中带动本地儿童书籍的流通；又因东南亚地区依赖港供童书满足旺盛的市场需求，香港的儿童图书行业迅速发展。童书出版公司纷纷成立，本土原创和文学翻译同步前进，“根据外国儿童文学翻译或改写”的儿童图书多见于市面（周蜜蜜 3），这些都是有利于《爱丽丝》首译面世的客观条件。

自清朝开始，南洋的华语社群一直使用从中国进口的儿童书籍，1958 年的“禁书令”^[4]虽阻断中国大陆地区对马来亚的图书供给（禩素薇 168），由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引进的童书则快速填补了巨大的市场缺口，所以马来亚本地的儿童文学创作一直动力不足，未有长足发展（179）。80 年代，随着马来西亚华语教育危机的出现和当地印刷出版技术的提高，华族加大对儿童图书的重视，格外刺激了当地创作中文儿童读物的热情。1986 年南洋出版社发行的儿童读本《阿丽思的梦境》虽是最早的《爱丽丝》文本，但实为借“阿丽思”之名进行的故事原创，由台湾地区原版引进的《爱丽丝》译本仍是八九十年代马来西亚流传较广的版本。2000 年以后，马来西亚的市面上陆续出现不少当地创作的《爱丽丝》文本，如彩虹出版社的《爱丽斯梦游仙境》、小太阳出版社的《爱丽斯梦游仙境》，等等，但通过源文本溯源和实际文本比对，笔者发现唯有 2003 年辉杨出版社发行的《爱丽斯梦游仙境》符合译本标准。译本发行后，新加坡《联合早报》2003 年 9 月 7 日的“新到图书”栏目专门给予推荐，足证此译本在新马地区较高的认可度。

1949 年后，各个华语地区历经政治形态流变，迥然相异的文学生态环境应运而生，造就了《爱丽丝》不同的文本流传路径和首译本生成特点。大陆的首译正值儿童文学翻译体系由封

闭走向多元，特殊的历史节点赋予其特殊的历史意义；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的首译面世前，都曾重印中国大陆而来的旧译本，也曾转译日语本，为两地的共同特色；马来西亚的华语社群地理上远离中国，但儿童译作长期依赖中国港台地区供应，形成稳定的交流和接受机制。由此看来，彼时的华语地区虽受地域和政治导向阻隔，儿童文学翻译却借由各种契机和巧合突破藩篱，保持着较为频繁的互动。首译出版后，《爱丽丝》在不同华语地区的译介发展相对独立，在数量、形态、译者三个方面特色各异，但亦有相似之处。

三、《爱丽丝》中文译介对比分析

（一）译介数量

随着八九十年代中国大陆地区儿童观念的进步，图书出版领域意识到儿童群体特殊的阅读需求，开始大批译制面向儿童的文学作品（高璐夷 104）。受市场需求驱动，大陆地区《爱丽丝》中文译本数量逐渐增加，80年代有3本面世，90年代几乎年年都有新出译本。2000年前后《哈利·波特》系列畅销全国，“以翻译作品为主的儿童幻想小说开始在中国真正‘火’了起来”，推动译制工作繁荣发展（卢宁 14）。同为儿童奇幻小说的《爱丽丝》也受到青睐，2001年后每年新增翻译10本左右，2009年后每年新增译本超过20本。新出译本不断，旧译本的再版也在继续，如此高频率的译本更新和重印不仅是市场需求的结果，更为出版利益驱动所致。由于国内原创儿童读物发展缓慢，质量参差不齐，翻译高品质的外国童书可降低成本，让书商在响应市场的同时实现利润最大化（吴丽蓉、陈俊宇）。尤其是《爱丽丝》这类早已进入公有领域的儿童经典，版权使用无任何限制，一时间，出版社纷纷效仿，推动《爱丽丝》译介数量节节攀升。

台湾的童书需求量不比大陆，故译本总体数量少；和复译不断攀升的大陆译本相比，台湾的《爱丽丝》译本增长较为稳定，70年代共有5个新译本面世，80年代后，除1992年出版6个新译本外，其他年度的新出译介数量都保持在2本上下，旧译本的重印和再版频次均较大陆低。台湾社会对儿童群体的认知较大陆发展得早，70年代，台湾教育事务主管部门就专设研究班培养儿童文学写作的中坚人才，部分财团法人设立儿童文学写作奖，以鼓舞民间创作热情（邱各容、林文宝 160-61）。官方和民间共同发力，使台湾儿童文学原创力量的储备相对雄厚，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儿童读物对译作的依赖程度。

香港地区的《爱丽丝》译介数存在年代间差异，20世纪80年代和2000年后各有4个新出译本，20世纪60年代有2本、70和90年代各1本，鲜有旧译本重印。相较其他华语地区，香港高度的国际化程度和中英双语通用能力为翻译行业提供良好的发展空间，但浓重的商业气息和人才的频繁流动则在特定环境下阻碍了儿童文学翻译的发展。经济腾飞后的香港社会繁荣，市场利润颇高的漫画连载书刊为出版商所追逐，一度成为70年代主流的儿童读物，文学市场萎缩。此种环境下，70年代，《爱丽丝》只有1本翻译出版；90年代，面对回归后的不确定性，一批儿童图书从业者陆续移民离港，文学创作情势低迷，各大儿童杂志相继停刊（张永

健 657), 童书翻译亦受牵连,《爱丽丝》的译制也顺势减少。而 20 世纪 80 年代和 2000 年后的香港社会环境安稳, 儿童文学创作丰富多样,《爱丽丝》的中文译介随之增多。

马来西亚只有一本当地创作发行的《爱丽丝》中译, 且无再版, 这和当地儿童文学的发展导向不无关系。一是马来西亚的华语儿童读物长期依赖其他地区供给, 本土创作力量未能充分发展; 二是自 60 年代起, 为促进民族团结及和谐共生, 马来西亚的儿童文学更注重当地不同族裔语言之间的互译, 如, 把马来文作品译为华文, 供华族儿童阅读, 帮助他们学习了解其他族群的传统和文化(叶健 1-32)。大概因为《爱丽丝》所描绘的奇境旅行故事既无关马来西亚本土意识, 也不属于任何族裔语言, 所以未受当地书商关注。

整体来看,《爱丽丝》译介的次数及变化趋势均受制于华语地区童书创作的发展水平。与此同时, 大陆地区的书商利益、香港地区的童书行业波动、马来西亚地区的民族意识是各地域独特的童书翻译制约因素, 共同决定了《爱丽丝》中文翻译的数量和频次。

(二) 译介形态

大陆地区的《爱丽丝》译介形态显现 3 个明显的特点。第一, 译文由全译转变为非全译。80 年代的 3 个译本都是全译, 90 年代后出现编译、改编、改写、编著等 20 余种非全译形态, 2000 年后非全译占比超过全译, 成为《爱丽丝》译介的主导形态。第二, 译本的文内元素日渐多元, 新译本频繁使用导读、结语、注解、汉语拼音; 田尼尔的黑白插图不再是译文的固定搭配, 取而代之的是各式各样的彩色图画, 由翻译出版方指定绘制。第三, 把《爱丽丝》中译本编入儿童文学作品丛书系列进行推介发行, 不同的丛书名目对应不同的翻译附加内容。在文学和童话相关系列中, 为译文添加故事人物简介、故事导读、故事情节说明等板块, 并使用全新彩色图画是常见配置, 例如“世界著名童话精选”“世界儿童文学珍藏”等; 2001 年后显著增加的课程系列丛书, 如“语文新课标必读”和“小学生课外必读”等, 更注重为《爱丽丝》中译本搭配内容导读、汉语拼音、生词解释、阅读习题、写作引导等内容; 英汉对照系列也陆续出现, 译本呈现英文原文外, 不乏英文单词、词组的注解, 以及语言知识点测验。

台湾地区的译介形态和大陆同中有异。首先,《爱丽丝》全译本和多种形态的非全译本见于市面, 但和大陆非全译占比逐年升高的趋势不同, 台湾的非全译一直占据较高比例, 是《爱丽丝》译介形态的主导。其次, 台湾的译本同以引言、结语、文内注解等为常见的翻译附加内容, 除启用当地插画家为译本制图, 不少台湾译本也直接选用海外插画名家绘制的《爱丽丝》插画, 如日本绘本作家平田昭吾的插图、英国著名儿童插画家布朗(Anthony Browne)的插图等等。再次,《爱丽丝》的丛书化编排同是台湾惯用的译本出版方式, 和大陆几个系列齐头并进的情形不同, 文学和童话系列在台湾独占鳌头, 课程、英汉对照等系列仅是个别点缀。2013 年后,《爱丽丝》的中文译介出现以欧育兰和蕾婷的原创漫画译本为代表的动漫卡通系列, 这种以图为主、以文为辅的翻译类别为台湾地区所独有。

香港地区的《爱丽丝》都是配以彩色插图的非全译本, 普遍篇幅短小、内容简单, 这是香

港儿童读物在快节奏的商业社会中形成的惯有格局(周蜜蜜 166)。马来西亚唯一译本的中译形态和香港类似,字数不多,行文简单。入编丛书发行同为两地惯例,文学和童话系列较为常见。

从《爱丽丝》的中文译介形态来看,华语地区的翻译普遍采用自由多样的翻译策略和方法,丰富多样的译本内容为阅读增添乐趣,入编丛书是四个地区共同的推介策略,译本的文学价值和童话属性也是推介的共同追求。但相比之下,大陆地区翻译的教育目的尤为突出,不同类型的导言、说明、解释性文本为儿童读者挖掘《爱丽丝》的意义与价值,以期帮助他们提升文学阅读和故事理解能力;丛书推介更直接关联学校课程要求,旨在实现对学校教育的完善和补充。

(三) 译者特征

大陆地区 246 个《爱丽丝》中译本的译者特征归纳如下:第一,译者信息看似清楚实则模糊。从译本所提供的信息来看,绝大部分译者姓氏清楚、分工明晰,共有 228 本在译本封面、序言、尾页等地方标注译者姓名和责任分工。但深入译本内容后发现译者信息常有出入。例如,2000 年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艾丽丝漫游奇境记》译者为雨笠,2004 年此译本由相同出版社重印,译本内容保持不变,但译者却变为陈征一;又如,2006 年希望出版社发行石延博编译的《爱丽斯漫游奇境》,2010 年青岛出版社重印此译本时,石延博的翻译策略则变成了译写。诸如此类不甚明朗之处不在少数,由此推断,《爱丽丝》的大陆译本或存伪译和假译。第二,随着时间推移,译者身份发生变化。八九十年代的译者包括知名译学家(如贾文渊和吴钧陶)、高校外语教师(如朱洪国),以及长期从事文学译介的专业人士(如陈复庵);2001 年后的译者多为默默无闻的译坛实践者,难以判定其是否具备翻译相关背景和工作经验。

台湾地区的译者特征与大陆差异稍大:第一,75 个《爱丽丝》译本中有 69 本在封面、封尾或序言等处标明译者信息,虽标识明朗度与大陆译本不相上下,但译本重印和再发行时,台湾译本更忠实首版信息,极少出现译者责任的混淆与变更。第二,和大陆译者身份的逐渐模糊不同,台湾的译者信息慢慢增多且更加清晰。不少译本随附译者介绍,并提供译者作品名录,译者以长期从事儿童文学创作的译作家(如林满秋、岭月、刘思源)、高校外语专业的教师和学生(如陈丽芳和李艳惠)及潜心研究《爱丽丝》故事并付诸翻译实践的资深文学爱好者(如张华)为主。

《爱丽丝》的 12 本香港译本中有 8 本明确了译者信息,8 人中唯宋诒瑞是香港地区的儿童文学译作家,为童书翻译专业人士,其他译者和大陆译者情况类似,只见姓名,无其他相关从业经验可寻。马来西亚译本为独立译者所作,译本内页提供明确的译者姓名,但无其他相关介绍。

综上所述,4 个华语地区译本中,台湾地区的译者信息最为确实,且专业化素养最高。这主要得益于童书创作行业的高度繁荣,吸引了大批专业译作家和业余爱好者加入,儿童文学翻译从业者的社会认可度普遍较高,更促使经验丰富的译者长期积极参与童书译制。大陆、香港地区和马来西亚的译者同以普通译界人士为主,但原因不一。面对译本需求量的急速增加,大陆地区的童书译制和出版难免有不规范之处,套用、滥用他人文本的现象时有发生,客观上增添了《爱丽丝》译者信息的模糊度;又因儿童文学仍处于文学体系较为边缘的地位,其译制工

作不如其他文类受重视，难以保证译者的专业程度。香港地区和马来西亚两地译者的默默无闻大概和当地《爱丽丝》译介无全译、重图画的特点有关，翻译需处理的文字篇幅小，工作量少，所以无需过分投入精力找寻专业译者，具备一定资质的文字工作者足以应对译本创作需求。

继《爱丽丝》首译本面世后，各华语地区逐渐建立和发展出特色各异的《爱丽丝》中文译介机制。大陆地区层出不穷的《爱丽丝》新译本得益于迅速增长的童书市场和儿童观念的日趋进步，蓬勃发展的译制工作不断丰富和更新儿童读者对该作品的理解和认知。然而繁荣背后亦存在问题。首先，部分译本粗制滥造，部分译者专业素养缺乏，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爱丽丝》的阅读价值。质量不高的译本不仅无法准确把握原文的韵律和节奏，读来“横生梗塞之感”，更普遍存在“不太应该”的漏译、错译，必然会“误导读者，剥夺其本应有的阅读幸福感”（徐德荣、江建利 102-103）。其次，多数译本打着教育的幌子，层层叠加的译本内容将《爱丽丝》包裹成认图识字的工具书，抑或是锻炼理解能力或提高英文能力的文本，掩盖了原著重要的文学和美学价值。相比之下，《爱丽丝》在台湾地区虽于 50 年代出现伪译现象，但此后随着当地整体童书创作水平的提高和从业者专业素质的增强，作品译制的质量得到较好保证，作品的推介也较为有序。香港地区和马来西亚对中文童书译作的需求较小，且更青睐篇幅短小、图文并茂的《爱丽丝》译本，译制中规中矩。

尽管华语地区的《爱丽丝》中文译介存在地域性差异，从非全译形态普遍占比较高这点来看，将经典大众化是相同的跨地域性翻译趋势——非全译本长度短，降低儿童的阅读难度，彩色插图的配制增添阅读乐趣，这种根据目标读者进行的改变，降低了原有故事的阅读门槛，更便于儿童读者接受，可实现经典故事的普及和传播。和忠实原著相比，华语地区《爱丽丝》的译介更忠实于儿童读者的阅读需求，原著不再被视作高高在上的权威，翻译对其进行了本地化的编排，使其转化为符合当地语境的中文读物。

注释 [Notes]

- [1] 由于研究时间和精力有限，本文的研究范围暂限定为此六个地理位置接近且华语文化浓厚的地区，未囊括其他使用华语的地区。
- [2] 谭载喜认为“构成翻译的两个最基本的‘绝对’条件，一是‘转换’，一是目标文本与源文本之间的‘对等性’”（13-15）。转换是指“目标文本由特定源文本转换而来”（13），笔者依据这一条件规定卡罗尔所作《爱丽丝》为源文本；对等性是指“目标文本和源文本之间必须有一定相似性”（17），“最高的‘对等度’仅低于百分之百，最低的‘对等度’则必定大于零”（19），这是笔者制定译本筛选原则二的依据，即译本必须和卡罗尔的《爱丽丝》具备介于 0 到 100% 之间的对等性。
- [3] 中国澳门和新加坡无本地译本，两地通用的方法是原版引进其他华语地区的《爱丽丝》中文译本。澳门较多使用繁体字印制的台湾译本，兼顾使用香港和大陆译本；新加坡以引进大陆的简体字译本为主。
- [4] 1958 年，为杜绝共产主义思想传播，马来亚联合邦政府（此时马来西亚未建国，故称之为马来亚联合邦政府）下令禁止 50 家中国大陆地区出版社的出版物在马销售，包括少年儿童出版社等多家少儿专业社（裾素薇 168）。

引用文献 [Works Cited]

- Cai, Shengqi. "The Publishing of Books at the Early Stage of the Post-War Era: 1945-1949." *Journal of Sinology*, no. 5, 2015,

- pp. 209-51. [蔡盛琦:《战后初期台湾的图书出版——1945至1949年》,载《国学馆学术集刊》2005年第5期,第209-51页。]
- Chau, Mat Mat, editor. *Hong Kong Children in the Past 100 Years: Exploring Children's Literature in Hong Kong (1960s-1990s)*. Ming Pao Publications, 1996. [周蜜蜜编:《香江儿童话百年:香港儿童文学探源(六十至九十年代)》。香港:明报出版社,1996。]
- Chiu, Ko-Jung and Wen-Bao Lin. *History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in Taiwan*. Wu-Nan Book, 2005. [邱各容、林文宝:《台湾儿童文学史》。台北:五南图书出版,2005。]
- Feng, Zongxin. "Alice in Chinese Translation." *Alice in a World of Wonderlands: The Translations of Lewis Carroll's Masterpiece*, edited by Jon. Lindseth and Alan Tannenbaum. Oak Knoll, 2015, pp. 187-98.
- Fok, Yuk Ying. "Reconstruction of Imag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Picture Books in Hong Kong's *Children's Paradise*." *China Children's Culture*, 2011, pp. 142-64. [霍玉英:《图像重构:香港〈儿童乐园〉图画书的转化》,载《中国儿童文化》2011年,第142-64页。]
- Gao, Luyi. "A Hundred Year of Translations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Publishing and Distribution Research*, no. 3, 2017, pp. 102-105. [高璐夷:《百余年儿童文学翻译之索隐》,载《出版发行研究》2017年第3期,第102-105页。]
- Lai, Tzu-yun. "Forgotten Contributors: On the Japanese Adaptors Behind Taiwan's Dongfang Publisher."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in East Asia*, no. 8, 2015, pp. 9-50. [赖慈芸:《被遗忘的功臣:东方出版社背后的日文改写者》,载《东亚观念史集刊》2015年8期,第9-50页。]
- . "Invisible for 50 Years: Chinese Translations in Taiwan." *East Journal of Translation*, no.1, 2013, pp. 49-58. [赖慈芸:《埋名异乡五十载——大陆译作在台湾》,载《东方翻译》2013年第1期,第49-58页。]
- Lu, Ning. "An Analysis of the Translation of English Children's Fantasy Novels in China." *East Journal of Translation*, no. 3, 2020, pp. 6-15. [卢宁:《英语儿童幻想小说在中国的译介与分析》,载《东方翻译》2020年第3期,第6-15页。]
- O'Sullivan, Emer.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Scarecrow, 2010.
- Sian, Suk Wee. *Malaysian Chinese Children's Literature: Cultural Continuity and Localism*. The Youth Book Corporation, 2006. [禩素薇:《马华儿童文学研究:文化传承与本土色彩》。新加坡:新加坡青年书局,2006。]
- Sun, Yuxiu. "Discussions of European and American Novels: A Sequel." *The Short Story Magazine*, no. 6, 1913, pp. 35-46. [孙毓修:《欧美小说丛谈续编》,载《小说月报》1913年第6期,第35-46页。]
- Tan, Zaixi.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Perceptions, Perspectives and Methodology*. China Translation & Publishing Corporation, 2012. [谭载喜:《翻译与翻译研究概论——认知·视角·课题》。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12。]
- Wang, Quangen. *Major Trends of Modern Chinese Children's Literature*. Chongqing Publishing, 2000. [王泉根:《现代中国儿童文学主潮》。重庆:重庆出版社,2000。]
- . "A Synthetic View on the Exchange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hildren's Literature in the Latter Part of the 20th Century." *Journal of Fuling Teachers College*, no. 2, 2004, pp. 28-37. [王泉根:《20世纪下半叶中外儿童文学交流综论》,载《涪陵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第28-37页。]
- Watson, Victor, editor. *The Cambridge Guide to Children's Books in English*. Cambridge UP, 2001.
- Wu, Lirong, and Junyu Chen. "Children's Books Publishing into the Blue Ocean Era: What Led to the Lack of Originality?" *Workers' Daily*, 11 May 2018. [吴丽蓉、陈俊宇:《童书出版进入“蓝海时代”:什么导致原创能力不足?》,载《工人日报》2018年5月11日。]
- Xu, Derong, and Jianli Jiang. "A Study on the Retranslation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Classics: A Case Study of *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 *Journal of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Social Sciences)*, no. 6, 2012, pp.100-05. [徐德荣、江建利:《儿童文学经典复译研究——以〈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为例》,载《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第100-05页。]
- Ye, Jian. *Translation, Introduction and Exchange of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Professional Publishing, 1986. [叶健:《华马文学的译介与交流》。怡保:专业出版社,1986。]
- Zhang, Yongjian, editor. *History of Chinese Children's Literature in the 20th Century*. Liaoning Children's Publishing, 2006. [张永健编:《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史》。沈阳: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2006。]
- Zhou, Youguang. *New Languages in the New Era: Language Developments in the Post-War Emerging Countries*.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1999. [周有光:《新时代的新语文:战后新兴国家的语文新发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论成长小说翻译中的文学性再造

◎ 黄佳佳 徐德荣

内容提要: 成长小说的文学性在翻译中的再造对于小说独特的价值体验与精神内涵的传达至关重要。笔者以符号学意义观为切入点, 提出文学性产生于文本语言符号意义的建构, 继而将文学性界定为能够创造审美愉悦效果的意义集合体, 并由此出发探讨如何通过语言符号多重意义的充分再现实现成长小说翻译中文学性的再造。本文认为译者应遵循儿童文学翻译的等效原则, 以符合读者视域的目标语言, 实现原语符号意义的全面再生, 最大限度再造成长小说的文学性。

关键词: 成长小说 文学性 社会符号学 意义 儿童文学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 (2021) 03-0094-12

基金项目: 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儿童文学跨学科拓展研究”(19JZD036)

作者单位: 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 山东 青岛 266100

DOI: 10.19967/j.cnki.flc.2021.03.010

Title: The Re-creation of Literariness in the Translation of Bildungsroman

Abstract: As a special literary form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the re-creation of literariness in the translation of Bildungsroman is crucial to the expression of its unique value and profound connotations. From a semiotic perspective,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literariness arises from the construction of linguistic symbolic meanings of texts, and defines it as a collection of meanings that can create aesthetic pleasure. It then discusses how literariness can be possibly recreated in the reproduction of multiple meanings of linguistic symbols in the translation of Bildungsroman. It is believed that translators should follow the principle of equivalence in children's literature translation and realize the comprehensive reproduction of the symbolic meanings of the source language in the target language that fits the readers' vision, so as to recreate the literariness of the Bildungsroman to the maximum extent.

Keywords: Bildungsroman, literariness, socio-semiotics, meaning, children's literature

Author: Jiajia Huang,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Shandong, China; Derong Xu, Professor,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Shandong, China.

成长小说的翻译兼具重要性与特殊性。成长小说属于写实儿童文学，呈现儿童的成长过程及状态，一部优秀成长小说对儿童（青少年）读者的人生态度、价值观念影响极其深远。与一般成人小说不同，成长小说作为儿童文学，其自身的文学特质不容忽视。成长小说翻译研究中少有对其文学性再造的讨论，而忽视儿童文学不同文体特质在翻译中的再造，则不能实现原作特定的文学效果及其意旨。笔者从社会符号学的意义观出发，对成长小说的文学性特质进行界定，并以儿童成长小说《绿山墙的安妮》马爱农译本和邓少勉译本为例，考察两译本在文学性再造方面的得与失，归纳成长小说翻译中文学性再造的原则与策略。

一、理解“文学性”

自雅各布森提出“文学性”概念，“文学性”便成为20世纪西方文论的关键词。雅各布森认为文学研究的对象不是文学整体，而是“文学性”，也就是使文学成为文学的特性，力图使文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的学科，进而进行文学理论的建构。事实上，20世纪西方思想史的语言学转向以及文学研究中语言学理论的介入为这一概念提供了思想及理论基础。其中，索绪尔的现代语言学理论更是功不可没。索绪尔将语言视为独立自足的结构系统，提出了“语言”和“言语”“能指”和“所指”等一系列抽象的概念和术语，语言也因此成为独立的研究对象。而“所谓的‘文学性’问题，正是根据语言学的方法和模式提出并进行分析的”（李龙13）。于是从俄国形式主义文学理论开始，便将文学研究诉诸于语言学，提出“文学性”问题，建立一种新的文学理论研究范式，后来的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文学理论都在“文学性”内涵的阐释中追随着这一范式。俄国形式主义认为，“文学性”是将作为“材料”的语言本身组织成文学作品的程序、手法、技巧。他们认为文学作品（诗歌）中的语词是独立的，没有任何外在指涉，“那么，将这些指向自身的语词有效地组织到文学作品中来的艺术手段和程序就值得研究。这些手段包括：辞格、时空游戏、独特的词汇、句子构造、修饰语、谐音、同义和同音以及押韵等”（40）。在形式主义看来，文学语言不具有指称性，语词就是语词自身，文学具有独立性和自足性。随后，在结构主义那里，“文学性”成为“文学的抽象结构形式”（80），即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具有普遍意义的抽象结构，这一结构程式为作品成为文学作品提供可能性。他们试图说明意义的产生过程，而非对意义的挖掘。可以看到，在语言结构系统内部，结构主义对“文学性”概念的阐释更加追求科学化、抽象化，使得“文学性”的构成要素变成了没有生气的语言、符号和结构。而解构主义也接受索绪尔的语言学影响，将语言视为符号系统，解构主义理论家德曼（Paul de Man）认为修辞性是语言的根源和实质，“文学性”是“语言的修辞功能而非审美功能，是一种可以辨明的、在能指的层面运作的比喻（双关语），它并不负责阐明世界的本质——尽管其潜力能够创造相反的幻觉”（李龙177）。德曼在修辞学中理解“文学性”，这一说法也告诉我们语言并非透明的，这与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的文学理论的语言学转向具有内在的连续性。至此，关于“文学性”问题的讨论告一段落。在语言学的理论语境内，“文

学性”的定义也不断更新变化，可以确定的是，不同阶段的探索都循着语言学模式，将语言系统化、结构化、符号化，使得他们的讨论禁锢在封闭的自给自足的语言结构系统中，具有排他性，这正体现了其要建立文学科学的初衷。与此同时，也让人不禁质疑，语言自身成为研究对象，是否能说明一切问题。毫无疑问，本质上，他们对“文学性”的阐释具有极大的科学性及合理性，但从纯粹的语言维度理解“文学性”，不免走向极端化和绝对化，这样“文学性”问题最终也难免失去其意义。

对此，国内学者也提出自己的理解。史忠义认为西方学者对“文学性”定义的绝对追求包含着“明显的形而上学和教条主义”（126），应该以宏观、开放的态度予以界定，他认为“文学性存在于话语从表达、叙述、描写、意象、象征、结构、功能以及审美处理等方面的普遍升华之中，存在于形象思维之中。形象思维和文学幻想、多义性和暧昧性是文学性最基本的特征”（127）。此外，刘淮南认为俄国形式主义等将文艺学与语言学研究对象混淆，着重关注语言以及形式研究是其局限性所在。从汉语文学的角度，他提出文学性“主要是表现在文学的内容方面，或者说是文学文本在内容与形式的结合中体现出来的特性及其层次”（21），“认为文学性即文学的价值性”（24），并提出了文学的“文学性”以及非文学的“文学性”。学者童庆炳从美学角度提出“审美性就是我们所理解的文学性”（57），这种审美性在文学语言文本中体现为“气息”“氛围”“情调”“韵律”和“色泽”。

综上，西方文论界在语言学模式下，执着于从语言、形式、结构中寻找“文学性”的影子，而国内学者则以语言文字为依托，在传统审美和感性思维中认识文学性，认为“文学性”源于形式，止于内涵，倾向于从语言的审美属性以及创作者自我表达的维度探索文学作品的属性。这样看来，西方学界对文学性的探索秉持的是一元论观点，对“文学性”问题的回答仅仅诉诸于语言本体，进行纯理论的抽象化研究；而国内学者则尝试从多元角度，承认语言的本体性，强调创作者的能动性并说明其在文本中的具体体现。不难发现，他们的共性在于都回归文学构成的物质基础——语言，从这一层面上来看，西方学者对“文学性”的语言学探讨仍有诸多可圈可点之处，如结构主义想要探讨文学背后的结构和程式，他们深入语言系统内部，旨在寻找构成“文学性”的程序、特质、机制等。而国内学者则在不同理论背景下关注作品或者创作者如何表现“文学性”，都以语言为基点，西方关注如何产生或产生的过程，国内更加注重如何表现或以何种方式存在于具体文学中。“文学性”产生的机制让我们可以科学地认识文学作品，其表现让我们可以获得审美愉悦。但是，可以试想一下，如果一部作品经过分析，具有“文学性”程式和技法，语言表层和内涵上也表现得极其丰富，而其读者却全然不知，那么，其意义又如何定位呢？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在自我建立的文学语言系统中讨论“文学性”如何产生，寻找意义产生的过程和方式，在他们的描述中，语言构建的是了无生气的符号世界，并非真实的世界，在这样一个自给自足的封闭世界里，所谓的意义也仅仅是向语言符号自身寻找，但意义岂能自我实现呢？显然这是索绪尔现代语言学理论深刻影响的结果。1957年，《文艺学报》刊登钱谷融先生《论“文学是人学”》一文，重新厘清文学的任务——“以表现人为出发点”（陈晓

明 29), 文学创作是人介入的结果, 文学价值和意义的最终实现自然也需要人的参与, 而这正是 20 世纪西方学者寻求文学性奥秘时少有关注的问题。没有了人, 我们难以认清语言符号的意义所在, 也就无从体会语言符号意义中产生的效果。我们不否认“文学性”的产生需要某种机制或程式, 但也不可忽视文学作品的出发点正是创作者本人, 而落脚点也在于读者本人, 再完美的机制若是无法触发人们对文学性的审美体验, 或者说未被感知, 那么, “文学性”就是无意义的, 无效的, 甚至是不存在的。因此, 笔者认为, “文学性”是语言机制, 是人参与其中发挥作用的机制, 也是效果和意义的产生机制, 这种机制中蕴含“文学性”的可能、潜势和效果。

20 世纪的西方文学深受索绪尔语言学及其构建的符号系统的影响, 未能有效揭示作为意义创造者的人的作用。文学作品中的语言符号并非独立透明的, 在作者的选择和使用中早已被赋予丰富充实的意义, 这才具备产生文学效果的可能。在符号学研究中, 社会符号学研究一切人类符号, 它对语言的分析不再从以往的“文本和语言结构出发”, 而是“从社会结构和社会过程、信息和意义出发”(陈宏薇, 《社会符号学翻译法研究》89), 社会符号学解决了人与符号学的关系, 将人纳入意义的产生过程, 重视文学作品语言产生的意义和效果。其中, 莫里斯(Charles Morris)提出了“符号学的三方面意义, 即形式意义(符号与其它符号的关系)、存在意义(符号与所指对象之间的关系)与实用意义(符号与解释者的关系)”(陈宏薇, 《汉英翻译基础》58-59), 将这种符号学意义观运用到语言研究中, 就有了语言符号的三方面意义: 言内意义(体现符号之间的关系)、指称意义(体现符号与所指对象之间的关系)、语用意义(体现符号与解释者之间的关系), 这三种意义构成社会符号学的意义观。简言之, 社会符号学的意义观下, 语言不再是表层的客观存在的, 无生气的程式化结构, 而是鲜活的, 有生命力的实体, 而这鲜活的生命力是人赋予的。文学语言更是如此, 创作者借助不同的语言机制进行遣词造句, 原本扁平的语言因意义的赋予而饱满起来, 这种体现在字里行间的意义被读者接受时, 也就实现了文学的最终意义和价值。鉴于此, 笔者以符号学的意义观为视角, 试探讨能够通过语言符号意义产生文学效果的“文学性”机制。

从符号的三层意义中, 可以看出语言符号的意义产生于符号关系的建构之中。首先, 不同语言符号之间的关系构成言内意义, 诗歌的韵律、节奏往往从这层意义上凸显其文学性, 给读者带来新奇的审美感受, 这独特的感受也体现着我们常说的“文学性”。其次, 符号与其指称对象之间构成指称意义, 符号与其指称的关系或单一, 或多元, 这都与具体的文本语境相关, 比如魔幻小说《哈利波特》中作者通过各种法器、魔咒、不同身份的指称意义建立起文本中的幻想王国, 读来妙趣横生, 引人入胜, 这也正是该作品文学性特质的彰显。而语言符号和解释者之间的关系则构成语用意义, 文学文本的解释者既包括作者, 也包括读者。作者在文学文本中通过语言符号的选择和使用创造表达意义、表征意义、祈使意义、社交意义和联想意义等来契合文本语境的需要。就如在某文本中描绘国王和乞丐的对话时, 作者借二者迥异的言语表达使语言或获得表现身份地位的表征意义, 或具有表明双方关系的社交意义, 读者在领略到这种

具体语境中语言符号具有的特殊意味时,必然开怀一笑,阅读兴趣油然而生。无疑,这种由语用意义创造的独特文学效果恰是文学性的有力表现。当然,文学语言的“多义性、多重阐释性、无限衍义性等特点”(吕俊 50)使其往往同时具有多层意义,每一层或者多层意义都是作者对语言符号的选择和精心构造的结果,而符号意义的建构与集合则由表及里地彰显文本的“文学性”。据此,从社会符号学的核心意义观出发,我们可以认为,文学性是文学文本中一种具有某种特定文学效果的意义的集合。如上述语言符号三层意义带来的或新奇感受、或趣味体验等效果,都是读者在作品中获得的独特的审美体验和审美愉悦。同时,文本语言产生的独特效果,蕴藏的多层意义,这都离不开作为意义构建者的文学创作者,为何呈现某种语言符号的排列组合,如何实现某种特定的文学效果,必然经过作者一番思考,并非任意而为,因此也必然渗透其创作意旨和思维特质。“诗仙”李白的浪漫主义格调、“诗圣”杜甫的现实主义色彩,二人独特鲜明的风格彰显的是其文学创作中的思想、情感与审美倾向。因此,笔者将文学性定义为:文学文本中能够创造审美愉悦效果,体现作者思想、情感和审美特质的意义的集合体。

二、成长小说的文学性

学界广为认同的是,“成长小说”一词源自德语 Bildungsroman,又译作“教育小说”“修养小说”“塑造小说”等。巴赫金(Mikhail Bakhtin)在《教育小说及其在现实主义历史中的意义》(“The Bildungsroman and Its Significance in the History of Realism”)一文中从“成长小说”与其他小说的区别出发,强调了“成长小说”的特质是描述和构建“成长中的人物形象”或“人物形象的动态统一性”(231-34)。作为欧美文化舶来品,这一文学体裁也不断被中国学者广泛讨论。刘半九认为:“‘教育小说’这种小说类型的自身特点:往往是以一个所谓‘白纸状态’(tabula rasa)的青少年为主人公,通过他的毫不离奇的日常生活,通过他一生与其他人相处和交往的社会经历,通过他的思想感情在社会熔炉中的磨炼、变化和发展,描写他的能力、道德和精神的成熟过程、他的整个世界观的形成过程。”(1-2)芮渝萍指出,成长小说是关注青年人心理和成长问题的小说,在成长小说中,主人公往往是少年儿童,因为“少年儿童作为一种纯真无邪品质的化身,其视点天然具有重新认识、构建世界的功能”(7)。孙胜忠提到“精神追求或自我教育是成长小说的核心概念,强调主人公美学意义上的、内在的、精神上的成长是它的主旋律,这也是辨认成长小说与否的关键”(384-85)。从学者对其概念界定中可以看出,作为儿童文学的成长小说,其特质在于它描写的是动态成长着的主人公即儿童(青少年),这种成长关乎内心本真、精神追求、价值寻找与确认。

朱自强教授指出“儿童文学也是成人作家进行自我表现的文学,他的创作与其心理资质、生活经验、人生哲学观念等都有必然联系。儿童文学创作满足了他们的精神需求”(114),可以说,作为儿童文学的成长小说创作也正体现着作者的思想、情感和审美特质,小说也因此具有了文学性。那么这种体现创作者内在特质的语言符号的意义建构能否被其读者感受与接受,能否产

生文学效果,是我们要着重讨论的问题。正是文学效果的产生最终实现作者进行意义建构的意义,实现文学作品的创作意旨,而成长小说的文学性特质也才得以凸显。不同于一般成人小说以及其他儿童小说,成长小说拥有特殊的受众群体——少年,根据皮亚杰(Jean Piaget)认知发展理论,可以大致认为少年处于认知发展的最后一个阶段,即形式运算阶段。“其抽象逻辑思维迅速发展,性格与情感正在日趋丰富复杂,他们的审美意识、生活经验与思想水平正在逐渐成熟与提升”(王泉根 59-60),这就要求创作者要创造出具有“统一的二元价值系统”(朱自强 112)的成长小说,要根据少年读者的心理及审美能力与需求等赋予作品真正的“文学性”。正如王泉根在谈到少年心理和少年文学创作时说道,“优秀的少年小说往往能使读者得到丰富的心理体验,即审美愉悦”(63)。小说创造的语境一定具有某种“意味”,这种意味是契合少年心理的。就如他们会将心情投射到自然景物之中,使得他们对自然的审美体验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这样看来,成长小说的文学性不仅蕴藏在体现作者自身审美特质的符号意义的集合中,更彰显在语言符号意义所建构的让少年读者产生心理共鸣,获得审美愉悦的独特文学效果之中。

三、成长小说的文学性在翻译中的再造

文学性是文学作品的生命力,“文学翻译的本质特征在于文学性的传递”(周晔 19)。成长小说的文学性在既体现作者审美特质,又观照读者审美体验的语言符号意义的建构与传达中得以生成。“语言符号凭借意义而进入文本”(刘宓庆 76),翻译的过程则是“以有形符号和无形符号承载的意义解读、可能性诠释和可能性意义的再造为核心”(贾洪伟 26-27)。符号学的意义观下,语言符号的意义是所指、言内、语用意义的多层集合,那么,翻译中要再造原作的文学性,必然要尽可能地全面理解,诠释原作语言符号的多层意义,聚焦于语言符号意义的多重完整再现。如此,才有可能传达原作特定的文学性效果。符号学的核心意义观为成长小说翻译中文学性的再造提供了切实可行的路径,再造成长小说的文学性要求译者深刻体会、挖掘小说中作者的语言符号建构中蕴藏的意义潜势,并以契合少年读者认知与思维水平,符合读者审美特质的另一种语言符号进行意义的再建构,在此过程中,文学效果得以传递。

文学语言不同于日常语言,语义层次丰富,“有的符号只具备一种意义,有的符号具备两种意义,有的符号三种意义都具备”(陈宏薇,《社会符号学翻译法研究》91),这就使得在文学翻译的意义传达过程中,译者往往会遇到原语言同时含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意义;同时,语言符号的随意性、排他性以及思维规律的限制等都会对意义再现构成障碍。“译事之难,就在于原语和译语符号各种意义同时对应的情况极为少见”(柯平 32),翻译的绝对等值难以实现。因此,在成长小说翻译中,符号意义的多重完整再现也难免遇到瓶颈,此时,译者要以实现“儿童本位的等效翻译”(徐德荣、江建利 66)为原则,“尽最大努力保证上下文里最重要或最突出的意义的正确传译”(柯平 32),而更多情况下,译者要积极采取适当的翻译策略尽可能充分地让原文意义全面再生。下文中笔者以《绿山墙的安妮》^[1]为例,就语言符号重要意义的优先

传译和多重意义的充分传译两方面来探讨成长小说翻译中的文学性再造策略。

（一）重要意义的优先传译

成长小说翻译中，译者需要在语言符号转换中进行意义的选择与取舍，要充分结合语言符号的性质以及组合规律等识别原语符号最重要的、最突出的符号意义进行传译。那么，何为最重要意义呢？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家奈达（Eugene A. Nida）指出，“上下文不仅决定词义如何理解，还决定其如何翻译”（35），可以认为，上下文语境就是译者的意义选择的坐标系。因此，“三类符号学意义中的任何一种都可能成为某一上下文或情境中最重要的意义”（柯平 44），并且这一重要意义往往最能表现作者的创作情感和思维特质，最能表现作品的主题。

1. 指称意义的优先传译

“指称意义涉及到语言语境中语言的微观结构，即语音、语法、词汇所表现的意义”（衡孝军 24）。成长小说中指称意义更多表现在符合人物的视域和认知、反映人物思想的独特性的意象中，作者在文本中具体意象或形象的选择和使用反映出主人公的独特的审美与情感特征。下面将举例说明以指称意义的优先传译再造作品的文学性。

（1）原文：I do my best. I think to myself, “Now my hair is a glorious black, black as the raven’s wing.”（Montgomery 24）

译文 1：我竭尽全力，我暗自思忖：“现在我的头发是乌黑油亮的了，黑得像乌鸦的翅膀一样。”（马译本 14）

译文 2：我使劲想，心里说：“现在我有一头美丽的黑发，乌油油的。”（邓译本 14）

原文中使用比喻来使形象具体化，语言更加生动、明快。raven’s wing 是安妮用来表达想象中自己的头发的“黑”。马直译为“乌鸦的翅膀”，清晰再造原文的所指意义，表达了安妮丰富的想象力，能够让读者通过乌鸦的形象体会安妮的发色之“黑”，这样直白质朴的语言也正体现出安妮鲜活的想象力和对生活的热爱，同时为读者创造了阅读的趣味性体验。邓译文省略意象，译为“乌油油的”，采用叠词，创造了音韵美，读来朗朗上口。但这样的译文似乎更适合年龄更低些的儿童阅读习惯，也有些中规中矩，仿佛教科书式的表达，掩盖了作者借指称意义所传达的内涵，译文也就缺失了成长小说语言的独特意味。根据语境来看，例文中指称意义是最重要的意义，应该要优先准确传译语言符号的指称意义，以贴合语境、创造相同阅读效果为目的，呈现出小说中人物的思维和认知方式，实现文本文学性再造。

2. 言内意义的优先传译

“言内意义即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所表现的意义，是词语成分之间、句子成分之间和篇章成分之间的关系所反映的意义，体现在语音、词汇、句子和篇章等各个层次”（杜英丽、顾建华 134）。成长小说中言内意义通过作者对语言符号的搭配组合，以新颖的语言形式和独特的意

蕴为读者创造不寻常的审美体验。下面将举例说明以言内意义的优先传译再造作品的文学性。

(2) 原文: “It just satisfies me here”—she put one hand on her breast—it made a queer funny ache and yet it was a pleasant ache. (Montgomery 26)

译文 1: “它使我心里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奇怪的痛苦, 不过这是一种愉快的痛苦。”(马译本 16)

译文 2: “它让我这里奇怪地疼, 可这是让人快活的疼。”(邓译本 15)

言内意义体现语言符号之间的关系, 作者的词汇搭配、句法结构等生成语言符号的言内意义, 这些语言符号往往具有强烈的情感表达性。原文中作者将 pleasant 和 ache 两个意义相互矛盾的词组合, 构成矛盾修饰法, 这样的组合看似不合逻辑, 却能深刻、强烈地表达出人物的思想情感。安妮以 pleasant ache 来表达自己的看到眼前美景时的心理状态, 马译文“愉快的痛苦”和邓译文“让人快活的疼”都实现了言内意义的传译, 但“让人快活的”较为口语化的表达比“愉快的”情感表现力更强, 更符合少年读者的阅读心理。对于这样看似矛盾的语言符号, 译者需要识别其独特的作用, 优先传译其言内意义, 通过等效的语言形式, 表达人物情感, 带给读者新颖别致的审美感受, 以此再造文学性。

3. 语用意义的优先传译

“语用意义, 是符号与其诠释者之间的关系所体现的意义, 包括有表征意义、表达意义、社交意义、祈使意义和联想意义, 并均与社会文化教育因素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张勤 92-93)。成长小说中的语用意义主要体现在作者选择和使用的象征或表达人物的审美倾向和价值追求的语言符号中。下面将举例说明以语用意义的优先传译、再造作品的文学性。

(3) 原文: But they shouldn't call that lovely place the Avenue. There is no meaning in a name like that. They should call it—let me see—the White Way of Delight. (Montgomery 26)

译文 1: 可是他们不该管那风光秀丽的地方叫林荫道呀。这类名字毫无意义。他们应该叫它——让我想想——‘白色的欢乐之路’。(马译本 16)

译文 2: 可他们不该把那么可爱的地方叫林荫道, 这名字一点也显不出它的美丽。应该叫它——让我想想看——雪径通幽。(邓译本 15)

该场景描述了马修带安妮去绿山墙农舍时经过一条长满苹果树和雪白花朵的林荫道时, 安妮的兴奋与喜悦。她不满意那里的人们把这条路叫 the Avenue, 认为应该叫做 the White Way of Delight, 这样的描述极其生动地刻画出安妮富于想象力的特质。马爱农将其译为“白色的欢乐之路”, 原文语言符号的所指意义得到再现, 语言也具有一定的趣味性, 但细读原作, 我们知道安妮是一个充满浪漫主义情感的女孩, 马译文在刻画安妮人物形象特质上似乎缺少表现力。

正如朱自强说道,“而在优秀的成长小说中,作家的思想在作品中就会物化成富于个性的艺术形式”(37)。这样一条林荫道在安妮眼中是满载想象与美好的,为它命名也体现作者独特的思想与情感,由此可知,语用意义是该语言符号的意义重心。邓译文为“雪径通幽”,让人联想到诗文“曲径通幽处”,帮助读者在脑海中勾勒此处的幽深美景,也展现了安妮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想象力,表达出安妮对美好事物的热爱与追求的思想特质。语用意义的传译对于再现原文中人物的思想、情感和审美至关重要,如此,译者才能生动再造原文精神内涵和文学性特质。

(二) 多重意义的充分传译

上文说到,受思维规律、语言符号特性等诸多因素的限制,译者难以全面传译文学语言的多层意义。但承认语言转换的障碍,并不是说译者只能被动地反应,“从某种角度看,翻译的根本任务在于异中求同,即克服不同语言符号系统表现在各个平面与层次的异,求得最大限度的同”(许钧 6)。“求得最大限度的同”便是说译者要深刻理解,敏感捕捉到原语符号的不同层面的意义,且本着等效翻译原则,以符合目标读者认知水平、审美视域和译入语规范为前提,最大限度地实现语言符号多重意义的完整传译,这样,在优先传译重要意义的基础上,尽力挖掘作者语言符号意义的丰富性,实现最大限度的语义等值,才能最大程度再造原作的文学性,使原作的内容、思想得以完整、充分再现。下面笔者将举例说明以多重意义的充分传译再造成长篇小说文学性。

(4) 原文:“And A-n-n looks dreadful, but A-n-n-e looks so much more distinguished. If you'll only call me Anne spelled with an E I shall try to reconcile myself to not being called Cordelia.”(Montgomery 31)

译文 1:“安这个字看上去糟糕得很,可安妮就显得出众得多。只要你们叫我带‘e’的安妮,不叫科迪莉娅,我就会竭力顺从你们的意见。”(马译本 21-22)

译文 2:“‘安尼’看上去糟糕透了,而‘安妮’却蛮顺眼的。如果您能叫我带有‘女’字旁的安妮,不叫我科黛拉我也愿意。”(邓译本 21)

例句中安妮表达她对自己原来的名字 Ann 和自己改后的 Anne 的看法。A-n-n 和 A-n-n-e 中一个字母 e 的差别使原文同时具备了指称和言内意义。马译为“安”和“安妮”,忠实传译出原文的指称意义,而言内意义的传达似乎有些欠缺,下文中“Anne spelled with an E”译为“带‘e’的安妮”更让读者不知所云。邓译为“安尼”和“安妮”,“安尼”一词作为名字看起来确实不让人赏心悦目,从形式上看足以形成鲜明对照,与后面的 looks dreadful 搭配也更容易理解,实现了指称意义和言内意义的传译。同时,下文中的“带有‘女’字旁的安妮”也十分自然贴切,呼应上文。因此,文学语言符号之间的组合使其具备言内意义时,需要辨别其特殊形式,积极传译,“而不像日常语言那样可以‘得意忘言’”(吕俊 50)。邓译文以等效翻译的原则尽可能

准确地实现了原文语言多重意义的传译，传达出原文的独特的文学效果。

(5) 原文: “I didn’t think you and Gilbert Blythe were such good friends that you’d stand for half an hour at the gate talking to him,” said Marilla with a dry smile.

“We haven’t been—we’ve been good enemies.” (Montgomery 306)

译文 1: “我没有想到你和吉尔伯特·布莱思竟然是那么要好的朋友，你站在大门口和他谈了半个钟头。”玛丽拉带着一丝干涩的微笑说。

“我们以前不是——我们曾经是死对头。”(马译本 275)

译文 2: “我看你和吉尔伯特·布莱思还没有要好到能在门口聊上半小时啊，”玛丽拉说，脸上挂着干巴巴的笑容。

“我们一直不是——我们一直是真正的对手。”(邓译本 243)

该情景是小说近结尾处安妮和曾经的“敌人”吉尔伯特握手言和后与玛丽拉的对话。good enemies 构成英文的矛盾修饰法，意蕴深刻，能够产生新奇的艺术效果。马译文为“死对头”，其中enemies译为“对头”较为贴切地其指称意义，译文也表达出安妮当时对她与吉尔伯特新的关系的看法，译出了该词组的语用意义，感情强烈，生动有趣。但对比原文，发现并未译出其修辞特征，忽略言内意义的传译。邓译文“真正的对手”，在情感表达的语用意义以及修辞效果的言内意义上都有所缺失。仔细阅读原文，可以看出前文的good friends与下文中good enemies有呼应对照之意，鉴于此，笔者在马译文基础上，将安妮的回答试译为“我们一直不是的——我们一直是要命的对头”，在理解上下文语境后，将good一词译为“要命的”表达出二者之前极其强烈的竞争关系，以“要命的对头”准确传译出词汇的所指意义，且与前文“要好的朋友”保持语义关系的连贯，再造了上下文语篇成分间的言内意义，同时也不乏趣味性。多数情况下，这样的修辞手法往往具有多重意义，翻译过程中，译者需要理解其语言表层意义，并结合语境，透过表层体会其深层内涵，深入理解作者或人物的思想情感，以等效原则实现多重意义的充分传译，以此展现原文的精神内涵与风格特质，再造原文的文学性特质。

成长小说的语言符号中一定体现作者某种情感、态度、思想，因此，“译者必须进入句子的深层结构中，用理性透视用情感感知这类的表征符号，如实地呈现发讯人的内心情感，运用表象符号，创造表情脉络，真实反映发讯人表达的主体审美感受和审美情感”（张勤 93）。成长小说的读者一般为青少年，译者要本着儿童文学翻译的等效原则，深刻且合理解读原语的意义所在，保留语言趣味性的同时，也要创造性地赋予语言审美属性，最终以符合读者视域的语言机制传达原语文本的思想价值与精神内涵。

成长小说翻译中，无论是译“意”还是译“味”，都离不开对原文语体风格、情感价值、审美特征和作者意图的考量。成长小说的文学性蕴含在作者对语言符号的精心建构中，蕴含在

通过语言符号建构的人物形象、语言、环境及其所传达的情感价值和独特效果之中。因此，译者需要真正融入作者在文学文本中创造的意义世界，深刻剖析并体悟原作语言符号的双重审美特质，感受其文学效果，力图在译作中实现译者、作者、目标读者三者的视域融合。为此，成长小说翻译中，译者应本着儿童文学翻译的等效原则，深刻剖析原语符号的最重要意义，在此基础上，完整理解、充分传译原语言符号的多重意义，以实现原作特定文学效果为导向，再造成长小说的文学性。

注释 [Notes]

[1] 文中主要以马爱农译本和邓少勉、马新林译本为例，以下简称马译本、邓译本。

引用文献 [Works Cited]

- Bakhtin, M. M. *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 Bakhtin: A Theory of the Novel*. Translated by Chunren Bai and He. Hebei Education, 1998. [巴赫金:《巴赫金著作集:小说理论》,白春仁、晓河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 Chen, Hongwei. "A Study of Social Semiotic Translation Method." *Journal of Qingdao Ocean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no. 3, 1996, pp. 88-93. [陈宏薇:《社会符号学翻译法研究》,载《青岛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3期,第88-93页。]
- Chen, Hongwei, editor. *Essential Translation from Chinese into English*.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1998. [陈宏薇编:《汉英翻译基础》。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
- Chen, Xiaoming. "At the Joint of History-Rereading Qian Gurong's 'On Literature is Human Studies.'" *Literature Contending*, no. 11, 2017, pp. 28-32. [陈晓明:《在历史的关节点上——重读钱谷融的〈论“文学是人学”〉》,载《文艺争鸣》2017年第11期,第28-32页。]
- Du, Yingli, and Yingli Gu. "The Translation of Social Semiotic Meaning from the Three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Tian Jing Sha-Qiu Si.'" *Overseas English*, no. 23, 2012, pp. 133-34, 147. [杜英丽、顾建华:《从〈天净沙·秋思〉三英译本看社会符号学意义的翻译》,载《海外英语》2012年第23期,第133-34, 147页。]
- Heng, Xiaojun. "Functional Equivalence in the Process of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Idioms from a Social Semiotic Translation Approach." *Chinese Translators Journal*, no. 4, 2003, pp. 23-25. [衡孝军:《从社会符号学翻译法看汉语成语英译过程中的功能对等》,载《中国翻译》2003年第4期,第23-25页。]
- Jia, Hongwei. "Reflections on Translation Semiotics - Post-translation Insights of Gray's 'Yuan Creation.'" *Translation Forum*, no. 3, 2018, pp. 26-32. [贾洪伟:《有关翻译符号学的思考——格雷〈元创作〉译后感悟》,载《翻译论坛》2018年第3期,第26-32页。]
- Ke, Ping. *A Course in English-Chinese and Chinese-English Translation*. Peking UP, 1993. [柯平:《英汉与汉英翻译教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 Liu, Huainan. "'Literariness' ≠ Attributes of Literature." *Studies in Literary Theory*, no. 2, 2006, pp. 19-24. [刘淮南:《“文学”性≠文学“性”》,载《文艺理论研究》2006年第2期,第19-24页。]
- Li, Long. *A Study of "Literariness" with Reference to the Linguistic Turn*. People's Press, 2011. [李龙:《“文学性”问题研究——以语言学转向为参照》。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 Liu, Miqing. *A Course on the Aesthetics of Translation*. China Translation, 2016. [刘宓庆:《翻译美学教程》。北京:中译出版社,2016。]
- Lv, Jun. "The Linguistic Turn of Philosophy: Implications for Translation Studies." *Foreign Languages*, no. 5, 2000, pp. 49-54. [吕俊:《哲学的语言论转向对翻译研究的启示》,载《外国语》2000年第5期,第49-54页。]
- Montgomery, Lucy-Maud. *Anne of Green Gables*. Translated by Ainong Ma. People's Literature, 1999. [蒙哥马利:《绿山墙的安妮》,马爱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 . *Anne of Green Gables*. Translated by Shaomian Deng and Xinlin Ma. China Foreign Translation, 2009. [蒙哥马利:《绿山墙的安妮》,邓少勉、马新林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9。]

- Montgomery, Lucy. Maud. *Anne of Green Gables*. New America Library, 1987.
- Nida, Eugene A. *Contexts in Translating*. John Benjamins, 2001.
- Rui, Yuping. *A Study of American Bildungsroman*. China Social Sciences, 2004. [芮渝萍:《美国成长小说研究》。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 Shi, Zhongyi. "My View on the Definition of 'Literariness'." *Chines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no. 3, 2000, pp. 124-30. [史忠义:《“文学性”的定义之我见》, 载《中国比较文学》2000年第3期, 第124-30页。]
- Sun, Shengzhong. "A Research on the Genre of Bildungsroman."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ry Studies*, no. 1, 2014, pp. 370-87. [孙胜忠.《成长小说体裁考辨》载《英美文学研究论丛》2014年第1期, 第370-87页。]
- Liu Banjiu. Preface. Tian, Dewang, translator. *Henry in Green*. By Gottfried Keller, translated People's Literature, 1980. [田德望译 刘半九译本序:《绿衣亨利》, 凯勒著。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
- Tong, Qingbing. "On Literariness." *Language Construction*, no. 3, 2009, pp. 55-59. [童庆炳:《谈谈文学性》, 载《语文建设》2009年第3期, 第55-59页。]
- Wang, Quangen. *Children's Literature Tutorial*. Beijing Normal UP, 2009. [王泉根:《儿童文学教程》。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 Xu, Jun. *Research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Criticism*. Yilin, 2014. [许钧:《文学翻译批评研究: 增订本》。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2。]
- Xu, Derong, and Jianli Jiang. "On the Framework of Translation Criticism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Foreign Language Studies*, no.2, 2014, pp. 66-71, 112. [徐德荣、江建利:《论儿童文学翻译批评的框架》, 载《外语研究》2014年第2期, 第66-71, 112页。]
- Zhang, Qin. "An Experimental Analysis of the Role of Social Semiotics' View of Meaning in Translation Theory." *Journal of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no. 5, 2001, pp. 91-94 [张勤:《试析社会符号学的意义观在翻译理论中的作用》, 载《浙江师大学报》2001年第5期, 第91-94页。]
- Zhou, Ye. "The Beauty of Details: The Communication of Literariness in Translation: Taking Bi Feiyu's Novel 'Qing Yi' in English Translation as an Example." *Journal of Beijing Second Foreign Language Institute*, no. 2, 2014, pp. 18-27. [周晔:《细节之美: 翻译中文学性的传达——以毕飞宇小说〈青衣〉英译本为例》, 载《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 第18-27页。]
- Zhu, Ziqiang. *Introduction to Children's Literature*. Higher Education, 2009. [朱自强:《儿童文学概论》。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

◇责任编辑: 马纳克

兼容策略，辩证眼光 ——汪榕培的汉诗英译思想

◎ 张智中

内容提要: 汪榕培先生是典籍英译大家，他认为诗歌可译，提出“译可译，非常译”的观点，并认为理想的译者，就是中国的独立译者。他关注读者，主张用流畅的当代英语表达原作的精神实质，承认现存的汉诗英译的各种风格流派，提出“传神达意”的汉诗英译原则。他认为汉诗英译是文学翻译，不是学术翻译，对于同一汉语著作，可采取通俗的普及译法和严肃的典籍译法这两种译法。本文梳理研究汪榕培的汉诗英译思想，以期为当下的中国文学英译和汉诗英译带来启发和借鉴。

关键词: 汪榕培 中国文学英译 汉诗英译 当代英语 传神达意 典籍英译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 (2021) 03-0106-1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汉语诗歌在英语世界的译介研究”(16BWW012)

作者单位: 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翻译系，天津 300071

DOI: 10.19967/j.cnki.flc.2021.03.011

Title: The C-E Poetry Translation Thought of Wang Rongpei

Abstract: Wang Rongpei is an established poetry translator who believes that poetry is translatable in an unusual way and that the most ideal translator is an independent Chinese translator. He attaches much importance to target readers while proposing to adopt contemporary English to render the content and the flavor of the original poems. He embraces the various schools of C-E poetry translation and puts forward the poetry translating principle of “vividness on the basis of expressiveness.” According to Wang, C-E poetry translation is literary translation rather than academic translation, and for the same Chinese literary piece, there may be two versions: one is a popular version by using an adapting method and the other is a classic version by using a literal translation method. This paper probes into the C-E poetry translation thought of Wang Rongpei, so as to shed light on the current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hinese poetry.

Keywords: Wang Rongpei,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C-E poetry translation, contemporary English, vividness on the basis of expressiveness,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lassics

Author: Zhizhong Zhang, Professor, Translation Department,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China.

汪榕培是中国典籍英译大家。“自上个世纪90年代初开始至今,在中国文化走出去大战略的背景下,汪榕培教授以对中国古典戏曲、诗歌和典籍的热爱,孜孜不倦地进行中国典籍的翻译与传播。汪榕培教授博观古今,传扬文化,被誉为中西文化的摆渡者。”(朱安博4)他说:“我主要从事的是汉译英,特别是中国典籍的英译。从1991年翻译《道德经》开始,我翻译的中国典籍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道家著作、中国古典诗歌和中国古典戏剧。这跟我的兴趣爱好是密切相关的。”(《我和中国典籍英译》3)本文聚焦研究其中一个方面,即汪榕培的汉诗英译思想,及其对当下汉诗英译所带来的启发和意义。

一、汉诗英译:可译性与译者的主体性

诗歌是否可译的问题论争已久,至今尚未有定论。诗歌翻译的历史,与诗歌是否可译的争论史一样悠久。诚如汪榕培所言:“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来看,诗歌翻译是一个难题。关于诗歌的可译性问题,历来众说纷纭。说不可译者大有人在,然而各国的许多著名篇章已经被译成各种外语,在全世界流传。”(《比较与翻译》85)诗歌已经被翻译,并且正在翻译着,将来还会得到更多的翻译。汪榕培拿事实说话,提出“译可译,非常译”,虽然这是他英译老子的经验总结,但这一理念之后被运用到其汉诗英译中。他说:“我提出过一种‘译可译,非常译’的说法,这种说法同样也适用于译诗。”(84)通过“译可译,非常译”的道德经式的表述,汪榕培强调了诗歌翻译或汉诗英译客观存在的难度:“且不说两种语言之间的翻译,就拿近年来我国在普及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出现的大量‘古诗今译’来看,令人满意之作就实在少见。”(85)作为语内翻译的古诗今译尚如此困难,古诗英译的难度当然更大。这更说明,诗歌翻译不是任何人想译就可以译好的。译者若不是诗人,手中若没有一支诗人的笔,是断不能译好诗歌的。

另外,近年来关于中国典籍英译者的主体性问题也多有争论。一般认为中国人不适合做汉译英,因为这不符合常见的翻译习惯:从外语译入自己的母语。但是,中国的翻译家却大多对此有着坚定的信心。汪榕培饱读诗书,对西方汉学家的译文多有涉猎和研究。他说:“中国古典名著的英译本,多数是由英美译者完成的。他们的英文通顺流畅,但是由于中国古典名著的内容博大精深,社会文化内涵丰富,西方的译者往往抓不住原著的精髓,误译的地方较多。[……]把中国传统文化以准确真实的本来面貌推向世界,反映当代中国学者对传统文化研究的最新成果,这一任务理所当然地落到中国译者的身上。”(《比较与翻译》前言1)具体到诗歌翻译方面,汪榕培说:“洋人译汉诗有其优越之处,他们译诗至少应该比中国译者更加符合英语的表达习惯,正如英诗汉译多数是由中国译者来完成的一样。”(113)他又说:“可是在汉诗英译方面,也许是我眼高手低吧,对他们的译诗总是不满意,对洋人的迷信也就逐渐减少了一些。”(118)

其实,就像虽然有人说诗歌不可译但诗歌却早已得到翻译一样,到现在为止还有不少中外人士坚持认为,汉译外的理想译者,应该是外国的汉学家而不是中国人,但实际上,中国人从事汉译外的工作,自古有之。早在唐代,玄奘就把老子翻译成梵文(汪涛3);在上个世纪,

朱湘曾把中国诗歌翻译成英诗(罗选民 69);在 20 世纪 30 年代,梁宗岱把《陶潜诗选》翻译成法文在巴黎出版,并获得法国著名作家的高度赞扬(88)。事实证明,中国人自古就有从事汉译外工作的传统,并且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汪榕培说:

至于中外合译,也有其自身的问题。[……]我的第一部译著《老子》是同 William Puffenberger 合作的,翻译过程中就出现了类似问题。Puffenberger 还将此译本用作美国学生使用之教材。为此,从第二本译著始,我放弃了这种模式。文学作品从本质上说,属于个体劳动,其合作相对困难。作品之创见常常是个人的,商讨讨论式的创作不易创新。翻译同创作一样,也是个体的创造性劳动,需要个体的主见、个体风格。(班柏 8)

总之,汪榕培认为诗歌是可译的,但要采取“非常译”的方法;在汉译外的理想译者的问题上,汪榕培不光认为理想的译者不应该是外国人,还否定了人们普遍倡议的中西合璧的合作翻译模式。他认为中国独立译者最为理想,这一理念不无道理和洞见,这是他长期从事典籍翻译和汉诗英译的宝贵经验总结。这一理念,必将极大地鼓舞当下的和未来的中国译者。

二、译诗的语言策略:流畅的当代英语

相比于中国多数汉诗英译者,汪榕培非常重视译文的读者接受问题,反复提到并强调英语读者的接受能力。他翻译汉语诗歌的目的,是为了把中国古典诗歌的精华呈献给西方的英语读者。他说:“我们遵循的翻译原则是以流畅的当代英语表达原作的精神实质,再现原作的艺术风采。”(《比较与翻译》36)例如,《诗经·采薇》中非常有名的四行诗及其英译:

表 1

昔我往矣, 杨柳依依; 今我来思, 雨雪霏霏。	许渊冲译: When I left here, Willows shed tear. I come back now, Snow bends the bough. (许渊冲 191)	杨宪益、戴乃迭译: When we left home The willows were softly swaying; Now as we turn back Snow flakes fly. (龚光明: 2016, 26)	汪榕培译: When I set out so long ago, Fresh and green was the willow. When now homeward I go, There is a heavy snow. (汪榕培、任秀桦 693)
----------------------------------	--	--	---

三个译文中,许译和汪译是格律体译诗,杨译是自由体译诗。许译在译诗形美方面的追求,用力最甚。汉诗每行四个汉字,英译就相应每行四个音节,而且押随行尾韵。这样一来,译文显得非常简洁凝练。比读杨译,就会觉得 left home 比 left here 更具体亲切, the willows were softly swaying 和 snow flakes fly 更具有画面感,因此意象更加鲜明。汪译虽然也是格律体,四行同韵,但不拘泥于每行音节的多寡。从语言的角度来看,显然汪译更具流畅的现代英语的气息,尤其 now homeward I go, 具有英诗的语言特性。王宏印说:

许渊冲的翻译会偏重追求形式美和押韵,所以意象方面会有所忽略,也可能会有过于简化的情况。这样的话,有些地方会显得过于流畅、过于押韵,会有类似于打油诗一类短诗的性质,所以有的人会提出来批评。汪老师的诗里面虽然也是注重格律的,但是不太出现这种情况。汪老师在翻译有些哲理的部分会做一些发挥。因此,我们也不难看出来汪老师和许渊冲先生他们在诗歌翻译方面的不同追求。(21)

我们以为,此为中肯之评。

汪榕培说:“诗歌能不能翻译,是翻译史上经久不衰的一个讨论话题。其实,任何文字的转换都没有问题,关键在于能否在翻译的过程中达到同样的美学效果。”(张智中序1)古典汉语诗歌,以其美丽品质打动读者。所以,古诗英译成功与否,不仅仅在于译文是否传达了原诗的含义,更在于是否传达了原诗之美。这才是译诗是否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与核心标准。因此,在其译诗中,汪榕培非常注重表情的美学功能,非常注重再现汉语诗歌的情感之美,用韵是体现情感之美的其中一个手段,采用富有当代气息的流畅英文,更保证了其译文的高质量。汪榕培不仅大量阅读英文原著,还广泛阅读古今中外汉学家和翻译家的各种风格的译文,兼收并蓄,吸取精华,融入自己的译文。在其专著或译著前言里,他经常对同一首汉语诗歌的不同译文进行比较,提出“比读是复译的基础、复译是比读的升华”的观点。对于译诗审美的多样性,汪榕培持开放接纳的态度,并从中获得新的认知。

总之,汪榕培在汉诗英译的过程中,高度重视译文的读者,而且是英语世界的真正读者,而不是中国的英语学习者或工作者这样的“假读者”。他遵循的翻译原则、采取的语言策略,是以流畅的当代英语再现原诗的精神实质和诗歌意蕴与风采。

三、汉诗英译的原则:传神达意

每个翻译家都有自己的翻译标准。谈起汉诗英译的标准,汪榕培说:“我的译诗标准只有四个字:‘传神达意’,即传达原诗的神韵,表达原诗的意义。”(《比较与翻译》99)那么,“传神达意”似乎就是“传神”与“达意”之并列关系,其实不然。汪榕培对这四个字进行了详细解释,他说:“这四个字不是并列结构(‘传神’和‘达意’不是并重的),而是偏正结构(‘传神’是‘达意’的状语,即‘传神地达意’)。一首好的译诗首先要表达原作的基本意义,传神是在达意的基础上的传神,是锦上添花,不达意则无神可传。”(119)那么,既然“传神达意”是偏正结构,意思是“传神地达意”,这就意味着,翻译的基础或出发点,在于“达意”。其实,达意是一切翻译的基础。如果译文不能达意,或者达意明显错误,那就是错误的翻译,译文只能误入歧途。例如,三字经开篇:“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的几种英译:

表 2

一、毛增印译:	二、郭著章译:	三、王宝童、李黎译:	四、赵彦春译:
At the very beginning of their life, men are naturally good. Their natures are much the same, but their habits become widely different due to different living environment in later days. (毛增印 8)	Men in the beginning of their very life Are naturally good. Their natures are similar And their habits become widely different. (郭著章 3)	At first mankind Is kind at heart, With natures alike But habits apart. (王宝童、李黎 2)	Man on earth, Good at birth. The same nature, Varies on nurture. (赵彦春 1)

英译一为散体译法，达意准确，其中 *naturally* 和 *natures* 是同源词语，再加上 *different* 的复用，译文虽然采取散体，但仍有一定的节奏和韵律。英译二形式上四行，其实是分行的散文。不妨散文读之：*Men in the beginning of their very life are naturally good. Their natures are similar and their habits become widely different.* 显然，与英译一近似，只是少了 *due to different living environment*（由于不同的生活环境）这一信息，感觉若有所失。

英译三语言简洁凝练，却能达意准确而不失生动。若散文解读：*At first mankind is kind at heart, with natures alike but habits apart.* 回译汉语：“起初，人们的内心善良，本性相同，却习惯有异。”译文中，*mankind* 与 *kind* 的同源异构，为译文增添了耐品的味道；两个副词 *alike* 与 *apart*，巧妙地译出了“相近”“相远”。以诗体观之，押韵格式为 *abcb*，即双行押韵，单行不押韵，为英诗所常见。

英译四若散文读之，则是：*Man on earth, good at birth. The same nature, varies on nurture.* 显然，语法的问题就来了：*Man on earth, good at birth.* 以句号为标志，该是一个句子了。但——这是句子吗？似乎省去了什么。如果补充完整，则应该是：*Man on earth is good at birth.* ——*Man on earth* 之后的逗号是多余的，显然不符合英语的语法规范。译文如果回译成汉语呢？——地球上的人，善于生育。汪榕培强调，译诗必须首先达义。这达的什么义呢？再看第二句，*The same nature, varies on nurture.* 明显的语法错误了：主语和谓语动词之间，怎么能加上一个逗号？

英译四试图用三个单词来译三个汉字，同时追求尾韵。且不说这样的翻译策略是否具有可行性和可操作性，从翻译的实践来看，早已脱离原文的意思，词不达意，语法不通。诚如汪榕培所言：“现在出版的汉译英作品，有的实在不敢恭维，甚至语法有错误，用词也不妥当，连《大中华文库》也不能幸免。如果这样的作品出口到国外，一定无法为国增光；如果给国内学英语的读者看，则有误人子弟之嫌。”（《我和中国典籍英译》4）再看前三个译文，至少达意正确，完成了翻译的基本任务，尤其是英译三，可谓音义俱佳。回顾上引汪榕培所言：“一首好的译诗首先要表达原作的基本意义”——这是达意。“传神是在达意的基础上的传神，是锦上添花，不达意则无神可传。”——这是传神。

以此观之，英译四没有达意，甚至有语法错误，更谈不上传神。英译一和英译二可谓达意，但传神不足。只有英译三，不仅达意，而且传神，正符合汪榕培所倡导“传神达意”或“传神地达意”的译诗原则。所以，正确深刻地理解汪榕培“传神达意”的译诗理念，对于我们从事

译诗或译诗批评,大有裨益。“他[汪榕培]根据自己丰富的翻译实践提出的‘传神达意’理论独树一帜,为后来的翻译活动以及翻译评论都提供了很好的理论支撑和指导作用。”(李正栓52)“传神达意”,是从“达意”开始,以“达意”为基础,努力走向译文的“传神”。这就符合翻译的基本规律和客观事实。“达意”而未“传神”之译文或译诗,是合格的译文;如果能在“达意”的基础上,进一步达到“传神”,则是优秀的不可多得的译文或译诗。可以说,由于汉诗英译的高难度,没有“达意”的译诗,不在少数;“达意”而未“传神”的译诗,更是常见,占大多数;既“达意”又“传神”的译诗,则是译诗的珍品,少之见也。即便是一个优秀的译者,其译作也是“达意”者多,“传神”者少。

汪榕培是从翻译实践到翻译理论的大家,其“传神达意”的翻译标准,是他在大量的翻译实践中总结并提炼出来的,这一标准不仅可以用来指导诗歌译者的翻译实践,还可用来引导读者的翻译批评,功莫大焉。“正如严复的‘信达雅’一样,‘传神达意’也极简单,包含内容却十分丰富,值得深入挖掘,也值得去丰富、补充、解释、说明,把它变成一个可以操作的典籍翻译标准,同时,也可以把它看作是典籍翻译的一个原则或追求的理想目标,并从理论上给予更多的关照,让其发挥更大的作用。”(赵长江183)

四、汉诗英译:“文学翻译”高于“学术翻译”

就汉诗英译而言,译者的策略也有两极:学术型翻译和文学型翻译。前者追求翻译的准确性,讲究原诗中包含信息的准确与完备;后者追求译诗的文学性,追求译诗的诗意和诗性,不太计较一些细节。之所以如此,还在于译者心目当中的读者有所不同。如果汉诗英译的读者,主要定位为英美国家的大学教授或汉学家,重在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译者就会采取学术型翻译的策略,不仅追求信息的准确,甚至追求词法和句法的“原汁原味”,于是,译者多采用直译法。但是,如果译者心目中的读者,是英美国家的诗人、普通大众或文学爱好者,就会采取文学型翻译的策略,译者会采用地道流畅的英文语言来再现原诗的审美境界。显然,汪榕培属于后者,他强调汉诗英译的文学性,认为文学性应该高于学术性。他说:“译诗重要的是表达意境,不是传达每一个细节,逐字逐句地翻译诗歌绝对不会产生好的译本。我的译本不是‘学术翻译’,而是文学翻译。”(《陶渊明诗歌英译比较研究》自序5)汪榕培说:“我最喜欢的诗人是陶渊明,所以译他的诗歌下的功夫最大。”(《我和中国典籍英译》3)为此,汪榕培专门到陶渊明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去体验生活,体察民情,为翻译陶渊明做好充分的情感和心理准备。因为陶诗是复译,在自己动手翻译之前,汪榕培首先研究已有的各种译文。比如针对《归园田居(其三)》许渊冲的译文,汪榕培评价说:“用韵体译诗难度大,但是他的译文却仍然颇得神韵,令人十分佩服。”(《陶渊明诗歌英译比较研究》121)对美国汉学家华兹生(Burton Watson)的译文,汪榕培说:“他的译文准确,富有现代气息,符合现代英语的正常语流,尤其是最后两句可谓别出心裁。”(116)对于弗洛德先(James David Frodsham)的译文,汪榕培认为:“同样是清新流畅的。”(118)丁

祖馨的译文，显然为自由体，但作为格律体译者的汪榕培，却仍然喜欢。谈到美籍华人柳无忌的自由体译文，汪榕培说：“他长期生活在美国，汉语和英语功力都很深厚，译诗很多，《归园田居》（其三）是译得成功的一首，平白如话，却依然富有诗意。”（《陶渊明诗歌英译比较研究》118）在对各种译文认真研究之后，汪榕培给出自己的译文：

Back to Country Life (III)

Tao Yuanming

When I plant beans at the foot of Southern Hill,
 Bean shoots are few but rank grass grows at will.
 I rise at early dawn to weed and prune
 Till, hoe on shoulder, I return with the moon.
 As the path is narrow, grass and bushes tall,
 The evening dew will soak my dress and all.
 It's nothing when my dress gets wet with dew,
 As long as my desires indeed come true.

（《英译陶诗》59）

译诗中每行 10 个音节，个别 11 个音节，不太拘泥于音韵形式，不像许渊冲那样讲究，必须每行音节一样。译诗没有采用缩写等形式，以免显得古板。尾韵格式为 aabbccdd，为英诗所常见；用词简单朴素，语言流畅，清新自然，没有斧琢之痕。整体观之，译文较好地实现了达意基础之上的传神，堪称佳译。汪榕培“在翻译过程中，虽然做了大量严谨的学术考证，但他并未被这些考证束缚手脚，译成学究气有余而诗性不足的刻板译文，而是进行艺术的再创造，以不同形式表现了原作的诗美。”（郝晓静 73）在汉诗英译中，汪榕培主张文学翻译，反对学术翻译。他说：“翻译文学作品跟创作文学作品有相通的地方，需要译者有文学的素质，甚至是天赋。”（《我和中国典籍英译》4）因此在他看来，汉诗英译是“文学翻译”，不应作为“学术翻译”来对待。在这点上，汪榕培与许渊冲的汉诗英译观点是一样的，都是为了让中国文化走出去，让中国诗歌走出去，力争做到中国诗歌或中国文化在英美国家的推广和普及。

五、汉诗英译：兼容策略与辩证眼光

在汉诗英译的策略方面，汪榕培并不走偏，隅于一端，而是有着兼容的翻译观。首先，他对格律体和自由体译诗都表示欣赏，这种兼容的心胸，显得难能可贵。谈到《诗经》的英译，汪榕培认为，许渊冲英译的《诗经》，神形兼备；谈到胡品清、杨宪益、丁祖馨等人的散体或自由体英译，汪榕培也予以肯定，赞赏有加。这充分说明，对于好的散体译诗，汪榕培是能够

欣赏的,他是从诗意的角度来看待译诗的质量的,而不是完全着眼于译诗的押韵。

其次,汪榕培考虑到汉诗英译策略的时间观,以及中西方译诗审美标准的不同,从而显示了他辩证的眼光。他说:“中国人欣赏英译的汉诗标准跟西方人欣赏英译的汉诗标准也会有区别,19世纪的读者和21世纪的读者又有区别。所以,同一首汉诗的不同译本会得到不同的评价,也许这个问题只有在历史的长河中置于世界文学的视野下才能逐渐清晰。”(张智中序1)这就说明,汪榕培不仅考虑到中西诗歌美学特质的不同,还注意到译诗读者审美观随着时间而产生的流变。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一代有一代之翻译。翻译的方法、技巧和策略,都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有所不同。因此,如果诗歌译者胶柱而鼓瑟,则不能与时俱进,取得真正的译诗成就。

其三,汪榕培认为,对于同一汉语著作,可有两种英文译法,一种是通俗的普及译法,一种是严肃的典籍译法。他说:“很多外国人读我们的东西也许就是我们的小学生读书那种水平,而且外国人和我们思考问题角度也不一样。比如说一部红楼梦,至少就有两种译法。同样,如果作为进入大中华文库收藏的典籍资料来翻译,就该忠实原文,更接近原文,如果为了吸引西方大众化的读者,就应按西方习惯翻译。”(朱安博4)汪榕培的这种辩证思想,源于他内心的读者意识和对中华文化的忠实翻译观,反映了一名翻译大家的锐利眼光和辩证思想。考虑到西方读者当下对中华文化有限的接受能力,汪榕培认为可以采取通俗的译法,以便于中华典籍在西方世界的推广和普及。同时,从长远来看,还可以采取严肃的更加忠实于原文的译法。如果译者照顾中国人的思维特征,就会像杨宪益英译《红楼梦》所采取的策略;如果照顾西方人的语言表达习惯,就是霍克斯英译《红楼梦》所采取的策略。霍克斯更多考虑他所处时代的英语读者,杨宪益更多考虑未来世界的英语读者;霍克斯是为当下而译,杨宪益是为未来而译。

总之,对格律体和自由体译诗都表示欣赏,译诗策略当与时俱进,通俗的普及译法与严肃的典籍译法并用,这三点,构成了汪榕培汉诗英译的辩证观。由此推论:汉诗英译,当然格律体和自由体、甚至改写体并存。采取多种翻译策略,才能看到眼前,并展望未来,或者在畅想未来的同时,不忘脚踏实地。汪榕培的这种汉诗英译的兼容策略及其辩证观,对当下中国的典籍英译或汉诗英译,具有很好的启发意义,值得认真研究。

六、汉诗英译:系统性与长期性

中国的典籍英译,是个长期的系统的工程,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所以,必须克服急躁冒进的思想情绪。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当下,汪榕培对国内和国际形势有着自己的独到理解。他说:

全世界的重要作品都要翻译成英文,反映了英美文化的主导地位。但英美文化对其他民族的文化不一定感兴趣。我们能做到的是,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打好基础,首先将文本翻译过去。其次,翻译的选题上,要将蕴含中国文化核心价值观的文本和优秀的中国文学作品率先译介过去。长期以来,中国文化对外译介的工作

十分欠缺。而随着时代的发展,语言已经发生了变化,理雅各的译作拿到今天来读,终究还是有些许不舒服,理解上也可能有一定障碍。从这个意义上,经典作品应‘常译常新’,不可能一劳永逸。(班柏6)

从这段话里,我们可以看出汪榕培放眼未来的战略目光和准备。我们的汉译英作品,可能暂时没有或缺乏西方的英语读者,但在不久的将来,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随着中国经济地位的提高和中华文化吸引力的提升,自然就会有一些读者,而且读者的数量也会与日俱增。其实,译文的诞生,有的不一定马上就产生阅读效应,可能若干年后才真正产生一些效应,带来一些反响。比如《红楼梦》的两个英译本,一般认为霍克斯的译本在英语世界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而杨宪益的译本却遭遇读者的冷落。但是,根据最近的研究,美国的学生有时更喜欢杨译本,因为它是更加感人的、同情的、贴切的,他们认为杨译本与霍译本同样优秀,霍译本有其明显的优势,但在某些方面杨译本略胜于霍译本(辛红娟等126)。杨译本注重直译,可能一时不为广大西方读者所接受,但随着文化交流的深入,未来的英语读者会越来越发现杨译本的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翻译的策略会改变,读者的口味也会变化。同时,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化的兴趣也必将越来越浓。因此,我们现在的翻译,可以看做是未来的准备,可谓未雨绸缪。

另外,在翻译的选题上,汪榕培主张将蕴含中国文化核心价值观的文本和优秀的中国文学作品率先译介过去。吾生也有涯,吾译也无涯。优秀的译者,更应该把自己的精力,放在翻译优秀的文学作品上。一方面,可以在翻译方面开拓未来,翻译一些前人从未翻译过的作品;另一方面,可以进行经典重译,对于那些过时的存在问题的译文,进行重新翻译,正是经典作品的“常译常新”。汪榕培说:“有计划地把中国典籍翻译成为英语是一项基础的工作,需要很多人付出不懈的努力,进行长时间的文化积累。”(《中国典籍英译的几点认识》7)就个人而言,汪榕培说:“只有热爱这项工作才会心情舒畅地去做,才能耐得住寂寞。”(《我和中国典籍英译》4)又说:“现在仍有必要对中国典籍英译的目的、做法、现状、规划等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才能在‘放眼世界,立足本土’(Be global, act local)精神指导下,把中国典籍英译的工作做得更好。”(《中国典籍英译的几点认识》7)

总之,汪榕培认为,“中国典籍翻译是一项旷日持久的工作,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朱安博5)在汉诗英译方面,我们要注意到这项工程的系统性、长期性、艰巨性;作为译者,应该热爱诗歌翻译这项工作,耐得住寂寞,首先将蕴含中国文化核心价值观的文本翻译过去,为未来的西方读者做准备。汪榕培的汉诗英译思想,对于中国诗歌走出去,对于构建对外文学话语体系等,都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引用文献 [Works Cited]

- Ban, Bo.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lassics and the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Wang Rongpei.” *Shando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no. 6, 2018, pp. 3-10. [班柏:《典籍英译与中国文化“走出去”——汪榕培教授访谈录》,载《山东外语教学》2018年第6期,第3-10页。]

- Gong, Guangming. *New Theory on Translation Aesthetics*. Shanghai Jiaotong UP, 2016. [龚光明:《翻译美学新论》。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
- Guo, Zhuzhang. *A Chinese-English Collection of the Best Chinese Traditional Primers: Book II*. Wuhan UP, 2004. [郭著章:《汉英对照蒙学精品·第2分册》。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
- Hao, Xiaojing. "The Aesthetics and Its Expression of Wang Rongpei in His C-E Poetry Translation." *Shanghai Journal of Translators*, no. 6, 2018, pp. 73-77. [郝晓静:《汪榕培古诗英译审美思想及表现》,载《上海翻译》2018年第6期,第73-77页。]
- Li, Zhengshuan. "On Wang Rongpei's Strategy of 'Conveying the Sense via Transmitting the Spirit' with His Translation of YUEFU Ballads." *Shanghai Journal of Translators*, no. 6, 2017, pp. 48-52. [李正栓:《汪榕培英译〈乐府诗〉的“传神达意”研究》,载《上海翻译》2017年第6期,第48-52页。]
- Liang, Zongdai. "The Poems of Tao Qian."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2003. [梁宗岱:《法译陶潜诗选》。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3。]
- Luo, Xuanmin. *Translation and Chinese Modernity*. Tsinghua UP, 2017. [罗选民:《翻译与中国现代性》。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
- Mao, Zengyin. *Verses in Three Characters and Genre Pictures*. China Intercontinental, 2005. [毛增印:《三字经与中国民俗画》。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5。]
- Wang, Baotong, and Li Li. *The Triword Primer & the Kiloword*.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2008. [王宝童、李黎:《英译三字经·千字文》。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
- Wang, Hongyin. "Translating Classics and Inheriting Academics." *Journal of Shenyang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no. 2, 2019, pp. 20-27. [王宏印:《典籍翻译与学问师承》,载《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第20-27页]
- Wang, Rongpei. *Comparison and Translation*.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1997. [汪榕培:《比较与翻译》。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 .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ao Yuanming's Poetr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2000. [汪榕培:《陶渊明诗歌英译比较研究》。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
- . *The Complete Poetic Works of Tao Yuanming (A Versified Translation)*.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2000. [汪榕培:《英译陶诗》。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
- . "I and th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lassics." *Research of Contemporary Foreign Languages*, no. 5, 2012, pp. 1-4. [汪榕培:《我和中国典籍英译》,载《当代外语研究》2012年第5期,第1-4页。]
- . "My Opinions o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lassics." *Journal of Yanshan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Edition)*, no. 3, 2013, pp. 7-8. [汪榕培:《中国典籍英译的几点认识》,载《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第7-8页。]
- Wang, Rongpei, and Xiuhua Ren. *The Book of Poetry*. Liaoning Education, 1995. [汪榕培、任秀桦:《〈诗经〉:中英文版》。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
- Wang, Tao. *Practical E-C and C-E Translation Skills (Revised Edition)*. Wuhan UP, 2007. [汪涛:《实用英汉互译技巧(修订版)》。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
- Xin, Hongjuan, et al. *On Yang Xianyi's Translation*. Nanjing UP, 2018. [辛红娟等:《杨宪益翻译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8。]
- Xu, Yuanchong. *Book of Poetry*. Dolphin Books, 2013. [许渊冲:《诗经:汉英对照》。北京:海豚出版社,2013。]
- Zhang, Zhizhong. *An Aesthetic Study of C-E Poetry Translation*.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5. [张智中:《汉诗英译美学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 Zhao, Changjiang. "A Study of Wang Rongpei's Thoughts o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lassics." *Journal of Dalian Minzu University*, no. 2, 2018, pp. 178-84. [赵长江:《汪榕培典籍英译思想研究》,载《大连民族大学学报》2018年第2期,第178-84页。]
- Zhao, Yanchun. *The Three Word Primer*. Guangming Daily, 2014. [赵彦春:《英韵三字经》。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4。]
- Zhu, Anbo. "Translation: Difficulties and Solutions: An Interview with Prof. Wang Rongpei." *Shando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no. 3, 2013, pp. 3-6. [朱安博:《“译可译,非常译”——汪榕培教授访谈录》,载《山东外语教学》2013年第3期,第3-6页。]

学思并举、知行并重、本外共参 ——张柏然教授翻译人才培养观

◎ 郭薇

内容提要: 作为著名翻译理论家、双语词典编纂家,张柏然教授在致力于中国翻译学与词典学教学、研究与实践的近五十年里,始终重视人才培养,众多学子现广泛活跃于中国外语教育与翻译界。本文探讨了张柏然教授因材施教、有教无类的教学宗旨,梳理和构建了张柏然教授“学思并举、知行并重、本外共参”的翻译人才培养观,以期为中国翻译学人才培养提供启发与借鉴。

关键词: 张柏然 教学宗旨 翻译人才培养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 (2021) 03-0116-07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 (21YJC740017); 中南大学课程思政建设研究项目 (2020KCSZ090); 中南大学研究生课程思政建设项目 (2020YJJSKB07)

作者单位: 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3

DOI: 10.19967/j.cnki.flc.2021.03.012

Title: Equal Emphasis on Learning and Thinking, Knowing and Doing and Mutual Reference to Patterns from Home and Abroad: Zhang Boran's Concepts in Cultivating Translation Talents

Abstract: Professor Zhang Boran who was renowned in the fields of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lexicography, has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alent cultivation during his nearly 50 years of dedicated teaching, research, and practice. The students cultivated by him are active in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in China. This paper probes into his concept of talent cultivation, namely “equal emphasis on learning and thinking, knowing and doing, and mutual reference to patterns from home and abroad”, along with his tenet of teaching in accordance with students' aptitude with no social distinction,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alent cultivation in translation studies in China.

Keywords: Zhang Boran, teaching tenets, translation talent cultivation

Author: Wei Guo, Lecturer,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China.

张柏然教授是中国资深翻译家、双语词典编纂家，他一生致力于翻译学与词典学研究与实践，在近五十年的教学、科研与实践中，提出了系统的中国特色翻译学和词典编纂理念，为中国翻译学、词典学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与此同时，张柏然教授重视人才培养，从本科生、硕士生到博士生培养，他总能因材施教、全程参与其中，形成了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的人才培养观。本文探讨并总结了张柏然教授人才培养的主要目标、内容与方法，尝试构建张柏然教授翻译人才培养观，为中国高校翻译学人才培养提供启发与借鉴。

一、学思并举：张柏然教授翻译人才知识结构观

张柏然是一位“融文字、文学与文化的学者”（许钧 65）。他一生钟情于文字推敲、文化探索与翻译实践，译著等身，代表性作品（含合译）包括：马拉默德（Bernard Malamud）的短篇小说《职业的选择》（*A Choice of Profession*）、本奇利（Peter Benchley）的长篇小说《鲨海涛声》（又译《大白鲨》）（*Jaws*）、赫利（Arthur Hailey）的长篇小说《超载》（*Overload*）、毛姆（W. Somerset Maugham）的长篇小说《人生的枷锁》（*Of Human Bondage*）、尤里斯（Leon Uris）的长篇小说《愤怒的群山》（*Angry Hills*）、霍尔特（Victoria Holt）的长篇小说《阿欣顿珍珠项链》（*The Spring of the Tiger*）等。长期的翻译实践，使得张柏然对翻译过程的艰辛深有体会，对双语转换的技巧了然于心，同时，为其翻译课堂教学及翻译人才知识结构培养提供了大量一手素材与经验。

张柏然教授的翻译课堂生动别致、内容丰富，始终围绕两大要诀教导学生展开实践、构建知识结构。其一，翻译要勤于查证。张柏然的查证精神，从其《人生的枷锁》（*Of Human Bondage*）第一章首句“The day broke gray and dull. The clouds hung heavily, and there was a rawness in the air that suggested snow”的翻译处理可见一斑。此句中的“clouds”，原本译作“阴云”，但他隐约记得曾在书中读到过更贴切的中文表达，在书堆里查证数日后，终于在《水浒》中找到“彤云”这一描述，即下雪前密布的浓云，遂将原文改译成“天亮了，天色阴沉沉的。彤云低垂，寒风刺骨，眼看要飞雪花了”（毛姆，《人生的枷锁》1）。读来更为贴切形象，又有据可考。其二，翻译要注重译文的可读性。张柏然拒绝翻译中的“硬译”现象，译文力求贴合译入语的语言习惯。在讲授《大卫·科波菲尔》（*David Copperfield*）汉译本语言转换问题时，张柏然认为，董秋斯汉译本，将原文“with no more hair upon his head (which was a large one, and very shining) than there is upon an egg”译为“他的头很大，亮光光的；上面的头发绝不比一个鸡蛋上的多”，貌似忠于原文，但可读性不佳，症结在于此处英文原文的修辞法不符合汉语的语言习惯，若“硬译”，译文则显晦涩、生硬。他在翻译课堂上，让学生在充分理解原文内容的前提下，抛开原文，修改译文，让译文更符合中文表达习惯。经过数轮探讨，学生提供的译本“他的头发像鸡蛋一样，是个不毛之地”，既还原了英文的比喻修辞，又符合汉语的语言习惯，实属佳译。

除了翻译理念的普及与翻译精神的传递，张柏然教授还高度重视对学生翻译实践过程中

思维能力的培养。早在1990年的全国中青年翻译家笔会闭幕词中，张柏然就强调“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一样重要”（张柏然，《闭幕词》4），后在《毛姆短篇小说选I》（*Short Stories by Somerset Maugham I*）审校者前言中，他再次提及，译者“能将理论与文学翻译实践相结合，是值得肯定的”（4）。在真实的译文审校场景中，张柏然更是言传身教，不遗余力与学生译者反复推敲、打磨措辞，借助翻译理论指导具体实践。以毛姆短篇小说Lion's Skin的标题翻译为例，lion's skin在英文典故中，表示“假威风、假勇气”，学生译者起初将其译为“假威风”，虽能传达原语的言外之意，原文语言的形象性却荡然无存。后改译为“狐假虎威”，学生译者认为该译法保留了原文语言的形象性，但张教授指出该译法归化力度过大，过犹不及。汉语语言极具包容性，多数中国读者“读异国文学是为了欣赏异国作品特有的韵味和语言风格”（姜秋霞、张柏然 56），张教授指出，要实现汉语的包容性及读者对异国文学特色的期待，译文就应涵盖一定异化特色，“狐假虎威”虽保留了原文语言的形象性，却以“老虎”替代“狮子”，导致译文内容失真，同时，降低了汉语的包容性。经过一周的反复研讨，张教授与学生译者最终定稿为“狮皮之虞”，“虞”字形象地传达了原文的言外之意，即欺骗，“狮皮”一词还原了原文的语言特色，扩充了“狮皮”在汉语里的表达力。

二、知行并重：张柏然教授翻译应用型人才培养观

自2007年以来，翻译硕士专业（MTI）教育随着我国专业学位政策的调整和就业市场的需求，获得了飞速发展。截至2021年7月，全国已有262个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点。张柏然教授认为，“当下翻译硕士人才培养重中之重应当加大以实践能力为培养重点的翻译人才教育举措”（张柏然、辛红娟 352）。针对翻译应用型人才培养，张柏然注重的是翻译人才能力与市场需求的结合，他曾援引全国翻译硕士第二轮教学合格评估的结果指出，我国翻译硕士专业学位人才培养在“兼职教师、学生相关专业知识、实习基地、课程建设、专任教师实践能力等方面仍有较大提升空间”（352），在这些问题中，师资队伍、翻译平台建设、翻译实践量与过程管理是三个比较突出的问题。针对上述问题，张柏然建议，各院校应该依据教育部印发的《翻译硕士专业学位教学评估指标》（以下简称《指标》）进行改进。《指标》设定了办学理念、师资队伍、教学资源、教学内容、教学管理和教学质量等6个一级指标，20个二级指标和47个主要观测点，涵盖了“翻译硕士人才培养的方方面面”，凸显了“全程性、全面性和全员性”之“三全”特点，与高等教育中的“全面质量管理原则”非常契合（350）。若能根据《指标》进行改进，我国的MTI人才培养会更好地实现人才能力与市场需求相匹配的目标。

张柏然教授长期致力于双语词典编纂实践与研究，其翻译思想与育人理念很大程度上体现在日常的英汉词典编译工作之中。张柏然是国内语料库词典学创始人之一，他作为主编亲自参与编写的词典多达13部，总篇幅数千万字，还为近20部双语词典撰写了序言。由他主编的《新时代英汉大词典》（以下简称《新时代》）是国内首部利用自建双语语料库研编的大型学习

词典，满足了国内中高级英语学习者的新需求，其原创性受到学界同行与使用者高度评价。《新时代》的编纂原则是以学习者之需为本，务求译义准确精当，配例丰富适用。该词典不仅提供词目译义，还广设短语、成语和整句译例。凡 16 万条译例，译文准确流畅，可让学习者在查证词义之余，提升英汉双语理解、表达能力，渐悟英汉翻译之道。以 smile 词目为例，该词典不仅呈现了 smile 作为动词和名词的 8 种词义，还提供了 43 个相关短语、成语、句子实例，其中，smile 作为动词使用时，分别被译为“莞尔微笑、粲然一笑、嫣然一笑、开颜一笑、笑吟吟的、付之一笑”（张柏然，《新时代》2202-2203）。通过大量译例，编纂者将 smile “译出了不同的合情合理的‘微笑’，不仅译出了原文的意义，也译出了原文的味道”（陈宏薇 54）。此类词目解析与译例，在《新时代》中不胜枚举，可让学习者在查证词义的同时，精进双语表达能力。

在英汉词典编纂教学与实践过程中，张柏然教授特别重视提醒学生关注汉语语言特色的表达及中国传统译论美学思想的体现。他认为，“汉语意合重于形合”（张柏然、张思洁，《意合与形合》54），中国传统翻译美学“以中和为美，讲求和谐；尚化实为虚，讲求含蓄；重感性体悟，讲求综合”（张柏然、张思洁，《中国传统译论的美学辩》27-28）。编纂英汉词典，如何通过译笔将汉语的语言特色和思维模式如实传达出来，是编纂者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新时代》编纂，正是这种翻译思想与实践理念的具体践行。以体现汉语凝练典雅美的四字结构为例，《新时代》中的四字结构译法比比皆是。如：张柏然带领学生团队将“*She moved with an extraordinary spontaneity and grace*”译为“她步履轻盈、仪态万千”，将“*The graceful outlines of the mountains were traced against the sky*”译为“群山优美的轮廓与天空交相辉映”。四字结构的使用，使得汉语的和谐、含蓄与整合之美、汉民族注重中和、内敛与平衡的思维模式尽显无遗。读者在品味译例语义内涵与意境之美的同时，也提升了翻译审美的能力。张柏然教授认为，词典编纂者应具备翻译思想与实践经验，这一理念为我国英汉学习词典译义质量的提升提供了保障。

张柏然教授注重知行并重、学以致用，对双语词典编纂及其价值有独特认知。他认为，双语词典编纂应坚持“汉语语言文化语境下”的英汉双语词典编纂进路，考虑英汉语言差异，尤其注重中国人的外语学习真实需求。双语词典的编纂绝不仅仅是实现语言层面的对译，更要实现双语词典在促进不同文化对话、维护世界语言文化多样性方面的作用。

三、本外共参：张柏然教授翻译研究型人才培养观

译学发展进入新时期，张柏然教授坚持创立中国传统翻译学派，在翻译研究型人才培养过程中，始终坚持圆融中西译论之长、连缀古今人文之萃。针对翻译研究型人才培养，特别是翻译学博士生培养，张柏然教授与许钧教授的理念十分契合，共同倡导建立一种“渊深宏通、胸襟开放和新锐高效的学术创新体制”（许钧 67）。这种学术创新体制在博士研究生培养中主要体现有三：一是博士研究要有理论深度和原创性；二是博士研究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科学的

研究方法、扎实的论证、翔实的研究资料，以保证研究质量；三是博士研究要有开放性和创新性。具体而言，在翻译学人才培养过程中，应注重三种倾向：一是指引导学生用现代观念整理中国的传统译论，探求中国译论的当下价值和意义；二是用创造性思维对西方的译论流派进行学习后创新，让中国特色在世界译论中彰显；三是用中国传统译论的完整性去有效整合西方各类译论的分散性。

张柏然所主持的南京大学翻译研究中心和双语词典研究中心定期举办各种高层次、高规格的学术研讨会议或学术交流活动。他鼓励青年学子参与交流、组织会务，以此开阔视野、培育人脉、促进交流、增长才干。不仅如此，他与许钧教授先后策划主编了《译学论集》、《面向 21 世纪的译学研究》、《译学新论丛书》、《译学新论》等多套（本）翻译学论集或学术专著，为翻译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和翻译学博士研究生）提供学术发表的平台，助推青年的成长。这些论集除汇编国内名家巨擘的论文以外，也会留出适当的篇幅，用于展示青年学者的研究成果。部分丛书编写更是以推荐青年学者作品为旨归，如 2005—2009 年间推出的《译学新论丛书》。这套丛书前后四辑共推出 33 位青年才俊的译学研究最新成果，引荐年轻人进入学界视野，为他们的成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外，张柏然还邀请学生参与主编《中国译学：传承与创新——2008 年中国翻译理论研究高层论坛文集》，不遗余力提携后学，推动译论研究薪火相传。

张柏然认为，中国的传统学术是“以文史哲为主的道德文章教育（即通才教育）”，中国国学大师的成长之路大都是“道德、文章加影响力的‘内圣外王’之道”，是一种“通人治学模式”（张柏然，《顶天立地》3）。西方的译学理论是建立在西方语言特点基础上的，我们不能机械地照搬。然而，当前的翻译学学科建设及人才培养体制，常常照搬西方学科的细分体制，将人文学科中的文、史、哲学分科设置，导致学科分裂弊端日益突显。“任何一个文化大国，它在建设自己的翻译理论体系的时候，都是以本国的翻译经验作为自己最基本的认知材料，作为整个知识体系的骨架和网络”（张柏然，《中国译论》86），然后才是对东西方的原理进行相互参照、取长补短，在此基础上得出更加深层次的结论。“要使我们的翻译理论体系具有中国的优势，就必须重视我们自己的智慧与经验，要养成我们中国式的人文情怀、文化姿态和叙事方式，直接进入中华文明的历史发展的过程，体验和思辨出具有自己文化专利权的原理、原则”（许钧 69）。张柏然认为，翻译学研究型人才培养模式应该回归中国的传统学术模式，注重古今共鉴、本外共参。

张柏然教授提出，建立有中国传统文论特色翻译学的根基是文化自信，立足点是中华民族的语言、文化、思维方式。纵观一千多年来的中国翻译理论，从道安的“案本求信”，到严复的“信达雅”，再到傅雷的“神似”说和钱钟书的“化境”论，都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思维方式，都根植于中华民族的审美思想。在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的思维方式和审美思想的基础上，构建符合中国语言文化特色的翻译理论体系，是符合学科理论发展特征的。秉持着这种文化自信与学科理念，张柏然在翻译研究与教学的过程中，特别注重培养学生的中国古典哲学、美学思想，他认为“只有加强国学素养的培育，才能积极应对业已出现的人才培养瓶颈，培养出有

担当、有情怀、有使命感的高层次翻译人才”（张柏然、辛红娟 338-39）。张柏然教授的宏观指引以及他对中国文化、中国翻译理论根基的信心激励着中青年翻译学人积极挖掘中国译论的当下价值、创新式整合西方各类译论。学生姜秋霞、刘华文、张思洁、辛红娟、祝朝伟和吴志杰等十余人，都在翻译研究和国学素养积累的过程中，不断阐释有中国古代文论特色的翻译理论、整合西方各类译学观点，构建中国翻译理论体系。

张柏然教授的第一位博士生姜秋霞在中国翻译哲学与美学的思考之上，致力于敦煌文化翻译与传播，领衔开展敦煌文化关键词译介与研究，为敦煌文化走向世界开辟了一条快车道。“敦煌文化作为古丝绸之路文化的结晶，是集宗教、艺术、科技、文学、医药、农业、建筑、民俗等内容于一体的综合文化体系，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精神、深厚的中西文化思想和独特的文化形式”（姜秋霞）。对敦煌文化的翻译与传播研究，是从中华民族的语言与文化现实出发展开的研究，顺应张柏然教授的中国翻译学建设理念、符合他为祖国文化的传承而培养翻译研究型人才的本衷。

如果说姜秋霞是张柏然教授探求、归纳中国传统译论理念指导下的代表性人才，他的另一位博士生祝朝伟则是借鉴、整合西方优秀译论理念指导下的杰出代表。祝朝伟在教学与研究中注重西方阐释学对中国翻译研究的借鉴意义，借助外位参照丰富中国译学理论的阐释力与阐释范围。“打通中西”已成为他为学为师的信条：在翻译研究中，注重当代西方文论与中国传统译论的结合，既借用西方分析性思维，又采纳中国传统哲学、美学观。在高校事务管理及人才培养过程中，则注重当代西方教育教学方式与中国传统教育理念的结合，既努力培养学生批判性、发散性的思维方式，又积极督促学生养成尊师重道、求真向善的求学品质，顺应张柏然教授圆融中西译论之长的翻译研究型人才培养观。

张柏然教授对学生的培养注重因材施教，指导细致入微。以学生刘华文博士论文《中西比较视阈中汉诗英译的主体性审美介入》批改情况为例。张教授的批注多达 35 条，主要集中于中国文论“言、象、意”三者关系的归纳概括及其在诗歌翻译中的运用（贾玉嘉 27）。在肯定学生国学功底扎实、核心观点“圆融中西来观照诗歌翻译”正确的基础上，张教授指导学生“言、象、意”的古代渊源和历史发展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寻，对论文进行了延展与细化，从而营造了更为深入、广阔的探讨空间。在张柏然教授本外共参的翻译研究型人才培养观指引下，刘华文近年陆续出版《翻译诗学》、《差异·认知·界面——汉英翻译三维论》等专著，以求深化、拓展导师思想，实现与导师的学术呼应。本外共参是张柏然研究型翻译人才培养观的重要理念，是其翻译人才培养观主要内容的呈现。

在近五十年的翻译学、双语词典学人才培养过程中，张柏然教授始终注重对学生特质的发掘，深入了解学生的个人素养、能力与学术兴趣，全方位引领学生参与翻译理论研究与实践，真正做到“夫子教人，各因其材”。张柏然的翻译学人才培养观贯穿于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人才培养全阶段，为翻译学本科生提供学思并举的课堂教学与创新思维训练，对翻译学硕士

研究生进行知行并重的理论指引与实践指导，为翻译学博士研究生提供打通古今、中外的研究思路，提出构建中国传统翻译学派的使命。

引用文献 [Works Cited]

- Chen, Hongwei. "New Cultural Considerations in Bilingual Dictionary Making-Comments on the New Age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Foreign Languages and Their Teaching*, no. 2, 2005, pp. 51-54. [陈宏薇:《双语词典编纂的新文化理念——评〈新时代英汉大词典〉》，载《外语与外语教学》2005年第2期，第51-54页。]
- Jia, Yujia. "Academic Resonances in the Commentary of A Dissertation on Translation Poetics." *Journal of Nan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no.1, 2020, pp. 27-30. [贾玉嘉:《翻译诗学论文批注中的学术呼应》，载《南京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第27-30页。]
- Jiang, Qiuxia, and Boran Zhang. "Equivalence or Recreation?: An Analysis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no. 4, 1996, pp. 53-56. [姜秋霞、张柏然:《是等值还是再创造?——对文学翻译的一项调查与分析》，载《外语教学与研究》1996年第4期，第53-56页。]
- Jiang, Qiuxia. "Improving the Ecology of Language to Promote Dunhuang Culture." *China Social Science Today*, 14 Aug. 2018, 003. [姜秋霞:《优化语言生态 对外传播敦煌文化》，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8月14日，第003版。]
- Maugham, W. Somerset. *Of Human Bondage*. Translated by Boran Zhang, et al.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1983. [毛姆:《人生的枷锁》，张柏然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
- . *Short Stories by Somerset Maugham I*. Translated by Hongjuan Xin and Yong Yan, proofread by Boran Zhang. People's Literature, 2016. [毛姆:《毛姆短篇小说选I》，辛红娟、阎勇译，张柏然审校。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 Xu, Jun. "Persistence and Seeking: Zhang Boran's Translation Thoughts and Talent Cultivation Concepts." *Chinese Translators Journal*, no. 3, 2018, pp. 65-70. [许钧:《坚守与求索:张柏然教授的译学思考与人才培养》，载《中国翻译》2018年第3期，第65-70页。]
- Zhang, Boran, and Hongjuan Xin. *Inquires on Translation Studies: New Observations and Reflections on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Studies*. Nanjing UP, 2016. [张柏然、辛红娟:《译学研究叩问录——对当下译论研究的新观察与新思考》。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
- Zhang, Boran, and Sijie Zhang. "Aesthetic Analysi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Translation Theories." *Modern Foreign Languages*, no. 2, 1997, pp. 25-29. [张柏然、张思洁:《中国传统译论的美学辨》，载《现代外语》1997年第2期，第25-29页。]
- . "Parataxis and Hypotaxis." *Foreign Languages and Their Teaching*, no. 7, 1998, p. 54. [张柏然、张思洁:《意合与形合》，载《外语与外语教学》1998年第7期，第54页。]
- Zhang, Boran. "Closing Remarks."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 no. 1, 1991, p. 4. [张柏然:《闭幕词》，载《语言与翻译》1991年第1期，第4页。]
- . *New Age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4. [张柏然编:《新时代英汉大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 . "Standing Firm in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Pursing Innovation in Scientific Output-On the Methodology of Translation Studies."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no. 1, 2007, pp. 1-7. [张柏然:《顶天立地搞科研 领异标新写春秋——翻译理论研究方法论纵横谈》，载《外语教育》2007年第1期，第1-7页。]
- . "Chinese Translation Studies: Rebirth from Fire." *Foreign Languages in China*, no. 4, 2008, pp. 1, 85-86. [张柏然:《中国译论:直面“浴火重生”》，载《中国外语》2008年第4期，第1, 85-86页。]

◇责任编辑:蒋莉华

FLC

国防语言能力研究

美军军事行动命名的概念隐喻研究

——以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为例

◎ 梁晓波 李雪莹

内容提要: 概念隐喻在军事行动命名中具有特殊地位。为了揭示现代战争军事行动命名中概念隐喻的使用特点与机理, 本文以概念隐喻作为理论指导, 通过对 2001 至 2010 年阿富汗战争和 2003 至 2010 年伊拉克战争美军军事行动名称中概念隐喻的研究, 重点考察隐喻运用的类别、语义特征以及所蕴含的命名机制。研究发现, 美军在军事行动命名中广泛使用了概念隐喻, 主要分为动物、人物、工具、自然景象等 10 类概念隐喻。美军军事行动名称中的概念隐喻运用, 对于美军鼓吹军事实力、提振气势、宣扬行动道义、营造舆论、震慑敌军、减轻压力、维护形象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本研究有利于我们进一步认清美军军事行动概念隐喻命名的使用策略和作用。

关键词: 军事行动 命名 概念隐喻 隐喻机制 战争

中图分类号: H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 (2021)03-0123-15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防与军队改革视野下的国防语言能力研究”(16ZDA210)。

作者单位: 国防科技大学文理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72

DOI: 10.19967/j.cnki.flc.2021.03.013

Title: A Conceptual Metaphor Study on the Naming of U.S. Military Operations: The Cases of Afghanistan War and Iraq War

Abstract: Conceptual metaphor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naming military operations.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reveal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mechanisms of the use of conceptual metaphors in the naming of military operations in modern warfare. Based on 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 this study examines conceptual metaphors in the names of U.S. military operations in Afghanistan (2001–2010) and in Iraq (2003–2010) respectively, focusing on the types of metaphors used, the semantic features of the metaphors, and the naming mechanism and reasons.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U.S. military has widely used conceptual metaphors in naming military operations, which are mainly divided into 10 types, including animals, characters, goods, and natural sights. The conceptual metaphors in naming the U.S. military actions have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trumpeting its military strength, magnifying momentum, preaching the morality of operations, manipulating public opinion, terrifying enemy forces, reducing pressure, and beautifying its image. The study helps to further understand the use and functions of metaphorical concepts in the naming of military operations.

Keywords: military operations, naming, conceptual metaphors, metaphorical mechanisms, war

Author: Xiaobo Liang, Professor, School of Liberal Arts and Science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Defense Technology, Changsha, Hunan, China; Xueying Li, School of Liberal Arts and Science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Defense Technology, Changsha, Hunan, China.

隐喻广泛地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不仅仅是一种语言现象，更深深地塑造着我们的思想与行为（Lakoff and Johnson 8）。由于军事活动中军事行动常常需要保密而不能直接暴露其行动内容，或者行动由于使命特殊需要在表述上谨小慎微或者精雕细琢，因此，军事行动命名通常也会使用隐喻的形式。为了更好地了解现代战争中军事行动的命名情况，特别是战争中军事行动命名的隐喻思维及其运用情况，本文专门搜集 2001—2010 年期间美军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场中的军事行动语料，利用概念隐喻理论，对其进行分类、分析和解释。

一、文献综述

命名是人类语言的起点和基础，人类最早最原始的语言就是命名；命名是人类思维认知的起点和条件，是人脑对外界信息复杂加工的表征系统；命名是历史文化积淀的结晶（马鸣春，《命名学的有关理论及探索》41）。目前国内对命名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命名的特性和分类上^[1]。张国庆论述了标准的分类与命名方法，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建立全球标准信息系统的构架需开展的工作，为标准分类及命名提供参考（28，30）。

在军事领域不仅对武器装备和技术、战略战术等进行命名，在军事行动的计划中也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军事行动是军队所从事的主要活动，可以表现为战时军事行动与平时军事行动。战时军事行动主要是为配合赢得战争、战役或小的冲突的胜利而采取的，动用军事人员和武器装备开展的暴力行为；平时军事行动主要表现为为未来战争做准备的、针对某一假想敌人的军事演习演训竞赛，也包括紧急情况下的抗灾抢险等活动（梁晓波，《战争话语》111）。一般来说，军事行动的命名有的显性透明，有的隐蔽难以琢磨，还有的则夸大其词突出威慑，甚至纯属欺骗，未有其实。汤姆金斯（Richard Tomkins）介绍了美军军事命名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关键事件以及一些著名人士对美军军事行动命名的评述，例如美国商标咨询公司创办者和总裁马斯特（S. B. Master）认为语气、发音、节奏、长度都是美军军事命名的重要因素（58-59）。马鸣春指出，军事战略战术的命名方式有：描写说明法、特点剖析法、文化取典法、修辞巧用法等（《军事命名学》171-75），武器装备的命名大致有以下几类：直接陈述法、剖析法、词格巧用法、文化点染法、意识流露法、外语渗透法（190-94）。张晓海等人针对军事命名实体识别任务的特点，提出了一种基于自注意力机制的军事命名实体识别方法（29-33）。

对于命名的概念隐喻研究，国内尚不多见。目前，我们注意到在科技术语的语义发展和翻译领域，白云研究了科技术语的概念隐喻命名，发现科技术语新概念的命名及语义的泛化多是依赖隐喻（55-59）。袁森、万卢阳探讨了科技术语与隐喻之间的联系，认为隐喻一方面创造了新的科技术语，另一方面又使科技术语通俗化（156-57）。在国家形象研究中，杨明星、赵玉倩对外交话语中隐喻的话语特征与语用功能开展了研究（151-59，190）。梁晓波（《国家形象》113-17）和梁晓波、曾广详细分析了概念隐喻在形象以及国家形象构建中的作用（40-45）。梁晓波还研究了 2003 年至 2008 年美军伊拉克军事行动名称中概念隐喻分布情况，结果表明，这

期间美军军事行动名称大量使用概念隐喻,以起到宣示联军的力量、凸显对敌愤怒情绪、突出敌军将受到的强大打击,以及维护国际社会舆论的作用(《战争话语》111-31)。在将概念隐喻应用于战争话语分析的研究中,拉考夫(George Lakoff)研究了美国政府对伊拉克海湾战争有关报道(Web),沃恩(Charles Vaughan)对1982年黎巴嫩危机时期美国的《纽约时报》、以色列的《耶路撒冷邮报》、黎巴嫩的《白天报》(An-Nahar)、巴勒斯坦的《黎明报》(Al-Fajr)四家新闻报纸进行了概念隐喻研究,发现所使用概念隐喻大致可分为军事隐喻、原始的意向、两极性分类和熟悉性意向(61-74)。帕里斯(Roland Paris)对1999年3月20日至1999年6月10日北约对科索沃地区实施轰炸期间美国重要领导人涉及科索沃地区局势的讲话进行了概念隐喻研究,发现其讲话中主要使用了四类历史性隐喻,这些隐喻的运用可以更好地勾起人们对一战、二战乃至越战等战争的痛苦记忆和回忆,引起人们的感情认同,类比强调此次战争的正义性(423-50)。昂德希尔(J. W. Underhill)对2002年9月至2003年5月英国《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上的150篇有关伊拉克战争文章中的概念隐喻进行了研究,发现在报道中通过概念隐喻对有关战争的概念实现了转换,使得其他概念代替了“战争”词汇,从而掩盖了“战争”词汇本身带来的各种不利影响(135-65)。

由上述可知,虽然概念隐喻在命名中发挥重要作用,但学术界对其研究并不多见,军事领域概念隐喻研究更为少见。因此,本文收集了美军开展的两场军事行动的全部名称,在真实多样的语料基础上,揭示现代战争军事行动命名中概念隐喻的使用特点与机理。

二、研究问题与方法

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是新世纪以来美国领导发动、主导实施、全程指挥的大规模战争,具有历时长、参与者多、影响深远等特点(朱同银 123)。然而两场战争在合法性上却值得深入思考。首先,9·11事件使美国突遭恐怖袭击,美国以“反恐”“自卫”的名义发动阿富汗战争,表面上好像做到了“师出有名”。然而在战争实施过程中,美国对国际规制缺乏真心诚意的遵守,特别是绕开联合国采取单边主义行动的任性做法,加之美国发动战争目的的工具性追求日益明显,显然动摇了其合法性根基(126-29)。其次,美军攻打伊拉克可以说是“师出无名”。为了能自圆其说,美国还为打伊找到了两个“莫须有”的借口:一是伊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二是伊与“基地”组织勾结(孙必干 12-13)。

美军自2001年发动入侵阿富汗战争行动,美军对阿富汗的军事行动被统一命名为“持久自由行动(Operation Enduring Freedom)”,对伊拉克军事行动被统一命名为“自由伊拉克行动(Operation Iraqi Freedom)”,行动下又包括许多小的军事行动。因此,有必要对美军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地区军事行动的概念隐喻做一次全面的研究。本文的研究问题为:(1)以美军为首的联军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军事行动命名在概念隐喻方面有何特点?(2)这些军事行动命名中隐含了什么样的命名机制?

本文拟通过互联网收集美军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军事行动的名称,结合概念隐喻理论,对它们进行概念隐喻的定性、分类以及数据统计,以期寻找美军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行动命名的特征及其机制。

文中数据来源和相关信息均通过在 Wikipedia 等网址搜索获得,收集美军阿富汗军事行动的时间段为 2001 年 10 月至 2010 年 12 月,收集美军伊拉克军事行动的时间段为 2003 年 3 月至 2010 年 10 月。除去部分重复和信息不全,共得到名称内容和行动相符且独立的有效的阿富汗军事行动 74 场,伊拉克军事行动 593 场,其年度基本分布见表 1 与表 2。

表 1 美军阿富汗战争军事行动年度分布表^[2]:

年度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数量	5	12	7	8	10	9	13	1	4	5
总数	总数 81, 实际有效数 74									

表 2 美军伊拉克战争军事行动年度分布表^[3]:

年度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数量	61	118	103	89	186	28	7	1
总数	总数 624, 实际有效数 593							

隐喻评判的标准: 隐喻被看作是两个语义范畴之间的单项认知映射 (Lakoff and Johnson 9), 凡是一个范畴的概念被另一个范畴的概念表达出来, 我们认为隐喻也就产生了 (梁晓波,《战争话语》5)。因此, 在对军事行动名称的隐喻性质做判断时, 依照名称与军事行动内容的关系, 若名称在字面上与军事行动内容没有明显关联, 但语义上相关, 便将其视为具有隐喻性质, 例如“战士行动 (Operation Warrior)”名称上没有指明战争时间、地点等要素, 而语义上与军事行动形成关联, 突出军事行动如同战士般的勇猛顽强、战无不胜。此类命名给人很强的隐喻暗示, 因此, 可以将其视为概念隐喻的表达形式。在对隐喻性质做出判断后, 根据其命名所用词语的概念语义特征, 对所有名称进行范畴的再划分, 为接下来的研究提供基础。

三、数据和分析讨论

(一) 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军事行动名称的隐喻分析

根据美军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军事行动的分类, 将它们分为纯军事行动和人道主义救援两大类。两类军事行动在性质上具有本质差异, 前者指的是纯粹的以军事打击、护送、防护、营救或防御为目的的军事行动; 后者是基于人道主义而对受助者提供物质上的支援与帮助。两类军事行动名称所具有的隐喻性质具体情况如表 3、表 4 所示。为更直观地显示概念隐喻数量上的差异, 图 3-1 与 4-1 展示了使用概念隐喻与非概念隐喻的具体统计数据:

表 3 阿富汗战争军事行动名称概念隐喻与非概念隐喻分布表

性质类别	概念隐喻 (55)		非概念隐喻 (19)	
	纯军事行动概念隐喻	人道主义救援隐喻	纯军事行动非概念隐喻	人道主义救援非概念隐喻
数量(74)	50	5	19	0
百分比%	67.6	6.8	25.7	0
	74.3		25.7	



▲图 3-1 概念隐喻与非概念隐喻数量分布图

表 4 伊拉克战争概念隐喻与非概念隐喻分布表

性质类别	概念隐喻 (453)		非概念隐喻 (140)	
	纯军事行动概念隐喻	人道主义救援隐喻	纯军事行动非概念隐喻	人道主义救援非概念隐喻
数量(593)	428	25	130	10
百分比%	72.2	4.2	21.9	1.7
	76.4		23.6	



▲图 4-1 概念隐喻与非概念隐喻数量分布图

如表 3、表 4 所示，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军事行动中，美军军事行动名称的隐喻表达分别占到 74.3% 和 76.4%，远高于非概念隐喻表达。这说明，美军在这两个国家采取的军事行动中，概念隐喻的命名是非常广泛的。下文将对美军在两个国家开展的纯军事行动和人道主义救援行动名称做细致的概念隐喻分析。

(二) 纯军事行动命名中的概念隐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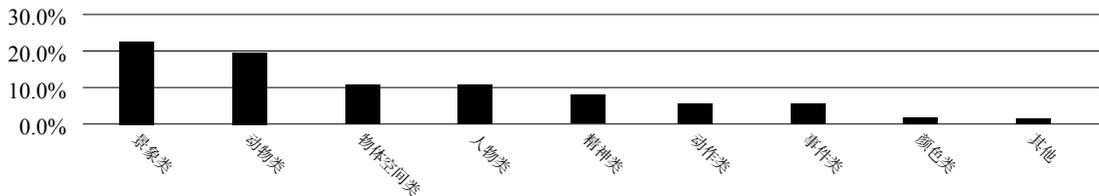
由数据可知，美军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共进行联合军事行动 667 场，其中运用概念隐喻命名的纯军事行动名称有 478 个，占总数的 71.7%。下面将分别对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中纯军事行动名称的隐喻概念加以分析。

1. 阿富汗纯军事行动命名中的概念隐喻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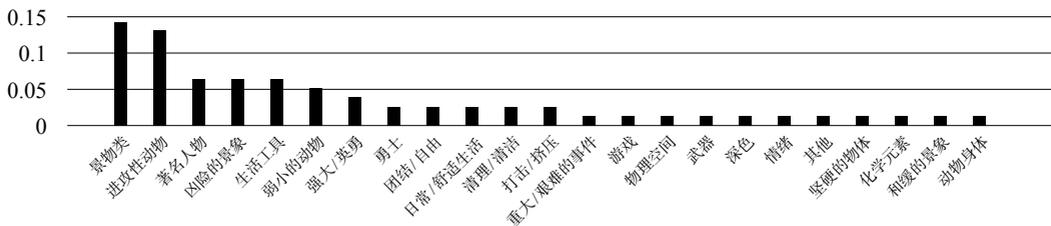
阿富汗战争中采用概念隐喻命名的纯军事行动名称共 50 个，根据其语义特点，本研究将其划分为 9 大类概念隐喻和 23 个亚范畴，占总名称的 67.6%，具体语义范畴类别详情见表 5。

表5 纯军事行动概念隐喻的主要概念及其数量和百分比

隐喻语义范畴	亚范畴 (词汇数量 76)	具体词汇	百分比%
景象类 (17)	景物类 (11)	山 Mountain (9), 树 Tree, 石山 Tor (1)	14.5
	凶险的景象 (5)	雪崩 Avalanche, 闪电 Lightning, 暴风雪 Blizzard, 风暴 Storm, 火山 Volcano (1)	6.6
	和缓的景象 (1)	新黎明 New Dawn (1)	1.3
动物类 (15)	进攻性动物 (10)	蛇 Viper/ Cobra (2) 龙 Dragon, 水雉 Jacana, 蟒蛇 Anaconda, 沙锥鸟 Snipe, 秃鹫 Condor/Buzzard, 鹰 Falcon, 豹 Panther(1)	13.2
	弱小的动物 (4)	麻雀 Sparviero (2), 雷鸟 Ptarmigan, 水母 Medusa(1)	5.3
	动物身体 (1)	翅膀 Wings (1)	1.3
物体空间类 (8)	生活工具 (5)	雪橇 Sleigh 斧头 Hammer, 吸尘器 Hoover, 镐 Pickaxe, 钳子 Pincer(1)	6.6
	武器 (1)	匕首 Khanjar (1)	1.3
	坚硬的物体 (1)	银 Silver (1)	1.3
	物理空间 (1)	港口 Haven (1)	1.3
人物类 (8)	著名人物 (5)	Argus, Apollo, Athena, Neptune, Achilles (1)	6.6
	勇士 (2)	勇士 Warrior, 弓箭手 Archer (1)	2.6
	其他 (1)	独行者 Mavericks (1)	1.3
精神类 (6)	强大/英勇 (3)	决心 Resolve (2) 顽强 Headstrong (1)	3.9
	团结/自由 (2)	真理 Veritas, 共同 Moshtarak (1)	2.6
	情绪 (1)	生气 Anger (1)	1.3
动作类 (4)	打击/挤压 (2)	助推 Thrust, 打击 Counterstrike (1)	2.6
	清理/清洁 (2)	清理/清洁 Sweep (2)	2.6
事件类 (4)	日常/舒适生活 (2)	拖鞋 Slipper, 诗 Accius (1)	2.6
	重大/艰难的事件 (1)	峰会 Summit (1)	1.3
	游戏 (1)	破坏神 Diablo (1)	1.3
颜色类 (1)	危险色 (1)	红色 Red (1)	1.3
其他 (1)	化学元素 (1)	硅 Silicon (1)	1.3



▲图 5-1 纯军事行动宏观概念隐喻语义范畴频率分布图



▲图 5-2 纯军事行动亚属概念隐喻语义范畴频率分布图

从表 5-1 可以看出, 在整个美军阿富汗战争军事行动中, 应用最为广泛的概念隐喻范畴是景象类, 其次是动物类。其中涉及最多的是景物类和进攻性动物亚范畴, 景物类中使用较多的为“凶险的景象”亚范畴, 其中较为突出的隐喻是“山”(Mountain), 多达 9 次。这些隐喻具有庞大、凶险的特点。显然, 使用此类隐喻, 有助于突出美军的强大以及不可阻挡的战斗能力。还有一些命名采用了“弱小的动物”这一亚范畴。这类动物通常具有体型小但难以对付的特点, 比如“麻雀 (Sparviero)”“雷鸟 (Ptarmigan)”“水母 (Medusa)”等, 这类隐喻也有对敌方的讽刺和藐视的意味。

排在第三、四位的概念隐喻是物体空间类和人物类概念隐喻。物体空间类概念隐喻中锋利的“武器 (Khanjar)”与坚硬的“工具 (如 Sleigh, Hammer, Hoover, Pickaxe, Pincer)”这些概念显然都是开展攻击的利器, 有利于显示联军军事行动“力量的强大”, 从而为美军的打击力造势。美军用此概念隐喻, 一方面宣扬了己方的武器装备精良, 起到鼓舞军心的作用; 另一方面, 军事行动拥有这些杀人的利器, 给敌方形成军事威慑力。人物类概念隐喻中“勇士 (Warrior, Archer)”和“希腊罗马神话人物 (如 Argus, Apollo, Athena, Neptune, Achilles)”概念都具有正义、勇猛等特点, 反映美军在命名中注重鼓舞士气, 提高战士的战斗意志和决心。

接下来所使用的概念隐喻范畴分别为精神类、动作类、和事件类, 他们涉及“打击/挤压 (Thrust, Counterstrike)”“清洁/清理 (Sweep)”“重大艰难的事件 (Summit)”和“游戏 (Diablo)”等多个亚范畴, 主要体现了美军战斗力强大, 对敌军形成威慑力。“团结/自由 (Veritas, Moshtarak)”和“日常/舒适生活 (Slipper, Accius)”主要体现了军事行动的正义性。“情绪 (Anger)”突出了美军对自己对手的愤怒。

按照所属概念隐喻范畴的语义相关度再做分析和归类, 可以得到 3 大类的语义空间, 各空间具体军事行动概念隐喻语义域频率排序如下:

1) 表现联军强有力的事物 (39): 军事行动是自然景物 (11) > 军事行动是进攻性动物 (10) > 军事行动是凶险的景象 (5) / 著名人物 (5) > 军事行动是勇士行为 (2) > 军事行动是强大/英勇的行为 (3) > 军事行动是坚硬的事物 (1) / 物理空间 (1) / 重大艰难的事件 (1);

2) 表现军事行动具有威慑效力 (14): 军事行动是生活工具 (4) / 敌军是弱小的动物 (4) > 军事行动是打击/挤压 (2) / 清洁/清理的行为 (2) > 军事行动是武器 (1) / 游戏 (1);

3) 表现军事行动正义性 (6): 军事行动是团结自由的行为 (2) > 军事行动是舒适 / 日常的生活 (2) > 军事行动是愤怒的情绪 (1) / 和缓的景象 (1)。

由以上三个类别的排序, 我们可以看出隐喻命名集中在宣扬联军的强大与勇敢、军事行动的威慑效力以及强调军事行动的正义性, 体现了美军在阿富汗战争中军事行动命名的重要特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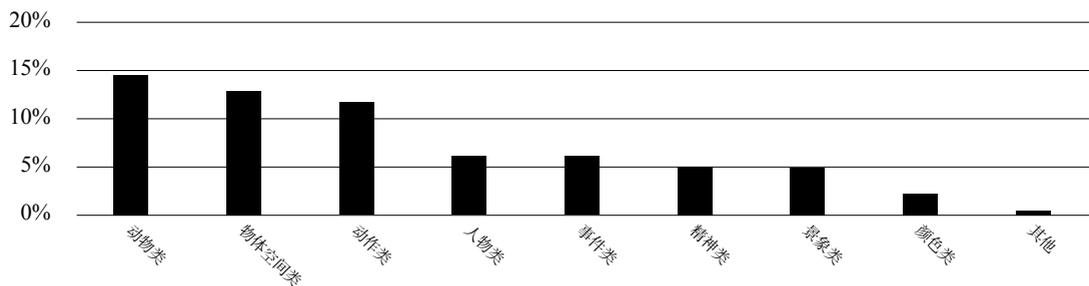
2. 伊拉克纯军事行动命名中的概念隐喻

伊拉克战争中采用概念隐喻命名的纯军事行动名称 428 个, 分属于 9 类概念隐喻和 34 个亚范畴, 占总名称的 72.2%, 具体语义范畴类别见表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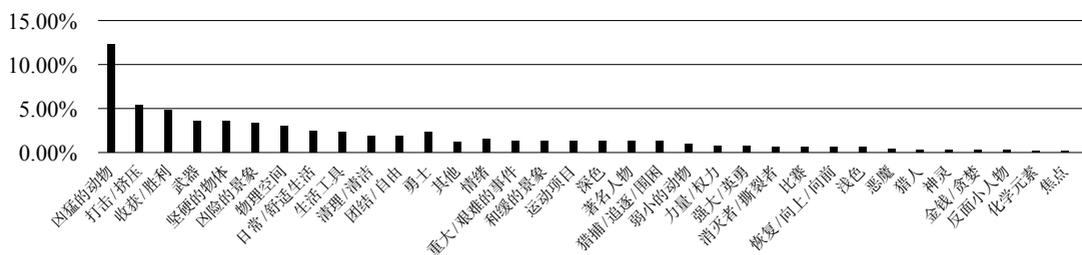
表 6 纯军事行动概念隐喻的主要概念及其数量和百分比^[4]

隐喻语义范畴	亚范畴 (词汇数量 884)	具体词汇	百分比 (%)
动物类 (126)	进攻性动物 (110)	鹰 Eagle/Falcon/Hawk (24) 狼 Wolfhound/Wolverine/Wolfpack/Wolf/Greywolf (13) 龙 Dragon (11) 虎 Tiger, 狮子 Lion (9) 蛇 Sidewinder/Serpent/Cobra/Viper, 牛 Bull (7) 马 Mustang (5) 豹 Panther, 蝎子 Scorpion (4) 熊 Bruins/Grizzly/Bear (3) 斗牛犬 Bulldog, 壁虎 Gecko, 狐狸 Fox (2) 象 Mammoth, 鳄鱼 Gator, 刺猬 Hedgehog, 猫鼬 Mongoose, 蜥蜴 Gecko, 蜂群 Swarmer, 鲨鱼 Shark (1)	12.4
	弱小的动物 (9)	鼠 Rat/Mouse (3) 鸡 Chicken (2) 绦虫 Tapeworm, 跳蚤 Lea, 水母 Medusa, 鲍鱼 Abalone, 羊 Rams (1)	1.0
物体空间类 (113)	武器 (33)	箭头 Arrowhead (6) 剑 Sword/Rapier, 步枪 Rifle (4) 军刀 Saber, 弯刀 Scimita, 三叉戟 Trident, 箭 Arrow, 战斧 Tomahawk (2) 矛 Spear, 盾 Shield, 匕首 Dagger, 弓 Bow, 火箭 Rockets, 烟雾车 Smokewagon, 鞭炮 Firecracker, 刺刀 Bayonet, 战车 Chariot (1)	3.7
	坚硬的物体 (32)	铁 Iron/Steel (23) 石 Stone/Keystone/Rock/Grit (8) 骨头 Bone (1)	3.6
	物理空间 (27)	极地 Polar/Arctic (7) 沙漠 Desert (3) 教堂 Church/Bethel, 半岛 Peninsula (2) 巴士底狱 Bastille, 星球 Planet, 荒地 Badlands, 银行 Banks, 市场 Market, 天堂城市 Paradise City, 走廊 Passage, 洞穴 Cave, 奥林巴斯 Olympus, 木棚 Woodshed, 山脊 Ridge, 西北 Northwestern, 靴山游戏 Boothill (1)	3.1
	生活工具 (21)	斧头 Hammer (10) 捕鼠器 Mousetrap, 碗 Bowl (2) 雪犁 Snowplough, 针 Needle, 橡木棍 Shillelagh, 干草叉 Pitchfork, 大锤 Piledriver, 打桩机 Cornhusker, 砍刀 Machete (1)	2.4
动作类 (100)	打击/挤压 (45)	打击 Strike/Striker (21) 挤压 Squeeze (4) 助推 Thrust (3) 拍打 Slam/Slapshot, 对决 Showdown (2) 扭打 Clinch, 挫败 Checkmate, 挖掘 Dig, 击倒 Knockout, 凿 Drill, 倒 Dump, 割断 Cut, 践踏 Stomp, 压制 Clampdown, 抓住 Snatch, 混战 Scrimmage, 统治 Dominance, 攻击 Jab (1)	5.1
	清理/清洁 (18)	扫除 Sweep (14) Clean/Cleanup (4)	2.0
	猎捕/追逐/围困 (12)	追捕 Hunt/Pursuit (8) 围困 Trap (4)	1.4
	收获/胜利 (11)	收获 Harvest (4) 胜利战争 Chosin/Bull Run, 火炬 Torch (2) 胜利 Victory (1)	1.2
	力量/权力 (8)	力量 Force/Fist (3) Power, Right (1)	0.9
	恢复/向上/向前 (6)	前进 Forward 贮存 Stocking/Restoring/Restore (3) 填充 Stuffer, 升起 Rising (1)	0.7

人物类 (55)	勇士 (20)	战士Warrior, 卫士Guardian (5) 火箭手Rocketman, 角斗士Gladiator, 大力士Piledriver, 开拓者Trailblazer, 狙击手Sniper, 十字军Crusader, 登山者Mountaineers, 斗牛士Matador, 将军Shogun (1)	2.3
	著名人物 (12)	Geronimo (2) Tyr, Tyche, King Tut, Hermes, Brutus, Bellicose Bastia, Hoplite, William Wallace, Pericles, Sawlatal-Fursan (1)	1.4
	其他 (11)	公爵Duke (2) 人群蜂拥Stampede, 马肩Sweeney, 药剂师Therapist, 商人Dealer, 淘金者Gold Digger, 自杀国王Suicide kings, 游侠Ranger, 小矮人Little Man Brief, 勤勉工作的人Backbreaker (1)	1.2
	消灭者/撕裂者 (6)	破坏者Breaker/Destroyer/Punisher/Ripper (5) 掠夺者Raider (1)	0.7
	猎人 (3)	猎人Hunter (2) Predator(1)	0.3
	反面小人物 (3)	海盗Viking (2) 盗贼Rogue (1)	0.3
事件类 (54)	日常/舒适生活 (22)	瓷器店Chinashop (2) 你好Aloha, 仙境Wonderland, 河桥River Bridge, 开窗Open Window, 自由快车Liberty Express, 新一天New Day, 黄色海滩Beach Yellow, 安全邻居Safe Neighborhood, 安全救援Safety and Security, 伊拉克家庭保护者Iraqi Home Protector, 春假Spring Break, 捏桔子Tangerine Pinch, 挤橘子Tangerine Squeeze, 安全教学Safe Teach, 三重奏Triple Play, 三部曲Trifecta, 松木Larch Wood, 电力线Powerline, 河边散步River Walk, 故乡Mawtini (1)	2.5
	重大/艰难的事件 (13)	手术Jaws/Ameliyet, 集会Block Party (2) 工业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 峰会Lofty Summit, 裁军Disarmed, 边境警察Diyala Border Police Audit, 多方救援Mutual Security, 崎岖Marne Rugged, 大胆行动Bold Action, 北方冒险Northern Venture, 斋月Ramadan (1)	1.5
	运动项目 (13)	潜水Dive (4) 赛马Quarterhorse Rides/ Stallion Run (2) 铁子弹Iron Bullet, 岩滑Rock Slide, 竞技Centaur Rodeo, 后卫Linebacker, 全垒打Home Run, 争球Scrum, 先锋Vanguard (1)	1.5
	比赛 (6)	Fiesta Bowl (2) Rose Bowl, Cotton Bowl, Turkey Bowl, Shank (1)	0.7
精神类 (45)	团结/自由(18)	自由Freedom/Liberty (6) 团结Unified/Unity/Solidarity (4) 正义Justice(5)和平Peace (2) 希望Hope(1)	2.0
	情绪 (15)	愤怒Fury(12)/Rage/Raging(3)	1.7
	强大/英勇 (7)	决心Resolute/Resolve (6) 英勇的Valiant (1)	0.8
	恶魔 (3)	恶魔Devil (2) Demon (1)	0.3
	神灵 (2)	神灵God (2)	0.2
景象类 (40)	凶险的景象 (27)	雷Sergeant/Thunder (7) 闪电Lightning, 风Hurricane/Tornado/Typhoon/Tempest (6) 旋风Cyclone/Storm (4) 雪Blizzard (2) 雾Haze雪崩,Avalanche (1)	3.1
	和缓的景象 (13)	光明Light (5) 黎明Dawn, 日出Sunrise (4)	1.5
颜色类 (19)	艳色 (11)	红色Red (6) 黄色Yellow (2) 紫色Purple, 绿色Green, 金色Golden(1)	1.0
	暗色 (9)	黑色Black (5) 白色White, 灰色Grey (2)	0.7
其他(4)	金钱/贪婪 (3)	金钱Money/Sterling (2) 贪婪Avarice (1)	0.3
	焦点 (1)	焦点Focus (1)	0.1



▲图 6-1 纯军事行动概念隐喻语义范畴频率分布图



▲图 6-2 纯军事行动亚属概念隐喻频率分布图

如表 6 和图 6-1、6-2 所示，在纯军事行动的命名中，概念隐喻有着较广泛的应用，涉及了 9 类隐喻范畴，34 个亚范畴，其具体特征如下：

从表 6-1 可以看出，在整个美军伊拉克战争军事行动中，应用最为广泛的概念隐喻是动物类范畴，其中涉及最多的是“进攻性动物”，其亚范畴涉及 21 种动物。其中使用最多的是“鹰 (Eagle / Falcon / Hawk)”这个概念，使用次数多达 24 次，其他使用相对较多的概念包括“狼”(13 次)、“龙”(11 次)、“虎”(9)、“狮子”(9 次)等。命名中还少量使用了“弱小的动物”亚范畴，比如“鼠 (Rat / Mouse)”“绦虫 (Tapeworm)”“水母 (Medusa)”等，这类概念隐喻与阿富汗战争军事行动名称中的概念隐喻较为一致。

排在第二位的概念隐喻是物体空间类范畴。“武器”和“生活工具”是战斗和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工具，往往具有锋利、打击力等特点，可以明显提高战斗效率。此类概念隐喻所起到的作用与前文一致。

第三位应用较为广泛的概念隐喻范畴是多样化的“力量动作”，其所包含的 6 类亚范畴在语义上有强大、凶猛等特点，如，“打击 (Strike / Striker)”使用了 21 次，“挤压 (Squeeze)”4 次，“助推 (Thrust)”3 次，“扫除 (Sweep)”14 次，“扫除 (Clean / Cleanup)”4 次。如此的概念隐喻命名，有利于展示联军的打击能力与战斗力，形成军事威慑力。

排在第四位的概念隐喻是“人物”。“勇士 (Warrior / Guardian / Rocketman)”“猎人 (Hunter / Predatorc)”“海盗 (Viking)”“著名人物 (Geronimo / Tyr / Tyche / King Tut / Hermes)”等概

念都具有勇猛、顽强、不可战胜、不达目的不罢休等特点，反映美军在命名中注重鼓舞士气，提高战士的战斗意志和决心。

第五位是事件类概念隐喻。“舒适 / 美好生活”亚范畴充分表现了美军所宣扬的军事行动是为了所谓“为伊拉克人民争取幸福生活”，“维护伊拉克国内人民的美好生活”等舆论。“重大或艰难的事件”说明虽然军事行动进行相对艰难，但有重大意义，也预示着行动必将取得胜利。“体育项目”和“比赛”这两个亚范畴也是为了强调联军军事力量的强大，喻示开展军事行动就如同参加体育项目一样简单。

第六位是精神类概念隐喻。“自由 / 团结 (Freedom/Liberty/Unified)”和“神灵 (God)”范畴突出战争的“正义性”，彰显神的旨意，表明这些军事行动是为所谓的“自由”而战，照应伊拉克国内以及国际舆论。情绪范畴主要体现是“愤怒” (Fury / Rage)。美军以 9·11 事件为借口发动此次军事行动，“愤怒”表达了美国国内民众的情绪，以此维护国内舆论氛围，获得国内民众支持，同时也借此宣扬美军所谓的战争“正义性”。“强大 / 英勇”范畴突出美军的强大，是为了鼓舞士气，提升战斗力。“恶魔类”则说明军事行动的残酷，给敌军形成威慑力。

第七位的概念隐喻是自然界的景象，这一类概念隐喻被分为两个概念亚范畴，分别是“凶险的景象”与“和缓的景象”。这类隐喻在语义上从两个侧面凸显了美军军事行动的强大与正义形象。一方面，“凶险的景象”这一概念隐喻突出美军的强大攻击力如同强大的自然景象一样不可阻挡；另一方面，“和缓的景象”又给人以希望，预示美方的军事行动会给伊拉克人民带来美好平静的生活，给美军的军事行动增添保护色。

排在第八位的是颜色类概念隐喻。这些颜色概念，在语义上往往会勾起人们对战争破坏、流血、残酷的映像。显然，如此的概念隐喻命名，从认知上烘托了气氛，突出了战争的残酷。

如果按照所属概念隐喻范畴的语义相关度再做分析和归类，可以得到 4 大类的语义空间，各空间具体军事行动概念隐喻语义域频率排序如下：

1) 军事行动是强有力的事物 (279)：军事行动是进攻性动物 (110) > 军事行动是勇士 / 猎人 / 破坏者 / 撕裂者 / 著名人物 (38) > 军事行动是坚硬的事物 (32) > 军事行动是凶险的景象 (30) > 军事行动是物理空间 (41) > 军事行动是重大 / 艰难的事件 (13) > 军事行动是作用力 (8) > 军事行动是强大 / 英勇的行为 (7)。

2) 军事行动具有威慑效力 (186)：军事行动是打击 / 挤压 / 清洁 / 清理 / 追捕 / 追逐 / 围困 / 恢复 / 向上 / 向前行为 (89) > 军事行动是武器 / 生活工具 (54) > 军事行动是体育项目 / 比赛 (19) > 军事行动是深颜色词 (13) > 军事行动是打击海盗 / 交易商等“人物” (11)。

3) 军事行动是为了美好伊拉克 (44)：军事行动是舒适 / 日常生活 (22) > 军事行动是和缓的景象 (13) > 军事行动是浅颜色词 (9)。

4) 军事行动是正义的行为 (35)：军事行动是为了团结 / 自由的行为 (18) > 军事行动是民众的情绪 (15) > 军事行动是神的旨意 (2)。

由以上四个类别的排序，我们可以看出隐喻命名基本集中在宣扬美军的强大与勇敢、军事

行动的威慑效力, 凸显军事行动是为了造福伊拉克人民以及军事行动的“正义性”, 体现了美军在伊拉克战争军事行动中命名上的概念隐喻思维特点。

综上所述, 美军两场战争中的军事行动命名都注重对强大的联军军事力量以及对敌军威慑效力的刻画, 同时对军事行动的“正义性”略有提及。对比两场战争中的军事行动, 我们发现由于美军藉由 9·11 发动阿富汗战争, 入侵战争貌似“师出有名”, 因而在命名中并没有花费笔墨说明战争是为了“造福当地人民”, 而在“师出无名”的伊拉克战争中, 其“美好伊拉克”的语义域甚至高于宣扬战争的“正义性”, 可以看出美军为赢得伊拉克国内民众的支持确实在军事行动命名上花费了不少心思。

(三) “人道主义”行动命名中的概念隐喻

阿富汗“人道主义”行动仅有 6 次, 均采用概念隐喻手段命名, 分别为:“闪电侠行动 (Operation Flashman)”“凯尔特人行动 (Operation Celtics)”“警戒行动 (Operation Vigilance)”“骄傲狮子行动 (Operation Lions Pride)”“暗黑破坏神网行动 (Operation Diablo Dragnet)”“学校之家行动 (Operation School House)”。从中可以看出尽管是“人道主义”行动, 但除“学校之家行动 (Operation School House)”名称中隐喻概念略显温和外, 其余隐喻概念更突出行动的严肃性以及美军高高在上的形象。

伊拉克“人道主义”行动共 35 次, 其中以概念隐喻命名的共 25 个, 占该类行动名称总数的 71.4%, 其名称中的隐喻概念多体现在两方面: 1) “人道主义”行动是“美好伊拉克的行为”, 如“巴格达是美丽的 (Operation Baghdad is Beautiful)”“帮助行动 (Operation Helping Hand)”; 2) “人道主义”行动显示联军的“强大”, 如“老虎关怀行动 (Operation Tiger Care)”与“狮子仔行动 (Operation Lion Cub)”。从中我们可以看出, 其命名中的隐喻概念多体现出行动的“和平温情”的一面 (梁晓波, 《战争话语》122)。

综上所述, 美军在两场战争中的“人道主义救援”行动整体体现了联军力量的“强大”与施舍者高高在上的形象。但由于战争发起原因略有不同, 美军伊拉克地区的“人道主义救援”更多表现出“温情”的一面, 体现出是对伊拉克地区与人民的“援助”。这一点在阿富汗“人道主义救援”行动中仅有一次, 更多体现了联军强硬的形象。

(四) 军事行动概念隐喻命名机制及理据

根据两场战争军事行动名称中的隐喻概念、语义频率分布及其特点, 我们可以看到, 美军军事行动概念隐喻的命名有如下的机制:

1. 纯军事行动概念隐喻命名机制

由上述讨论可知, 美军中东地区纯军事行动命名中的概念隐喻具有如下命名机制:

1) 命名重视凸显联军的“勇猛与不可战胜”, 主要通过自然界中凶猛的动物、强大的事物及勇敢的人物来喻指美军或联军, 具体表现为“山 (Mountain)”“勇士 (Warrior / Guardian /

Rocketman)”“猎人 (Hunter / Predator)”“撕裂者 (Breaker / Destroyer / Punisher / Ripper)”“坚硬的事物 (Iron / Steel / Stone / Keystone / Rock / Grit / Bone)”“凶险的景象 (Lightning / Sergeant / Thunder / Hurricane)”“物理空间 (Polar / Desert / Peninsula)”等概念隐喻, 此类概念隐喻往往体现了行动勇猛、强打击力、坚不可摧的特点, 众多隐喻概念形成美军军事力量的“强大”“不可阻挡”的语义域, 借此来鼓舞士气, 提高战斗力。

2) 命名重视凸显对敌军心理的震慑与打击, 主要通过不同的攻击性武器、不同的攻击性动作及对抗性极强的比赛来喻指美军的战斗力, 具体体现为“武器 (Arrowhead / Rifle / Saber)”“打击与清扫 (Strike / Squeeze / Thrust / Clean / Sweep)”“橄榄球比赛 (Fiesta Bowl / Rose Bowl / Cotton Bowl / Turkey Bowl)”等概念隐喻的使用, 突出表现了美军在伊拉克阿富汗战场上武器的杀戮性、打击的多样性和彻底性、竞争的高烈度性和紧张性, 以对敌军起到强大的威慑作用。

3) 命名重视凸显战争的“正义性”或是粉饰战争的“合法性”, 主要通过愤怒情绪、自由与正义及希望与神的旨意来喻指美军或联军军事行动的合理性, 具体体现为“愤怒 (Anger / Fury / Rage)”“自由和正义 (Freedom / Liberty / Justice / Peace)”“追求美好、希望、神的旨意 (Wonderland / Liberty Express / New Day / Dawn / Sunrise / Light / Hope / God)”等概念隐喻, 强调军事行动的“正义性”与“合法性”, 以此获得国内以及国际舆论的支持。“舒适的日常行动”, “和缓的景象”等概念隐喻说明军事行动是为了使当地地区和人民生活更加“美好”, 以此粉饰战争的“正义性”, 获得伊拉克国内群众的支持, 展示联军是“正义之师”。

4) 命名重视凸显对敌军的藐视、蔑视与嘲讽, 主要通过臭名昭著的人物和弱小的动物来喻指敌军, 具体体现为使用“海盗 (Viking)”“流氓 (Rogue)”等侮辱性和“麻雀 (Sparviero)”“羊 (Ram)”“鸡 (Chicken)”等概念隐喻来表现敌军军队战斗力羸弱, 终日躲藏, 难逃宰杀, 实现对敌军的讽刺与蔑视, 进一步凸显美方的“强大”和敌方终将被“消灭”的命运。

2. “人道主义救援”行动命名机制

由上述讨论可知, 美军中东地区“人道主义救援”行动命名中的概念隐喻具有如下命名机制:

1) 命名注重采用“美好、美好的事物/意愿”来隐喻救援行动, 突出行动的美好与善意。具体来说, “巴格达是美丽的 (Operation Baghdad is Beautiful)”“绿洲行动 (Operation Oasis)”“善意行动 (Operation Goodwill)”等主要通过使用“美丽的 (Beautiful)”“绿洲 (Oasis)”“善意 (Goodwill)”等概念, 突出行动是为了“美化”当地地区以及为“造福”当地人民的行为, 以此来突出行动的目的。

2) 命名注重采用“勇猛的动物和正能量动词”来隐喻“人道主义救援”, 突出对联军“高大形象”的塑造。部分名称如“狮仔行动 (Operation Lion Cub)”“老虎关怀行动 (Operation Tiger Care)”“黑鹰城市行动 (Operation Black Eagle City)”“福利日 (Operation Benefit Day)”等主要通过动物 (Lion Cub, Tiger Cub, Black Eagle) 与美好行为 (Harvest, Benefit, Strike) 等概念, 显示联军“强大”的军事力量, 形成威慑力。从中我们也不难发现“人道主义救援”名

称中的概念隐喻更偏“温和美好”，突出行动的性质。

从总体上看，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活动，无论是纯军事行动还是“人道主义救援”都注重对行动名称的隐喻表达。首先，在纯军事行动对抗中，由于经常发生流血、射杀、打击等情况，使用概念隐喻可以大大隐去军事行动所充斥的暴力与流血。同时，对内具有鼓吹“军事力量强大”“提高士气”“提升战斗力”的作用；对外也具有维护形象，威慑敌军，宣扬“行动道义”，维护舆论的效果。其次，对于“人道主义救援”行动，其主题往往体现“和平”与“温馨”，命名时所使用的隐喻概念也更偏温和，或者突出强调行动“人道主义”性质，显示联军的“强大”。最后，从战争的出发点考虑，对于“师出无名”的战争，美军挖空心思地宣扬战争的“正义性”，企图粉饰战争，以获得更多舆论支持。因此，美军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地区的军事行动名称主要体现了美军注重系统性使用概念隐喻来塑造对自身有利的形象，特别是利用概念隐喻来提升战斗士气，宣扬“行动道义”，营造舆论，震慑敌军，减轻压力，维护形象，粉饰其行动“正义性”等命名机制与特点。

注释 [Notes]

- [1] 关于命名标准的分类类型、方案等，参见麦绿波：《命名标准的研制方法》，载《标准科学》2008年第9期，第29-35页。关于名称的特征、策略及标准，参见冯志伟：《科技术语古今谈》，载《术语标准化与信息技术》2005年第2期，第5-9页。关于历史阶段的命名，参见冯天瑜：《历史分期命名标准刍议》，载《文史哲》2006年第4期，第52-56页。
- [2] 74场战争按照战争名称、发生时间、发生地点、作战目的在Wikipedia上分别有收录。其中1场行动（Battle of Fallujah）（2004）具有两个名字，将其记为一次军事行动；另外30次军事行动只包含了名称而未有其他战争要素（时间、地点、目的），被记为无效军事行动。
- [3] 研究中词汇均来自军事行动中主要隐喻概念词，例如，“壁虎行动（Operation Gecko）”中，仅记录“壁虎（Geck）”。

引用文献 [Works Cited]

- Bai, Yun. "Terminology an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Terminology an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no. 4, 2015, pp. 55-59. [白云：《科技术语与语言哲学问题》，载《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5年第4期，第55-59页。]
- Lakoff, George. "Metaphor and War: The Metaphor System Used to Justified War in the Gulf." [EB/OL]. www2.iath.virginia.edu/sixties/HTML_docs/Text/Scholarly/Lakoff_Guff_Metaphor_1.html and www2.iath.virginia.edu/sixties/HTML_docs/Text/Scholarly/Lakoff_Guff_Metaphor_2.html. 1991. 2021-07-23.
- Lakoff, George and Mark Johnson. *Metaphors We Live By*. Chicago UP, 1980.
- Liang, Xiaobo. *War Discourse: A Study Viewed from Conceptual Metaphor*. Henan UP, 2011. [梁晓波：《战争话语的概念隐喻研究》。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1。]
- . "Conceptual Metaphor Molding of National Image." *Journal of Hubei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no. 2, 2013, pp. 113-17. [梁晓波：《国家形象的概念隐喻塑造研究》，载《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第113-117页。]
- Liang, Xiaobo, and Guang Zeng. "The Image Evaluation and Construction Function of Conceptual Metaphor." *Foreign Language Research*, no. 5, 2016, pp. 40-45. [梁晓波、曾广：《概念隐喻的形象评价与建构功能》，载《外语研究》2016年第5期，第40-45页。]
- Ma, Mingchun. *Military Nomenclature*. Xinjiang UP, 2004. [马鸣春：《军事命名学》。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2004。]
- . "The Theory and Exploring of Nomenclature." *Journal of Engineering College of Armed Police Force*, no. 3, 2012, pp.

- 41-46. [马鸣春:《命名学的有关理论及探索》,载《武警工程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第41-46页。]
- Sun, Bigan. "Rereading the Iraq War." *Arab World Studies*, no. 2, 2006, pp. 11-16. [孙必干:《重读伊拉克战争》,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06年第2期,第11-16页。]
- Tomkins, Richard. "From 'Blue Key' to 'Justice': Talking about the Naming of Military Operations." Translated by Cheng Zheng, *Digest of Foreign Social Sciences*, no. 5, 2002, pp. 58-59. [汤姆金斯:《从“蓝匙”到“正义事业”——漫谈军事行动命名》,郑诚译,载《国外社会科学文摘》2002年第5期,第58-59页。]
- Paris, Roland. "Kosovo and the War Metaphor." *The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no. 3, 2002, pp. 423-50.
- Underhill, James William. "The Switch: Metaphorical Representation of the War in Iraq from September 2002—May 2003." *MetaphoKkde*, no. 5, 2003, pp. 135-65.
- Vaughan, Charles. "A Comparative Discourse Analysis of Editorials on the Lebanon Crisis 1982." *Ashgate*, 1995, pp. 61-74.
- Yang, Mingxing, and Yuqian Zhao. "Strategies for Translating Diplomacy-Serving Metaphor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hinese Translators Journal*, no. 1, 2020, pp. 151-59, 190. [杨明星、赵玉倩:《“政治等效+”框架下中国特色外交隐喻翻译策略研究》,载《中国翻译》2020年第1期,第151-59,190页。]
- Yuan, Sen, and Luyang Wan. "Research on Terminology Translation in the Information 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rminology Metaphor: Taking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tyle as an Example." *Information Recording Materials*, no. 1, 2019, pp. 156-57. [袁森、万卢阳:《从术语的隐喻角度研究信息化时代术语翻译——以科技文体为例》,载《信息记录材料》2019年第1期,第156-57页。]
- Zhang, Guoqing. "Standard Classification and Naming." *Modern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o. 21, 2011, pp. 28, 30. [张国庆:《标准的分类及命名》,载《现代农业科技》2011年第21期,第28,30页。]
- Zhang, Xiaohai, et al. "Military Named Entity Recognition Based on Self-Attention Mechanism." *Command Control & Simulation*, no. 6, 2019, pp. 29-33. [张晓海等:《基于自注意力机制的军事命名实体识别》,载《指挥控制与仿真》2019年第6期,第29-33页。]
- Zhu, Tongyin. "An Analysis of the Legitimacy of Three Major Wars the United States Waged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Global Review*, no. 5, 2018, pp. 117-35, 161-62. [朱同银:《冷战后美国发动的主要战争的合法性分析——以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为例》,载《国际展望》2018年第5期,第117-35,161-62页。]

◇责任编辑:陈忠平

《外国语言与文化》征稿启事

由湖南师范大学主办的《外国语言与文化》是经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新广出审(2016)5011号]的外语类学术期刊。本刊热切期盼得到社会各界的关心与支持,热忱欢迎广大外语教育工作者和研究者踊跃来稿。现就投稿事宜说明如下:

1. 本刊欢迎以下领域具有独到见解的理论性、实证性和综述性论文:语言与语言学研究、文学理论与批评、区域与国别文化研究、翻译理论与实践、外语教学与测评等,也欢迎介绍相关学科最新动态的新书评介、名家访谈等。
2. 研究性论文篇幅一般在8,000~12,000字左右,综述性文章8,000字以内,新书评介、名家访谈等一般为4,000字左右,特别优秀的稿件可适当放宽字数限制。
3. 为便于匿名审稿,请另页注明作者姓名、性别、出生年份、最后学位、职称、工作单位、通讯地址、电话号码、E-mail地址等。投稿后3个月内若未接到稿件修改意见或录用通知,作者可自行处理。
4. 本刊不以任何形式收取版面费,优稿优酬。
5. 投稿网址:中国知网“腾云”期刊协同采编系统<http://wywh.cbpt.cnki.net>
6. 联系方式:电话0731-88873041,邮箱jflc@hunnu.edu.cn,公众号“外国语言与文化杂志”

基于语料库的社会网络效度分析 ——以美国涉中军事科技报道为例

◎ 马晓雷 李平

内容提要: 本文以美国涉中军事科技报道语料库为例, 分别以读者的心理预期和新闻报道的重大事件为标准, 对基于该语料库生成的社会网络进行效度分析。研究表明: 基于语料库构建的主体关系矩阵与人工构建的主体关系矩阵具有一定的相关性; 以流动中介中心性为指标提取的关键网络节点与新闻报道重大事件中的主要参与者基本一致。研究结果说明基于语料库生成的社会网络具有一定的效度, 尽管该方法仍有进一步改进的空间。

关键词: 语料库 社会网络 效度 军事科技报道

中图分类号: H0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 (2021) 03-0138-09

基金项目: 2019年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基于文本挖掘的中美主流媒体贸易战报道对比研究”(19YBA047)

作者单位: 国防科技大学文理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00

DOI: 10.19967/j.cnki.flc.2021.03.014

Title: A Validity Analysis of Social Networks Extracted from Text Corpora: A Case Study on U.S. News Reports on China's Military Technology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assess the representational validity of the social network extracted from a collection of texts. Taking U.S. news reports on China's military technology as an example, this study compares the network generated from a collection of texts with a similar form of representation produced by human readers, and links the central nodes identified in the network to the key players in the historical events reported by the news articles. The result provides evidence of a moderat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matrix extracted from the corpus and the readers' representation of the texts. The nodes with high flow betweenness centrality in the networks correspond well with the key players identified in the news reports. The study suggests that corpus-based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can be a valid tool for analyzing social reality even though this new method needs further improvement.

Keywords: corpus, social network, validity analysis, news reports on military technology

Author: Xiaolei Ma, Professor, 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Defense Technology, Changsha, Hunan, China; Ping Li, 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Defense Technology, Changsha, Hunan, China.

作为一种系统分析社会关系与结构的方法, 社会网络分析已经成为研究社会现象最有效、最具说服力的工具之一(张存刚等 109; 裴雷、马费成 40; 朱庆华、李亮 179)。该分析将社会主体以及主体之间的关系表征为网络中的节点和连线, 再借助图论、概率论和几何学等方法, 对人类行为的结构和关系特点进行深入的量化分析。近年来, 自然语言处理领域的学者开始尝试基于大规模语料库开展社会网络研究。然而, 相关研究却较少关注以大规模文本为数据来源构建的社会网络是否能够真实反映客观事实。针对这一情况, 本研究以美国涉中军事科技新闻报道为例, 对基于该语料库生成的社会网络进行效度分析, 以验证基于语料库的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一、基于语料库的社会网络分析方法

相比传统利用问卷调查、访谈、实验等方式构建社会网络的数据来源, 语料库在信息的丰富度和可及性等方面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Diesner et al. 329; Agarwal et al. 1202)。以社会网络的形式提取和表征语料库中关于主体和主体行为的信息, 可以引入社会科学的分析视角, 发挥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的优点, 挖掘深层次的人物关系和叙事逻辑。相比传统基于检索行、搭配、词表、语义韵等分析手段的语料库研究方法, 社会网络分析的结果更为直观。基于语料库构建社会网络, 关键在于确定主体及主体之间的关系。主体识别可以采取自然语言处理的实体识别技术, 也可以借助人工筛选判断^[1], 从语料库中提取出事件的主要参与者, 包括人物、组织机构、国家等。而主体关系识别的目的在于统计事件参与者之间的共现关系, 其基本假设是经常被共同提及的参与者之间联系更为紧密。在主体及主体关系识别的基础上, 可以借助UCINET等工具生成以主体为节点、以主体间关系为连线的社会网络。应该说, 语料库在社会网络分析中的意义和价值已得到广泛认可。

然而, 与常规利用访谈、问卷、实验等建构社会网络的数据来源不同, 语料库中蕴含的社会主体以及社会关系需要借助数据挖掘的方式提取。以共现作为标准的社会关系判别方式是否能够有效反映真实情况, 仍然是一个有待验证的问题。在可查文献中, 科尔曼等(Steven R. Corman et al.)利用二次分配程序法(Quadratic Assignment Procedure, 简称QAP)统计机器和人工建构的矩阵之间的相似度, 以此为标准判断通过中心共振分析法(Centering Resonance Analysis)构建的关键词网络是否有效(157-206)。不过, 该研究探讨的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社会行动主体之间的关系网络。塞佩达(Noah Cepela)和达诺夫斯基(James A. Danowski)发现美国总统在社会网络中的地位与其民众支持率成反比, 以此证明基于大规模新闻报道建构的社会网络具有一定的效度(212-18)。但民众支持率受多种因素影响, 将其作为判断社会网络效度的标准值得商榷。总的来说, 基于语料库方法构建的社会网络是否具有效度仍然是一个有待探讨的问题。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问题

本研究旨在以美国涉中军事科技报道为例，回答以下两个研究问题：

1. 在基于语料库构建的社会网络中，关键主体间的关系强度是否与读者的心理预期相一致？
2. 在基于语料库构建的社会网络中，具有高流动中介中心性的关键节点是否与重大历史事件的主要参与主体相吻合？

为回答第一个研究问题，本研究将分别采用语料库和人工判断两种方法建构基于同一批文本的主体关系矩阵，并利用QAP算法统计两个矩阵之间的相似度。我们的假设是，如果基于语料库构建的社会网络是有效的，那么它所反映的主体间关系强度与读者的心理判断应显著相关。

为回答第二个研究问题，我们选择5个新闻报道较集中的年份，分别构建对应年份的社会网络，并通过计算流动中介中心性（flow betweenness centrality）确定各年份社会网络中的关键节点。同时，人工阅读各年份的新闻文本，确定重大历史事件的主要参与者。我们的假设是，重大历史事件中的主要参与者，应得到媒体的高度关注。由于媒体会从多个角度对关键主体进行深入解读，因此其社会网络中的流动中介中心性应显著突出。

（二）研究语料库

本研究的语料来自Lexis-Nexis数据库，数据检索策略为“主题= China + technology + military”，共包含43种美国主流期刊在1980年至2014年间发表的232篇涉及中国军事科技的新闻报道。每一篇新闻均标注有来源、标题、正文、发表年份等信息。数据保存格式为纯文本，共184,666词。

（三）研究过程

针对研究问题一，本研究采取以下步骤：

1. 对232篇新闻报道中的主体进行人工标注。本研究涉及的主体有国家、地区、公司、组织和个人。新闻报道中的个体主体通常具有官方属性，因此通常将其标注为隶属的机构、组织或国家。此外，对同一主体的不同表征形式进行归一处理。经过合并，共确定了66个主体。

2. 统计任意两个主体之间的共现频次。利用自编程序，统计任意两个主体共同出现在同一句话中的频次，从而建立主体之间的关系矩阵。以句子为基本统计单位，是因为句子的意义相对独立，且通常能够完整表达两个或多个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

3. 人工判断关键主体间的关系强度。选择10个频次最高的主体作为分析对象，邀请某高校29名英语专业三年级学生阅读232篇新闻报道的标题和导语，并对10个关键主体之间的关联强度进行评价。评价采用李克特量表，1代表非常不相关，5代表非常相关。计算29名受试评分的平均数，从而得到10个关键主体间的对称关系矩阵。该矩阵代表受试对主体关系的心理

理预期。

4. 利用UCINET软件的QAP correlation功能统计语料库矩阵与人工矩阵间的相关系数。

针对研究问题二，本研究采取以下步骤：

1. 统计 232 篇新闻报道的历史分布情况。根据发文量，确定 1983、1993、1999、2002 和 2007 五个年份作为观测点。集中阅读以上年份的新闻报道，梳理各时期发生的重大事件及主要参与主体。

2. 计算 10 个关键主体的流动中介中心性，并对其进行标准化处理，即以流动中介中心性除以对应年份社会网络中全部主体的流动中介中心性平均值，以衡量各主体在各年份社会网络中的重要程度。

3. 将各年份标准化流动中介中心性最高的节点与人工分析得到的重大事件主体对比，以验证两者是否一致。

三、结果与讨论

(一) 矩阵相似度计算结果

表 1 列出了利用语料库提取的 10 个关键主体之间的共现关系矩阵。可以看出，10 个主体之间的共现强度存在较大差异。强度较高的关系存在于美国和中国之间，在同一个句子中共出现了 3378 次。其它共现频次较高的主体关系包括美国与西方公司(768 次)、中国与西方公司(701 次)、中国与俄罗斯^[2] (361 次)、中国与该公司(350 次)、中国与美国专家(344)、美国与中国公司(333 次)。相比之下，伊朗和中国(台湾)之间的共现频次较低，仅为 1 次。其它共现频次较低的主体关系包括伊朗与欧洲(2 次)、中国(台湾)与中国公司(3 次)、伊朗与以色列(4 次)、伊朗与美国专家(4 次)、中国(台湾)与西方公司(5 次)。

表 1 基于语料库提取的主体关系矩阵

	美国	中国(大陆)	西方公司	中国公司	俄罗斯	美国专家	以色列	中国(台湾)	欧洲	伊朗
美国	0	3378	768	333	300	292	303	156	110	105
中国(大陆)	3378	0	701	350	361	344	289	193	103	93
西方公司	768	701	0	151	28	51	44	5	18	10
中国公司	333	350	151	0	20	26	21	3	10	14
俄罗斯	300	361	28	20	0	34	39	11	11	18
美国专家	292	344	51	26	34	0	32	21	10	4
以色列	303	289	44	21	39	32	0	4	9	4
中国(台湾)	156	193	5	3	11	21	4	0	3	1
欧洲	110	103	18	10	11	10	9	3	0	2
伊朗	105	93	10	14	18	4	4	1	2	0

表2列出了29名被试在阅读232篇新闻的标题和导语之后建构的主体关系矩阵，每一个单元格代表所有被试评分的平均数（精确到小数点后四位）。可以看出，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强度最高，平均值达到5。其它强度较高的主体关系包括中国与台湾（4.1379）、中国与中国公司（4.2759）、中国与俄罗斯（4.1034）、中国与以色列（3.9310）、美国与美国专家（3.8966）、美国与中国公司（3.8276）。相比之下，伊朗和中国台湾的关系强度较弱，仅为2.2759。其它强度较弱的主体关系包括伊朗与俄罗斯（2.3448）、俄罗斯与中国台湾（2.5172）、俄罗斯与西方公司（2.5862）、俄罗斯与以色列（2.6207）、中国台湾与以色列（2.8276）、中国台湾与欧洲（2.8276）。

表2 基于人工判断构建的主体关系矩阵

	美国	中国(大陆)	西方公司	中国公司	俄罗斯	美国专家	以色列	中国(台湾)	欧洲	伊朗
美国	0	5.0000	3.2069	3.8276	3.7931	3.8966	4.1724	4.1379	3.3448	3.8621
中国(大陆)	5.0000	0	3.4138	4.2759	4.1034	3.6207	3.9310	4.3793	3.1379	3.6207
西方公司	3.2069	3.4138	0	3.3103	2.5862	3.1379	2.7931	3.2069	3.2414	2.8621
中国公司	3.8276	4.2759	3.3103	0	3.4828	3.3793	3.1724	3.6552	2.8621	2.8966
俄罗斯	3.7931	4.1034	2.5862	3.4828	0	2.9310	2.6207	2.5172	2.8621	2.3448
美国专家	3.8966	3.6207	3.1379	3.3793	2.9310	0	3.0345	3.3448	3.1379	3.0690
以色列	4.1724	3.9310	2.7931	3.1724	2.6207	3.0345	0	2.8276	2.5862	3.0345
中国(台湾)	4.1379	4.3793	3.2069	3.6552	2.5172	3.3448	2.8276	0	2.8276	2.2759
欧洲	3.3448	3.1379	3.2414	2.8621	2.8621	3.1379	2.5862	2.8276	0	2.5517
伊朗	3.8621	3.6207	2.8621	2.8966	2.3448	3.0690	3.0345	2.2759	2.5517	0

借助UCINET软件的QAP Correlation功能对两个矩阵进行相关性检验，结果表明两个矩阵之间的皮尔逊相关系数为0.572 ($p=0.017$)，具有统计学上的显著意义，说明基于语料库和人工判断两种方法得到的主体间关系矩阵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但也应注意到，两个矩阵之间的相关性并未达到0.8以上的强相关水平，对此我们认为有以下两种情况影响了实验结果：

第一，如果假定人工判断的结果是准确的，说明基于语料库构建的社会网络虽然具有一定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但与真实情况仍有差异。这可能是由于，本研究采用的数据共现统计方法的原理是如果两个主体频繁同时出现，那么两者之间关系紧密，却并未考虑主体之间关系的本质。虽然以往大多数基于语料库的社会网络建构方法采用的共现标准不同^[3]，但都遵循了这一原则。然而，主体间的共现关系可能存在多种性质，如友好关系、敌对关系等，如果不加区分，可能会对统计结果的有效性产生影响。此外，本研究是以句子作为统计共现的基本单位，如果以段落或篇章为统计标准，结果可能会有不同。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达诺夫斯基和塞佩达曾分别以3、10、25、50、100、200个单词作为窗口统计主体共现关系，结果发现所生成的社会网

络并无显著差异(35)。当然,该结论是否具有可推广性仍值得未来进一步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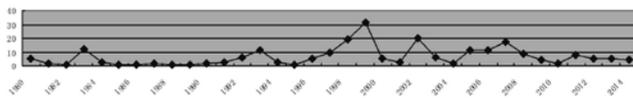
第二,假定人工判断的结果是不准确的。由于时间限制,本研究并未要求受试阅读新闻全文。虽然新闻的标题和导语可以反映其核心思想,但同正文部分相比也可能存在偏差。此外,受试有可能会受其背景知识的影响而未做出客观判断。虽然本研究在数据收集过程中要求受试尽量仅依据新闻阅读的结果判断主体之间的关联强度,但是否能够完全规避背景知识的影响并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情。

以上分析表明,无论哪种情况,本研究结果都表明虽然基于语料库构建的社会网络具有一定的效度,但在解读和应用分析结果的过程中应当保持谨慎,对于可能影响社会网络效度的因素要有足够的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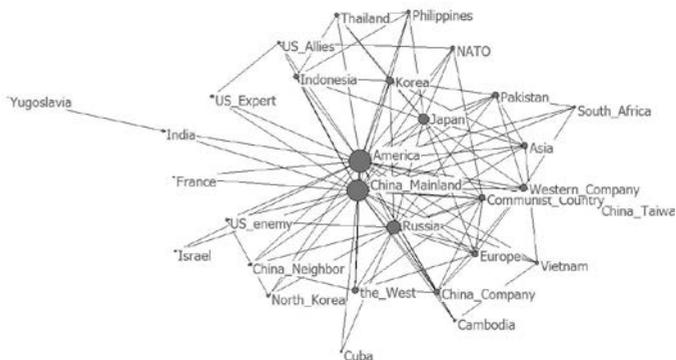
(二) 流动中介中心性分析结果

图1显示了232篇文本在35年间的分布情况。图中有5个相对比较明显的波峰,分别是1983年,1993年,1999年,2002年和2007年。我们推测,在这5个新闻报道较集中的年份,发生了比较重要的涉及中美军事科技问题的历史事件。我们分别以这5个年份的新闻为语料来源,构建了5个美国涉中军事科技报道的社会网络(图2-图6)。

图谱中节点的大小代表度中心性(degree centrality),即网络中与该节点有联系的点的数量,一个节点的度中心性越高,就越接近社会网络的中心。从以上5个图谱可以看出,美国与中国始终处于社会网络的中心。其它一些较重要的主体包括俄罗斯(含前苏联)、日本、以色列、西方公司、中国公司等。同时也可以看出,以上主体在网络中的地位有波动。例如,前苏联(俄罗斯)在1983年网络中的地位明显高于其它年份;又如,以色列在1993年网络中的地位突出,但在其它年份其重要性并不明显。



▲图1 美国涉中军事科技报道年度分布情况



▲图2 1983年社会网络图谱

表 3 各年度关键主体的标准化流动中介中心性^[4]

	1983	1993	1999	2002	2007
美国	8.1702	<u>7.2942</u>	<u>6.9690</u>	9.2264	8.0549
中国（大陆）	8.1819	<u>4.3937</u>	<u>11.9561</u>	10.0870	7.5751
西方公司	0.6107	1.0753	0.4325	<u>5.1364</u>	1.4072
中国公司	0.1121	<u>3.5340</u>	0.1054	0.5920	1.4026
俄罗斯	<u>2.7741</u>	1.0521	0.6080	1.0064	0.6091
美国专家	0.4145	0.0438	0.0982	0.2077	<u>0.8943</u>
以色列	0.0002	<u>2.6137</u>	1.1219	0.0740	0.6884
中国（台湾）	0.0094		0.2124	<u>0.9896</u>	0.6113
欧洲	0.1201	0.9646	0.2889	0.0664	<u>0.9944</u>
伊朗		<u>1.0179</u>	0.1971	0.1828	0.4904

表 3 用粗体和下划线标识出了各主体标准化流动中介中心性的最大值，该值表示主体在相应年份的新闻报道中处于突出地位。为了验证表 3 反映的趋势是否符合事实，我们分别阅读了 5 个年份中的新闻报道。我们推测，在这些年份发生的重大事件是影响主体流动中介中心性的重要因素（见表 4）。

表 4 各年度重大事件及主要参与者

年份	事件	主要参与者
1983	前苏联击落一架韩国客机。美国国防部部长卡斯帕·威拉德·温伯格（Caspar W. Weinberger）访问中国。里根政府希望联合中国对抗前苏联，提出为中国提供武器和军事技术援助。	美国、中国、前苏联
1993	1992 年，中国和以色列建交。该年，美国政府认为并指责以色列向中国输出先进军事技术。同年，美国政府认为并指责中国与巴基斯坦之间的导弹技术合作。中国在美国设立的公司成为美国政府调查和制裁的对象。	美国、中国、以色列、中国公司
1999	中国国家总理朱镕基访问美国。美国政府公布所谓考克斯报告，指责中国窃取美国军事高科技，同时批评克林顿政府的对华高科技出口政策过于宽松。	美国、中国
2002	克林顿访问中国。美国媒体猜测并指责劳拉公司和休斯公司在与中国的商业合作中，泄露了可能用于提高火箭和导弹水平的敏感技术。	美国、中国、西方公司
2007	据外媒报道，中国销毁了一颗报废卫星。美国媒体采访各领域专家，从技术层面解读所谓对美国国家安全带来的挑战。同年，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出台报告，指责中国通过网络攻击等手段获取美国敏感技术。	中国、美国、美国专家

对比表 3 和表 4 可以看出，关键主体的标准化流动中介中心性波动情况与各年度新闻报道的重大事件及主要参与者基本吻合。例如，在 1983 年，前苏联的标准化流动中介中心性远高于其它年份，这与该年度美国希望联合中国对抗前苏联这一主要新闻事件是一致的。又如，1993 年以色列的标准化流动中介中心性达到最大值，这与该年度美国媒体指责以色列与中国军事技术合作的报道相吻合。再如，2002 年美国媒体广泛报道两家美国公司泄露了敏感技术，

在该年度西方公司这一主体的标准化流动中介中心性也因此达到顶点。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基于语料库构建的社会网络与新闻报道的历史事件之间具有较明显的相关性。关键主体的标准化流动中介中心性波动情况，基本能够在历史事件中得到合理的解释，这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基于语料库构建的社会网络具有一定的效度。结合上文讨论的矩阵相似度，我们推测基于语料库构建的社会网络可能在反映关键主体之间的行为关系上具有更好的效度，而对于共现频次较低的主体间关系或许会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偏差。

本研究通过对比基于语料库和人工构建的社会网络，证明了基于语料库的社会网络具有一定的有效性。作为大规模真实文本的集合，语料库蕴含着丰富的知识和信息，如何更好地从语料库中挖掘和利用有价值的信息，是语料库语言学面临的重要挑战（冯志伟 7）。借助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提取和表征语料库中的关键信息，可以挖掘深层次的语义关系，通过引入社会科学的分析视角，可以丰富现有语料库研究的方法和手段。通过社会网络反映出的语义关联，可以更直观地反映出语料库内部元素之间的亲疏远近关系。相比卡方检验、互信息、对数似然值、相关系数等统计手段，中介中心性、网络密度、凝聚子群等社会网络参数也可以为语料库研究提供新的分析视角。

当然，基于语料库与人工建构的社会网络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差异。这意味着在应用基于语料库构建的社会网络时，不能简单认为其效度可靠，而应对其不足之处有充分的认识，未来应继续深入研究产生差异的原因以及进一步提高社会网络效度的方法。值得关注的是，已有学者围绕主体间关系的优化开展研究。例如，塔内夫等（Tanev et al.）利用情感分析的手段来判断主体间关系的态度倾向（20），莱费尔德（Philip Leifeld）和豪恩斯（Sebastian Haunss）以持有相同或相异观点作为统计主体间关系的基本原则（389-90）。此外，针对读者阅读新闻报道的心理过程以及产生的事件认知空间也值得进一步开展研究，相关成果可以为更科学地构建基于语料库的社会网络提供理据。

作为探索性研究，本文还存在不足之处：本研究采用人工标注的方法确定主体，未对语料库中的代词进行消歧处理，存在一定主观性，且研究没有考察不同主体共现关系统计方法之间的差异。未来的研究重点可借助自然语言处理的主体识别技术，对不同社会网络构建方法进行比较，以更好探究该方法的效度。

注释 [Notes]

- [1] 在主体识别上，大多数研究都采用了自然语言处理的实体识别技术，并结合人工筛选来确定语料库中包含的关键人物，部分研究在判断主体过程中还借助了领域专家或主题词典。
- [2] 本研究在标注过程中并未区分俄罗斯和前苏联，将其统一标注为 Russia。
- [3] 在主体关系统计上，以往研究采用的标准各不相同，分别以共同出现在同一个对话、同一个事件、同一个新闻报道或在一定跨距的文本窗口内作为标准。
- [4] 表中的空格表示对应主体未出现在该年份的社会网络中。

引用文献 [Works Cited]

- Agarwal, Apoorv, et al. "Automatic Extraction of Social Networks from Literary Text: A Case Study on *Alice in Wonderland*." *Proceedings of the Sixth International Joint Conference on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edited by Shou-de Lin, et al., Asian Federation of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2013, pp. 1202-1208.
- Cepela, Noah T., and James A. Danowski. "Automatic Mapping of Social Networks of Political Actors from Large Collections of News Stories." *Proceedings of the 2009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s in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and Mining*, edited by Nasrullah Memon and Reda Alhajj, IEEE Computer Society, 2009, pp. 212-18.
- Corman, Steven R., et al. "Studying Complex Discursive Systems. Centering Resonance Analysis of Communication."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vol. 28, no. 2, 2002, pp. 157-206.
- Danowski, James A, and Noah Cepela. "Automatic Mapping of Social Networks of Actors from Text Corpora: Time Series Analysis." *Data Mining for Social Network Data*, edited by Nasrullah Memon, et al., Springer, 2010, pp. 31-46.
- Diesner, Jana, et al. "Extracting Socio-Cultural Networks of the Sudan from Open-Source, Large-Scale Text Data." *Computational and Mathematical Organization Theory*, vol. 18, no. 3, 2012, pp. 328-39.
- Feng, Zhiwei. "Mining Knowledge and Extracting Information from Corpus." *Foreign Languages and Their Teaching*, no. 4, 2010, pp. 1-7. [冯志伟:《从语料库中挖掘知识和抽取信息》,载《外语与外语教学》2010年第4期,第1-7页。]
- Leifeld, Philip, and Sebastian Haunss. "Political Discourse Networks and the Conflict over Software patents in Europe."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vol 51, no. 3, pp. 382-409.
- Pei, Lei, and Feicheng Ma. "The Application of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SNA) in Information Science." *Library Tribune*, no. 6, 2006, pp. 40-50. [裴雷、马费成:《社会网络分析在情报学中的应用和发展》,载《图书馆论坛》,2006年第6期,第40-45页。]
- Tanev, Hristo, et al. "Automatic Expansion of a Social Network Using Sentiment Analysis." *Data Mining for Social Network Data*. Springer, 2010, pp. 9-29.
- Zhang, Cungang, et al.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An Important Sociological Research Method." *Gansu Social Sciences*, no. 2, 2004, pp.109-11. [张存刚、李明、陆德梅:《社会网络分析——一种重要的社会学研究方法》,载《甘肃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第109-11页。]
- Zhu, Qinghua, and Liang Li.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and Its Application in Information Science." *Information Studies: Theory and Application*, no. 2, 2008, pp. 179-83, 174. [朱庆华、李亮:《社会网络分析法及其在情报学中的应用》,载《情报理论与实践》2008年第2期,第179-83, 174页。]

◇责任编辑:易佳

国防语言能力视域下边防语言能力建设SWOT分析

◎ 庞超伟 杨咏运

内容摘要: 当前, 国防语言能力建设的相关研究方兴未艾, 而关于边防语言和边防语言能力的研究却极为缺乏。本研究在简要介绍SWOT理论的基础上, 梳理了边防语言能力的主要内涵和基本特点, 并运用SWOT分析框架, 从国防语言能力视域, 对边防语言能力建设的优势与劣势、机遇与挑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并结合我国边防语言能力的实际, 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 以期为边防语言能力建设提供理论参考。

关键词: 国防语言 边防语言能力 SWOT分析 对策

中图分类号: H0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 (2021) 03-0148-09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防与军队改革视野下的国防语言能力研究”(16ZDA210)

作者单位: 国防科技大学文理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72

DOI: 10.19967/j.cnki.flc.2021.03.015

Title: A SWOT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of Border Defense Language Capability

Abstract: Relevant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defense language capability is on the rise, but there are relatively few studies on border defense language and its capability. On the basis of SWOT analytical framework, this study sorts out the main connotations and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border defense language capability, and uses SWOT theory to analyze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border defense language capac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tional defense language capability. It puts forward constructive suggestions according to the reality of border defense language capability in China in the hope of offering a new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for border language capacity development.

Keywords: national defense language, border defense language capability, SWOT analysis, countermeasures

Author: Chaowei Pang, Professor, School of Liberal Arts and Science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Defense Technology, Changsha, Hunan, China; Yongyun Yang, School of Liberal Arts and Science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Defense Technology, Changsha, Hunan, China.

边境地区的语言文化对维护国家主权、维持地区稳定、促进国际交流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对边境地区语言文化的掌控能力应当成为国防语言能力的一个重要部分。因此,本文从国防语言能力视域着手,运用SWOT分析框架,重点分析边防语言能力建设在当前所面临的优势、劣势、机会和挑战,力求补充和拓展国防语言能力建设的宏观架构,为我国新时期边防语言能力建设提供参考意见。

一、国防语言能力视域下的边防语言能力

国防语言能力,指的是一个国家为满足国防和军事需求、维护和平、应对战争、维护领土和主权完整、保卫国家独立自主、开展军事对外交流和文化传播,在语言储备、建设、发展、运用和保障方面所具有的能力的总和(梁晓波 23)。边防是国防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设国防语言能力必须重视边防语言能力建设。虽然边境地区往往远离一个国家的陆上腹地和经济核心区,但其战略意义却十分重要,这些地区的语言文化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边防语言,指的是国家、机构或人员在边防建设、边界斗争、边境管控、边检事务等边防事业和涉边实践活动中使用的语言。从类别上看,边防语言包括国家法定官方语言、边境地区方言和邻国边境地区通用语言。我国的边防语言主要包括普通话、少数民族语(方)言和外语。边防语言的最大特点就是地域性强,边境地区的边防语言可能并非国家官方语言。同时,边防语言受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与军事实力影响较大,强大的经济与军事实力能使某一跨境语言成为流行的边防语言,例如在美墨边境,英语是通用的边防语言;而在中朝边境和中越边境,汉语是较为流行的边防语言。

从国家层面看边防语言能力,指的是一个国家在其边防建设、边界斗争、边境管控、边检事务中所具备的语言使用和发展能力。国防语言能力建设是服务国家利益的社会工程,而边防语言能力建设则是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国防工程。边防语言能力是国防语言能力的一个重要部分,这两者最显著的特征就是都体现国家综合实力,服务国家安全,维护社会稳定,并促进语言文化繁荣。边防语言能力包括了官方语言、民族语言、境外语言、边境文化和边境话语的使用和发展能力。边防语言能力关乎国家核心利益,它应当包括边防语言战略与政策制定能力、边防语言人才培养使用和发展能力、边防语言储备和发展能力、边防话语运用与传播能力、边防语言资源与技术开发使用能力,等等。

边防语言能力主要有三个特点:1)不可替代性:边防语言能力是从事边防事业必不可少的能力,它在确保边界稳固和边境安宁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不能被经济实力等物质能力所替代;2)基础性:边防语言能力是提升综合国力与威慑力的一种基础能力,它是维护国家领土主权、海洋权益等核心利益的基本武器;3)边疆性:边防语言能力的运用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它的主要施展平台在边界、口岸和海关,它保障了国家的治边方略,在国际友好交往和国际关系经营中具有重要作用,在边界斗争中也可以发挥超过武器的效用,在边界会谈会晤中具

有立竿见影的实战效益。因此，边防语言能力应当成为边防军事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语言问题往往关系到民族的团结、国家的安定（李洪乾 64）。当下，针对国防语言能力的研究方兴未艾，这一概念的理论内涵和应用范围必然会随着国防建设的实际情况而不断拓展，而作为这其中的一个重要构念，边防语言能力的相关研究却相当缺乏。尽管边防语言能力关乎国家形象、国家核心利益与国际地位，但在当前边防语言能力研究中，理论界限模糊、宏观定位缺失、战略政策缺乏是学界面临的共同问题。

二、SWOT分析框架及其国内应用

SWOT分析法自2000年以后在国内开始流行。SWOT是优势（Strength）、劣势（Weakness）、机会（Opportunity）和威胁（Threat）四个英文单词首字母缩写。关于SWOT分析法的来源，学界至今未有定论，国内更多将其视为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安德鲁斯（Kenneth R. Andrews）教授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一种科学分析方法（孙希有 90）。SWOT分析框架将被分析对象的内部资源与外部环境有机结合，使研究者能够较为系统全面地从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这四个方面进行分析。如今，SWOT分析框架已然成为一种基础的、科学的分析方法与思维模式，为各界所广泛采用。在本研究的SWOT分析框架中，“优势”能够展现边防语言能力的建设基础，“劣势”揭示边防语言能力建设的内部阻力，“机会”是边防语言能力建设的发展潜力，“威胁”表示边防语言能力的建设阻碍。

国防和军事领域研究有了SWOT分析法的帮助后显得更加简明高效，例如张兆垠将SWOT分析法用于军民融合型国防战略设计（112-22），郑雯用SWOT分析法分析了美国兰德公司的情报研究工作特点（125-28），这些以SWOT分析法为基础的研究成果在国防和军事领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在国内，SWOT分析方法常被用于分析战略决策、产业政策、企业发展，并常与层次分析法（AHP）和数学矩阵结合使用。将SWOT分析法用于语言研究应当是颇具特色的，但这样的研究在国内并不多。目前国内使用SWOT方法的语言研究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能力构建研究，例如孔令翠和刘巧玲基于SWOT分析法研究了我国外宣翻译策略，为提升我国国际话语权与文化软实力提出了建议（127-33）；第二类是能力评价研究，例如段蕾利用SWOT分析法系统分析了自媒体节目中语言表达的乱象并提出了可供参考的语言表达策略（94-97）；第三类是能力应用研究，例如常宏和唐梦楠运用SWOT分析法对军校大学英语教学的优势、劣势及面临的机会和威胁做了较为详细的分析（89-93）。相对而言，第三类能力应用研究是上述三类研究中最多的，类似的还有张金平（430-32）、李冬梅（80-81）和吴迪（84-86）等人在语言教学上的一些研究。

当前，国内学界已经基本就国防语言的定义达成了共识，在此基础上，有的语言专家和学者进行了更深层次的理论构建与探索研究，例如文秋芳等人对国家外语能力这一概念进行了理论构建（4-10）。这体现了国内学界在提升我国国际话语权和语言文化软实力时所做的不懈努

力,然而作为国防语言重要组成部分的边防语言却没有得到学界重视,相关理论和应用研究极为缺乏,本文提及的边防语言能力这一构念应成为国防语言能力框架下的关键部分。本研究运用SWOT分析法旨在探索边防语言能力的理论界限和建设情况,为未来的建设提供建议。

三、SWOT分析框架下的边防语言能力建设

语言资源是大国博弈的重要战略工具,语言战略是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建设内容(李洪乾、梁晓波¹⁾)。边防语言能力应当在国防语言能力的视域下去考量,边防语言能力建设应当成为国防语言能力战略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对边防语言能力建设进行SWOT分析,能帮助人们认清其全貌,为今后不断完善理论打下基础,为制定下一步边防语言发展战略提供建议。

(一) 优势: 庞大厚实的边防语言机制

边防语言能力的运用应该依托特定的体制机制,而边防语言能力建设依赖于体制平台和保障机制。体制平台涉及一个国家的边防体制,保障机制则包括边防语言的语种、人才、技术、装备和机构保障。一个国家的边防语言应当形成一种维护领土主权、保障海洋权益、解决边海防争端、对周边国家形成威慑力并能够服务于政治和外交的综合实力。边防语言的体制机制,应当是一个成熟完善、运行有效、执行有力的系统,如“国防部——国防语言办公室——边海防语言办公室——边海防单位——边防语言”这样的纵向垂直的系统或者“边海防体制——边海防单位——边防语言”这类横向平行的系统。边防体制机制是边防语言能力的实战平台,也是国家行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各国的边防体制主要有3种类型:边防军体制、边防警察体制、陆海分管体制(李国锋 58-59)。与我国在陆地交界的俄罗斯、蒙古国和越南实行的是“一家独管”式的边防军体制,它具有权责明确、组织严密的特点。这种体制下的边防语言体制可以看成是一种横向平行的系统,便于边防语言知识的传播和边防语言经验的共享。与我国海上接壤的日本及与我国毗邻的泰国分别属于陆海分管边防体制和边警制度,这两种边防体制下,其边防语言能力的平台拥有更多的部门基础,例如,负责抵抗武装入侵的边境警察与负责打击越界走私、海上偷渡的边警部门,以及负责海关口岸的工作人员与负责海上巡逻的海岸警卫队,都必须具备相应的边防语言能力,同时也构成了边防语言体制的重要部分。

边防语言能力建设始于作为语言使用者的人,发展于由人构成的机构,依赖于边防领域的体制机制。我国现行的边防体制是公安部主导、多部门参与的体制,这一体制下的边防语言能力同样具有极其广阔的平台基础(洛桑平措 45)。纵观全球,大多数主权国家同时具有陆地边界与海洋边界。在海上方向,海关口岸、港口和沿海地区的公安部门、海防官兵、海警、边检工作人员都是边防语言能力建设的实践者和参与者;在陆地方向,边境派出所、边防会谈会晤站、边防官兵、边警、口岸通道工作人员也为边防语言能力建设做出了贡献,这些部门和人员在边防建设、边境管控、边界斗争、边检事务的实际工作中必然会积累大量的语言实践经验,

为边防语言能力建设提供坚实的语种、人才、技术、装备和机构保障。符合各国国情及现阶段实际且相对完善的边防体制机制，是边防语言能力建设的重要基础和主要优势。

（二）劣势：补足边防语言能力的短板

边防语言能力建设的立足点应当是人才的培养和人力资源的使用。无论是在边检工作中的正常交流，还是边界斗争中的喊话对峙，抑或是边境管控中的摸底排查、卡点盘查，都要通过使用边防语言的人。换言之，人力资源是边防语言能力建设的首要资源，人才培养是其中的关键环节。相对于更受重视的国防语言人才培养，边防语言专业人才的培养在世界范围内都较为欠缺，战略规划尤其缺少，而这正是提升边防语言人口的重要基础。有学者指出，国防语言人口是指服现役的、能够为国防和军队服务的外语人口（傅岩松、彭天洋 20），边防语言人口则是国防语言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由于重视程度不高，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边防语言人才的数量底数和质量底数是无从知晓的。这其中特别让人警惕的，是边防多语种人才的缺乏。这里的多语种不仅指外语，也包括少数民族语言。例如，美国、印度、俄罗斯与中国都是多民族国家，不少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各民族内部也往往存在多种方言。边境地区大多数是少数民族聚居区，能同时掌握外语或少数民族语言的多语种人才在世界各国都属稀缺，这给边防语言能力建设带来了诸多不利影响（于乾 60）。在中国，内蒙古的边检站人员要学蒙古语，吉林的边检站人员要学朝鲜语，新疆边检站人员则要学维吾尔语、哈萨克语等，只有掌握了当地少数民族语言，才能保证边防检查工作顺利进行（张佃成 41）。正因如此，边防语言人才培养的战略规划显得十分重要。

从国防语言能力视域看，边防语言能力明显存在发展方向不清、定位不明的问题，未来的建设必然路途漫长、任务艰巨。美国在这方面处于国际领先地位，例如“国防部语言技能、区域知识、文化能力的战略规划：2011—2016”（US DoD, 2011）、“语言技能、区域知识、文化能力实施计划”（US DoD, 2014）等官方文件早已成为美国各军兵种加强语言能力建设的指导方针，其以语言能力为核心的系列概念得到了充分普及和发展。由于美国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普通话和中国地区方言被列入美国政府的“关键语言”（critical languages）清单（李艳红 1）。美国政府和美军在语言战略上的一些举措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这其中有值得我们学习和研究的地方，正如梁晓波等人强调的那样，多层次、多口径、多部门、多方位的联合参与，使当前美军语言文化建设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45）。只有先从顶层设计上做好边防语言能力战略规划，才能使边防语言逐渐变成保障有力、长期有效、持久威慑的有力武器。

（三）机遇：抓住边防语言群众的大好良机

在边防事业的各种实践中，边防语言的人力资源不仅立足于边防语言专业人才的培养和使用，还在于群众基础这个充满变数却极具潜力的因素。无论是战时还是平时，群众基础一直是当局者不可忽视的要素。在边防建设、边界斗争、边境管控、边检事务的实践中，广泛的群众

基础是边防语言能力运用和发展的沃土。例如,在边防一线的基层单位,齐心共建、信息互通、资源共享的群众工作是一项重要工作内容,许多单位会通过边民群众、边民信息员和护边员获得及时有效的信息,海上的渔民、商船也可成为国家海防的机动前哨。在边检站、海关这类单位,通晓宗教和民俗的群众志愿者能为边防工作带来极大助益。在中国,建设边防语言能力的机遇良好且难得,拥有这非凡机遇的重要前提便是上下齐心、军民融合、干群合力的牢固的群众基础。

牢固而坚实的群众关系为边防语言能力的运用提供了直接的人力资源,团结和睦的氛围为边防语言能力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在边界斗争和边境管控等边防活动中,边防语言往往具有一定的军事色彩,此时边防语言能力建设的军民融合变得更加重要。美军在战略和战术层面把外语培训与语言研究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其国防部与地方大学密切合作,这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战地人员的语言能力,并为其提供了语言学习和应用的资源(张天伟 3)。而我国边境地区群众基础普遍较牢,边防语言人才的来源除了院校机构的培养和边防单位的锻炼,还直接来源于边境地区的广大群众,边防语言能力具有军民融合的大好发展机遇。我们可以借鉴美军国防语言人才储备的军民融合策略,利用好牢固的群众基础、广泛的地方资源、强大的机构网络,抓住机遇,不断推动边防语言能力建设(庞超伟、杨波 1-4)。

(四) 威胁: 超前储备应对威胁的语言能力

作为领土前沿、斗争一线的边界地区具有多视域安全环境复杂多变的特点,这给我国的边防语言能力建设带来了严重挑战。事实证明,我们应当超前发展应对威胁的语言能力。中印边界陈兵对峙是国民难以抹去的记忆,边防语言在这其中扮演着不可小觑的角色。在边界对峙事件中,边防官兵通过拉中英文字横幅、挂中英文字标语的方式将边防语言运用到边界斗争中;在中印边界地区特别是争议地段的一些石堆上,也有解放军边防官兵喷涂的口号和标记。复杂的边界斗争无疑给边防语言能力建设带来各种或有形或无形的巨大挑战。

边防语言能力建设的另一个挑战,是边民国家意识淡化所带来的威胁。受全球化思潮的侵袭和国外敌对势力的干扰,不少边民的国家意识淡化。例如在中越边境,越南政府在强烈的护国意志驱使下,大力开展其北部边疆的巩固性建设,这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中国边民的国家意识(谷家荣 13-18)。历史上的新疆“伊塔事件”曾震惊世界,六万边民携牲畜举家叛离国境。边民是国家守土固疆所依靠的边防力量,也是国家兴边安疆所依托的边地主体(张飞 59)。边民的国家属性赋予了边民在边防语言能力建设中的独特地位,他们是边防语言的重要来源,也是语言建设的重要资源。边民国家意识的淡化、边境地区语言文化功能的弱化,以及复杂的边界斗争使边防语言能力建设面临现实威胁和艰巨挑战。

从国防语言能力视域对边防语言能力建设进行SWOT分析,不难看出,在世界各国边海防体制逐渐适应国情变化并发展成熟的背景下,边防语言能力建设具有广阔的平台和扎实的体制基础,而抓住边防语言群众基础这个不确定性因素更能为此提供良好机遇,但是边防语言人才培养战略缺失是各国所普遍面临的问题。不同地缘政治环境中的边境语言文化所面临的挑战给边

防语言能力建设带来了现实的威胁。

四、对我国边防语言能力建设的建议

边境地区是国家疆界的起止处，极易因为战略地位、经济交往、文化信仰、政治制度、民族问题乃至领土主权而产生矛盾。同时，边境地区常常是一个国家地理位置相对偏远、经济相对落后、对外交往频繁、人员来往密切、偷渡走私严重、安全形势复杂的地区，往往会在国家安全、领土安全、民族安全、政治安全、文化安全、检疫安全、军事安全等领域遭遇最为严峻的挑战。因此，强大的边防语言能力就成了国家治理边疆、管理边疆、稳定边疆的重要依靠。基于对边防语言能力建设的SWOT分析，针对我国边防语言能力建设的实际情况，本研究拟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首先，应当加强边防语言能力战略特别是边防语言专业人才培养的战略规划，进一步摸清边防语言能力的底数。如上文所言，边防语言能力是国防语言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我国现阶段国防语言战略缺乏顶层设计，宏观政策定位缺失，语言能力标准缺位（傅岩松、彭天洋 20）。加强边防语言能力建设，必须依托国防语言发展战略，与国防语言能力建设保持一致步调，依据党和国家的治边兴边政策方针，制定出从顶层到末端、统揽全局的发展战略和实施计划。加强我国边防语言能力建设，必然要进行大量的调查研究，要摸清边防语言人才底数，以全面掌握边防语言的现实需求和实际情况。边防语言能力战略与人才发展战略作为国家边防语言能力建设的顶层设计，如同战机的图纸、施工的蓝图，不可不察。

其次，应当建立和完善边防语言体制机制。可以依托我国现有的边防体制，突出边防语言能力的重要位置，在政策上向边防语言专业人才适度倾斜，并在一定级别的机构设立专门的边防语言办公室，以指导各边防单位的语言事务，集中解决边防基层单位和工作人员在日常工作、对外交流、信息发布与传播、文献翻译等方面遇到的语言问题。这种边防语言机制的完善，不仅具有其本身的效益，对于人民群众而言还具有教育意义。换言之，边防语言体制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将是对国防语言能力建设的促进、对国防教育内容的补充。

再次，应当巩固和深化边境地区边防语言的群众基础。人民群众是我国边防事业的建设者，也是我国边防语言能力建设的参与者。长期以来，边防单位和边防工作人员已经打下了牢固的群众基础，“鱼水情深”一词经常用于形容在边境地区军民融合、军民共建的军警民关系。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群众基础的建立和巩固绝不是一劳永逸、固定不变的，特别是在信息爆炸和自媒体泛滥的当下，这一问题更不能“吃老本”。建议建立边防语言志愿者流动站，与社会上的边防语言力量建立持续有效的联络；或者在边境县市设立边防语言培训机构，将其作为院校机构特别是民族大学和民族学院的特色专业，让具有一定文化和语言水平的普通民众成为边防语言培训机构的教练员，以此巩固和深化边防语言的群众基础。

最后，应当强化边境地区语言文化实力。经济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国国民的思想产生

了冲击,边界在某些边民眼中成了一道无关紧要的铁丝网和隔离墙。这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边疆文化意识的淡化和边防语言文化实力的弱化。强化边境地区语言文化实力,首先要在舆论上树立正确的导向,让内地人民群众认识边疆,关注边疆,关心边民,让处在祖国边陲的边民时刻意识到自身的重要性,提升其文化自信、自我认同与家国情怀。其次,还应保护好边境地区少数民族的语(方)言和文化,将少数民族的语(方)言列入边防语言的重要部分来运用和发展,这样既能强化边民的国家意识,又能提高我国应对复杂边界斗争的实力和潜力。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加快边疆发展,确保边疆巩固、边境安全”。边疆的稳固、边境的安宁需要边防语言的实践,边疆的发展也离不开边防语言能力的建设。语言已成为一种重要的国家战略资源(李洪乾、梁晓波 6)。边防语言与边防话语关乎国家领土安全和主权完整,我国边防语言能力建设任重道远。

引用文献 [Works Cited]

- Chang, Hong, and Mengnan Tang. "SWOT Analysis of English Teaching in Military Schools and Study of Teaching Strategies."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and Research*, no. 1, 2015, pp. 89-93. [常宏、唐梦楠:《军校大学英语教学SWOT分析及教学策略研究》,载《考试与评价(大学英语教研版)》2015年第1期,第89-93页。]
- Duan, Lei. "The Language Expression Disorder of the Comperes in Self-media Programs and Its Countermeasures." *China Radio and TV Academic Journal*, no. 8, 2019, pp. 94-97. [段蕾:《自媒体节目主持人语言表达乱象及对策》,载《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9年第8期,第94-97页。]
- Fu, Yansong, and Tianyang Peng. "On Strengthening China's Defense Language Capability in the New Era: Demands and Solutions." *Journal of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no. 3, 2014, pp. 18-22. [傅岩松、彭天洋:《新形势下我国国防语言能力建设的思考与对策》,载《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第18-22页。]
- Gu, Jiarong. *Border People's Life Politics: Memories, Mentality and Actions among Minority Ethnic Populations along the China-Vietnam Border in Yunnan Province*.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2013. [谷家荣:《边民生活政治:越跨境民族的记忆、心境与行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 Kong, Lingcui, and Qiaoling Liu. "Translation is also Marketing: The Study of Translation Strategies for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based on SWOT Analysis." *Foreig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o. 1, 2018, pp. 127-33. [孔令翠、刘巧玲:《翻译亦营销——基于SWOT分析法的外宣翻译策略研究》,载《外国语文》2018年第1期,第127-33页。]
- Li, Dongmei. "The Exploration on the Mode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Learning: The Combination of MOOCs with Flipped Classes." *Overseas English*, no. 15, 2015, pp. 80-81. [李冬梅:《慕课与翻转课堂相结合的外语教学模式探索》,载《海外英语》2015年第15期,第80-81页。]
- Li, Guofeng. "On Foreign Border Defense Systems." *Conmilit*, no. 2, 2000, pp. 58-59. [李国锋:《国外边防体制管窥》,载《现代军事》2000年第2期,第58-59页。]
- Li, Hongqian. "The Study of Language Policy for National Defense from the View of National Security." *National Defense Technology*, no. 2, 2015, pp. 63-66. [李洪乾:《国家安全背景下的国防语言政策研究》,载《国防科技》2015年第2期,第63-66页。]
- Li, Hongqian, and Xiaobo Liang. "The Problems of China's Defense Language Education Program and Their Countermeasures." *Journal of Yunmeng*, no. 2, 2018, pp. 1-6. [李洪乾、梁晓波:《语言战略化背景下的我国国防语言教育现状及策略研究》,载《云梦学刊》2018年第2期,第1-6页。]
- Li, Yanhong. "American Critical Language Strategy: Framework and Goals." *Foreign Languages Research*, no. 2, 2016, pp. 1-8. [李艳红:《美国关键语言战略实施体系的构建和战略目标》,载《外语研究》2016年第2期,第1-8页。]
- Liang, Xiaobo, et al. "A Perspective on th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nd Measures of Language and Culture in the US Armed

- Forces.” *National Defense Technology*, no. 1, 2013, pp. 44-50. [梁晓波等:《美军语言文化发展战略与举措透视》,载《国防科技》2013年第1期,第44-50页。]
- Liang, Xiaobo. “Strategic Measures for the Building of Defense Language Capability under the Principle of Economy.” *Foreign Languages in China*, no. 4, 2019, pp. 22-28. [梁晓波:《经济原则指导下的国防语言能力建设——战略与举措》,载《中国外语》2019年第4期,第22-28页。]
- Luosang, Pingcuo. “On the Development of My Country’s Border Defense Management System.” *Modern Economic Information*, no. 5, 2019, pp. 45, 47. [洛桑平措:《基于我国边防管理体制发展的思考》,载《现代经济信息》2019年第5期,第45,47页。]
- Pang, Chaowei, and Bo Yang. “The US Military’s Civil-Military Integrated Defense Language Professional Reserve: Establishment of the US National Language Service Corps and Its Implication.” *Foreign Languages Research*, no. 5, 2016, pp. 1-4, 112. [庞超伟、杨波:《美军军民融合式的国防语言人才储备研究——美军国家语言服务团的建设及启示》,载《外语研究》2016年第5期,第1-4,112页。]
- Sun, Xiyou. *Analysis Methods of Competitive Strategy*. China Finance, 2003. [孙希有:《竞争战略分析方法》。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
- Wen, Qiufang, et al. “A Model of National Foreign Language Capacity and Its Trial Use.” *Foreign Languages in China*, no. 3, 2011, pp. 4-10. [文秋芳等:《国家外语能力的理论构建与应用尝试》,载《中国外语》2011年第3期,第4-10页。]
- Wu, Di. “Effects of Flipped Classroom upon Spoken Language Teaching of College English from a SWOT Perspective.” *Journal of Jilin Teachers Institute of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no. 6, 2018, pp. 84-86. [吴迪:《SWOT视域下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对大学英语口语教学的影响》,载《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第6期,第84-86页。]
- Yu, Qian. “Several Points of Understanding on Strengthening Border Control.” *National Defense*, no. 4, 2010, pp. 60-61. [于乾:《加强边境管控的几点认识》,载《国防》2010年第4期,第60-61页。]
- Zhang, Diancheng. “The Importance of Minority Languages in Border Management.”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tudies*, no. 8, 2012, pp. 41, 50. [张佃成:《浅析少数民族语言在边境管理中的重要性》,载《语文学刊》2012年第8期,第41,50页。]
- Zhang, Fei. “The State Attribute and Status Function of the Border Residents.” *Guangxi Ethnic Studies*, no. 3, 2019, pp. 59-67. [张飞:《边民的国家属性与地位功能》,载《广西民族研究》2019年第3期,第59-67页。]
- Zhang, Jinping. “Construction of a Digital Network English Language Lab Based on SWOT Analysis.” *Research and Exploration in Laboratory*, no. 4, 2012, pp. 430-32. [张金平:《基于SWOT分析的英语数字网络语言实验室建设》,载《实验室研究与探索》2012年第4期,第430-32页。]
- Zhang, Tianwei. “Foreign Language Training System in the American Army.” *Foreign Languages Research*, no. 6, 2013, pp. 1-6, 112. [张天伟:《美国军队外语能力的培养体系及其启示》,载《外语研究》2013年第6期,第1-6,112页。]
- Zheng, We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telligence Research Work in US RAND Corporation and Its Revelations.” *Information Studies: Theory and Application*, no. 7, 2012, pp. 125-28. [郑雯:《美国兰德公司情报研究工作特点及启示》,载《情报理论与实践》2012年第7期,第125-28页。]
- Zhang, Zhaoyin. “Strategy Design of National Defens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eaturing Military-Civilian Integration Based on SWOT Analysis.” *Management Review*, no. 3, 2011, pp. 112-22. [张兆垠:《基于SWOT分析的军民融合型国防战略设计》,载《管理评论》2011年第3期,第112-22页。]

◇责任编辑:吴晋先